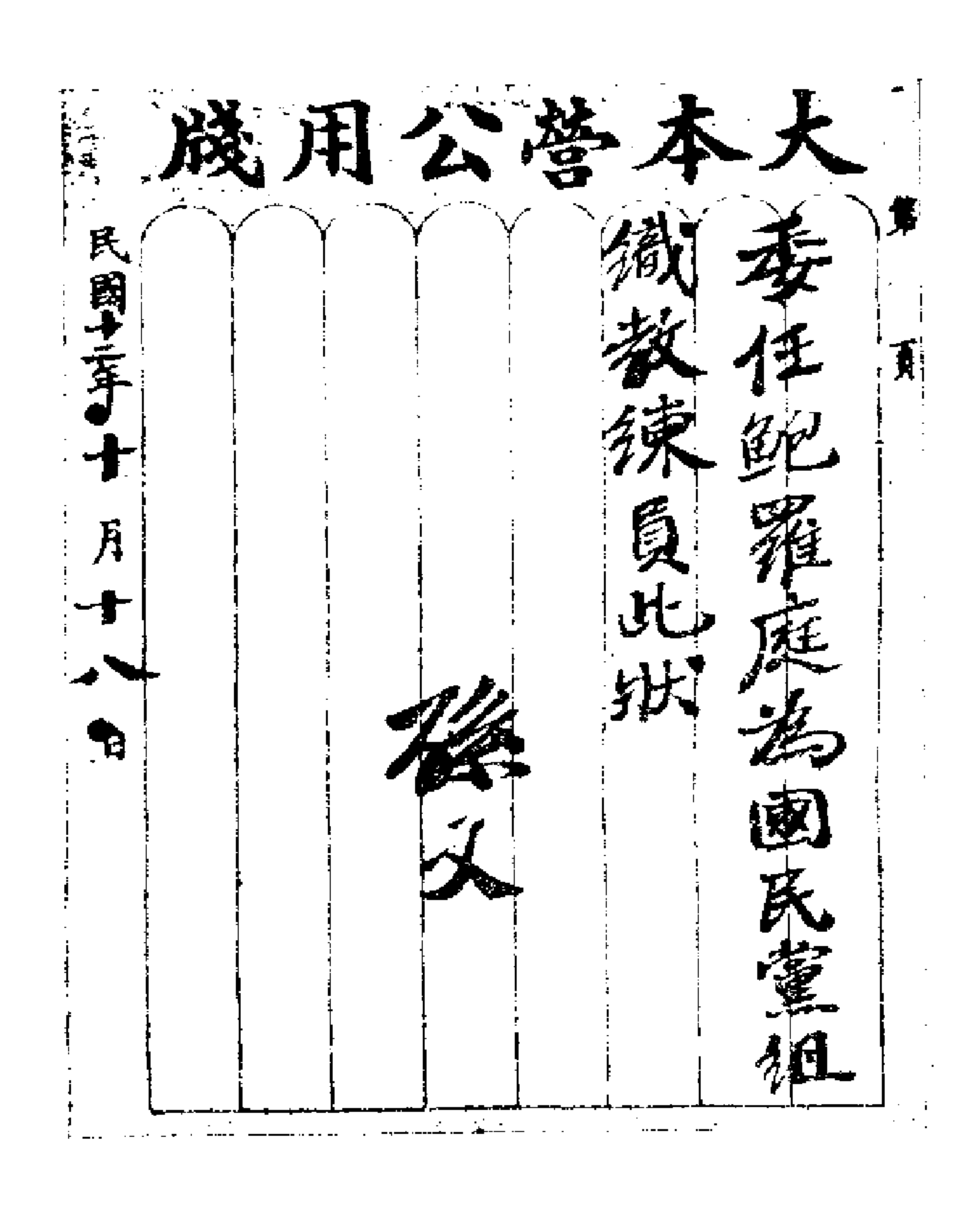


大本營公用牋

第　頁

委任鮑羅庭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此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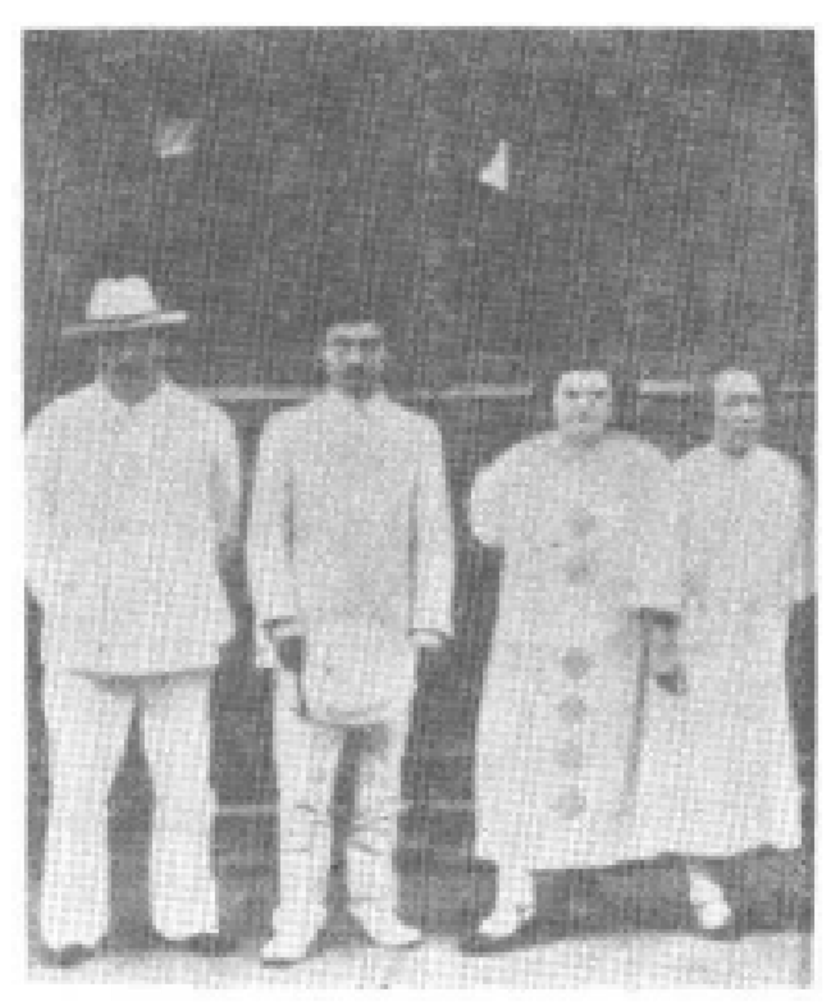
孫文

民國十二年十月十八日

孙中山所写聘请鲍罗廷为中国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的委任状（1923年）



在广州时的鲍罗廷（1925年）



欢送北伐军北上
左起：鲍罗廷、鲍罗廷的儿子和妻子、何香凝。(1926 年摄于广州车站)



鲍罗廷在武汉群众大会上演说（1927年）



鲍罗廷在武汉住所，左臂因骑马摔伤（1927年）



1927年 9 月回莫斯科后的鲍罗廷

编 者 说 明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为了推动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发起组织编辑的。《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就是其中的一种。

鲍罗廷，从一九二三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作为苏联政府派驻国民政府代表、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政策，主要是通过他来实现的。他以国民党、国民政府顾问的身份参预了国民党改组、建立黄埔军校、巩固广东根据地、镇压商团叛乱、陪同孙中山北上、进行北伐以及开展群众运动等重要活动；他和维经斯基还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经常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要会议。在此同时，他提出不少建议和主张，发表过很多报告、演说。鲍罗廷在中国革命中起过显著的作用。后来大革命的失败，他也是有责任的。正如毛泽东一九三六年所说，"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①

也正因为如此，鲍罗廷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很早就成为考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历史的重要课题。

本书是我们初步搜集到的鲍罗廷在华活动资料汇编。主要包括鲍罗廷自己的报告、文章近五十篇，中共领导人、翻

① 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8页。

译和其他人士的回忆、评论，以及鲍罗廷在中国活动记事。由于资料的分散和遗失，我们搜集到的资料仍不完全。鲍罗廷关于湖北农民运动的报告以及他在回国途中发表在《乌兰巴托新闻》上的文章和回国后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讲稿，我们还未见到全文。特别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的会议速记，看到的也不全。目前只能做到找到多少收入多少。

选入本书中鲍罗廷的论述，多无外文底本可供复核，主要是按当时可靠的中译本刊印的。这些译文质量不一，有的并有印刷错误。我们尽可能作了一些订正：遇有错字，以〔 〕号更正；遇有脱字，以〈 〉号增补；遇有残缺或无法辨认的字以□号代之；待考的字以〔？〕号存疑。此外，部分篇章没有标点或标点不全，酌情加以标点，有些地方还增加了题注和脚注。

我们在编辑此资料的过程中，曾得到李新同志的支持，陈庆华、刘明逵、林海、刘桂生等同志的帮助，同时还得到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广州起义纪念馆、广州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一大”纪念馆、上海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一些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在资料选录和全书编排方面难免有不妥之处，至希同志们指正！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是张注洪、杨云若等同志。李玉贞、李辉、张奇志等同志参加了部分内容的翻译和材料搜集工作。

一九八二年七月



第一部分　鲍罗廷关于中国革命的报告和文章











目 录

第一部分

鲍罗廷关于中国革命的报告和文章

对觉悟社记者谈对于中国内情之观察*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八日）

《商报》载十九日粤讯云，俄国代表鲍罗庭氏来粤，考察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状况，日昨觉悟社记者趋访鲍氏，询以对于中国内情之观察，鲍氏发挥尽致，极中肯要，兹译述如下：

（记者问）先生来华，对于中国社会之观察如何？（鲍氏答）外人初到中国，别个外人常告之曰，中国人其所处境遇，及其习惯心理等，极难了解。余（俄代表称）非此等之外国考察家，余在中国居住二十年，岂尚自认不知中国者。余相信此是一种阴险及有时不自觉之宣传，以使全世界之人，相信中国国情确如是不同于别国，及确如是退步，须急由先进国为之开化。藉此为外人在华所做之种种恶事之辩护，及为领事裁判权，外国法庭，租界，管理关税，自命保护中国主权，及其领土完全等等之辩护。在中国之外国报章上，毁谤中国之爱国要人，使无数外国走狗，得遂其欲望机会，以轻藐中国国民，而待之如次级之民族。此即所谓“文明国开化

* 此文原题为《文明国开化退步国》。——编者

退步国”之责任。唯余则不见中国与世界各国政治上经济上在同一之发展程度上有如何之差别，即有差别，亦不过属于外部之物而已。同一事情，别国大行之，似有正当之组织，在中国则小行之，似无组织，其方法或较旧式而已。即指吞款谓或贿赂者而言，此无他，亦不外文明国人所谓经纪费，但无庄严之事务所及告白招牌而已。余在华曾遇许多政治军人，新闻记者，科学家，律师，工党首领，工人，女子，彼等亦如世界别国各兄弟姊妹，具同一之贤愚善恶。余敢说中国较以开化中国为任务之各国，尤有理想之主义。其所以然者，非中国有异于人，亦因彼为一被压迫之国家，国民正为谋国家独立，脱离千古未闻之外国掠夺而奋斗也。

(问)先生对于中国政治之观察如何？(答)中国在纷乱之状态中，已十二年矣，凡视中国为许多消费人，天生成文明国消纳不知所用之实物之市场者，此种观念余极感不当，此余所当说出者也。且一大国民，欲图谋方法以适合别国经商之需要，实非易易，况彼复不能自由以自救耶，试观历史，美国殖民地革命，须经若干年而后终止，法国革命，又经许久而完成其历史上之工夫，凡社会政治之大受变动，需经许多时日而后完成，国民运动亦须许久而后能自定其所运动之如何进行与如何贯彻目的，中国现已有一种势力，为将来引导其国民运动以至于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此最后余所满意者也。该党现尚未自觉其自己之力量，及未组织完备，以完成其历史的职务，但吾人深信其不久即能自觉，必能组织完备。盖吾人一想该党有如是伟大之领袖，如孙中山先生其人便知之也。孙先生之经验，将能供给彼党之所缺乏，其所缺乏者何，军事精神，及国民的组织者二是也。中国国民党主义之精神，正在勃兴奋斗，一有军事精

神，及国民组织，则国民党主义之精神，将更为之增势。

（问）俄为劳农先进国，革命已成功，中国劳工事业在萌芽，其发展方法应如何？（答）俄人因革命之故，各阶级牺牲甚大。但此奋斗之重任，均落在工人身上。今日吾人（指俄人）之所以能成功者，皆因工人当内乱时在战壕作战或节衣缩食以供给军队，而使俄罗斯团体坚固也。劳农革命成功，乃能造成俄国民现在如是发展之境遇，此境遇之结果，即令大多数人有最大之幸福。各国劳工，皆正在奋斗，以求获此幸福境遇，但现已得之者，惟俄罗斯而已。故全世界无数工人，皆视俄国工人为劳工奋斗之先锋。至于中国之劳工劳动，余信其发展之最要条件，在与国民为中国统一自由独立之奋斗联合，如俄之工人一般。中国劳工，必须自造发展必要之境遇，但此境遇须待国民党所引导之国民之奋斗之成功，而后能实现，中国一日不脱离半殖民地之状况，劳工即百无达其目的之希望云云。

（原载《向导》第45期，1923年11月9日。）

在广东工联等团体举行俄国革命六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

……当俄国社会革命发生之后，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者就以为俄国社会革命若成功，必将惹起全世界的革命，与他们不利，他们费了许多心机，他们费了千万的金镑，佛郎，供给反对党来压迫苏维埃政府。……

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包围着了俄国，好象一道铁环，但是俄国的人民决心要将自己从国际的压迫政府的专横中解放出来，忍着饥饿来与敌人奋斗，努力求自己的独立与自由。……俄国的青年男女，在他们光荣的独立自由战争的期间，并不曾击球优游；他们都参加到红军里面，他们为他们国家的独立，反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而战，他们为自身的幸福，打倒国内的压迫阶级而战，他们并不嬉游，他们都到前敌去作战，到战线上守卫去……现在广东也好象俄国当日那种情形，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正同那般反对民治者作战，虽然广东尚有三分之二在敌人手里，孙中山和他的党有良好的主义，他们要求国家的独立与自由，毕竟是要成功的。……但是，现在中国尤其是广州的青年男女，我想他们只知道打球优游，未有把他们自己国家的独立与自由放在心上！……俄国的青年男女牺牲他们生命去求得国家的独立，求得他们

* 收入本书的是该演说中勉励中国青年的部分内容。——编者

自己的自由与幸福。……现在他们是何等的快乐，他们现在打起球来了，他们现在很欢乐的在那里携手闲游。他们的国家现在不仅解除了国际侵略者的压迫，你们请看，无论何国人，想到俄国去观察的，不得俄国的允许，决不许他们进去。……俄国革命成功之后，经济的状况，一日进步一日，若使你们到俄国去，你们就可以看见他的进步，而且进步得非常之快。但是你到德国去，你们不仅看不见他的进步，并且日见其颓败不已！现在的全欧洲并无有别的，只充满了衰败饥饿与恐慌。俄国革命的成功，全靠劳工阶级，在德国呢，他的劳工阶级随着社会民主党，试问他们现在做些什么？他们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德国的现状如何？……

国际帝国资本主义者压迫着许多弱小民族，拿他们做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现在独立运动成功的只有土耳其，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革命运动，是全世界最普遍最急切的需要……谁为革命而战？谁为革命而战死？革命的成功与胜利属谁？革命的威力可以打破什么？接济什么？……不用说只有青年的男女才能为革命而战，只有青年的男女才能为革命而战死，革命的成功与胜利仅属于为革命而战且敢于战死的青年，革命的威力可以破内外的压迫阶级，解放民族救济民众。……给土耳其以独立自由的并不是默哈黑〔墨〕特，孔子并不能给中国以独立自由，给俄国以自由独立的并不是托尔斯泰……孔子给你们独立与自由否？如果给了，你们的独立自由在那里？土耳其独立自由的获得，全靠人民自己的努力；俄罗斯的成功，全靠俄国的青年男女奋斗与牺牲；你们的独立与自由，也必须全靠你们，你们不努力，谁替你们努力？……

中国人民必须为他们自己的独立自由而努力，国民党尤

其是国民党的青年男女更要负这重大的责任。你们必须把国民的组织拓〔扩〕大起来，严密起来，来应付这个要求……。现在为了你们国家的独立与人民的自由，许多可怜的兵士与苦力正在前线作战，为你们争独立求自由。你们自己现在做什么？你们打球么？闲游么？整天在那里乱叫：陈炯明来了！陈炯明来了！你们做什么？你们必须加入国民党，你们必须使国民党扩大，你们必须使国民党有力，你们必须使国民党扩大与有力以求你们的独立与自由，独立与自由必须汝等青年男女努力才能获得的。……我听说国民党正要改造，正要向他的新要求——扩大与有力——方面改造，……现在那些可怜的兵士与苦力正在前敌作战，你们应当学俄国的青年男女，加入前敌，努力向内外的敌人一齐进攻。你们今日能学俄国青年男女数年前的奋战，你们将来才可有俄国青年男女今日的成功。我希望中国青年男女大家把争独立自由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那末，你们的国家才能独立而发达……

（摘自知依：《听了鲍罗廷君演说之后》，载1923年《新学生》第10期第76至77页。）

列宁之为人*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主席，国民党朋友及代表诸君：列宁逝世，非特关系于俄国，而且关系于世界中优秀分子甚大。列宁同志为我们领导及指导员，他是世界所有受压迫被利用之民族的朋友，不但是受压迫被利用的民族的朋友，而且为受压迫及利用的朋友中奋斗之人，又且为奋斗之人中的领袖。此次列宁同志逝世，我们所受之损失，系不能补救的。（鼓掌）我几十年来在俄国及环球各地所认识的人不少，列宁之为人仁心慈善，倡人道，比我们所认识之人为甚。因他是如此之好人，在世界上各种不好名词及最坏批评均加在列宁身上。世界上被人收买之机关报纸，对于最好之人而用最卑劣之手段，诋毁之，攻击之，果是何理耶？诸君有研究及此否？吾为说明之。因为列宁他敢说一句话，谓现在世界上可分为两种人，一种人之人数约为二万五千万人，另一种人大概是十二万五千万人。二万五千万人是压迫的人，而十二万五千万人是受压迫的人。他敢说此句话，故他被人攻击。在一千九百十七年之时，人类中有两种人，互相战争，果何为而战争耶？其为真理为民治而战，然皆为假话，如已为帏幕盖起来，外面是很

---

* 此文系1924年1月25日鲍罗廷在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悼念列宁逝世时的讲话。原无讲题。讲前孙中山说鲍罗廷讲《列宁之为人》，故用此为题。——编者

清楚的而内实污浊不堪，列宁将帏幕扬起，发现污浊不清之情状。内社会受压迫之人甚重，世界上之战争就是如此而已。列宁既发现社会上实在情形即真理之后，返回俄国将真理演述于俄国人民，非特得俄国人民信任，而世界之人民咸为之动，故世界各国特加以种种污蔑攻击，并且对于俄国人民用飞机及军舰及经济将俄封锁，并且用金钱收买攻击列宁之人。列宁在俄国民族中为领袖，虽为各国反动派所攻击而仍然奋斗。代表诸君现在能到列宁遗体之地定能看见俄国无数人民男女老幼表示一种悲哀悼惜情形，或者诸君能到伦敦、巴黎、柏林各处必能看见受压迫之民族，无分阶级，无分人种，对于列宁表示哀悼者。可见列宁之死亡，各受压迫之民族，不但死了一个良好朋友而且是失了一个受压迫奋斗中的大将。寻常所说伟大之人物及伟大者大多数是在图书馆中有几本陈旧中的书籍是他著作的，或是孝子贤孙用金钱来请人代他所作传记的，其所谓伟大人物者非吾所谓伟大人物，有学问且为人所敬仰者，而其死后令人景慕其思想及教训，其人虽死，而且思想教训仍在人世，且比其人在世时更见进步。如列宁在世时，如遇有事故，均推就于他身上不大奋斗。如他死了，则一切事故均须由个人自行处理，努力奋斗，世界民族之服从列宁，与服从耶稣不同，是服从他的主张，永远不变的，今天诸君是对于列宁兴哀悼之念，我十分感激，对诸君表示谢意。列宁为东方的朋友，即被压迫的朋友。现在死了，诸君有多少与他不甚亲切而皆哀悼，我甚对诸君表示谢意（鼓掌）。列宁现已死，而列宁主义仍在，所以列宁死了之后，关于东方，关于被压迫民族，国民党之责任，须加重一点，国民党领袖，责任亦加重一点，列宁虽死，列宁主义万岁。（鼓掌）

（伍朝枢译，原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26日第3版）

致孙中山先生电

（一九二四年三月）

孙中山先生鉴，英意两国未承认苏俄之前，驻京俄代表要求首先恢复中俄两国之外交，然后开会讨论解决中俄悬案各种问题。迨此等强国承认苏俄之后，驻京俄代表本可乘时利用本国巩固之机，对北京政府交涉，取不退让之态度，此为意中之事。但事实不然，而该代表反退让一步。其最要之点，以首先解决开会前总纲，以为将来会议时之根据，然后恢复两国外交。因此加拉罕与北京政府之代表，详细讨论有本月十四日，完成两国代表同签之协定。此协定签字后，而北京内阁否决之，且否认其代表之签字为有效。北京内阁所否认之协定，是为何等内容？即包含中国国民党之外交政策，取消前俄与中国所立侵夺中国主权之各种条约，取消租界及领事裁判权，承认中国在蒙古之主权。决定中国同有监管中东铁路之权，至中国有财力能赎回时，则完全归为中国所有，并退回庚子赔款，移作教育之用，主张新条约为将来双方保绝对平等。此种协定，如得诸其他帝国，则中国人须牺牲几许血，苦〔若〕干财方能得之，中国（国）民党亦须大经营，方能取得此协定所列之权利。此种协定，北京内阁否决之，必不因此协定不利于中国也明甚。然则此种协定，果为伊谁之利而否决之乎？此协定系本诸中国国民党（一月二十三日）在广州大会时决定之外交政策，而为中国民族主义之大胜利也。革命进

行中之俄国，已与邻邦之争自由者互相携手，中国得此，可谋脱离半殖民地之第一步，此协约经俄国提出，而北京内阁竟拒绝之。该定原文乃由邮寄呈内阁，任何内阁称为一国之代表机关，有无却受之充足理由，乞明察以判之。先生之民族主义，恐为此种不利于国之行为所阻碍，此为重要之事，尚希贵民党加之意焉。鲍罗廷叩。

（摘自《新民国》1卷5号，1924年3月30日，第18—19页。）

谢持、张继与鲍罗廷问答纪要*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中华民国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至五时半在广州东山鲍寓）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与俄人鲍罗廷谈话。孙科翻译。

监察委员曰。今日吾二人以中央监察委员资格与君说话。

鲍罗廷曰。余以中国国民党训练员资格与君等说话。

监曰。君见过此等小册子乎。（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及宣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印行。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及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一日团刊第七号而言。）

鲍曰。未见。

监曰。君知此次发生问题之真相乎。

鲍曰。只在上海闻陈独秀君云党内发生问题。昨日胡汉民汪精卫二君来。亦提起党内问题。

监曰。即是一个问题。

鲍曰。指"非必要时不宜取敌视态度"之谓乎。（团刊中语）

---

* 鲍罗廷与谢持、张继谈话纪要，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孙科翻译的这个本子，刊此仅供参考。——编者

监曰。非尽如是。乃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之党团问题。

鲍曰。此问题须由根本上解决。勿论及枝叶。

监曰。诚然。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自己作主。须受第三国际指挥。第三国际为苏俄所创造。又须受苏俄指挥。然则俄国对中国革命。究取何种态度。是否只求友国民党。抑同时扶助共产党双方并进乎。

鲍曰。余先述国民党之真相。再提此问题。遂列举金佛郎问题。德债问题。中俄协定问题。吴佩孚捕杀工人问题。皆关系极大者。不见国民党有何等主张。中央执行委员。已开会数十次。不见议事日程有关于国民大问题之讨论。……

监曰。请君不必历数此等缺点。本党确不能免。或尚可加举数十条。今春改组。全由于此。今既改组。先须解决组织上之大问题。本体上既发生问题。作用如何。可暂不提。组织上最重要问题。是否承认党中有党。即指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而言。

鲍曰。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有左派右派之分。如方瑞麟等对中俄协定之宣言。可认为右派。共产党则为左派。

监曰。君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在党内作党团活动。认为合理乎。

鲍曰。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

鲍又曰。小册子何时发刊。

监曰。一为去年八月。一为今年四月。

鲍曰。不错。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之后。见国民党

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不起来。并有许多右派分子加杂其中。乃不得不组织党团。

监曰。依吾辈见解。君所用方法。欲令国民党复活者。实足以使国民党死亡耳。使多数小团体在同一范围内相倾轧相竞争。乃致死之道也。

鲍曰。诚然。诚可致国民党死命。惟不希望如是结果。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

监张曰。余个人素来赞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共同从事革命。此次问题发生。仍主张友谊解决。今闻君之言论。则不能不变更主义。国民党是一腐败革命党。余亦不能全否认。假如君所说共产党是新生革命团体。如斯则两种性质不相容。不如分道扬镳。腐败者团结起来。加以改良。新生者一往直前。两无阻碍。分作两起。岂不更佳。

鲍曰。第三国际认定中国革命。只能用国民党党纲。不能用他种主义。故使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全部加入国民党。如有不奉命令者。则认为违反命令。

监曰。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否全体加入本党。抑则加一部分。

鲍曰。不知。按原则说。应该全体加入。

鲍又曰。假令将共产党分出去。共产党或者更换党名。而主义仍与国民党同。徒分离革命实力也。前途必不利。

监曰。吾辈亦非绝对主张分离者。惟党团作用万不能容许耳。

鲍曰。今日两者本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

监曰。此为一重要问题。正愿与君明言。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互相提携。或可得互相利用之好结果。如只有中国

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自今春以来。只见有害。不见有利。

鲍曰。中国共产党历史甚短。在中国社会无十分势力。假使只有一个共产党人。为国民党计。亦当招之来。不可挥之去。

监曰。中国共产党。原无足轻重。因其不过第三国际之差遣。第三国际为苏俄所创。俄国对中国革命政策。将由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操纵左右也。俄国认中国共产党为俄国之子。中国国民党或可为俄国之友。尚不可知。余之观察如是。

鲍曰。误解。然吾知国民党人许多反对与俄国共产党合作。

监曰。社会主义青年团决议案及团刊第七号所登载关于国民党者。君是否认为正当。

鲍曰。此两种印刷。未经莫斯科本部审查认可。尚不能承认。

监曰。如君所说。国民党已成待毙之人。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一复活剂。将打注射针而救济乎。

鲍曰。事相类而话不能如此说。我们合作。我们合作。

监曰。国民党腐败分子。仅而退步的而已。并未表明反对民党宗旨。亦未组织团体与本党相抗衡。即使有一时的组织。亦不过一时之作用而已。并未将国民党作一对相的研究物。照此两种印刷物观之。共产党持永久之计划，将国民党作一对相。日日以如何对付国民党为切要目的。国民党不能不认共产党团为本党本体上之大问题。

鲍曰。无妨。凡党皆有左右派之分。

监曰。国民党与共产党只能说是两党。不能说是两派。君如认之为合理。吾不料所谓组织者。竟如斯。直欺人之谭

〔谈〕耳。

鲍曰。中国国民党宗旨最适用。中国尚可应用一百年。假使国民党改为共产党。吾亦不赞成。只有提皮包离广州。

监曰。诚如君所言。反面说。在中国行共产主义。尚须待至一百年之后。共产党全体既加入国民党。实行国民党革命主义。又何必另挂中国共产党招牌。保留共产党组织耶。

鲍曰。国民党中央干部。尚未能组织完好。不能指挥全体党员。又未能对全国最有关系之问题。时时有所主张。共产党不能取销自己的组织。

鲍又曰。国民党依多数决议。可自由的驱逐共产党员出党。但不希望如此作。

监曰。今日谈话只如是。改日再接续讨论。

(选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国共产党史参考资料》Ⅱ,1980年版,第327至329页)

革命党应有的精神*

（一九二四年）

校长！各位教官！以及各位学生！诸位常常看见我们外国人到这里来讲演，不发生一个疑问么？现在我自己把我们的来意介绍一下：

在中国的北边，有一个邻国，就是我们俄国。两国毗连有二千多英里，关系不消说是极其密切的。俄国的人民，总共有一万五千万。在四、五年以前，国内的情形，也和现在的中国一样，不过现在就变了。从前俄国的土地，也不是我们人民的，是列强所管有的；工厂商店也不是我们人民自己的，是外国资本家管理的；所有的交通机关，以及一切重要机关，都为资本家所有，为外国资本家所有；银行本来是一国财富所在的地方，也归了外国资本家所管理。俄国当时的经济，和政治情况，既然如此，当然所有的军队，都不是人民的军队，都不保护人民的权利，而专维护外国资本家的利益。

自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俄国发生了革命运动。在这个时期，俄国死了一千万的国民。为什么？一方面要保持资本家的利益，一方面就要反对资本家的利益，所以发生战争。在革命派的意思，是要使国家政治，和经济，都脱离了列强的操纵，让我们一万五千万人来自治。

---

* 此文系鲍罗廷在黄埔军校的演说。——编者

我们自从一九一七年，正式实行革命后，一连五年之久，都在保持革命的势力中，没有时间来看我们的邻国——中国，帮助我们的邻国。但我们却做了一个好榜样，如果中国人愿意学，就是于中国有益的地方，这榜样是什么？就是俄国的革命军的精神！

当俄国革命的时候，列强如英、美、日等国，都是反对的，他们用了几百万万钱来兴军队，造机器，以图消灭我们，想把我们俄国根本消灭。幸喜我们的革命同志，认识了我们革命的意义，而要实现自己的革命主张，所以就不顾痛苦，以与列强抗战。当时俄国又正是穷乏的时候，他们不惟不顾薪水的多少，地位的高低，简直连衣食都可以牺牲！他们两日才有一磅面包吃，也要去打仗，所以弄到后来，有今日的成功。这是我们俄国青年同志的革命精神。

关于俄国革命军的情形，等一会就有一位同志讲给诸位听，不必待我细讲。我现在所要讲的是在俄国革命成功之后，再看远东的中国如何。中国现在的情形，我老实说，比俄国未革命以前还坏，并且要坏一百倍，或者还不止。中国所有的财富，现在都已不是中国人所有。试看各种交通机关，是否都归外国人管理，关税是否归外国人管理，诸位知道么？现在中国的土地，在实际上都已不是中国所有了，处处都在外国人的掌握中了。现在中国又没有正直的国民政府出来，为国民保护利益，长此以往后患更是不堪言的！

虽然中国也曾有过两次的革命，第一次就是义和团。义和团因为一面不得国内官僚的信任，一面又受外国联军的攻击，所以结果弄得失败，不惟不能制服列强，反为列强所制服。第二次就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本来没有外人的压制，是一个最好的革命时机。无奈革命党人，又没有良好的团结。

一般恶劣的政客，全为私人的利益关系起见，遂至从中破坏自己，减少自己的革命势力。正好象和人打仗的时候，自己的同志不去杀敌人，反在后面杀自己的同志，象这样弄来，不怪第二次的革命也归失败了。

中国在近年来，乱七八糟的战争中，可是也还剩下了几个革命人物。这几个人早已立定革命的志愿，拿着革命的旗帜，在你们面前走着。我现在要请诸君扪心一问，到底想不想建设个良好的中国？如果诸位也想建设个良好的中国，就请诸位竭诚地随着这几个人去革命。

我们这次到中国来，觉得中国好象到了大海中一样，什么都没有了，单单剩下几个热心革命的人物。这几个热心革命的人物是谁，就是国民党、孙总理和帮助他作革命运动的几个同志。我曾问过孙总理，你对于中国革命已有准备么？他答道："已有准备了"。他们这几个人，现在已实行把国民党改组，重新实施他们的革命计划。又办了这所陆军军官学校，给诸位求学。他们极盼望诸位出来实行革命，如果他们来问你们对于中国的革命，已有准备没有？我也望诸位能答道："已有准备"。因为你们青年应担负中国革命的全付革命责任。

当我们大家相集在这里的时候，诸位尽可向我发问一些问题，我当能替你们解答。我想你们此时，当有这个疑问，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辛辛苦苦地预备革命，将来实行革命的时候，又安知没有那种叛党来从中自杀，象辛亥一样。如果我们要免去这种将来的危险，又当如何设法呢？这个问题是你们此时应有的问题，并且希望你们时时刻刻都把这问题放在心里。我现在把这个问题解答一下，如果诸位还有更好解答，那自然是我们所欢迎的。

我们作革命运动的人，最要紧的是勇公好善，不要枉法徇私。果然这个人不是我们的同志，就是他不和我们打仗，也于我们有害。要晓得思想不同，就是仇敌，仇敌我们就该正式驱除他，不可和他妥协。必定要这样，才可以达到真实的团结，而免得将来内部分裂的危险。其次就是要肯牺牲，只要能做的事，便尽力去作。再次就是要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标准，当时时保全人民的权利。看着国内那一党，确是保护大多数人民的利权的，我们就加入那一党，就为那一党尽力。现在中国只有这一个训练革命军人的学校。改造中国的责任完全在诸位身上。我希望诸位能特别努力，以致贵国革命于成功。

（原载《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丛书》第1集《精神教育》，1927年6月）

鲍罗廷笔记

（一九二四年）

一月二十三日白天，孙中山派一名信差请我到他那儿去。他在代表大会秘书处等我。他的头一个问题是：取消国民党宣言，而用他为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即将成立的全国性政府拟定的纲领来代替宣言是否好些。右派对这个纲领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了，反之，他们会欢迎这个纲领，把它当作是摆脱在国民党宣言草案中提出的那些可恶的问题的最好途径。在纲领中宣布，政府准备满足人民关于衣、食、住、行这四项基本要求。政府准备保卫人民的利益，但在纲领中却只字未提什么是‘人民’，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这一切，为在中国实现这个乌托邦，应当创造何种条件。因此，中国的、海外的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人当然乐于接受这个纲领，那些在海外的资产阶级化的国民党人现在感到忧心忡忡的是，党会赞成反对帝国主义，这一来他们会被从东南亚撵走。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何他们不干脆退出国民党？那样至少可以不搅扰民族解放斗争。不，他们说怎么能退出已经加入了二十年的国民党。这就是不“尊重元老”了。实际上在这种“尊重元老”下面隐藏着某些自私自利的目的。问题在于，形形色色的狡猾的家伙、政治投机者正以国民党的名义作幌子，在侨居海外的华人中间为“争取独立而斗争”募集巨款。光在加拿大就有一万华人（主要是工人）支持国

民党。事实上这些经费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用在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上。国民党的全部进款都落入了那些狡猾的家伙的腰包。暂时还可以去掠夺海外华人，又不冒什么风险，也就是说国民党对帝国主义者暂时没有任何危险（因而后者毫不反对国民党），这些狡猾的家伙就心满意足了。但从国民党在其行动纲领中明确宣布他将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而斗争之日起，海外国民党冒险家轻而易举的生财之道必将告终。

由此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海外国民党人（不是群众，而是他们的领导人——官僚，以及商人、地主）抓住了宣读过的政府纲领不放。他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以便使孙中山放弃宣言草案并用该纲领代替之。他们每天晚上都聚在一起。他们经常从后门跑到孙中山那里，竭力用通过宣言会产生的极危险后果来恐吓他。他们的朋友们从海外给孙中山打来电报，表示担心国民党落入了布尔什维克手中，如此等等。他们甚至得以在害怕分裂的左派国民党人中制造混乱。这种混乱状态已经使很重要的一点从宣言中删去了，该点谈到要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收归国有，等等。这是为了达到表面的统一对右派作出的让步。右派对自己在土地问题上的胜利颇为得意，他们又毫不松懈地“工作”，目的在于废弃国民党的宣言草案。

担心得到了证实，孙中山因奉行旧的和极有害的“尊重元老”的路线，换句话说，与加入党二十年、并在每次集会时都向他的肖像鞠躬的人们友好的路线，他尽力避免摩擦，同意撤消宣言草案，提出政府的纲领。

情况是危急的。取消宣言草案，就意味着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是毫无益处的，国民党无谓的漂亮空话依旧统治着党。

自然，我对孙中山向我提出的问题回答说，我认为用纲

领代替宣言是不能容许的。一般说来，要使孙中山改变主意是困难的。他在自己的纲领中不是从国民革命运动的具体任务出发的，而是从这个运动一百年后的远景出发的。我对孙中山说，纲领需要完成，它应当公布，但无论如何它不应和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混淆起来，因为在宣言中第一次多多少少明确地谈到了党的直接任务，以及党如何理解自己的政治原则。我认为，如果说政府纲领本身不能带来什么好处，那它自然也不会有害处。但是，如果国民党宣言被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那么它就将成为以真正革命的国民党为首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基础。乌托邦的政府纲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而宣言回答了与中国命运攸关的问题，因此，它必将成为运动指导性的和决定性的文件……

在谈话中我列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经过长时间的交谈后，孙中山决定通过宣言，同时也公布政府纲领。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也是我们谈话的议题，这件事促使孙中山作出这个决定。事情是这样的，在一些报纸上刊载了孙中山与美国大使舒尔曼的谈话。后者同孙中山谈了三个小时，而他所公布的只是有利于美国干涉中国事务的部分，其余均密而不宣。孙中山向舒尔曼表示，即使他不得不同列强各国作战，他也将用武力取得关税。舒尔曼答应对于友好地解决向广州政府转交关余的问题提供帮助，只要将关余用于改善内河航行和改善航道，而不是用于军事需要。孙中山表示赞同，但他责备了舒尔曼乃至列强诸国对待中国的不公正态度。孙中山说："列强拒绝承认按权力属于我们的东西，同我及我的政府进行斗争，同时，他们不是按照华盛顿会议的决议以自己的干涉裁减督军的军队，反而支持督军"。他对舒尔曼说，如果所有督军都裁减军队，只保留维持秩序的警

察，在这种条件下他准备参加讨论现状的华盛顿圆桌会议。舒尔曼大使只公布了全部谈话的一些片断。这些片断给人的印象是，仿佛孙中山为了裁减督军的军队，赞同外国人干涉中国事务。

孙中山问："您认为以我的名义发表声明会给人什么印象？应当做些什么来补救现状？"

对此我回答说，如果现在他沉默，那就意味着承认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关于外国人干涉等项的声明，因而任何一个中国爱国者都不会原谅他的这一声明。即使把干涉理解为由中国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来裁减督军的军队，这也是对人民的背叛。而如果声明是断章取义的、歪曲了他同舒尔曼谈话的意思——我相信声明是这样的——那就应当立即辟谣。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可以成为辟谣的一种形式，在演说中可以明白清楚地阐述与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内部事务的一切干涉作斗争的问题，同他们的一切特权和专有权作斗争的问题，关于废除以武力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问题，等等。在这种场合，孙中山有极好的机会消除关于他同外国人妥协和拥护外国对中国进行干涉的一切臆测。这样的演说将在全世界发表，到那时美国大使舒尔曼利用孙中山的名字来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勒索的企图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我一次又一次地问孙中山：他关于中国人民可能从美国、英国或日本得到某种帮助的幻想还将抱多久？难道他等待这种帮助不是已经太久了吗？现在还不该对充满幻想和失败的过去进行总结并转到新的道路上来吗？

我对孙中山说，目前您要拿定主意，是在被压迫的中国和其他被压迫国家同帝国主义世界两者之间进行调和呢，还是为争取正义者的权利而斗争。假如我不是在现在同您谈话，而

是在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胜利之前交谈，那么您可能把为被压迫国家的权利进行的斗争想象为是沦落在海外某地、只是幻想同帝国主义作战的幻想家小团体进行的斗争。目前所谈的是世界规模的革命运动。一亿五千万苏联人在支持您，现在沦为半殖民地的德国的人民在支持您，刚刚获得独立、但在帝国主义对世界其余各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毫无使自己免受毁灭的保障的土耳其在支持您。伊朗、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各国的人民都会感到您是为被压迫民族的事业斗争的战士。一句话，您当前要做出决定，您是与全世界民族革命运动一道前进呢，还是依旧去说服舒尔曼，使他相信他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公正的，甚至盼望他或者其他类似美国的国家的代表们对中国事务进行干涉？

孙中山点着头，还作着其他赞同的表示。我们谈话结束后，他和我握了握手，走下楼去，回到主席座位上。他代表委员会关于国民党宣言的报告作得极好，并成功地主持了热烈的讨论。全国代表大会赞同宣言草案。孙中山第一个投票表示赞成。

（摘自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0—74页。）

吾人之责任*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同志们，我是刚由北京来的。我现在把我在北京所见到的，向诸位说一说。我们很痛心的，就是我们丧失了我们唯一的领袖。他奋斗几十年如一日，去岁北京政变，他看到环境上有需要他到北京去的必要，所以他亲身北上，只身去同一切恶势力奋斗。当他临死的时候，曾一再说，他对中国所遗下来的党的工作应由中国青年担负。中山先生死后，我由直隶南下经过河南等省，见许多青年，同诸君一样，都表示十分愿意继续中山先生遗志与事业，军队中如胡景翼、孙岳等一班人，都有同样的表示，农工界也是如此，足见中山先生的事业，中国一般人都愿意完成的。但我经过的地方，一般人终日工作不息，终不得一饱。这种情形，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中国贫瘠么？不是的。我所到的国家，以中国为最富足，一大部分人其所以如此的苦，是因为有一部分人，不做工，吸大烟，他们这些挥霍费，都是出自贫民，这是一种极不平的事。我此次到广州来，以为东江方面的敌人肃清了，广东人民可以享点平安的幸福，但是听说唐继尧又要进攻两广了，将来战争又不知道要延长到什么时候。唐氏在滇，已弄到滇人生活不能安全，现在进攻两广，粤人又要受他的

* 此文系鲍罗廷在广州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全体职员联席上的报告。——编者

害，究竟粤人和滇人，（原文如此——编者）为什么？因一个军阀，大家都不能安静而听他一个人支配。这种事，是要诸位负责任的。我们打仗，要为人民利益而战，不要为个人私利而战。任何方面的军人，那个不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同胞，因为个人的私利，使我们残杀，这真是一件值不得的事。你们中国国民党，可以说是完全为国为民的政党，大家是要极力拥护他。现在既有如此的基础，尚要力谋发展，使他势力能够普及全国。现在唐氏既有心进攻两广，你们是要设法制止，你们既是南方有觉悟的军人，尤其要负责任。一般士兵个个都要知道，不要为私的利益而战。我们要打仗，是要为全体人民。我是从最解放的国家来的，试问我的国家，何以能到这种地步呢？我们经过不少的奋斗得有我们的经验告诉我，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要作一个最大的宣传，使一般群众都明瞭，一般都明瞭打仗不是为个人利用的，我现在要请诸位决定态度，就"到兵士中去"。

（原载《中国军人》第6号，1925年8月17日出版）

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六月）

第 一 讲

我久想和诸位谈话，因为诸位在“民族运动”中，负很大的任务；中国北部与俄国毗连有六千多中里，从前俄帝国有很坏的政府和中国现在的北政府一样，彼此的革命党不能接近，所以不能与中国的青年军人接近谈话。近来俄国革命党费了四年工夫，将旧俄政府打倒，去掉此阻碍物，因此中国的革命党可与俄国的革命党接近；俄国革命可说成功，中国革命尚未成功，因为中国的各省人民，没有得到自由，故不说成功，俄国的人民已经得到自由，生活也较好些，政府已由人民管理，故可说成功。现在看中国的状况，除了广东与河南，内蒙古，直隶一小部分外，中国全国都被“军阀”压迫。到各省去游看，只听见人民呼号的声音，中国的人民受“军阀”与“帝国主义”的两重压迫，故不能说人民有自由了。大凡是个国家，从未见有外国人敢到国内随便来打死人的，只有中国，印度，安南，高丽，才见有这样的事。若是独立的国家，就没有这等事了。美、日、法各帝国主义，他们可以随便处置中国，中国人受尽他们的侮辱，欺服〔侮〕，我在中国许久，故晓得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及内部的情形怎样。我们衣，食，住的用物，一丝一粟，都是劳动家造出来的，就是一切的食物与财富，都是“农民”作出来的。假使“农

民"停工三几个月，中国全国就没有饭吃了。这班工作的"农民"使我们饱暖，现在受"军阀"的任意剥夺，压迫，或任意枪毙了。我们革命何以尚未成功，因为和"农民"离开，他们没有参加革命，这是失败的原因。可以表示革命没有人民是不能成功的，比如吴佩孚他的兵虽然练的很好，何以败于一旦，因为同民众离开了。此外尚有许多的"军阀"失败，也是因他们不和"农工合作"以为他是细民，不配参与国家大事，故不能成功，如现在张作霖有飞机两百多架，及铁甲车队种种武装，比吴佩孚还要强些，因为他和人民隔离太甚，其失败当更容易。他们的失败理由，有两种：（一）是他们不能为生产的人民保护利益者，且为压迫者，（二）是他们不能替人民向"帝国主义者"谋解放，当张作霖打败吴佩孚的时候，就跑到英国公使馆屏〔撇〕开许多的随从官吏，单独和英国公使谈话。张作霖是早和日本结好的，又复和英国结好，当时谈些什么，固不晓得，但是经此次谈话之后，英国的报纸，就说张作霖是中国唯一的救星。我们知道张作霖是除日本之外，又勾结了英国。当去年中山先生北上，要段祺瑞废除不平等条约，段祺瑞不独不听，反承认不平等条约。要知外人为什么来中国打死中国人，因他恃有武装的军官，如张作霖，段祺瑞，肖耀南，赵恒惕等，都是替"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人民的。我们知道冯玉祥，及广东的，谭，朱，各总司令，是反对"帝国主义者"的革命的军人，可惜兵力太小。假使张作霖等各军人，他们都能拿最雄厚的兵力，也能一起的，来反对"帝国主义者"，他们外国人，决不敢在中国这样横行。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要认清敌人，认清了敌人，工作已做了一半。现在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者"中间，因为有了张作霖等阻碍，使人民不能直接向"帝国主义者"冲

突。故必先要打掉这些阻碍物（张作霖，吴佩孚，赵恒惕等）。打掉的工作，因张作霖等有精利的武器，外观虽象很难，其实也不难。肃清"军阀"的方法，我们用军阀攻军阀的方法是不行的，要用一新的方法。这新方法，在俄国早几年用过已经成功了。此次我们打杨刘也小试这方法，也算成功了。简单言之，专靠单独的武装，去制胜敌人，是旧方法，如吴佩孚已经失败了，张作霖也要失败的，就是专靠武装制胜的缘故。俄国常〔尝〕用过一很小军队，打破一个很象张作霖的军队，夺了五百架机关枪，也是用这个新方法。可见得专靠单独的武装，很难得到胜利的。如果我们要求胜利，达到目的，必上自总司令下至士兵，都知道我们是替人民作事的。土地上很〔狠〕生产，供给我们衣食的大多数"劳动者"，他是我们的主人。凡对人民好的，我们要赞助他，我们要学他，好象天天学射击一样。凡对人民坏的，我们就要去射击他。我们当知道人民的生活太苦，知识太低，要改良他的生活，或提高他的知识，我们尽心力为之，才能够成功，如进攻湖南时，经过村子，若以为人民无足轻重，漠视他们，我们就必要失败，如果熟悉他们的情形，去帮助他们，就要成功，空空口说，是不中用的，必要实际出力去帮助他们才行。军队为什么要"政治工作"，就是要训练军队，去与"人民合作"，"政治工作"要使人民了解去打仗的目的，如要谭总司令去湖南，不是因他个人地位。从前中山先生在广东是大元帅，为最高首领，而部下的"军阀"握其权力，不和"人民合作"，所以难得说到成功。我们去打湖南，必要使人民箪食壶浆，来相迎接。现在应该一面使湖南内地的人民知我们军队，是辅助人民的，是保护人民的；一面要使军队，个个知道我们是去救助人民的，我们的任务是

是完全为人民的任务，必定能得胜利。即令我们到了湖南，任务尚未终了，必定要进攻北方各省，和国民军合作，然后才能够完成我们任务。我们要救中国，不能靠张作霖等军阀将杨刘打倒。目前有三件要紧的事，（一）研究军事学问，使训练与组织，都到好处。（二）我们要告诉军士和人民，使个个懂得我们要于“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在压迫之下，求解放的。（三）我们要仔细研究，怎样才能与“人民结合”。人民是不能欺骗的，必要深知其痛苦，替人民极力谋救济，方能密（切）结合。人民的“感情”有两字要注意的！曰“爱”与“恨”，第一要人民恨仇敌，如军阀及“帝国主义者”，我们天天要想一想，怎样使人民恨他，要激发人民的敌忾心，不然，人民不知恨他，仇他，也不能打倒他。人民的痛苦，天天延长下去。我们对于敌人，不能放松，比如治疮毒样，不施割治，必溃烂更宽。怎样讲爱，就是全部的爱，要用之于人民，不能分割一部与敌人，设若分了，就是对人民不尽忠实，所以要专用之于人民身上。“恨仇敌”、“爱人民”，我们先要言恨，使恨字缀于枪的刺刀尖上，注射到敌人身上。“爱”字专用于人民身上，如张作霖，赵恒惕辈，爱敌人（军阀和帝国主义者），恨人民，是与我们相反的。我们如果“爱人民”“恨敌人”定可成功，我们“政治工作”全部，是要我们如何爱民，使人民如何爱我们，能够做到这层，我们就能解救中国。设若不然，枪炮虽多，不能达到目的，至于以何方法而使人民爱我们，以何方法而使人民恨敌人，容后再讲。

第 二 讲

上回讲过我们怎样胜利的原因，今天讲有志救国的军队

之地位。革命军分布中国南北两部，都有发展的基础，南方即广东，北方系内蒙古三特别区，与河南。诸位所以到广东来，以为是革命的策源地，有中山先生指导，谭总司令暨长官带你们来粤，是为主义而奋斗。诸位来此以为是在理论上，实际上，精神上，都足以发生革命的力量出来，在广东与湖南无异，所以对于广东及中国各部的事，不能漠不关心，如对于某部事不关心，是空言爱国，所以对于广东的事情，尤宜特别注意，以为发展我们事业基础。比方军队要打仗，要先探阵地，所以我们要巩固基础，然后再向前面发展，不单是巩固现站〔在〕的阵地，就是后面也要使安稳。许多军队失败，因为站阵地不稳，后面也不稳，广东是我们现在的策源地，将来我们前进时，就是我们后面的地方，也要巩固才好。你看北方的国民军，他们后面是内蒙古，接近苏俄，他们后面是巩固的，从苏俄到冯玉祥的大本营，只要三十天，可以接济，再看广东的后面，从广州到香港，只要十二点钟。如有俄国船载煤油粮食从海参崴到广州，只费六七天，比自苏俄到冯玉祥的大本营，是要方便。因为北方交通不便，要用骆驼等来运输，海参崴到广州可用汽船，如果没有英国“帝国主义者”夹在香港，广东与苏俄关系是很密切的，因为有香港怪物夹在当中，阻碍我们交通。香港“帝国主义者”，探知湘军讲武堂，教课学生反对“帝国主义者”是很激烈的。他深知你们日夕焦思反对他的方法，在军事方面的训练，在民族方面的宣传，只要有一年的工夫，他觉得是很可怕的。他深知你们打败杨刘这样容易，觉得他们将来是很危险，所以设法妨碍我们，使难于发展。他们怎样设法来妨碍我们，使难于发展，并不是时常派兵来打败我们（派兵来打或者有一天的），还用别的方法，就是利用中国人来妨

害中国人。比方在上海香港天津等处，许多中国人愿作“帝国主义者”的工具，自是中国的耻辱。俄国革命时也有这样的卖国贼，他从小时入了外国学校，受了“帝国主义的教化”，养成卖国的思想，大概他们是发了财，因“帝国主义者”抢了中国许多赃物，分了一点给他，这就叫买办。买办分两种，一种商业买办，一种知识的买办（思想的买办）。“帝国主义者”利用商业的买办剥削中国的财富，利用知识的“买办”夺取我们的脑筋。后者比前者金钱的损失，还更利害。“帝国主义者”固为可恶，而买办抢了我们的财富和思想更为可恶。这班“买办”对于美日法等极力逢迎，对于中国文化加以轻视，如果遇有医生能将他的面目变成外国人模样，他愿将他的财产一半去酬谢医生。这班人是卖中国的，不知道中国数千年很光荣的历史，如果我们捉到他，便当杀却〔掉〕。此外还有一班军人买办，他们压迫人民不要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者”。诸位知道上海发生惨案以来，上海工人，一个多月，没发薪水，忍饥奋斗，学生、小商人，亦能奋斗。他们生想联络革命军队共去抵抗，使“帝国主义者”认识他们奋斗的勇气。我们应该敬重他们。但是张作霖对他们怎样，他是帮助“帝国主义者”压迫人民的，故张学良在上海封占上海总工会，压迫罢工工人上工，逮捕纱厂工会的职员，封闭工商学联合会，帮帝国主义者来压迫人民。他们这种卖国行为，大家不要忘记了，他与吴佩孚杀京汉铁路工人，把人民看作猪狗是一样的。他们不久必定要受失败的报应。军人买办，就是这样。以上三种买办，都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仇敌，香港英政府利用这三种买办来压迫广东政府。但是这个革命基础，我们是必要保全的。我们不要以为打倒杨刘以后就说军人买办已经打倒了，殊不知“帝国主义者”正

利用这班买办来围攻广东，有许多商业买办日夜图谋妨害我们革命的发展，我们革命是对于他的主人很危险，就是他们自己的危险。以上所说，因对于我们基础的地位，是很危险，即令我们将来前进，他们时刻可妨害我们。我们怎样对付他可免此害，有两种办法：（一）是我们的学校和军队，要使广东人民（尤其是工人农民）知道何以要打仗的目的，不仅湘军与黄埔党军如此，其余有同样目的底军队也应如此。我们要人民明白打仗底目的，要做许多底工作，使知我们要以广东为策源地，是替人民来革命的，庶几广东人民能舍去他与陈炯明的乡谊，来与我们接近。我们不是客体，是保护广东人民的，且将来是中国全国的保护人，到一省就是那一省的保护人，这样荣耀的历史是在后面。（二）是要防备买办阶级来妨害我们，要以武力对待他。这个革命基础的广东，是要权力爱护，要将一切障碍物扫除净尽。再看北方国民军的地位，他后面没有危险，而前面却有危险。他的前面受三种买办的危险，与我们一样。我知这一次北方的军官学校今日也在讨论我们所研究问题，我在北方看见许多学生，也想扫除这三种买办。上海几十万工人学生小商人，也在研究同样的问题，想扫除这种障碍。现在有许多外省学生跑到广东来求入湘军讲武堂，也是想扫除这三种买办。我想许多青年学生抱此目的，来替中国做事，这是很好的现象。

（原载《先锋》半月刊第2期，1925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政治部印）

在湘军讲武堂追悼廖党代表会上的讲演

（一九二五年九月六日）

同志们！在这次新班开学的那一天，廖先生是同在一处说话，今天在这里追悼廖先生了，廖先生不与我们在一起了，青天白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门口已经被人暗杀了！

廖先生之死，是中国工人农人失却一个最大领袖，也是我们革命军人的领袖，我们再没有法子来找这样一个领袖了。中山先生死了不久，廖先生是孙先生的信徒，今天又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追悼的时间是很难过的！在表面上看起来，中山先生的死是病死，廖先生之死是被人刺死，其实两先生死的原因都是一样。在二年前我到河南大本营，去见孙先生，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创造三民主义的领袖，但是他的手足身体是被三条铁链束缚，仅仅只有他的头脑自由，就是三铁链束缚孙先生的主义，使他不能实现。第一条铁链是：穿制服的土匪——军阀——他们表面上看见了孙先生是很服从的，但他一回去，就专做压迫人民、残害人民的事，件件都与三民主义相违反。第二条铁链是：抢夺的政客，他们在国民党里的资格是很老的，但是很没有一点精神，没有一点骨气，专是为他自己的利益，他的利益是要委任状，他的口袋委任状很多，就是被人民反对的人委任状也有，甚至于张作霖吴佩孚的委任状都有的。第三条铁链是：糊涂的党

员，不明白中山先生的主义，他们知识不能把谣言向民众解释，并且他自己也怀疑虑：所以中山先生的主义就不能实现。就是因为这三条铁链，使孙先生受气而死，廖先生也是因此被杀！就是穿制服的土匪，抢夺的政客，糊涂的党员，被帝国主义利用了。两年前国民党大会的意思，是要挣脱这三条链条，当时这次大会是国内代表参加，孙先生以为少数国民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是要运动有农工学生大家参加，才能够成功的。大会的议决，是党员对党的议决，是要服从的；个人的利益，是要为党牺牲的。

大会中说：三民主义的成功，是要在打倒帝国主义者以后，所以决定对外政策，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但是大会闭会未久的时候，象这三种链条的人，都开始结合来反对了，这三种势力——穿制服的土匪，抢夺的政客，糊涂的党员——在大会闭会的时候，他们都结合起来，所以他说到那种时候，他们就要下攻击的，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要来破坏这种铁链，但是很看不见的，当在东江战事期中他们就活动起来，我们对于这种恶势力如打倒杨希闵这回，不要忘却，杨是中央执行委员，谭总司令也是中央执行委员，但是谭总司令帮助国民党来打倒他，简而言之，就是好的打劣的，就是国民党的好的和劣的奋斗，是最紧要的，不仅是在战场上打倒穿制服的就算成功，有许多冒穿制服的也要注意。

在杨刘打倒之后，这种势力稍为放松一些，不久又结合起来，但是廖先生是为党出力与这般恶势力奋斗的，他们打廖先生一枪，不仅是对待廖先生，是对待革命党与革命军，所以廖先生的死是关系很大的。我从前对诸位说：我们要前进顺利，是先要巩固后方的基础，我那时候，警戒诸位，是要使敌人不在我后方威胁，在那时候，诸君或者不明白我的

话，今日想了明白了。

廖先生的死后三天，八月二十六日，我们听见机关枪的声音，是对于这三种恶势力攻击。

这种猛兽尚未驱除净尽，我们要 知 道 我 们革命基础未稳，领袖虽死，要如生存一样，廖先生之死，是实行大会的议决，实行中山先生的主义，同志们！我们追悼廖先生，是要研究大会的议决和中山先生的主义。

廖先生万岁！

中山先生革命成功万岁！

打倒反革命势力！

勇往奋斗，为国民党复仇！

为国家复仇！

使广东能强固革命基础！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学生黄敬笔记

（原载《先锋》半月刊第1期，1925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政治部印。）

和平的广东与衰落的香港

（一九二五年十月上旬）

同志们！现在是很严重的时局，广东从没有经过这样严重的时局。香港方面，事实上已承认了我们两点，第一是说广东国民政府日益巩固了；第二是说不能用武力征服广东政府。

不久以前，香港政府电请英国伦敦政府用武力干涉中国，但是伦敦政府回电不准，为什么他不准呢？

英国保守党政府他很知道，香港不过是大英帝国之一小点，这一小点虽然很重要，但是不能以这一小点而牺牲他全部重大的力量与利益。

英国商业在中国最近几年来不特不增加反而跌落，日本美国却有进步，这已使英国恐慌。此次因上海五卅惨案使他们在中国的威信失落，在广东方面不能用武力干涉，因若用武力干涉广东，恐怕激起全国更猛烈之运动反抗英国。

再则就是英国本国的无产阶级的目前，要求是要保持现时的工作时间和工资，若是英国用武力干涉中国，必须费去一万万镑的军费，那末，则不能不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资而使无产阶级的生活困苦，易起暴动，所以他不敢来干涉广东。

因此两层原故，所以不许香港政府以武力干涉中国，香港政府就不得不用别一种方法。这一种方法在以前或有许多

人不知道，现在我们以及广东人民都明白了。

这几天以内，我们看见革命的军人，一队一队往前敌去，许多罢工工人帮助军人输送，也一队一队往前敌去；同时做政治宣传的人，也都赴前敌宣传去了。这次赴前敌，就是要使香港政府的别一种方法——勾结陈林等扰乱东江——打个消灭。

我们此时，应向人民宣传，使人民知道此次的战争对人民是有利的，而且在历史上是很有意义的。更要使他们知道敌人方面的力量怎样？我们方面的力量又是怎样？

敌人方面的力量，就他本身来说，本没有什么重要，因为他的组织军事训练种种方面，都差得很。但是有应该使我们注意的，就是敌人背后的势力。

那一种势力是在敌人背后呢？谁也知道第一就是香港。但在香港的人民尚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买办阶级，他们是依赖英帝国主义为生的，他们的利益完全与帝国主义相同，他们名是中国人，实实在在就是英帝国主义的走狗，如陈廉伯等；第二种是商民，他们是取中立的态度，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和平，使他们有生产做，而怎样得来和平，他们是不管的；第三种就是一班纯全〔正〕的中国人，他们是愿意帮助广东政府的，因为他们离开广东跑到香港去的原因，是因为香港比广东安全一点；如果广东政府巩固，能够保持和平，他们是愿意回到广东来的。所以他们不愿意陈炯明、洪兆麟、林虎等打进广州来，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陈炯明回省，必使战事延长，不能得到和平。

在这三种人中，只有第一种人是想打倒广东革命政府的，因此在此次敌人背后，也就是他们最活动。因为他们要广东永久在纷乱的状态中，他们才可以发展。

如果广东有一个巩固的政府，则香港必丧失重大的利益，而为其致命伤，所以我在每次讲演中都特别要提出这一点。

香港每年的生意有一万五千万元，其中直接与广东发生关系的，有七千五百万元。并且香港的商业，每年是照规矩的增加，虽然广东日日在扰乱的局面中。因此使一般不明瞭，以为要做生意，一定要和平，何以在纷乱中反会增加。我们现在拿大连来比较，便可知道。在大连方面是很和平的，而大连的商业每年虽然也有点增加，但决不及香港增加的这么多，这便是一个很明显的反证。

有人说：广东在纷乱的局面中，香港的生意都如此增加，如果广东和平，则香港的生意必更增加。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对的，其实是错了，我们只要看陈廉伯时图扰乱广东就可明白。

我们再来看香港的兴盛是靠什么？如果香港出产很多原料，工业非常发达，则可以说广东安全，商品易于流通，生意可以增加。但是香港之兴盛，并不是靠工业发达，而是靠有安全的旅馆和货仓。除此以外还有金融的稳固，即汇丰银行的纸票可以很安稳的流通于市面，亦是使香港兴盛的一种原因。因为香港有了安全的旅馆，安全的货仓，稳固的金融，所以一班大商贾要运货来广东，都必先到香港看一看风势，然后运入广东。

若是广东能和平统一，能保障安全，则外面来做生意的，不必经过香港，可直接来广州，此时香港则必日渐衰弱而成为无用之地，这便是香港政府及其走狗所最怕的。

若是广东有一个巩固的政府，能永久维持和平，则中国资本必投到广东来，而不至流入香港去。即一班现在住在香

港旅馆的人亦必回到广东来。所有的货物也不致存放于香港的货仓，而将存于广东的货仓。至此各地商业都必汇集于广东，而广东便成为一般富之区。这是香港政府所不愿意而必图破坏的。

最近香港的报纸曾登载一篇文章气愤的说："可恶！我们费了许多心血，培养出一班熟练工人，现在我们却不能用他们了！"若广东经济发展，必需要得着这班熟练工人，而这班熟练工人也必愿意跑回广东来做工，因为他们不愿意在香港做工受印度人一样待遇。这一点也是香港政府所怕的。

我现在来做一个比喻：比如在大海中有一只船遇着大风浪，正在危急的时候，忽然逢着一个岛，于是船上的人都跑上这个岛去，找旅馆寄宿。旅馆的主人见着许多人都来他的旅馆住宿，不禁自喜的说：如果多起几次大风，则我的生意必兴旺起来，这恰足以描写香港之喜欢广东扰乱。

又比如大路上有一家旅馆，有一驾汽车天天都在这大路上驶来驶去，却从不在这旅馆停宿一次，旅馆主人因为自己没有生意做，气愤极了，于是便把一个玻璃瓶打碎于大路上，使汽车经过这碎玻璃瓶而爆裂。至此汽车必停止，汽车中的人必寄宿于旅馆中，而旅馆便有生意做了。旅馆好比是香港政府，汽车好比是革命政府，而陈林等便是玻璃瓶，香港政府则利用这个玻璃瓶，来阻碍革命的进展。

香港政府之利用玻璃瓶来阻碍革命的进展，不只陈林等这几个玻璃瓶，还有许多的玻璃瓶供他使用。如最近有一位四川军人——熊克武，他起初打四川失败了，跑到湘西，又被赵恒惕驱逐，于是便走来广东，阳为拥护革命政府，阴则与香港政府及其走狗陈林等勾结，以图危害革命政府，革命政府窥破了他的阴谋，于是便如弹簧一般的，把他弹至黄埔

拘留起来了。可叹！这班军阀不愿做革命的弹簧，而甘做反革命的弹簧！若曾经受过这位军人压迫的四川人民，听着广东革命的弹簧把他弹至黄埔拘留起来了，一定要额手称贺。

其次，邻省的军阀亦是表同情于东江的敌人的，因此敌人无后顾之忧，而敢进兵东江，并且失败之后，有逃避之地，不致如刘震寰、杨希闵一样失败后无去路。邻省军阀所以同情于东江的敌人，就是因为他见着广东革命一天一天的巩固起来，恐将予他们不利。

说到北方的军阀，他们对于我们表示同情，如同他们对于上海等处罢工表同情一样，当然没有好意，而是非常仇恨我们的，所以他们也是阻碍革命汽车进行的大玻璃瓶。

再其次就是一班政客，他们是利用时局纷乱，以达到其升官发财的目的，如果广东有一个廉洁的政府，他们便绝其生路了，所以他们对于东江的敌人亦表同情。

此外，还有一班不明白此次战争意义的人，他们以为此次战争是共产与反共产之战争，而不知此次战争乃铲除玻璃瓶，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这班人简直可以说是一班糊涂虫。

以上所说的这些人，都是阻碍革命汽车进行的碎玻璃瓶，但是他们却不能完全阻碍我们这个坚固的革命汽车一点不能向前进。这个革命汽车是国民革命军做成的，而国民革命军不是一省之人组织成的，有湖南，四川，云南等省的人。所以这个革命汽车，决不能因革命的路上有许多玻璃瓶而停止前进，并将加大马力，冲上前去，将这些玻璃瓶辗他一个粉碎。

在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各省的人都有，他们对于兵士都能了解，因此他们在兵士中宣传，必能发生效力，并且他们所宣传的决不是宣传一省的利益，而是宣传全中国所

需要的国民革命。兵士受了这样的政治训练，对于革命的意义必能了解，因此他们必能很勇敢的将阻碍革命汽车前进的碎玻璃瓶扫得一个干尽。

我们革命汽车上所载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孙中山革命的理论——三民主义：（1）解除帝国主义的压迫；（2）达到人民的统治；（3）为大多数人谋幸福，即改善大多数人民的经济地位。这犹如三个炮弹，或三把刺刀，兵士拿着向敌人进攻，一定要发生很大的效力的。

我们在群众中演讲，一定要向群众说明：我们出发东江的军队，是谋民族解放的军队；是为达到人民统治的军队；是谋大多数人民幸福的军队。他们出发去打东江是为救广东的灭亡，巩固革命的基础，所以这次战争是革命与反革命之战争。

站在广东革命政府后面的，还有许多工人，商人和农民等。现在广东有三万罢工的工人，他们在三个月以前，就开始与帝国主义奋斗，现在仍旧继续奋斗，此次革命军出发东江，直接是打陈林等反革命军阀，间接便是打英帝国主义。所以现在广东三万罢工工人与出发东江的革命军，犹如左右手一样，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此次省港罢工失败，则此次东征亦难制胜；反之，若此次东征失败，则罢工必受摧残而消灭，如同现在汕头一被敌军占据，马上就禁止罢工，强迫工人去上工一样。所以现在在广州的工人必尽力帮助革命军来打倒共同的敌人。

商人现已一天一天的与我们接近了。比如在没有好久以前，政府向商人借款，他们要求的利息很高；可是到现在战时，政府向他们借款，他们要求的利息减低了百分之七，就是以前要百分之二十的利息，现在只要百分之十三，这便是

商人赞助政府之表示。虽然我们不敢相信商人都很革命，但我们却信得过商人赞助我们，比赞助敌人的成分多。

农民方面，虽然我们没有做很多的工作，但农民受环境的压迫，以及敌人之摧残，无论如何都是跑到我们这方面来帮助我们，不致跑到敌人方面去赞助敌人。

这种情形底下，我们可以保证这次战争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但是我们不要太过于骄傲，仍然须努力工作；往群众中去宣传，使群众明瞭这次战争的意义，知道这次战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而得到一般人的同情和赞助。

我们在工农商学各界宣传共同的口号是：

用全力帮助前敌军人！

用全力打倒敌人！

总括起来说，在广东革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状况：革命与反革命分化得如此清楚；各界人民如此的团结，拥护革命政府，以打倒一切反革命派。

但是我们要记住：如果此次失败，则现在唯一的革命基础，必随之而消灭。至此，我们几年工作的成绩都化为乌有！中国革命成功的时期，也必延长至比辛亥革命到现在还要久远。

如果此次失败，则香港二十几万工人都要变成奴隶，受英帝国主义之鞭挞而不敢作声。

如果此次失败，则广东财政定归破产。

如果此次失败，则广东便无脱离香港的希望。

如果此次失败，则广东全省人民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权必被剥脱！一班革命分子必被拘拿或屠杀。

如果此次失败，则广州的男男女女必不能如现在一样很平安的在街上行走，一定要受反动的军阀的骚扰和残害。

如果此次失败，则香港番鬼来到广州，必很堂皇在街上走来走去；并且口里定将说着：昏蛋的中国工人现在来看一看我们的威武！

如果此次失败，则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都必受摧残而停止。

简单一句话，此次战争如果失败，必致全广东黑暗！全中国黑暗！

所以我们对于这次战争，一定需要胜利。但我们要达到胜利的目的，只有男男女女一齐团结起来做革命的后盾。

我们在这紧张的时局里，当抛弃一切，努力从事革命的工作。如读书的人现在应抛开书本，跑到群众去宣传，等到胜利后再来读书，愿大家努力在群众中宣传，使人人都知道这次战争的意义。达到完全的胜利！

饶来杰笔记

（原载《罢工与东征》，1925年10月国光书店出版）

国际情形*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同志们！今天我要先向各位报告一桩好消息，就是昨晚接前敌电报天险的惠城①已被我们的革命军攻下了！

我前次演讲的时候，曾对各位说过一句话，就是欧洲大战的结果却只美国得到胜利！各位听了我这句话一定以为很希奇，其实这并不是一句希奇的话。我们可以看美国在大战中没有一些儿损失，但大战后，得了许多金钱。欧战以前美国国内还是很多内债，大战后不但内债没有了，而且成为世界每个国家的债权人。若是美国要把他借出去的金子通通收回来，我相信至少可使几国同时破产。美国轮船增加的吨数，超过世界任何一国，他在中国的商业较欧战前既进步至数十倍，同时我们又可看看战胜国的英吉利，他的商业尤其是在中国的商业却一天一天低落。这都是事实，并不是凭空讲的，各位略加考察一下，便可以明白。

美国有了这么多的金子，他要拿到那里去用呢？第一便向各国投资，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但是美国在中国是后至之客，盘踞中国占有种种优越权的，最先有英国，其次有日本。英日两帝国主义握住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占了很多优越权，均足以保障他在中国商业的发展。换言之英日的优越

---

* 本文系鲍罗廷在国民党政治特别训练班的演讲。——编者

① 即惠州，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时于1925年10月14日攻下惠州。——编者

权，也就是美国要在中国发展势力的大障碍。美国既要在中国求发展，所以一定要先消除他的障碍，所以一定要和英日两大帝国主义大起冲突。他们的冲突我们随时都可以看见，如此次省港罢工后，香港的美国打那轮船公司竟即时迁到广州，他的轮船竟直接由非律宾入广州。美国商人只知赚钱，香港的死活，他是一毫不管的。香港的英文报时时很凄惨的叫道："我们为什么不团结起来!"但是美国帝国主义总是始终不理他，这是很明白冲突的事。又如关税会议问题美国是主张中国关税自主，英日却坚持关税协定。这是因为中国的关税协定，仅是保障先进的英日商业势力，于美国是没有多大好处的缘故。他提出关税自主的口号，一面可限制英日商业的发展，增长自己的势力，一面可讨好中国民众——装起亲善的面孔。

大家还记得在前月报纸上不是登载香港的英国人开了一次大会，请求伦敦政府出兵来干涉广州吗？他们的电报发了很久很久，英政府只回他一声说："这个政策是不行的！"香港自我们罢工以后，几乎弄到他们即时要破产了。为什么英国政府受了这样大的损失，他总不敢出兵来打广州呢？鸦片战争的真正理由不（正）是英国人要强迫中国人同他交易，中国人不肯，如是他就很愤气〔激〕即时派兵进攻，强迫通商。现在罢工不是一样的不同他通商，且现在的中国情形四分五裂，较以前糟得更厉害。英国是乘战胜之威，两方面的情形较以前是相差得很远，为什么英国人总不敢出兵呢？我们要知详细的情形，便要把英国来研究一下。第一当知道英国所以这样兴盛的缘故，他所靠的是工厂中制造的用品、矿山上掘出的矿产，以及航行海面的商船，他国内是没有农业，他是一个纯粹工业的国家，所以有人说他是世界的工厂，世界

的商店，那是很恰当的。中国无工业产品只有农产品，所以中国是农业国家。德国的农产品可以自给，工业又很发达，所以是一个农工业的国家。苏俄同法国都是一样，不过程度不及德国罢。英国既是工业国家，所以他要靠工业生产以生存，靠工业生产以与各国交换农业生产，英国的工业生产品运到印度、加拿大、非洲、澳洲、中国等经济落后的国家以求额外利润，英国四千万的产业工人是要靠经济落后国家的四万万人来给他的。换句话说，也就是以前英国四千万工人的生产是要供给经济落后国家四万万人的需要。这是大战前的情形。但是到了大战以后，世界的情形就起了大大的变化，我们单举印度来讲，在欧战期中，因为交通断绝，许多必需品都买不到，如是印度的小资本家便自办工厂，供给需要，到了现在印度的纺织业，铁路工程发达的情形均与大战前完全不同了。又如香港来讲，单就造船工厂来讲，以前香港的商船完全要靠苏格兰制造的，现在香港一万余工人的船厂，居然也有了。香港每年制造出来的船，几乎要多过英国本部所出的了。其余各殖民地如加拿大如澳洲非洲的工业发达的情形，都是一样。殖民地的工业发达，如是使英国本国的出产不能畅销，如是令他本国的工厂倒闭，如是令他本国的失业工人一天一天加多。在中国来讲，英国的商业也日益低落，其原因则不是由于中国工业发达，是因为另外的政治问题。这个政治问题也很紧要，缓一下再行讲及。英国帝国主义自欧战后因殖民地工业发展，遂令他〈受到〉非常大的经济打击，他的商业不得不一天一天低落，所以他现在是自救不暇，那还有力向中国用兵。

英国是工业革命最早的国家，自英国工业革命后，如是各国始继起改用机器。但是英国工业因为这个缘故，他的机

器，也就是现在最老的机器，德美等国的新进机器工业，一切都比英国精良完美，机器完美，所以生产力大，生产的物品自然可能价廉物美，多得人家欢迎。英国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的工业，遂远远赶不上各国，而成为工业落后的国家。自然英国的工业落后并不是与中国一样的国家相比。英国工业除机器落后之外，他产业组织更陷于无政府状态中，各种实业都散漫而不统一，不能左右世界上各大市场，更不能转动金融。同时我们看看美国的工业，全国联络一气，煤油、银行，以及各种实业均并合为一两个大托拉斯，联络活动，以与外国资本竞争。英国每种实业都分为几十个公司，各公司又有公司的意见，如矿业公司全国竟多至六十余处，在这个情形之下，当然不能与人相竞。英国的资本家受了此种打击，如是他的商业也不能不一天一天低落，此是第二种原因。

我们再看看英国帝国主义上面的打击有没有方法去补救呢？这又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因为英国是最老的工业国家，所以有最老的无产阶级，英国的无产阶级因为他有很老的经验，所以他本身的组织也是非常好。他们有一定的生活程度。如每周至少要几多薪水才能维持生活，他是永远不能减少的。英国工人生活除美国外比其他各国都好得多，有些边〔还〕比美国工人更好。如工人病的时候仍旧照常领薪。英国的工业组织总陷于无政府状态，但他的工人组织是非〈常〉坚固而统一。这是英国国内无产阶级的情形。英国的无产阶级以前之所以不反对他国内资本家侵略弱小民族，不起来革命，并不是英国的无产阶级特别无良心，是有一个原因。因为欧战以前英国占了世界的大市场，售销他的剩余生产，以获得多量的额外利润。（利润分两种，一是利润，如英国制造的货物，在英国销售能获得百分之几的赢利，此是

利润，但资本家以为这样利息太少，如是又把他的货物运到经济落后国家的市场去发卖，除消费抵除外，他又要多赚百分之几十的赢利，此种赢利就是额外利润，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弱小民族中所吸收的脂膏。）欧战之起也就是各国争销货的市场，争额外的利润，到了大战结局以前英国独占的市场，又加现在多几个帝国主义来竞争了，以前英国独得的额外利润，现在不但不能保持其原有状态，而且要一天一天减少。在英帝国主义独获额外利润的时候，自然英国的资本家能在他多量的利润当中取出一点馂馀①给他国内的无产阶级，所以他的无产阶级也可以相安无事，由他的资本家去蹂躏弱小民族，甚而至于顾目前之利，反去助他的资本家侵略弱小民族。但是现在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资本家不但不能保持旧有的额外利润，而且因为不能与第二个帝国主义相竞的原故，工厂天天要闭，他们要再振起精神与第二个帝国主义相竞，所以不能不先向他国内的无产阶级进攻。把他旧有的生活费减低下去，并把工作时间增加起来，然后可以维持他的生活。但是英国是工业国家，无产阶级的工人是有非常大的势力，资本家的进攻，他那里肯随便放过呢？如是他们便要起来反抗。各位看到报纸上登载英工人罢工的情形吗？前月是一百余万的矿山工人总同盟罢工，就是因为英国的资本家要减少工人工资加多工作时间，工人不应允的缘故，英国的资本家不但是矿山主人想如此对待工人，其余如口器业，机器工业的资本家也是如此。所以自矿山工人总同盟以后，机器工人与海员工人也与他结成三角同盟，如资本家不维持他们旧时生活时，只有一致罢工对付。英政府对于这事着慌到了不得。因为维持工人生活，工商业又不能与人竞争。照资本

① 馂馀，吃后所余的食物。——编者

家的请求，工人又即时要起革命，目下的办法只有由英政府先拿出一千万金镑（约中国银一万万元）交矿山主人，以维持工人生活，此一万万元大约可以维持到五个月之久，由今年十月起可至明年二月之度，但此一万万元，是一天天会完的，到了明年二月英国的工商业未必即能胜过其他的帝国主义，争得旧时一样的额外利润，那时英政府又有什么法子来应付呢？且以上的津贴，是维持既有工做的工人，英国现在除此之外，还有二百万因工厂倒闭失业机器工人——据最近的调查。这些工人都有高深的学问精巧的技术，能制造种种美好的商品，但因工厂倒闭，所以至于失业，英国工人不象中国工人无事情做便肯草草过生活，日间出来行街，晚上躺在马路上，他的政府若无法安置他，他是要来推倒政府，要起来革命的。如是英政府对此二百万之失业工人又要在国库里每年提出五千万金镑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五千万金磅并不是小小一个数目，此二百万工人在有工厂的时候能做出种种商品去换额外利润，但是现在不但不生产，而且每年要花五千万镑去供养他，大家想想英国帝国主义目下所受经济打击厉害不厉害呢？英国无法子这样一月一月二百万，五千万，继续维持下去，那时终要对于工人压迫，减少工资增加工作时间，试问在生活程度一天天增高的社会中，英国工人能不能应允资本家的条件？不肯的时候，唯有起来革命。将来的问题我们现在且不必讲，目下的大英帝国主义实天天在大恐慌之中，日日要想出法子来应付以防国内的革命，以上的事实，是英国工商业一天天低落第三种原因。

至于第四个原因，就是政治问题了。有上面的三种原因，如是便造成第四个原因，殖民地的工业既日益发达，如是各地的资本家，便都想起来要求自治，要求独立，各殖民

地的独立运动，便又成为英国很重要的问题。如印度连年要求独立运动之剧烈，均为各位所知道的事，其余如埃及，如中国，则受了民族革命潮流的影响，埃及连年的战事是闹得很剧烈，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更日益厉害，全国的群众运动，大家口号，都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其余如南非洲，加拿大，澳洲，均因工业日形发达而要求自治，最近的香港大罢工，更使他受了非常大的损失，从前各殖民地都是他好好的买卖场所，现在通通变成了他的敌人了，英国的工商业受了这些影响，遂不能不一天一天低落，此是第四种原因。

英国受了以上的重大打击，如是使到他非常愤怒，愤怒之极便拿起枪来，在上海、沙基、汉口等地向中国人乱打，英国帝国主义这些表示，不是表示他还有力量，实表示他既经软弱到极，没有方法抵抗外界的打击。英国现在好象一只雄狮，给人打得太厉害了，如是便跑起来，向人乱咬。至于这头雄狮此回打击，能不能够安然回复，现在我不回答，但许多人都说是得了致命伤，将使他永〈远〉不能恢复！

香港的英国人请求他的祖家出兵干涉广东，结果始终不见一兵一卒前来，激得他非常生气，英国外交总长张伯伦氏覆电说，你们的损失我也觉得非常痛心，但目下是没有方法救护你们！就是因为大英帝国主义得了致命伤的缘故。港政府一面怪他的祖家不理他，一面又想自筹方法来打广东，好了，现在他打广东的方法得到了，各位你们知道他打广东的方法吗？他打广东方法不是什么，就是用陈炯明来捣乱广东政府。陈炯明为英国所不敢为的事，他以为到了东江，锁了惠州城门，便可来同国民捣蛋了！殊不知惠州城不一日便被我们完全攻下，叫他即时逃入香港。各位你们知道惠州城是用什么东西去攻下来的呢？是用一个大炸弹，这个大弹不是

别的东西，即是民族革命。我们再看这个炸弹，不但能把惠州城攻下来，将来要把比惠州城十倍坚固的壁垒攻下！

以上四个理由，各位既都明白了，便可以知道欧洲大战的胜利不是英国。战争的结果不但不能使英国工商业上涨，反而要使他往下低落。反而要令他国内起一番大革命，这些力量于中国革命前途是有非常大的援助。苟中国民众现在即能联合起来，帝国主义是不是怕的？因为帝国主义自身目下是非常弱，但敌人固然是弱，你们自身现在是很弱，因为求中国解放的民众自身尚未能团结。帝国主义本身个个都非常弱，倘你们要把他屈服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土耳其比中国还小，苏俄革命时所处的境是比中国还危〈急〉，但他们都能把帝国主义屈服，中国要把帝国主义来屈服，当然可以做到。屈服帝国主义的第一步工作是照中山先生的遗嘱做去，中国是农业国家，英国是工业国家，英国工人一日没有工做，便要革命，便要推倒他的政府！中山先生写遗嘱的时候，叫你们要在最短期间去实行，他不是随便想，便随便写，他是很明瞭各国情势，如我们现在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同各位讲一句，如你们能团结起来，你们的力量便是非常大，你们便能把帝国主义屈服，如你们分裂下去，你们即会软弱下去！帝国主义也就即会向你们加紧压迫！帝国主义现在设了多种的方法，造出许多谣言，费了很多金钱以分裂你们，你们不至分裂，你们的力量便可很强，并要请各位来听讲的同志，要把我这个意思向每个同胞宣传，今天我只同各位先讲英国的情形，因英国情形与世界各国很有关系的，以后有机会，再同各位讲其他各国，那时就可以很容易明瞭了。　**饶君强笔记**

（原载《鲍罗廷先生演讲录》1960年2月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重印本。）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广州各界发起庆祝苏俄十月革命八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各位同志及国民，今天为俄十月革命八周〈年〉纪念，你们这样踊跃参加庆祝，现在我代表苏俄诚恳之态〈度〉答覆同志。各位同志，除开苏维埃没有如广州之地方以纪念俄国革命之纪念日。广州为中国国民革命之主脑，为革命之策源地，为最干净之地，为太平领袖生长之地，为反帝国主义之地，为推翻满清政府之首领生长之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大规模之地，所以此地就有各界人民纪念苏俄八周〈年〉纪念之庆典。各位同志，现在中国革命与从前俄国革命有很多相同之地方。八年前俄尚受双重压迫，一帝国主义之压迫，二本国皇帝之压迫。那时的俄国还为帝国主义及皇帝之国家，而非人民之国家。及人民起来革命把帝国主义及政府推翻之后，我国遂以独立，而打倒帝国主义及政府之后，即把政权交回人民，所以民族民权主义在此实现了。民族主义要推翻帝国主义压迫，民权主义要把政府交与人民的。同志们：我们尚未能实现社会主义，八年中我们依照社会主义之原则做去，

---

* 此演说是鲍罗廷该日下午在广东大学操场召开的这一纪念会上所作。——编者

但现在尚未实现。因为第三主义非一国家单独能够实现的，须要有几国家一齐实行，然后可能的。若你们贵国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后，你们与世界上之国家一齐实现第三主义。同志们，俄国革命在八年当中非常之困难的，其中有四年尤为之痛苦。与帝国主义奋斗那时，帝国主义利用俄国反革命派，及以海陆军队助之，把俄国四方八面包围，使俄之货物不能出口，而外货不能入口，英法日美及其他国家一齐联合而反抗我们。但我们在此奋斗之中，非孤立的，还有人助的，是何人呢？各位好朋友你们知道中国革命领袖——孙先生助我们的。当俄在困难奋斗中，孙先生给列宁一电报，内说你们安心与帝国主义者奋斗，我们帮助你。列宁接了这个电报，感激不已。我们无论现在及将来都不会忘记的。凡国家之中总有一阶级，这阶级必反抗其资本家政府而帮助我们的，即是农工阶级。中国农工阶级所以亦助我们，我们无论现在及将来亦都不会忘记的。孙先生代表中国人民帮助我们。我们可以说反帝运动是中俄大家一齐做的，这是中俄友谊之地方。我们自推翻帝国主义之后，迫帝国主义者以平等待我们，然这个奋斗终于胜利而牺牲很大。各位同志，你们将来亦必能达到此目的——自由独立，但你们现在每人均须具有爱国心，争本国人民自由，以实现民族主义。我已与你们一齐做了数年之工作。当我初来时，孙先生在河南，斯时他年纪尚未老耄，但他痛心至容貌憔悴，为什么呢？孙先生斯时想人民自由，实现民族主义，以政权交与人民，实现民权主义，解放人民经济，实现民生主义，但总不能实现，以有军阀阻梗也。孙先生为军阀所包围，不理孙先生之国民革命，只顾金钱，故孙先生向人民宣言，唤起全国工农商学，使他们一齐归于孙先生旗帜之下，而成强固之政府，不为帝

国主义所摧残。由此看来政府将有实现孙先生主义之可能，但终归于人民之团结，孙先生生时不能实现，遗留他之方针政策由我们实现之。这一年来你们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得了很多之胜利。各位同志更加你们努力，等到我们九周〈年〉纪念比现在热闹一百倍，等到你们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与俄之现在情形一样实现中俄为革命同盟者，及十周〈年〉纪念日广州及全中国变为非常之隆盛景象，是我所希望的。我们的口号是——中国革命万岁——中国革命团结万岁——所有被压迫民族联合万岁——苏维埃政府与中国国民革命政府团结友谊万岁。

（原载《工人之路特号》第136期，1925年11月9日，第三版。）

革命势力的联合与革命成功*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院各委员，国民政府各委员，国民党诸同志，国民革命军各长官，各位同志，各位市民！今天是苏俄八周〈年〉纪念日，得诸位来到此处，兄弟谨代表苏俄各联邦很诚恳地感谢各位！兄弟记得在广州庆祝这个革命纪念日，今天已是第三次了。第一二两次的庆祝，有中国国民革命大领袖、世界人类的好朋友孙中山先生列席。今天虽然是一样的庆祝，可是很不幸，这位大伟人孙中山先生已不在座了！苏俄的大领袖列宁先生也不在了！这两位伟大的领袖的躯体虽然不在，但他们的革命精神却时时在我们左右。他们未竟的事业，仍然在我们身上。我们今晚在此处庆祝的意思就是表示我们要继续去做这两位大伟人未竟的工作，同时希望在下一次中国革命十五周〈年〉纪念，苏俄革命九周〈年〉纪念的时候，中国已成为一完全独立、完全自由的国家。更希望在广州的同志，此时能将广东造成一个完美的模范省，表示出革命党所在的地方与其他的地方毕竟不同，使广东三千万民众，个个都说国民党是一个很好的党，是能为人民谋利益的党；更要将此种革命精神散布全国，使全国人民知道只有国民党，能担负中国国民革命的

* 本文系鲍罗廷该日晚在苏俄革命八周年、俄代表欢宴广州各界大会上的演说。——编者

使命。

我们要怎样才能做到这个地步呢？唯一的方法，就是在乎真正革命的同志能联合在一块，如我们革命的力量不能联合在一块，必不能得到成功。关于这一点，以后我讲到俄国革命历史的时候，大家便可以明白。真正革命的同志联合在一块，同做革命的工作，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在乎自己能牺牲。惠州城下的战士，他们的死不是为他们自己利益而死，是为全中国民众幸福而死，以三四千人而抗敌万余，此等的死，确是为民众利益而牺牲。在汕头阵亡的诸将士和在江门附近牺牲的战士，他们的牺牲也都是一样为民众利益而牺牲。更有几月来食不饱寝不安的几万罢工工友，他们的牺牲也不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争民族之平等自由。还有许多不计损失的爱国人，他们也是不惜牺牲的，他们常自豪说："我们为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如许金钱。"此外还有许多很有价值的牺牲者，他们都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是为民族的利益而牺牲。

诸位！这种牺牲精神，假使中国革命起的第一日便即能这样做去，我相信现在一定不单是中国得到了平等自由，世界许多民族谅都已得到平等自由了。现在各位都有这种精神，所以目下能使革命的工作，得有这样的进步。

诸君！八年前俄国的情形，也是和中国起初革命的时候一样。当时统治俄国的是德国的罗马罗夫民族，俄皇之所以能维持其地位，固然有许多压迫人民的军队被他们利用，但同时还有一部分资产阶级与他们相勾结。因为俄国自外国资本输入后，国内便发生一种新兴的资产阶级，此种阶级与一班民众的利益不同，所以他与俄皇联合，利用俄皇的军队以压迫本国民众。当俄国革命时，他们一方面勾结本国一切反革

命派，一方面又因为是寄生在外国资本上面，而与外国资本家相勾结，以图消灭俄国革命。

中国的革命运动，并不是起在最近的十四年间，单就广州来讲，反帝国主义运动之起来已将近一百年了。帝国主义资本初入广州的时候，广东的民众便感觉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常设法抵制他们，使他们买不到东西吃，而要自己来做厨子，一切运输工作也都要自己来担任。后来因为有一部分人同外国人有做生意的关系，可以得到很大的利润，于是才去帮助他，而有所谓偷运燕窝汤给外国人吃的事，这一部分人就是方兴的买办阶级。所以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在一百年以前就发生了。

俄国革命时，因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以及压迫人民的军队三种反革命势力互相勾结，力量非常雄大。所以当革命初起的时候，这些反革命势力四面向我们围攻，好像铁链一般牢牢把我们圈住，使我们对于一切工作，都不容易去做。英国当时费了一万五千万镑的金钱来破坏俄国的革命，俄国南部之奥得西地方，是如中国南部之广东，法国便以大炮向之轰击。美日两国又在远东勾结反革命派扰乱西比利亚一带，并进兵至乌拉山。我们此时不是应付这里的事变，就是抵抗那里的进攻，时时这里战胜了，那里又失败了，这种困难的情形足足经过四年之奋斗，才将帝国主义打退，一切反革命派肃清。我这些话，不但在中国是这样讲，就是在伦敦在纽约以及世界上任一块地方，当帝国主义者之前都是这样讲。因为这都是事实，帝国主义者是不能否认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压迫我们呢？这并不是因为俄国要实行“共产主义”，乃是因为俄国二万万人民曾说过一句话：“俄国的国土是俄国人民的。我们的祖宗这样遗下给我们，我们也要争回来交

给我们的子孙”，于是引起帝国主义的嫉恨而要将我们民众屈服。

诸君！我现在且不必讲我们过去的痛苦。因为要使诸君知道我们既往的痛苦，最好请诸君想想中国民众百年来所受的痛苦便可以明白。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一百年前已经开始，最大的运动便是反对鸦片输入的战争。当时诸君的祖先不愿意帝国主义以毒药卖入中国，以害全国的同胞，于是发生战争，不幸当时的战争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的祖先，仅以为多造几支船，多练几营兵便可打倒帝国主义。他们当时以炮击广州，正如击俄国奥得西一样。中国受了这种种丧师失地的侮辱，于中国南部的农村里便产生了一个革命家。他看见自己同胞受了帝国主义种种压迫和痛苦，乃思以拯救之。他并知道要解除人民的压迫和痛苦，一定要用革命的手段。他为使群众坚信革命，所以又主张接受外人的宗教，此人为谁？即领导太平太国革命运动的洪秀全。

诸君！这次孙先生在北京病榻上，他常叫人取许多关于太平天国的书给他看。伟大革命领袖的孙先生，他觉得一生事业有许多与太平天国相同的地方。太平天国是主张与帝国主义一样信奉基督教的，他并不是用“共产主义”的旗帜，但是帝国主义终是要打倒他，为什么呢？因为太平天国唯一的罪过是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所以帝国主义终不以宗教相同的关系而放过他。

帝国主义反对俄国革命，不是反对他的共产主义，是不准俄国民众说“俄国土地是俄国民众的”这句话。当时帝国主义对俄国虽然是四面夹攻，但俄国民众卒能战胜之，使他不敢不以平等待俄国。中国革命如何呢？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太平天国运动均不幸失败了，因此遂酿成第三次的义

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现在姑勿论其所用的手段对不对，内部分子如何，但他始终是表现中国民众的一番激烈的反帝国主义者运动。他并没有主张“共产主义”，他是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帝国主义又始终要消灭他，而且还要叫中国人负担重大的赔款。有人以为帝国主义消灭义和团运动是因为义和团受满清的利用，但孙中山先生推倒满清，为什么他又要借款给袁世凯以扑灭革命的势力呢？这很明显的是因为袁世凯是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代表。袁世凯得势，便是帝国主义的胜利。所以他一定要叫袁氏去消灭国民党。近几年来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民众积极作反帝国主义运动，帝国主义却时时以“共产”“赤化”加之。若说孙先生这样领导民众反帝国主义便是“共产”“赤化”，那末中国以前一切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也都可以加“共产”“赤化”。

诸君！现在世界上分成两种人，一种是压迫者，一种是被压迫者。被压迫者占全世界人数之十二万五千万，压迫者占二万五千万。可是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的事实，随时随地都可以看见。如以前的俄国，如高丽、印度、埃及，以至于中国都是受他们的压迫。当俄国革命时，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花费许多金钱，用种种方法来攻打俄国，因为他知道俄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俄国革命之成功，对于帝国主义必不利，所以他们如铁链一般的围着我们。当时我们用什么方法以打破他呢？唯一的方法，就是全国革命势力的团结；我们团结我们的力量在列宁主义指导之下做革命的工作。联合，服从，牺牲，我们不仅是在口头上说；而且时时刻刻表现在行动上。假如我们的联合，服从，牺牲，只是口头上的，俄国的革命早已失败了！我们早已像中国的鸦片战争，太平天

国，义和团，以至如孙先生之许多信徒一样先行牺牲了！今晚再不能与诸君在此地谈话了！因为我们之能真正联合，服从，牺牲，所以能攻破敌人，强迫敌人如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承认我们。在最近期间我们并可强迫美国承认苏俄，如美国不承认我们的时候，我们只有继续奋斗！

诸君！中国的革命史已经过百年的长期，你们如果要使之成功，只有和俄国一样联合革命势力，集中在孙文主义之下来奋斗。经验告诉我们，革命势力的联合，可以打破铁链一般的包围。俄国是用这种方法得到完全的解放，农业得以改良，实业得以发展，货仓中的粮食布匹，现已堆满了，出口货每年已多过入口货几千万了。我们更用这种联合的革命势力造成革命军，以保障革命永久不至失败。现在不独能维持本国的独立自由，且能有余力以助世界各被压迫民族之得到独立自由！

诸君！如中国革命势力能联合，可使广东富庶过香港几千万倍，可令广东之和平与兴盛为全国之模范。东江之役我们既以数千的革命军打倒几万压迫民族的军队，由此以推，数十万的革命军必能扫平全国的军阀，统一中国，在北京建筑革命的国民政府。帝国主义的势力虽在鸦片之战，太平天国之役，义和团之役不能打倒他，但若革命势力能联合，现在一定能将他打倒！我们此时要高举孙先生之遗骸以欢呼革命的胜利！

苏俄革命的成功，就是这样。苏俄的情形是与中国一样，所不同的只言语而已。苏俄可以成功，中国当然也可以成功！革命势力的联合，虽有许多艰难困苦，都可以把他们打破。大家的目的都是求中国四万万人以至世界人类的自由，目的既这样大，心胸当然也要这样大，切不可以小小的

意见而阻碍革命的进行。革命更不是口头上的事实，是以行动为标准。所谓革命势力之联合，是真正在革命工作上的联合。苏俄革命与中国革命是不可分离的，我甚愿以后能随时在事实上得到证明！谨祝革命势力大联合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万岁！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万岁！民众势力与政府结合万岁！

伍朝枢翻译　饶君强笔记

（据1925〔或1926〕年广州铅印件排印

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长官们，党代表，同学们，革命军兵士们！我们今天到这个很重要的会，来参阅〔阅〕第二军官学校毕业，各位都是带兵的官长，今天有很大的纪念，在国民革命历史上面，在国民革命军历史上面，国民革命军是什么？是中国民族要他担负一个很大的任务，中国民族要你们解放中国。这个四百兆人民的中国已经分裂多年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求解放，已经运动多年；虽然牺牲很多，尚未能成功，还是要奋斗，没有好久以前，上海、广州发生惨案以来，人民有很大的运动，这运动口〔又〕将失败。其原因是中国没有很大的革命军，及人民没有大团结，只有广东方面是革命的势力集中处，但全国没有很大的势力集中，除了我们在这里做了一点成绩，就全国来看，因为他们只顾自己私利发生分裂没有成绩。如汪先生说，张作霖最近发生分裂，与人民没有利益的。这种情形，不过是民国十四年来，军阀的消长，人民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不能解放；只有我们在此训练军队，欲达到解放的目的；只有我们能表示能达到此项目的，打倒许多反革命派，拿此地作强固的革命基础，能强迫帝国主义者以平等待我，我们在此地革命势力天天膨胀，不独扫除此地反革命的势力，且要把全国反革命的势力扫除。

诸位出去是要担任改造中国的人物，这种大的责任，是中国青年想望不及的，我们竟担任了。今天对于诸位的贡献：第一军队要有纪律，一为军事的纪律，是要团结摧毁敌人的，敌人未摧毁，决不放〔退〕让；一为政治的纪律，我们是要为人民利益奋斗而牺牲的。诸位有这种大责任，也就有一种权力来要求的。你们可要求革命党来指导你们，要党站在稳固地位，不受动摇。这个革命党，是我们领袖遗传下来，站在人民上面，把反革命势力扫除，我们要求党要站稳，并要革命军联合一致，扫除一切反革命势力。希望诸位，参加国民革命军，这种日子是很光荣愉快的，祝诸位成功！把中山先生遗留下来的事业做好。

（原载《先锋》半月刊，第3期，1925年12月出版）

与广州民国日报记者之谈话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记者问：鄙人今日拜访，仅以革命青年之资格，与鲍先生谈话，现在中国因为受了帝国主义者势力之包围，一天紧似一天，这种情形迫在目前，使我们青年，都莫有一日之安居。我们知道，吾人欲将此等恶势力推翻，使中国成一个自由平等之国家，只有和苏俄联合，才能达到吾人之目的。但如今之所联合，乃系政府与政府之间，而中俄两国人民，尚未有充分之了解及相援助，如此情形，则中国之国民革命，恐不容易成立。故吾人今后应当进一步的使中俄两大民族，开一个联合会议，使苏俄同志，参加中国的民众运动，而定下革命之方略。吾相信如此做去，必能使中国国民革命赶快成功。但这种理想，如何方能使其实现，尚望先生赐教。

鲍先生闻言后，乃庄重言曰：此问极佳。但中俄会议，已有许久。此事上海各报，均有详细登载，谅已知之。盖苏俄政府已派加拉罕公使与中国政府正式会议商定两国国交问题。

记者曰：诚然，中国政府，确与苏俄政府订立国交，已由苏俄驻北京公使加拉罕与中国外交会议，但吾今所言者，乃指民众而言，并非政府也。

鲍先生因续言曰：中国人民与苏俄人民之联合，此事亦于前数年行之矣，言此事之举行时，苏俄革命尚未成功，孙

中山先生亦失败逃亡在上海，列宁先生乃与中山先生订立合约，互相援助，中山先生从前在上海时，已不在政府做事，完全是一个平民，故列宁先生与中山先生订立合约的时候，大家也不过以一个革命者的资格来订立，所以吾人也可以说是列宁与中山先生的联络，就是中国革命分子之联合。当此合约订立未久，而俄国革命亦幸得成功。其后旋有俄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联络，即由苏俄驻北京公使北京政府所订立者是也。此种意义，乃是联络中俄两民族的感情，而由苏俄自动的废除以前俄王和中国所订下之不平等条约，以及放弃在中国之特权，以后互相亲善，此即苏俄政府与中国政府会议之情形也。至于属于列宁先生与中山先生所订之合约，我们亦皆知之。此合约之基础，乃系大家帮助两国革命之成功，比如中国革命有若何困难，则俄国的革命同志应当尽力帮忙。俄国革命有若何困难，中国同志也要尽力帮忙，使两国革命都能够得以进展。因为当那时候，苏俄革命尚未成功，俄王的势力极为浩大，人民受其专制亦极厉害。苏俄革命同志，均被其驱逐在外。当这时候，俄国皇帝以及其他一切反革命派，均派人到中国来与中国之反革命派联络，团结他们之势力，以谋对付各本国之革命分子。所以苏俄之革命分子，知道推翻一切反革命派之势力，而使革命成功。只有两国之革命分子大家联络，以进行革命之工作。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倘然俄国革命不能成功，则中国革命亦不能成功，中国革命不能成功，则俄国革命亦不能成功也。所以我们倘若想革命都能得到成功，只有大家联合，互相援助，就是中国同志，要帮助俄国革命的成功，俄国同志也要帮助中国革命的成功。①

（原载1925年12月23日广州《民国日报》第3版。）

① 此稿尚未刊完。——编者

在国民政府欢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宴会上的演说词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今天我很欣喜看见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同志，也很高兴与各位同志们谈话，因为两次的代表大会中，没有和全体谈过话，我对于同志们所接谈的，只是广东一部分的同志，现在能与各地来的同志见面、交谈，觉得是更荣幸的！

我是在二年前来广东的。在未来之前，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不知道将要做什么工作！所以我到这里来，并不是我本来的志愿，但我终于来了！终于来的缘故，第一个原因，是你们的领袖和我们的领袖间有一种谅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是我的一种义务，但是我二年前来南方时，并不是直接到中国南方广东来，我是先到上海，所以我们的订约就在上海。其时孙逸仙博士正为了反革命势力扩张而避居上海，还没有回去。实在我的来广东，是我实行条约的第一步，但是没有做第二步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领袖死了，现在你们的领袖也死了，那末我们要不要互相实行你我的义务呢？要不要实行同样的义务呢？是的！我们要实行！在你们的义务方面，你们应该联合起来，团结成一体去继续

总理向有的辛苦!负一部分应尽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在联合起来反抗你们的仇敌! 自然我们呢，也愿意实行我们一部分的责任，实行我们同样反抗仇敌的责任! 不过在我们实行我们一部分责任的时候，就是我们初来广东的时候，一看见这里广州的情形，竟不堪设想，若是把他一切描写出来，或过于世界万恶渠薮的地方，那是很不好的了! 我们不能够把详细的情形说出来，不过简单的说一句：就是国民与主义之间有很大的隔膜，差不多国民是国民，主义是主义，国民与主义二者，没有关系似的，而且假革命的人，其行为与主义不相融合，差不多主义是孙博士的好主义，而行为确不是孙博士的好行为。凡是看见过这种情形的人，在良心上是不是觉得行为与主义是可算相合的吗? 老实说，是不可能的! 是不会的! 但是当时也有同志跟着孙博士去做，我呢也要做我的工作，可是不能够! 因为在这不可能的空气里,环境太恶劣了! 其实孙逸仙看见了这种情形，已经忧愁得很，因为主义与行为以二者是相离太远了的。这两方面相离太远的缘故，实能使他容易年老，至少也使他少活了几年!

我当时既经看见这种情形，那末我到底怎样办呢? 主义是好的，但是行为是不对的! 主义与人民完全没有关系，那末要这种事实的现状下怎么办呢? 我走吗? 我还是留下在工作，不是留下事实上不能做工作，要是去，我违背我的义务和责任，那末到底我怎么办呢? 同志们我不是普通的一个新闻记者，走进总理的办事室里谈话时，满口恭维和赞成，走出了室外，就背后说他是一个理想家这一般人的样子，但是我们做的工作是同志替国家做工作，是不是对民众做工作? 是的! 对国家和对民众，是为国家和民众的利益而做，决不是为一己而做，那末我应该脱了我的衣服，丢了我一切而去

工作，走好呢，工作好呢，当然的是工作！孙逸仙博士委任我做政治顾问，我于是非常喜欣，我很愿意和他合作，我二年的工作，都是以他的主义和教训做材料，我只有这二种材料的工作，除了常常把主义和行为这二方面，想拉在一起外，没有其他的工作。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常常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挫折，我们就去请教总理的引导，我们依了他的引导去做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果就不会十分错误的，然而他现在死了，我们失了一个指导师，尤如一个小孩子失了一个教育的母亲一样，在他活的时候，差不多他的生命完全在革命上面，不但他发明革命的新途径，而且他能有权力来摧残这些阻碍革命的东西，他实在有权威的人，是一个利害的领袖，如今他竟逝世了，他逝世后，我们遇到了种种的困难，没有我们遇到种种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些才是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位同志们所要讨论和决定的。实在我们也只有二条路，我们屈服了，还是猛进，是的，我们要一直前去，把一切的力量拿出来，我们不管他的障碍，我们应当去战胜Overcome①那些障碍才是！

同志们，我们所有的问题只是内部的问题，现在我们都明瞭了解的了，我们只知团结起来是对的，我知道大家都承认是对的！我们如果都认为对的，那就好了，纵或有些少问题，我们也可以讨论，不过在帝国主义者知道我们内部有了冲突的时候，他便用种种话来骗我们，然而我们反抗帝国主义者是一致的，是共同努力的。（鼓掌）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件事我们也不应该有二种意见，使这个重要的工作在未成功前就先自己分裂而得不到实际的利益，我们决不可使他们因为我们自己内部有了冲突而高兴，如果我们有分裂的现

① Overcome，意为“征服”。——编者

象，就是我们给帝国主义者的生命中多延长几年的寿期。(鼓掌)。现在大家应该明瞭，我们应该赶快使自己的国家能独立自由，明白了这一层，我们就应当去努力前进，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是继承总理的三民主义中的一部分，就是第一个民族主义，我们决不要看差了总理的工作，是民生主义，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民生主义的时期。固然，三民主义是整个的，不能分开的，但是三民主义，同时也有系统的，步骤的，我们不要误会，因为民族自由了，国家独立了，民权民生才能实现，所以凡是我们革命的分子，就不应该有二种歧见，不但不应该，且亦不可有！我们决不要为了将来的信仰不同，而在第一步同一工作的时候就争斗，其实即使党中有聪敏的人，也说不出将来不同的地方到底在什么，就是我们总理也不料将来有不同的纠纷，他决定这种主义和策略的时候，也不料有什么不同势力，我们当合在一起，为民众而牺牲。决不能够在下定第三时期的同异，若是我们不能把意见统一，那帝国主义者就不怕我们了！

所以我们从今后让我们大家决定一致的，联合起来革命，不妥洽，不畏难，向帝国主义者冲锋，切不要使他们可以干涉我们的成功，(鼓掌)我希望在这一次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里，在关于这一点上全体一致的决心，求民族解放与独立，奋斗，国民革命的成功指日可待，就此祝国民党的成功万岁！

(原载《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第6号，1926年1月)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欢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席上之演说词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同志们！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是已经闭会了。你们在这二十天的大会中所经过的一切工作，在世界的革命史上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纪念。你们此后所有的奋斗，在革命的战场上无论如何颠覆，其精神是永远不死的，犹如你们和我们的领袖不死一样。你们在这工作的历程中，犹如在一片沙漠之上，设计建筑一个坚固的基础，使中国和全世界的民族能得到有力的援助。今天的这一些不过是你们休工下来的一些甜味罢了，但是我们不单以为已成就了这个基础，还要想如何把这个基础高筑起来。我记得有一个寓言上说：“古时罗马城里有一雀，这雀能知这大城之危险与否？因为他知道有危险时，就叫起来，所以大家视这雀为预言家，为了他有预兆，这不但是一句寓言，而且屡次的应验了。因此这个雀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东西。后来这只雀的主人带他到市上去卖给一间饭馆里去闭在笼内等杀。但那时候这只雀不能忍耐了，于是向这佣人说：‘你为什么这样的粗待我呢！我的祖上已救过了几次罗马城的危险了。’这个佣人回答他说：‘你祖上确是救过罗马城的，但是你现在要享幸福了，

所以请你到市馆里来闻市肆之香。' "①所以我以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要想在世界努力一些革命并在革命史上留一个很好的纪念，而也在继续往古的革命事业，绝不是来馆子里享幸福的。（大鼓掌）所以我们要知道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但有绝大的希望，而且是把一切的力量来战胜前途的困苦和种种障碍。虽然，有人说国民党是改变了面目，但我们知道决不向帝国主义方面走去，而且还要破坏帝国主义。当我们总理病的时候，敌人就有许多谣言说总理死了之后，国民党也就死了的，然而我们的精神和力量更团结起来向前努力，不但证明他们的猜度是差误而还证明他们的野心，现在事实上已确切由党军的胜利上知道革命的势力已扩张而将至于完成。不过党军之所以胜利全由于各种革命势力和空气所助，因之，党的胜利与否不单是一部分军队所能，而确在党的本身。所谓党军只是为党而努力的一种强有力的表证，但我们在新闻纸上不论任何方面都可以看见帝国主义者之毁谤，而同时帝国主义者也在那里害怕，因为现在能救中国的只有国民党，扑灭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也只有国民党的革命军队才能够。我们何以知道国民党是唯一救中国的党呢？因为他们能够引导民众，且为民众利益而奋斗，所以他不但受民众的拥护，且受世界革命党人的同情。因有一个革命的党，而尤其是受他领袖中山先生主义的熏陶，则这个党的成功一定不远的。所以我们希望此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之后一年内

① 鲍罗廷所引"雀曾经救过罗马"的传说，与传统的"鹅曾经救过罗马"的典故不同。传统的说法是，传说卡皮托里的神庙里养有一群鹅，当公元前390年高卢人进犯罗马城，在深夜里袭击卡皮托里时，神庙里的鹅闻声高叫，惊醒了守将马尔库斯·曼利乌斯，他立即率领士兵击退了高卢人的进攻。由于鹅的叫声拯救了罗马城，从此鹅就被视为圣物供奉，由国库出钱喂养，罗马人每年还要抬一只金鹅游行，表示纪念。——编者

的工作能够猛进。到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要在北京开的，至少也须在南京或武昌开会。但是我们决不肯在帝国主义保护或压迫之下开会，因为我们只要努力实行总理的主义，和依照遗嘱的方针做去，则不但三次大会在南京开了会，而同时国民政府也迁到南京的，代表大会终在国民政府所在地举行。因为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不能分离的，所以我们所谓在南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不单是歌颂胜利，实在是要把他总理的方法和精神扩大起来，实行我们的决议案——实行建设中国的决议案。同志们！今天的会议实在是革命上一个很好的纪念团〔？〕留在这种军阀与帝国主义本身各自破裂的时候，我们能够满足一切的欲望，国内军阀为了本身利益的不闻〔同〕而起了争权的血战，国外的帝国主义者也因有势力不匀而自己分裂起来，但谁使他们分裂的，是国民党的革命努力来使他们分裂的。（大鼓掌）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分裂，而为他们造成一个恢复努力的机会，要知道自己分裂，不但是妨害了国民党的前途，实在是中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能一致团结，那一定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唯一要努力奋斗，一方面使革命成功，一方面使总理在泉下安慰。同志们：俄国革命的成功，我们拿经验来看起来是全由于党的——领袖之下——精神和纪律，因为俄国的革命党不是没有叛徒，但这些的叛徒陆续应去的去了，革命党掌握政权的事实于是乃不致失其所以。你们应如何奋斗，如何达到国民革命的目的，要如此，就非执行革命的纪律不可，而尤其是革命的军队，因为一个革命的党，非有严密的纪律和有纪律的军队不可，——但是要有纪律的军队，就非有党的指挥和训练不可！革命党的军队之基础，在民众之上的，革命党的军队，是要做一切军队的模样的，那末革命的党才能得民众的相信与拥护。

国民党是为人民所需要而奋斗的，人民所需的是打倒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就要去打倒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所以国民党是最高的机关，国民革命是他唯一的目的。所以希望今后的国民党能以纪律来支配工作，并引导其成功，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一定能够出些力量来统治了中国，愿同志藉杯酒以祝诸同志之健康！

（原载《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速记科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4月印行。）

在广州纪念列宁逝世二周年，李卜克内西、卢森堡逝世七周年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各位同志，我们今天为什么跑到这里来纪念列宁先生呢，各位同志假若你们由广州北上而上海而北京而满亚利〔满洲里〕，再上你们更可以见到列宁同志奋斗成功的地方，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世界上穷人的国家。世界上很多人都是穷的，工人由朝做到晚，但是他们工作的结果是归给谁呢？是归给很少数的地主资本家——压迫他们的人。俄国旧时也是一样。旧时俄国的土地工厂也是工人农民没有份，而有少数资本家去垄断。农工每天做到晚，但是仍是衣不蔽体，食不充饥。资本家大地主并且勾结皇帝及帝国主义联合向他们压迫。列宁同志此时看到工农的苦痛，看到少数人去压迫剥削多数人，如是他便联络革命分子起来向国内资本家大地主俄皇帝国主义进攻，解除多数人的压迫。列宁同志此时发出一个口号，打倒少数剥削工农的人。俄国的工农群众从此也渐渐觉悟起来了，如是大家联合起来照列宁同志的口号去做。列宁同志领导他们卒将俄国少数压迫阶级的人打倒。但是此时帝国主义却通通嫉恨起来了，如是通通来封锁俄国，这种封锁比香港政府封锁广州厉害许多，不过帝国主义始终得不

到成功。帝国主义不能成功的理由，是因为俄国革命的民众能联合起来，团结一致间〔向〕他们反抗。列宁同志此时更看到英法德美等帝国主义国内的工农也是一样苦痛，也是同俄国前时一样黑暗。他们英法等国的工农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应一致联合起来。列宁同志发出这口号之后，世界的无产阶级也就一天比一天团结，他们通通联合起来，如是成了一个团体叫做第三国际。这个团体有许多各国的革命领袖，但是他们都是回去反对他国内帝国主义，而且许多因此而被捕〈囚〉禁在监狱中。前十余天伦敦政府又捕了十余人去了。他们十余人不是犯了什么罪，被捕原因，是因为带了第三国际的徽章。这些事实，并不是英帝国主义如此，其他帝国主义都是如此。列宁同志告诉我们革命的方法并不止此。列宁同志说要打倒帝国主义，一定要东方被压迫民族与西方被压迫阶级联合。这样的联合战线，便能将帝国主义打倒。现在东方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既与我们联合一块，孙中山先生指导下的国民党也是联合一气来共同向帝国主义反攻了。这个反攻，便是世界革命的开始。各位同志，今天是列宁同志死的日子，我们在这大纪念日当中要下一个大决心，做世界的大联合，大家携手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然后人类才能得到快乐。被压迫的工人联合起来——被压迫的农民起来——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我们革命的同志在两个伟大领袖旗帜之下联合起来。

（原载《工人之路特号》第209期，1926年1月22日。）

鲍顾问与白崇禧之谈话

（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原《人民周刊》记者按：广西代表白总指挥崇禧，夏司令威，刘斐（白参谋长）等于二月三日上午十一时往访鲍罗廷顾问，鲍氏与谈俄国革命之经验等事甚详，且甚精要，记者得鲍氏之允许，特录之以饷读者。

白问：俄国革命之经验如何？

鲍答：俄国革命历史一百年之久，其中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失败，直到一九一七年革命才算成功。以前屡次失败的原因第一就在没有忠实与好的领袖，没有能为民众利益奋斗的领袖。因为我们有好的领袖，我们这些少数的领袖终身从事于为人民利益的奋斗，他们把俄国人民的利益，甚至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放在他们自己与家族的利益之上。因为我们这少数领袖能这样对人民的努力，他们已成为万众所爱戴的领袖，他们已成为一种精神上的权力。列宁的死，俄国民众都为之流泪，世界的民众亦莫不闻之悲哀。杜洛次基，他曾领导红军战胜俄国国内外一切反革命与帝国主义的军队，他每次演说的时候，非特演说场是挤满的，就是演说附近的街上亦是挤满的，都以能看杜洛次基一面为快。但是单有了好的领袖是不够的，中国太平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失败亦都因为领袖四周围的人没有好的。当二年半前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以前，孙中山先生虽然是这样伟大，因为手下的人民〔们〕坏

的多好的少及对于他的命令阳奉阴违的多，亦是没有办法，只能使他灰心。在我们革命史上没有好的，有纪律的信仰主义与领袖的党是过去失败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这几个领袖决意要把他四周围的人训练好，就是决意造成一个有纪律的有信仰的与忠心的党。造党不是一天一日所可做得到的，造党不是一种机械式的程序，不是像机器一样可以拿多少铜铁与煤等就可以造得成党的。一个是党的造成要经过多少训练与奋斗，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党员要好宁可少；党员多而坏那就不如无党。我们的党曾经有一次肃清党内五分之一的党员，那时我们有五十万党员开除了十万人。现在我们有七十万党员以上，都是最服从纪律的，有信仰的遵守领袖的命令的党员，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党完全是可靠的，我们靠这党帮助与指导我们国内一切行政上，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事情。

有了好的领袖与有纪律的党，如果在他们的脚下没有基础，那么他们不免是悬在半空临风飘荡。所以我们的领袖与党，把他们建筑在劳苦的工农身上。因为俄国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在一万五千万人口中最大多数是农民；其次就是工人阶级。我们的火车头是放在工农这两根钢轨上面的。不过我们不要误会这挂车上只搭工人农民而不搭别种客的。决不是这样的。学生，商人，实业家，教员，工程师等车上都有，不论这位客人能趁一站或数站或到尽头。不过列宁相信工人阶级是能够领导革命到最后的成功的，并相信工人阶级没有农民的帮助是不能成就他的使命的。我们的工人在革命运动中确实总是站在前线的。

我们的领袖与党每决定一政策或决议时，必先考查这政策与决议对于人民大多数的影响如何，好呢？还是坏呢？如果

对于人民大多数是好的，就决定这政策，否则决不提出。不过这一种政策的测量并不是很简单的：有时在目前这政策之行施虽然要使人民受一点苦，但是人民暂时受一点苦后其结果人民得到真正的或更大的幸福。当我们革命四面包围奋斗最苦的时候，我们的兵士在前敌打仗，我们后方不得不没收农民的粮食运到前方去接济军队，虽然当时农民不免受很大的苦痛，但是这是应当的，因为前敌的兵士是为人民的利益，预备牺牲生命！后方的农民应当受苦帮助前敌的兵士。前敌的胜利才能使农民不再重新受地主的压迫而有今日的幸福。这一种暂时要使人民受苦以换得最近将来的真正幸福之政策不是人民骤然所能了解的，所以在人们中间把这种政策来宣传来解释是最重要的。所谓"为人民"并不是专为当地的人民，为那一省的人民，应该是为全国的，甚至于全世界的人民。因为一省的问题是不能单独解决的，一定要全国的问题解决然后能解决的。譬如假使在我们的乌拉山，高加索，乌克兰地方仍然是被反革命军阀所占据的时候，试问我们革命是不是在永远的危险中？试问是不是允许我们在莫斯哥省有所建设？所以我们的领袖的眼光一定注射到全国问题的解决。当然我们知道人民对于我们的估量，是以我们在当时所有的成绩，决不可以只看见远而不看见近的，所以我们是一定要注意当时人民利益的增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一省人民利益的改善不是单独可以解决的，是要与全国的，甚至与全世界的问题连带解决的。

因为我们有好的领袖、纪律的党，建筑在工农两根钢轨上，根据专为全国及全世界人民利益的政策，我们才能将十八路对垒的敌人——英、日、美、法与反革命的白党——打败，俄国的革命才能成功。尚有一点要说的，就是俄国革命

的方法。俄国及各国过去革命运动的失败都是失败在“对敌人仁爱”与“对朋友残忍”的错误方法上面。俄国革命领袖用果断的政策无怜惜地打倒敌人。列宁是我所知道的人们中最仁爱无比的一个人，但他知道要把一万五千万的民众联合起来与重重的敌人开战，决非玫瑰香露的政策所可做得到的，一定要有坚定强硬的政策才行。有了建筑在人民利益上的政纲，尚须有摧毁一切阻碍这政纲实现的障碍之无顾惜的政策。

白问：苏俄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政策如何？

鲍答：俄国革命后，帝国主义的国家，表示愿意同我们携手，他们对我们政府讲：你们可以放弃你们世界革命的梦想，而来加入我们的团体，一方面为解放自己而奋斗的被压迫民族他们天然是我们俄国的同盟者。我们的政府完全拒绝了帝国主义者的要求，仍旧继续世界革命政策与东方被压迫民族携手。东方被压迫民族为自己的解放是反对帝国主义，我们俄国为巩固其革命起见，亦是反对帝国主义。东方被压迫民族与俄国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我们苏俄帮助东方被压迫民族，就是帮助我们自己的革命。

白问：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有何异同？

鲍答：这一个问题很难答复。这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微细的研究。但是据我所知道的，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别。就是有一点差别，这是因为中俄两国的情形有所不同，不过两国情形所差别的很少，因此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中间的差别亦是很少。列宁相信无产阶级能领导革命到底，达到人类的完全解放，这是因为列宁在俄国看得见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与其在革命进行中的地位。但是孙中山先生当时在中国没有能看见无产阶级的力量与能力，不过在他逝世前

几年中中国无产阶级已逐渐表示其力量与革命性，因此中山先生的思想亦渐次与列宁的思想相接近。一九二二年中山先生与列宁先生的代表越飞在上海会议对于中国问题有共同的谅解，这就是表示中山先生与列宁先生思想渐形接近的趋向。如果天假中山先生以年岁，他与列宁的思想根本哲理上可以得一谅解。

（原载《人民周刊》第1期，第3期，1926年2月7日、24日）

世界革命运动状况报告*

（一九二六年五月）

各位同志，现在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呢？现在的世界，系一个动摇的世界，我们站在旁边来看这个地球，在地球上的欧亚非美澳各洲，好似在空中悬着，上下左右无依，时时摇摆不定的东西，恍惚这个世界，失了固定，失了平均的势力，好似疯狂的一般，若是如果我们要明白为什么失了平衡，而呈出摇摆不定的状态？则一定要明白当时的历史，当时的历史可分为两期：第一期，为欧洲大战时期，即由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第二期，为欧洲大战后时期，即由一九一八年——一九二六年，我们试一追想这两期经过的历史是如何状况？这距今非久的事，各位一定有记得的，当欧洲战争时，剥削者资本家所持的理由，是何等的好听，在他所办的报章杂志上说：战争的原因、系为谋得世界的和平，欲使世界上的人民得享自由幸福，简言之，即系为民主主义而战争，故他挂着这个假面具，无论在礼拜堂也好，会场中也好，随时随地，都是这样的去向民众宣传，由是一般工人，也为所欺骗，如英法德等国的工人阶级，也是这样的梦想；想因此而能达到生活的改善，民主主义的实现。那里知道这战争

* 本文是鲍罗廷在一九二六年五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报告后，两大会据以作了《世界革命状况报告决议案》。——编者

是剥削的资本家，因为剥削所得的利益，分配不均，而引起的大战呢，这时欧洲工人阶级皆被资产阶级的蒙蔽，试以伦敦为例以说明之：伦敦为世界最大的城市，有很多的工人阶级，在战争时期当中，工人的出版物，仅一张小报纸。而其他一切报纸的机关，都在剥削者手中。以当他的宣传的口舌，故以一小张的报纸，而欲与多数的报纸相匹敌，是何殊以一口而与多数口相匹敌，是亦犹驱羊敌虎，何济于事。到现在来，则与前时不同了，现在伦敦多数的报纸，皆操诸工人阶级的手里了。

我们很明白知道战争真正的原因，资本家并非好意，欲使民主主义实现，以改良工人的生活。纯系剥削者，没法子去瓜分世界，因此而战争起来。当时的剥削者，英、美、法、俄、意、日本及其他诸国站在一方，德奥土耳其及其他诸国又站在一方，双方争得非常厉害，其所争的地方，就是亚洲非洲两块大土地，以亚非两洲人口最多，土地最好，各国咸欲染指其间，但没有办法瓜分得均匀，不得不继以武力，所以大家打将起来，而酿成空前的大战。

欧洲空前的大战，共有四年之久，在这四年长期的大战，把全世界的财富都破坏了。把本国工人阶级所创的财富，及其他属国剥削得来的财富，也消耗净尽了。好似大战当个大火炉，把全世界上的财富，都熔毁在火炉中了。又大战的结果，好似两土匪，合伙打劫得来了一笔财富，因分赃不匀，遂相打起来。不但打得不要命，并且把抢的财富都打坏了，但是，这些抢来的财富，并没有完全打坏，还有多少遗留下来的，这时他们背后来了一人，戴高帽子身穿长袍满口仁义道德，极像君子模样，他就倡〔唱〕起和平的美调子，然后将这些留下来的东西捡去，由欧洲运过太平洋去了。这个人就

是美国。现在美国的财富，甲于世界，就是这个缘故。

美国不但拿去了这些财富，还得了很多的债权券，因欧洲大战时期，需款甚钜，同时生产品又甚少，故把由剥削本国工人得来的财富用罄，还是不够，不能不向美国借款子，美国此时除将货物运到他们国里去卖高价得一笔大款子外，亦极愿意把款子借给他们，总要他们立个凭据，以作抵押，其年限二十年或三十年，是不要紧的。英法各国需款孔急，也极愿立债务券给他，谓二三十年后，我一定还的。是以英法等国，都派代表到美国，要求延长还债的时期，因此美国竟一跃而为世界债主国，成今日最富的国家。美国于是时不但得了许多债券，而且把德国的铁路银行等一切的收入，都捻为已有，德国的工人，又多一层剥削的痛苦了。

德国的工人，每天所做的工作，比前时辛苦得多。工人所得的财富，都要交给本国转给欧战胜利的国家，故此工作的时间总要延长，所得的工资则特别减少，故德国的工人，不但受本国的剥削，还要受各国的剥削，所谓争民生主义要求自由的战争，就是把欧洲的财富移到美国去了。我们明白这点，就可知道世界的情形。

我们试就美国的财政权而论，就是如美国欲使欧洲任一国倒闭，则美国一日一夜之时间就可令之倒闭，所以欧洲各国欲还美国的债，当然也要使本国的工人工作时间延长，工资减少的。资本家所谓要求世界增进自由，实现民主主义的战争，岂不是更增工人的痛苦。

欧洲的工人不但要减资加时，去赔偿美国的债，同时又要代本国的资本家，去赔还美国的债，盖大战当中，本国无法制出货物以自给，迫得用美国运来的货，故其结果，更要代资本家偿外国的债，此为第一情形。

欧洲工人当大战后，有一件事发生使得被压迫国家减少痛苦，如印度在欧战当中，能发展自己的实业，使英国运来之货物减少，同时剥削因之减少，不独印度如此，即香港上海在战争时工商业非常发达，如造船业、纺织业，几有一日千里之势，使外来的货物，大受影响，至大战之时或大战之后，世界上被压迫民众，皆发生反抗，此反抗运动对帝国主义者，是有很大损失的，如印度，摩洛哥，西比亚，中国等地，皆起来革命，去做反帝的民族运动，此皆能令帝国主义者，受很大的打击的。如英国受中国印度之反抗，法兰西受摩洛哥之反抗，意大利受波里民族之反抗，咸使帝国主义者受到损失的，再举英国以看，英国为老大的国家，工业的组织，机器等皆较老旧，美国为新兴的国家，组织及机器都较新，故出产亦较多，如英国的煤矿公司，分成几千个，美国则仅数个托辣斯，以集中其资本，故其机器及组织，都好过英国，此所以美国能超过英国的缘故，更在中国而论，在战前中美通商是甚少的，及大战以后美国运来中国之货物，不下于英国了。由此可说或在一二年后，能超过英国亦在意中事。

占世界六分之一的俄罗斯，自从革命之后，比前大不同了，在欧洲前是被帝国主义者剥削的，但革命成功了，就不致受此痛苦了，能够自由独立，把欧洲资本家施以重大打击，此时欧洲各国，虽受着大战的困苦，然彼资本帝国主义者如英、法、意、美等国，犹不放手反而继续整备海陆军的大武备，预筹下次的大战。照这样看来，欧洲各国负了一笔大债，给谁负担呢？工人阶级反抗的损失，又给谁去负担呢？民族革命反抗的损失，又给谁去负担呢？现在占六分之一的苏维埃，已绝了完债的责任了！但这宗大债，究竟给谁去完呢？资本

帝国主义，当然不肯应付这宗债台的，还要大战起来，再给无产阶级去负担了！因为他们积极筹备战斗品了，并声明负担给款的，（一）是工人阶级，（二）是无产阶级呵！现在资本帝国主义，不独压迫本国的工人无产阶级，还要压迫国外的工人无产阶级呀！好象英日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军阀张作霖吴佩孚为工具，来剥削中国的利益，欲使中国代他完债哩！由此中国，非国民革命成功，不行了！他们叫人完债的方法，怎样呢？是把欧洲千万工友作工时间增加，薪水减少，就可榨出几千万大宗款子来偿债了。

各位同志，你们知道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意义怎样呢？现在不必我来详细报告，简略说来是表示不完此项债款的呵！如要完债须由资本家自己包袋内的金钱完去罢了，我们无产阶级是不代你们完债的！

为什么欧洲工人阶级，大战停了八年之久，到今天才起来反抗呢？当战争的时候，俄国的工农因为在列宁同志指导之下，故对于帝国主义的阴谋，是很明白，马上就革命起来，反抗他完债的负担了，故当时许多人知道大战的结果，是要工人阶级完这笔大债的，惟帝国主义的说话是说为工人谋利益，谋自由而战的，于是用着这奸计欺骗了群众，到后来战事完结，就加用一种方法，组织“国际联盟”使各国加入，宣言国际联盟可使各国亲善，维持世界和促进世界大同，用了广大的宣传，群众也以为真的了，而不知在大战前受了欺骗，大战后，又受欺骗了！

各位同志，你们以为中国的军阀和反动派，欺骗你们的手段，是很聪明，很利害，而不知国外的资本帝国主义，欺我们是更加利害的呵！各位同志，相信欧洲资本帝国主义会压迫和欺骗我们的，其国际联盟的实在作用是二端：（一）欺

骗工人阶级，小买卖，和贫困的知识阶级，在报纸上或礼拜堂中作普遍的宣传，软化民众反抗的势力；（二）实施资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准备世界第二次的大战，完全与原来的宗旨相反了！

同志们：我们勿怪欧洲工友，迟起反抗了，盖西方工友各人都晓阅报纸的，早上看的报纸，是说国际联盟的好处，到礼拜堂听讲，又是说国际联盟的好处，并说苏维埃俄罗斯的不好，等到做工完毕回来，又有晚报可阅，也是赞美国际联盟的，因此脑海中就存着这种论调，一直经过了八年，还受着资本帝国主义的欺骗，而不自觉哩！不但如是，其宣传工夫，是广阔的，在中国都可看见。此次国际派来的司法调查员，说是调查中国司法情形，关于领事裁判权，应否取销，尽可讨论，俨然极关心中国的事情一样，但在二月以前开会时，德国欲加入的，但他仍受着压迫，竟把他的假面具揭破了！斯时群众才认识了国际联盟的作用，查当时受了欺骗，一方是为报纸间及礼拜堂的言论所蒙蔽，他方乃因工会会长，不明白资产阶级之阴谋，到了此时，把假面具揭开之后，就没一天内英国二百二十万工友大罢工起来了！同时各国如法，德，荷兰诸国的工人，即开会援助英国罢工的工友了。此时正要表示工人的力量了！

（原载《中国农民》第6、7期合刊，1926年7月。）

在黄埔军校两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词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六日）

今日兄弟代表苏俄红会诚意恭祝黄埔军校成立二周年纪念。现在我们的革命虽然成功，但是你们的革命尚未有成功。我们在革命之中，奋斗了一百年，你们革命奋斗也有八十年了。妨碍我们革命成功的敌人也是妨碍你们革命成功的敌人。所以你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以为这种缘故，所以你们的领袖与我们的领袖联合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故我们单独革命，无完全胜利之希望，非联合你们革命断难成功，要中俄两国联合起来，革命方能成功。各位同志你们不应存着中俄两国有不同之点，要共同以一样的宗旨联合起来。我们革命奋斗已有了一百多年，一百年中间，同志牺牲不知有了多少。你们革命于两年中牺牲了数百先锋队，我们领袖交落重大责任于我们，要于最短时间完成国民革命，如果不能完成此种工作，算得说是革命领袖的信徒吗！同志们所以今天二周年纪念，应该更努力完成国民革命，共同奋斗，打倒敌人，到三周〈年〉时，国民革命完全胜利，全国有很光荣的价值。兄弟到粤三年之久，这三年中兄弟得到一个责任，一个很好的教训，如果中国统一之后，再要去打倒帝国主义，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如果有了牺牲的精神，国民革命必可完成。国民革命有两个利器，一个是党，一个是军队。

党与军队有联结之关系，党与军队是一个，军队与党也是一个，不可分离。我们以军队作党的先锋，只认清党与军队是一个利害，绝对团结，于军队方有希望。现在四方八面均是敌人，各派一定要联合起来，共同去打倒敌人。敌人既推倒之后，方再讨论革命的原理，否则先事分裂必影响于革命前途。我们于本日二周年纪念大会当中，高唱黄埔军校万岁！黄埔学生团结万岁！国民党与国民革命军团结万岁！一切革命的势力联合起来！打倒敌人！革命领袖万岁！中国国民革命势与苏俄联合万岁！

（原载《海外周刊》第14期，1926年6月21日。）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同学录》序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四日）

中国国民革命，因向来只为少数人之事业而未成中国广大民众之革命，是以至今尚未成功。中国国民革命必须为工农群众，加以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及革命军之协力合作，在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之下，并与世界革命运动密切联合之革命，方能成功。

请将此语缮于黄埔校旗之上！

黄埔学校为中山先生遗产之精粹，黄埔学生必须保卫此遗产而专供献于革命。

中国国民革命万岁！

黄埔学校万岁！

（原载《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同学录》，1926年版，广东省档案馆藏。）

革命的基础问题*

（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

同志们！诸位进学校的那天，是一个不可忘记的纪念日；今天当然也是一个不可忘记的纪念日了。当诸位离开这个学校，去到别的地方实际做事的时候，应该知道革命是一回什么事，他的基础是什么；我今天所要说的也就不出于此。

中国革命运动，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了，我们可把这八十余年的历史分作四部分去讲，看看过去的推动力和成功或失败的地方，究竟在那里。我们不但要知道过去的错误，还要努力去改正过去的错误。

诸位要知道，革命不是机器，革命党员不是工人不是随便转转轮子就可以使这机器流动不息的，革命〈是〉过去的失败和成功堆积起来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坐车，正进行间，车忽停止，我当时以为是机器发生毛病，及细心检阅后，才知机器依然如故，完全因道路不平，以致不但不能帮助这个车走得快，竟由阻碍而停止其进行。由此，我们可想到火车头是早已发明的，但不能行走，后来有人发明了铁轨，这火车头才能通行无阻。中国过去八十余年的革命运动，也和这早已发明车头一样，及至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始找见铁轨而开始进行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怎样修理道路，怎样铲除障碍，而能够使这车头走得更快。但是革

* 本文系鲍罗廷对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毕业生的特别演讲。——编者

命轨道是什么，诸位听了八十余年的各次运动的失败原因后，自然就明白了。

第一，我们先说革命道上的大障碍物，满清的反帝运动。他在道光年间，因拒绝英国入侵，也曾“朝廷降旨，大将出马”的和英人开仗（人民还不知反帝是什么），结果，失败了，不平等条约也被加上了。但他在此次已经分明看出中国民众在财富上，组织上，纪律上……均不如英国；将来必须使中国民众，在财富上，组织上，纪律上和英国站在同一的水平线上，才能抵抗英国。但他知而不改，只图苟安旦夕，不愿放弃特权；终于不肯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而交还政权。所以自此以后，他就接二连三的见败于法，日，俄，德，诸国以至于灭亡。

第二，我们再讲太平运动。他们睹清政之阑乱，官吏之贪残，民生之困蹙，起而作覆清之举，转战十余年，结果仍归失败。他们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完善的组织，彻底的主义，对纪律也没有革命的认识，纯系宗教思想。当领袖的，以为上帝遣他来救国救民，当兵卒的只知为革命而死者必升天堂，并不知纪律为革命成功与失败之要点。

第三，我们再讲排外运动。——即庚子之役这次运动。无组织，无主义，亦无真正领袖，较前更为迷信。可说是乱民被官府利用了。

第四，我们再讲辛亥运动。这次运动，只看重了军事运动，却忽略了民众；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修好轨道给车头走。所以结果，没有建设很好的国民政府，只建了一个万恶的军阀政府。自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始知唤醒工农，把车头放在这两条铁轨上，向前进行。我记得当孙先生在南京时，曾做了一篇文字，可惜很少有人知道。我所以能知道的原因，

是由列宁同志的批评中见的。这文字所论的，就是革命的基础问题——轨道问题。其要点有二：一为农民问题，一为实业问题。由此我们知道，我们要有革命的政府，必先注重农工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要革命成功，必先要革命的基础稳固。不然我们的革命终是空谈的了。过去通通的错误，都在这一点，都是没有解决这个基础问题。如满清因不愿把政权交给民众而失败；太平运动因民众无主义无纪律，而失败；排外运动，因官府不知组织民众，唤醒民众，只知利用民众而失败；辛亥运动，因忽略了民众而结果不良。现在我们这个运动，表面上看起来，党员较前增加，范围较前扩大；但基础仍未稳固。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这个基础问题。我来中国，第一就注意这一点。我现在关于这一点，又著了一本书，不久当可出版。

什么是基础问题——农工问题呢？人们告诉我，中国有五千万户农民五百万至六百万户工人，每户以六口计，要有三万万三千万以上的工农群众，差不多占全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我们要革命成功，就非解决工农问题不可。诸位要知道，这大部分生产的工农群众所产生的东西，不尽是他们自用，都供给了不生产的人们，自用的不过百分之五十。其余百分之五十，供给那个了呢？就是军阀，官僚，地主，恶绅，以及帝国主义者。中国反革命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就在这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工农出产品上面哩。任我们喊叫打倒帝国主义的声浪怎样高，若不解决这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出产被剥削的农工问题，我们请别希望真正的革命成功了。我们要知道现在的斗争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剥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与被剥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的斗争。我们又要知道，中国为什么没有廉洁的政府呢？因为有些人，他们仍想继续

剥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所以他们反对廉洁的政府，还有些人，他们自命为总理的信徒，他们跑〔跪〕在总理的坟墓前，可用三跑〔跪〕九叩礼表示他们的诚意，但你若告诉他们农民问题怎样重要，他们总会说你是赤化或是共产党来宣传他们。我还记得二年前，我同总理在大本营，关于农民问题，有一次商议的结果，总理有一个命令（现存文库），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实行呢？因为当时的政府，不是真正党有的，党就没有力量去实行总理的主义和总理亲笔签字的命令，党所以没有这种力量的原故，因为党内人员对农民问题没有彻底的认识和统一的意见；我们现在要有这种力量，就非使党内人员对此有彻底的认识和统一的意见不可。至于有人说解决农民问题是共产〈党〉的政策，这个疑问很容易解释的。我们要知道除共产党人外，凡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员，都必须承认农民问题是重要的。极而言之，就是要建一资产阶〈级〉的政府，也得要注重农民问题。因为想工业发达，必需要有原料和市场；现在国内外的原料和市场，已被英，美，日，法，各帝国主义者占尽，我们的原料从那里来呢？即有原料，制成物品，又该向那里销售呢？所可靠者，就是这三万万的农民了。然而这三万万的农民因受了百分之五十的剥削，已穷得要命，面包问题，尚无法解决，我们又希望那个来买其他的没有比面包更急需更重要的工业出产品呢？照这样我们的工业还能发达吗？所以要工业发达，必须要使三万万以上的农民不受百分之五十的剥削，有力以后，再来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不然工业终难发展。所以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都必须使其国内农民解放市场扩大，以稳固他们的基础。

现在我们大家，既知道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我们到了民间去或与民众接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唤醒民众，组织民众，

以巩固我们党的基础，修理革命前途的轨道，然后我们运动，才可希望成功。

此外我们还要知道，军事运动，固然是革命的武器，但只是革命的武器之一，我们只靠这个而不注重基础问题，结果终是不会好的。因为现在中国的革命运动有两要素，军事之外，还有必须注意的政治一层。前两天，关于西北国民军失败的报告，有人说国民军有几个领袖，以为他们这次的失败是由于受党的赤化的原因，殊不知他们口里虽然在喊叫着

法子使他们了解信仰或帮助我们的党没有？当然是没有的，所以军事胜利之后，最急需最重要的就是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解决民众问题的政治工作了。各县公安局的人员，和军队中的军官，是一样重要的，一县之中，若没有好人在公安局里，单是军队亦难收效；惟两个合起来，共同担负，才能收很好的结果，所以我希望诸位把从前专一的视线——当军官，稍为活动一点。

我今天所讲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不能在此最短时间中，把这重要的问题，详细的发挥，抱歉得很；可是，我所说的话，若果尽被诸位相信而记念着，我的话也很够了。我希望诸位毕业后，到乡间去的，务力领导农友们解除他们的切身痛苦；到县里去的，务使县政府成为革命的基础；到省里去的，务使省政府成为真正民有的；到军队中去的，务使军队变为我们党的炮垒；并希望诸位不要到同一的地方去，务使各方的势力联合在一起才好。总之，要千方百计，费尽心血，使我们党的基础愈巩固愈好。

一五，九，三〇。述善笔记。

（原载《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册》。）（已据原书后勘误表作了校正。——编者）

土地问题*

（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

同志们！诸位快要毕业了，即要参加最重要的革命工作，散布到全国去。在出校以前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必要彻底明了。所以我今天愿将我对中国革命的意见，供献给大家。

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已有很长的时间，至少是八十五年了，它的特性，都是反对帝国主义。要知道现在怎样进行革命工作和将来的计划，我们便〈应〉当知道过去的历史。因为革命运动是互相连系的；是活的，革命运动不是机器，革命党不是工程师。革命是一种过程，在此过程中，要发生错误，是免不了的。革命党的责任，即在研究这种错误，不使它重演。我个人参加中国革命运动，知道有一种最大的错误，即不管过去的历史，如初生的小孩一样。要知道革命军人是与外科医生一样的，用你们的刺刀，割去已发生的毛病，并防止其再生。革命刺刀不仅能刺死敌人，且须将国民革命中所发生的一切毛病除去，而防止其再演。这是革命军人用枪刀的意义，惟一的意义，不能加以其他的意义的，否则就有很大的危险。

单单一支军队，单单是一个党，仍是不能革命的，虽然

* 本文是鲍罗廷对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毕业学员所作的演讲，与编入本书之《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系对不同对象所讲，内容略有重复。——编者

其主义是对的，机器本身虽完备，有时要倒下去而不能用。我们知道火车头发明很早，也很完备，可是不能行。后来有人发明了必要的两条轨道，且建筑在很坚固的基础上面，火车头乃能很迅速的向前进行。中国的革命火车头离开目的地——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很远，因即还没有很坚固的基础。我们最近寻着两条轨道——反帝国主义和军阀，我们以火车头置于其上。反帝国主义的轨道已很老了，差不多有八十五年的历史。第二条轨道有两个时期，在辛亥革命以前为排满，以后为反军阀。我们以此两条轨道达到三民主义。

许多同志以〈为〉反帝国主义是我们发明的，其实在八十五年以前，满清早已实行，而且直接的与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武装冲突，即在广东这方面，不仅在广东方面，即在天津，大沽方面，也曾反对过帝国主义。中国反帝国主义的轨道早为满清所建设。太平运动时期，已开始第二条轨道——反军阀的建筑。继续建筑这条轨道的是义和团运动。但此运动却被满清——军阀，利用以反对帝国主义。辛亥革命，当然是继续反满清——反军阀的轨道；而同时亦是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轨道。辛亥革命，表面虽不是反帝国主义，然而自然而然要成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自辛亥革命以后，一面反军阀，一面反帝国主义，革命的火车头已放在这两条轨道上面，不过和总理的主义还差得远呵！这两条轨道所依以建筑的基础还不很坚固，不足以载中国革命的重量。

为什么过去一切反帝国主义（满清太平运动，义和团……）都失败了？满清当时的社会基础是农民，一切财富都依土地及作坊以生产。满清反帝国主义的失败，即因满清技术不能和英及其他帝国主义竞争。中国农民的经济生活，文化，和技术都要有相当的基础，才能和帝国主义斗争。我

们不能希望一般无知识和终日劳动的人去和技术优良的帝国主义斗争，它只有两条路走：第一即唤起民众，组织民众，改良和增进民众的经济生活及教育事业；第二即屈服于帝国主义。满清却舍第一条路而走了第二条路了——即屈服于帝国主义。因当时满清皇族及士大夫们虽恨帝国主义却想不到增加和改良一般人民的生活文化及技术，因此便形成了一种革命的趋势，便是打倒满清及一切赖以生存的士大夫绅士阶级等。这不独中国是如此，俄国也是一样。当俄国革命以前，俄皇及一切士大夫阶级都不愿唤起民众，以与外国帝国主义斗争，而愿牺牲民众的利益，屈服于帝国主义。他们不知反帝国主义运动，一定要组织民众，使民众的经济生活改善。不仅当时的满清和俄国如此，即现在有许多人还是这样。口中尽管叫着打倒帝国主义却不愿将民众，尤其是农民组织起来。如要到民间去工作，他们便宁可抛弃反帝国主义的工作。中国民众不组织起来，经济生活不改善，中国反帝运动是不能成功的。

从满清屈服于帝国主义以后，中国许多人加以研究的结果，知道非打倒满清不可，此即太平运动的起源。太平运动是种极广大的运动，包括几百万的民众，尤其是农民。为何这样一个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满清的民众运动，竟被反动势力所压倒而失败了？第一，因太平运动无正当的政纲，以解决大多数民众——农民的问题，即无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太平运动固〈然〉注意人民生活，但却忽略了大多数民众——农民的要求——多得耕地，减少租税，增进经济生活。因此太平运动便消沉下去，太平运动的口号是人死后可升天堂，但是民众所要的不是死后的渺茫的安慰，是要活着享受好的生活。他们不知道要民众参加革命运动，不能靠将来的允

许，必定要在平常事实上表现出来，使民众知道，他们的生活确能日益改善。将来的允许，只能使少数人信仰，不能获多数人的拥护。所以我们在群众运动中如没有解决民众生活问题的政纲，只靠感情结合，终竟〔究〕是要失败的。各国都是一样。如果各国不能解决其主要的问题——农业国需解决土地问题——那革命运动一定要失败。

太平运动失败的第二原因，即是无一个民主集中的党。太平运动是武人的，宗教的，专制的。其领袖即所谓天所派的天王，人民一切均须服从。这样便失了民众自动的能力，一切均由天王作主。这在军队中是必要的，士兵服从官长，官长服从司令，可是民众不能如军队一样的组织，应由人民自己选举他们的领袖，而服从其命令。太平运动是由上而下的运动，而无一个从下而上以引导民众的党。同志们！我们要注意研究太平运动。因他是国民党的先进运动。他虽建设在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两条轨道上，而终于失败。即因无坚固的基础，即未能解决大多数人的土地问题。

义和团为何失败？满清利用人民反帝国主义，而又不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于此我们便可得一个教训，我们仅叫人民去打倒帝国主义是无用的，我们须为人民解决一切生活问题，使他们为切身利益而去打倒帝国主义。辛亥革命的失败，亦因无民众力量，单依靠武力，是由上而下的，而不是由下而上的运动。乡村县省的情形，仍然如故。不过推翻了一个宣统，另产生了许多的宣统而已，土地和党的问题全未解决，一切的政权都被袁世凯夺去了。这是军事革命下面无民众的基础，十五年来的纷乱即此之故。

当时是不是无人知道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呢？不是。当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总统职时，他曾作了一篇文章

寄给比利时的一家社会主义报纸发表。其大意谓：土地问题，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我们对孙总理著作中注意一下，便知他非常重视土地问题。我们如能解决土地问题，则中国大多数的民众都站在我们这边来了。

为什么土地问题这样重要？为什么过去失败都因未解决土地问题？为什么不解决土地问题即不能达到总理的三民主义？中国约有五千万户口的农民，每户以六人计，共有三万万农民了。中国约有五百万户口的工人，每户以六人计，共有三千万工人。这三万三千万的工农，是中国唯一的生产者。土地问题与这三万万人有密切的关系。若将国民革命中的三万万人的问题不管，那基础在何处？过去的错误，即在未替这三万万人解决生活问题。我们要问什么是国民革命的目的？是不是建设一个如英美德法的资产阶级的政府？假定建设一个完美的资产阶级的政府，那便需要什么条件？资产阶级的政府建筑在工业发达上面，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和市场，中国原料是不足忧的。市场怎样？市场有国内国外的分别。国外市场已为各帝国主义占去了。过去的大战，即国际帝国主义夺取市场的结果。中国当然没有能力和国际帝国主义争取国外市场，中国市场只能向国内市场发展了。中国国内市场本来很足发展，但在实际上，为什么这广大的市场还不能做工业的基础？我们要讨论的就在这里。

这便因三万三千万的人口未有购买力。他们无钱买鞋，当然不能希望鞋业来发展。他们无钱买衣，当然不能希望衣业发展。农民无钱买新式的机器去耕田，只能用不好的犁耙。他们无钱买运输的工具，怎样能希望新式工业的发展？农民晚间睡的很早，因既无钱买油，当然更不能用电灯，怎能希望电业之发达？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识字不读书不买书

因之书店纸店都无销场而印刷机器亦不能发展了。既无国外内的市场，那末，一切工业品卖给谁？如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则中国将在退化情形中，即成资产阶级的国家亦不可能。这是不是因这三万三千万人不工作，因之无购买能力，使工业品不能发展？我们知道中国农民，比任何国的农民都做工的多，自早至晚都在从事生产，且每日如此，每年亦如此。这岂能说他们是不做工，未生产的吗？然则其原因又安在？即因中国还有许多人尚实行中古时代的剥削政策。法国中古时，农民所受的剥削，比中国现在农民所受的还轻。各国中古时农民所受的剥削，没有中国现在农民所受的这样厉害。可是现代国民革命和政府，仍建设在遗留下来的封建制度的环境里面。

中国三万万农民的工作，比任何国农民所作的还多。但他们生产品却不能自己享受，大半都要被不生产者占去了。三万万农民之生产品，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五，要给不生产者占去。满清时代如此，民国时代亦如此。所余不及一半之生产品，只能维持他们的生活，甚至连生活都不能维持的都有！总理曾说：中国人口的增加，不能照他应当增加的速率。因他无适当的生产品的原故。如农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生产品不被人偷去，他们当然有钱买一切工业品，而工业必能因之而发达起来。如无法解决土地问题，中国人民将继续穷下去，国民运动将仍沉下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侵略将更凶猛的实施下去！所以无论共产党员或任何革命党员，都应起来解决这个土地问题。

仅叫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是不够的。如不能解决土地问题，那些口号便成空的了。满清也反对帝国主义，但不能叫革命。为什么呢？就是因满清不能解决土地问题，若解决此问题即是打倒满清自己，所以他愿屈服于帝国主义。太平

运动知道要解决土地问题，一般人很不相信，这便是总理说的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了。二年前总理曾说自〈己〉签字一个命令，即减少农民现纳租税——从百分之五十中减少百分之二十五。使此命令能执行，农民即可减少十二石半谷了（以百石为标准）。此命令为我在广州所亲见，现仍存在政府公文库中，使此命令早日实行，则农民将老早起来拥护国民党了，每家农民将以总理的像挂在他们家中，当神一样看待了。此命令我认为是总理遗嘱中最重的要的〔最重要的〕一项。为何此命令未执行？因为当时国民党没有力量去执行，党未有强迫党员去执行的权力，乡村没有党的力量，县省没有党的力量，大家不服从党，如何去执行？

每每叫人去乡村中为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便不愿意了，他们好像都怕解决土地问题。有些同志宁可同帝国主义军阀争斗而死，然而对此实际问题，则不但不愿去努力，而且反欲避免之。此命令之未能执行，即因党员未明此命令的意义。我们现在已到了一个新时期，革命势力已向北发展，似乎离目的地不远了。但是在实际上却还远的很。我们只能给军阀制度一个打击，不能完全肃清北方的军阀。即已攻克的地方，亦有新的倾向的危险。一俟政局稍定，我们即当从速解决土地问题。能否成功是要全靠诸同志的宣传。不解决土地问题，国民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无革命化的乡村，便无革命的地方政府，无革命的地方政府，便无革命的省政府。无革命的省政府，便无革命的全国政府。即有，也是空的，靠不住的，所以一切问题，一切工作，都应集中到农民乡村中去。

乡村中的工作，要好的革命党员去做，以使乡村成为党的砲〈堡〉垒。县和省的工作，也要好的革命党员去做，使县和省

成为党的砲(堡)垒。我们要注意乡村中的工作，我们要将基础建筑稳固，我们要使党有力量，党的命令要在乡村中能为人服从，县和省政府都要服从党的命令，军队中的同志要服从党的命令，承认党为国民革命的领袖。我们再说西北军如何失败？有人说是因军事的失败，而我们却以为是国民军未受国民党的指挥，仅口说信仰国民党的主义所致。国民军是很有纪律的军队，且有很好的领袖冯玉祥，但因未有政治的领袖，终竟只有失败。我曾亲向冯玉祥说：如无党的领袖，终是失败的，他现在相信了，仅仅名义上叫革命军，如不服从中央的命令，便什么都完了。我们要使党有力量，一定要做实际的工作，一定要从下部做起。如能解决土地问题，则必使农民都站在我们这边来，其余农民都可组织起来了。

以上不过将我在中国工作三年来的经验说出来，从这些经验中，可得到以下的结论：如革命分子不能团结起来，使党很有力量，则革命一定不能成功。我们要联合在实际上去解决农民、工人、商人、学生、教员等的一切工作和生活问题。我们要联合在具体问题上来。要推测这人是否真正革命党员，只问他是否有决心去解决土地问题。如他尚怀疑这个问题，则靠不住了。如能决然解决此问题，便是真正的革命党员。

一切革命分子联合起来！

一五，一〇，一。至精笔记。

(原载《黄埔军校第四期纪念册》。)(已据原书后勘误表作了校正。——编者)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

（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

（原记者注：鲍先生对于中国国民革命，得到结论中之大问题，就是这个土地问题。他以为欲求中国革命成功，全视这个问题解决与否，所以他近来对我们三次讲演，每次都把这个问题反复阐明，特别教训我们注意这个问题之工作，同志们！我们亦应特别注意此问题啊！）

中国革命的历史已八十五年了，每次革命运动，都是反帝国主义的，近年来更是厉害了。不过我们若单就近数年而研究，是难得一个真实的结论，因为革命是有历史的因果关系的，非明了已往的历史，一定研究不出结果的。

革命运动不是机械式的，是活泼的，革命运动是时刻在随着时代而递进，在这个过程中，又是免不了错误的，但在此错误中，就可得到革命的教训，因此，非研究过去的历史，教训就无从得来。

我自参加中国革命以来，觉得中国革命党员的大缺点，就在不肯研究过去的历史，找得失败的教训，而只图目前干下去，革命的历史是很远的，我们要明其根源，才能免去一切毛病，革命党员犹如一个医生，既要医治疾病，更要防止其一切毛病的发生。诸君是革命军官，一把枪就是医生的割毒刀，要用他将一切毛病都割去，并要防止将来发生毛病，这是枪的唯一意义，若再加上别的解释，就恐会发生危险来。

革命若单是一个军人或一个党，是不可能的。革命者犹如一架机器，本来会自动的，但若不加以看守，则两件机器的衔接处，又容易相撞以致破折，而不能行动了。一个火车头本来发明很早，因为只一个车头，所以不能行动，到后来有人发明了铁轨，又建筑在坚固的地上，火车头于是能行动了，中国革命，是一个火车头，离行动的时期还很远——即总理三民主义实现的时期还很远，因为还没有找得一个良好的坚固的基础，最近已经找得两条铁轨了，即反帝国主义与军阀，我们将在这两条铁轨上，去进行三民主义。

"反帝国主义"这个口号，在满清时就已经有了，并非我们现在发明的，满清是第一个与帝国主义相冲突者——尤其是与英帝国主义，他是以武装抵抗的，还不比现在用罢工的手段来对付，满清与帝国主义的冲突，好比现在吴佩孚的军〈队〉杨森与英兵冲突一样。

反帝国主义的铁轨，就是建筑在满清时代，此时代的建筑者是太平天国运动；同时又建筑第二条铁轨——反满，义和团运动，是满清利用来反帝国主义的。辛亥革命，一方面是建筑在反军阀——倒满——上，一方面是建筑在反帝国主义上，虽未明标反帝国主义的旗帜，其意义当然是建筑在二条钢轨上的。自辛亥革命后，中国革命运动，才正式开始建筑这两条钢轨——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形式，但到了现在，离行动的目的还很远，虽然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这两条钢轨是很好，但就八十五年的历史看来，建筑钢轨的基础还不坚固，所以隔行动的目的还远哩。

为什么满清反帝国主义会失败呢？因满清的基础是建筑在农民上的，所有一切财富，均取之农民身上，但农民毫无解放的思想，所以满清第一次与帝国主义冲突——鸦片战

争，即一败涂地，就是因为中国农村文化太低，抵不过英国的文明。如想抵抗，就要解放农民，我们断不希望奴隶式的农民能够反抗帝国主义而不失败，所以我们要反抗帝国主义，一定要提高农村文明，组织农民，使其解放，如此，方能抵抗帝国主义，这种抵抗，就是革命。

当满清皇帝士大夫受了帝国主义之压迫时，总不想人民的革命来反抗；因为人民的革命，首先就要打倒自己，因为如此，所以满清失败于帝国主义之后，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屈服于帝国主义之下；一条路是唤起全国民众，共同反抗。但满清宁愿走第一条路而不愿走到第二〈条〉路。不过这种情形，不仅满清如是，在各国历史中，多是喜欢屈服于外国而不愿组织本国民众来反抗外国的。又在各国历史中，如果人民组织起来了，就要妨碍本国特殊阶级的利益，所以本国的特殊阶级，宁愿将国卖与外人，而借以保护自己特殊的利益，十五年时〔前〕的满清，就是此种办法，自满清屈服外国后，就有许多卖国痛心的事起来。后乃知要反帝国主义，必先把满清皇帝士大夫绅士打倒不可，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起源。太平天国又知道要反抗满清，一定要唤起民众，所以牵动了千千万万的民众，布满了全国，作一极广大的革命运动，不过这个伟大的运动，因内受反动的满清与外国恶势力联合进攻，而失败了。但是太平天国运动既有了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两条钢轨的模形〔型〕，又有了一点民众势力，为什么竟至失败呢？其最大的原因，就是当时根据经济的原则错了，专采用原始共产的制度，将一切财富，都操在太平天国领袖之手，这并非农民的要求，农民所要求的，是要点土地来耕种，要受教育，今不适农民的需要，就是未将农民的基础坚固好了，所以失败。除掉经济原则错了外，还

有组织上不完全，没有一个党而建筑在半迷信半军人专政的上面，自称天王而统治部下，所以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第一就是没有替中国大多数民众解决一切问题，就是没有解决农民问题；第二就是没有党的组织，而受半宗教半专制的引导，因此，就被满清皇帝士大夫勾结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而失败了。这个运动，虽然是建筑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二条钢轨上，但因基础不固，终于不能支持到底。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可说是历史的因袭，在满清时代，要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而又不知解决人民的经济问题后才能反抗；但要解决经济问题，又必须打倒本国反动势力。这就是说，要打〈倒〉帝国主义，必先打倒满清，义和团之失败也就是因为：（一）没有打倒反动派——满清，（二）没有解决经济问题，这两个革命必要条件，

义和团失败后所得的教训，知道徒只口说是不成功的，必定要人民自动地去干；要人民自动地去干，又必定要首先解决人民的经济问题，组织起来，才能使人民勇往直前，但在满清是宁愿屈于外人而不愿人民起来妨害自己的利益的。

辛亥革命，因为只有一种军事行动，而未建筑在人民基础上，所以满清倒后，名号共和，实则又产生一些小皇帝——军阀来专制，这也是因为没有解决民生问题，不能建筑一个基础，而革命势力不能支持而落于袁氏之手，但当时对于革命主要的民生问题，孙总理是仍然顾到了的，当在南京就临时总统位时，曾做过一篇文章登在某社会党报上，① 主要

①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当天作了《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的演说》（见《孙中山选集》，1981年版第93至99页），7月11日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人民报》将它译为法文刊载，俄国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涅瓦明星》第17期加以转载。这里所说“在南京就临时总统位时，曾做过一篇文章……”欠确切。——编者

的就在解决民生问题，此外如各种著作及讲演中，处处都顾到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他知道非解决这个问题，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土地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我们若不解决土地问题，则八十五年的革命会因此而无成，恐八十五年后的革命还在讨论中呵！现在叫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本是很好的，但实际目前的土地问题，必同时解决，若有人说这是两回事，则可说这个人还不知中国的革命！以前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都因土地问题未解决而失败了，这些都是很显明的事实。但现在一谈到土地问题，无论乡村中也好，官厅也好，都起来反对，以为是实行共产主义了，其实土地问题，是国民革命中一个主要问题，其反对解决土地问题的人，是因享有承继太久而不愿放弃，这种人是与满清一样无分别的；要他来反帝国主义也可，如果人民要组织起来，他就不肯来了，国民革命是要首先解决土地问题，若不解决土地问题，是不能够成功的，我们不要唱高调，我们应就实际问题着想——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为什么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呢？我们现就中国的农工统计来看看：中国的农户为五千万，每户平均为六人，则得三万万〈人〉，工人为五百万户，平均每户六人，亦得三千万人，四万万人的中国，若此三万三千万的生产者，——农工不解决，革命如何成功呢？

如今假定说：中国革命成功后，成为一个很好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如英美法一样，而他们的国家是建筑在工业资本上的，（但是苏俄是建筑在农工阶级上面的）工业的要素是原料，资本，市场，在中国原料是很多的；市场可分为国内的与国外的，国外的就是被帝国主义占去的，统计是很大的，

但不能希望在此多数人来建立一个很大的市场，因为他们——农工——太穷了，无钱购买：有资本制靴而无人买，有资本制衣而无人买；农夫只能挑水灌田而不能买自来水机，晚上无钱买油点灯只得早睡；去买米不能雇车只得自挑……既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力量买得起，那工业发达了又有何用？只好摆在货架上看看罢了！倒底工业又怎样发达呢？市场又怎样兴起来呢？有人要说，这些人无钱买东西，岂不是因自己懒惰吗？但是我们要懂得，没有人买工业品，中国工业因不能发达；但在这三万万农民，比起各国的农民工作都忙，而他们又没有钱买东西，这是因为他们的出产物要将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五供给特殊阶级，譬如一百斤米，就要送给东家五十斤至六十五斤，将他们的生产品剥削去了，所以他们就没有钱买东西，何得说他们是懒惰呢？——农民因为压迫得不能动了，不能组织起来，而任人剥削，这个剥削数目，就是一切问题的来源，也是过去革命历史〔次〕失败的原因。这个问题也就是中国革命的严重问题，谁也不能否认他！现在如有人希望工业发达，必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建兴市场，固然，共产党不希望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出来，但无论哪一派，都要希望这个问题解决后，革命才能成功的，甚至资本家要想自己工业发达，也想先解决这个问题才有希望。至于我们要革命运动发展，就要先希望农民革命化，譬如我们要有革命的省政府，就要有革命的县政府；要有革命的县政府，又必须解决乡村中的农民问题。所以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基。因此，我们就要打破专靠军队的武力去革命的思想，如今要是个革命家，他必先要解决这个土地问题的。就是一个党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必受人民的爱戴。其余工人学生商人等问题，已经讲过很多，所以今日单就“土地问题”特别提

起个注意。

革命党是不能独行的，军队也是不能独行的，必定要有乡村，县，省，都为革命的堡垒，革命党才能行动。我曾记二年前孙总理亲自下过一道命令，将田租在百分之五十者减成百分之二十五，但没有见诸实行，就是因为乡村，县，省的人民，很少是为党的，所以党就无此力量去实行。平日别人谈话，很少说起这道命令，我以为这个命令也是孙总理最重要的一个遗嘱。但因党无坚固的堡垒，恐难实行罢了。所以革命要在反帝国主义与军阀这两条钢轨上去，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使农民组织起来，站在革命党方面来工作，并且我相信将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各阶级都会联合起来革命，而完成孙总理的事业。过去的失败，是因土地问题无解决，今后若还不解决，恐又将失败！革命分子联合起来，解决此问题！使乡村，县，省都为党的堡垒，才能使中国革命在反帝国主义及军阀两条钢轨上，自由行动，实现中国之独立，自由平等！

十月一日于中央党部

陈肇平笔记

（原载《黄埔潮》周刊，第12期，黄埔同学会印行，1926年10月10日出版。）

国民政府高等顾问
鲍罗廷先生演讲词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

国民革命与反帝国主义运动十五年前，就开始了，但是现在尚未了结。各位纠察同志！你们今日由前敌回来了！你们在前敌高举国民革命的旗帜，国家的尊严与工人的威望充分表现出来了，今日你们回来，就是检阅你们的力量与经验，预备将来新的斗争！同志们！你们由激烈的前线回来，其他反帝国主义的同志，你们的兄弟，还在江西福建与帝国主义走狗奋斗！现在国民革命将敌人包围了，他们无论左冲右突，都冲不出民族革命铁桶的包围。现在孙传芳最有战斗力的军队，都肃清了。我们的军队在南昌经过许多困难，现在胜利了。当在困难时，农民在敌人后面打鼓扬旗，以寒敌人之胆，使我们得到胜利。现在革命军握着反帝国主义的旗帜向前，可由广州打到满洲里了，使广东不致孤立了。现在的情形，我们广东好象右翼，江西福建为中路，天津满洲里为左翼。我们右翼与帝国主义奋斗十五个月了，现等到中路与左翼，预备好了，再行进攻。现在将中路左翼的反动军阀肃清，使人民得到团结，工农得到发展，那时中左两路可以一齐向帝国主义进攻。我们广东是个领导者，我们要做预备工夫，使革命基础得到巩固，使广东成为模范省，肃清土匪，开筑公路，使人民生计发展，那时我们就要领导全国民众向

我们的敌人进攻。同志们！你们是全国反帝国主义伟大的力量，在过去十五个月中做成了我们的榜样，证明了反帝国主义要有不妥协的精神，才能成功。你们是全国同胞的模范，全国同胞都得到你们的教训。同志们！今日以后更要努力做工夫，领导他们打倒帝国主义！

（原载《工人之路》第461期，1926年10月11日第3版。）

国际政治及中国革命根本问题*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第一讲

如果问地球分为几块地方？这事必先知地理，知地球分为几大部，现在知道第一部是亚洲，第二部？是欧洲，以外是非洲，澳洲，美洲。美洲是分为南北中三部。中国是在何部？亚洲；以外是日本，印度，及俄国之一部，也在亚洲。欧洲，是英，德，法，俄，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葡萄牙，比利时。英国是海或陆？离陆约为二十余里。在欧战时，德拟在法境架大炮轰英。又前次报载，有一女子由法境游泳至英，可以知其离陆不甚远。中国至英有三途：一由俄，一由红海，一由美国。非洲有埃及，现是英属，摩洛哥是法属，摩洛哥的民族是里夫，南非洲之联邦亦属英，非洲几为欧洲瓜分，此语是当否？现在须知的，是非洲为人瓜分是最重要。澳洲？是英属。美洲有几国？北美：有加拿大美国。美国：前为英属，何时逐英？略为法国大革命时，但又比此为早，是在一千七百八十三年，法国革命在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一千七百八十三年是在美国打倒英帝国主义的时候。中美：是墨西哥，巴拿马运河，前时至中国是绕道，现由此可减少半路。故我们要知国际政治，必先知此。这运河是属美。一千七

* 本文系鲍罗廷在黄埔军校的演说。——编者

百八十三年美打倒英帝国主义，但自己亦变为帝国主义，所以我们不能以他打倒帝国主义为满足，因他自己亦变为帝国

不买洋鬼子的物，他的工业一天天发达，故一天天争夺市场。欧战为什么起的？因工业发达，故市场亦必日大。当欧战时英美的报纸说何曾为争市场？争非洲？争中国等市场？抑为非洲民族自决？或为中国民族自决？此事他们不能对我们〈说〉了，德国报纸如何说？为保守，但此为皇帝时事，彼又何曾说为民族主义？报纸上只说："我们须救世以贯澈民族（原文如此。——编者）德国是一民族的皇帝"这是否说鬼话？他们是：争非洲及东方……及农业国，能卖他们的货物的地方。欧战是：一千九百十四年至十八年，俄国在一千九百十七年已脱离战争，云你们去打你们民族战争，与我没有关系。他们战四年，死者千万人，欧战时的炮弹，一粒要费二千元，他们用炮来战是四年，因四年战争，钱不知费去了多少，他们在几十〈年〉前工业积来的皆已战去，即是聚各交战国的货在一块地方把他焚了，这费是太大了，只有一国稍得利益，就是美国。俄国亦得了利益但和美国的利益不同，以后再说。美国得全世界金额一半，现在美国什么东西都是金的，美国将欧洲的金皆提至美，而又至欧洲收利息。他在战后，有一地法兵经过，美国每人给一碗汤，法兵云此是美国汤，各国兵士所说皆是一样，即买美国货物，亦云这是美国汤。前一项美国汤是不要钱，是慈善意思，美国人亦以此自夸，说是送赠的不计较钱，但欧洲金子皆流入美库。在大战前，美是很恭敬欧洲，故美国人到欧洲是举步小心，但在战后，美国以汤享各国。故美将官至欧洲是高视阔步，因为各国皆欠美债，不是少数，故知欧战后，美国有无上威权，以支配欧洲各国，要他吃什么，就吃什么，做什么，就做什么，此是欧战的结果。在战前美国在欧洲是无一点权利，战后在欧财，政，二者已有最高权利，美国已可统治欧洲。

欧战结果第二是什么？英国经济威权已行跌落，即英国在战后是向下走，不是向上升，这是什么原因？即战前农业国皆渐发展工业，故英之势力渐落，在中国印度埃及的工厂，是英官僚工厂，可举一例，香港从前的船是向英国造，现在不要到英国造了，因为农业国的工业已发达了。故在英国有二百万失业工人，当欧战时英国没有时间来造商品，专造军火去了，故印度中国需用商品，只好自己开工厂来造。我们方说英国是百年前的工业，故机器亦是很老，比别国是格外旧式，方说德国是较为新工业国，故机器亦较为新式，美国的机器亦比英国新，为何美国机器比英国好？为新工业的缘故，如现在设一工厂，是买新式机器，故德国比 英 国 好 一点，美国一工人比英国三工人所作的出品还要多，因机器新，故出货亦较多，因英国机器皆是旧式，不能及美国新机器及德国新机器之便利，要明白各国情形当把从前和现在比较一下。下次再说英国是要革命，因为 要 救 自 己， 必 要 革 命方可。

第 二 讲

前次说过英国不特不及德法，更有一点是要注意看报而又细心的人方能知道。以美国为比方，美国一矿工作的要比英国矿工加三倍四倍，这结果不特美国机器比英好，而组织上亦比较好，但美国是工业落后的，此一层谅大家一定不怎样清楚，对于工业组织详细说下。以矿工为比方，英国矿工是二千万，美国不过几个公司，但尽是托拉斯，二者是何为好，一为很多的小公司，一为聚小公司为大托拉斯，故托拉斯是较为坚固，工业是要发展扩充，故美国工业组织方面是比英国好，机器比英国好，生产力比英国好，而组织又比英

国好，由此世界商业竞争到底是英国好还是美国好？——美国好，欧战前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很少，在战后美国已能与英国竞争，一天天夺英国商业来做，我们试看欧战后英国是往下落，不是向上升，英国往下落的原因：

（一）级数落后：这是百物质〈量〉上落后？抑为数量上落后，现在英国的布物虽是做得精巧，但不及美国之多，而剩余亦多，故说是级数落后。

（二）欧战之际各殖民地各发展其工业，现在如印度有很大的工厂，有三万人的工厂专做铁路，印度现在大罢工，是纺织工人有二十万，此是英国工业的中心。

（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已有国民革命起来，现在不论什么样的国家都觉悟了，如印度埃及等，如俄国前是很多英商，但自革命以后，英国不运货入俄，已经断绝，不能运进去了！试看香港在地球上如一粒，用香港和属地比，或和非洲美洲〈比〉皆如一粒，广州亦非常小，与世界比更小，但香港小广州亦小，这次罢工已给英国以非常大的打击，英国损失约在一万万金镑，折中洋为十万万元，此是民族觉悟给与他的损失。你们在街上见有罢工的劳力，裁缝等，就是这班人在这五月内给英国以这大的损失。又俄国有二百万工人不与英国通商，其损失为何如？又加拿大是很丰富的国，地方亦是很大，自欧战发生及战后，其工业皆属美国，前时是属英国。又欧战前英国在土耳其的商业是很大，战后是减少了，故说民族觉悟是英国工商业往下落的原因，现在已明白了。

由此可知英国的衰落原因。（一）战后农业国的工业发达（二）级数落后，（三）组织不良，（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觉悟，凡此皆足以致英国衰落。更有一个原因，是现金皆到美国国库。因现金至何地而经济亦随之，上面说不论何国比

欠美国的债，故知经济力量已由欧洲移至美国纽约了，不论大小经济皆是一样。

为什么把英国说了半天，因为英国是第一先进工业国，英国是第一帝国主义的国，向亚洲美洲非洲去侵略，在战前英国是独占世界，赚了很多的钱去了，国家资本亦非常之多。因为英国是第一帝国主义的国家，而各殖民地亦已觉悟了，对于英国将如何？殖民地望成功？不望其成功？抑或助他待其强大？因英国是落后倒〔？〕同时各帝国亦随而倒，而殖民国的运动方能成功。英国对于中国有非常之关系，将来如何对付？及是否一定？或者云英国现在非常困难，将来能有出路，此是一问题，这事是最重要，英国能否找得出路？亦是最重要，或者再发生一次战争，而作出路，再发生战争，是否助英，因为英国有很好的海军及兵舰，打一战，或者可以找得出路。同志们对此，再战能找得出路否？一定是说不能，因再战是使英国更为困难，这时候英国军舰不敢来，也是这一点，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及四十一年，清帝下一令，不许有鸦片入口，不许与洋鬼子交易，英国是如何对付，即刻调舰打来，现在广州海军不比一千八百四十二年时好，亦不比前时多，此是我可证明的。英国最大的兵舰只能到澳门，一舰有十七八大炮，澳门至虎门不过六十里远，若放一二炮虎门已不成问题，而且不知炮从何来。为何他不开仗？因为沙基一战，已给他损失十万万圆，再战是做不来了，前时有一将军说：我无论如何胜仗，但再战是兵士都没了。英国最重要者为工商业，顾此为英的生命，倘再战是英国工业竟要往下落。现在英国已有二百万失业工人，若每工人家庭是三人，则失业者为六百万，二百万在中国是不甚要紧，但在欧洲是极重要。此等工人，不是农民来工厂要工

做，此工人代表财富非常之多，英国工厂一次出来二百万工人，且是熟练工人，能建大洋房大机器，是英国一次训练出来的工人，倘你们给我二百万工人，再给资本，则能做大工厂大轮船，五年后中国亦是大工业国家，但二百万工人是每天在工厂内走来走去，为什么他不出来？因此工人不作〔做〕工，每天是要给五千万镑金，折银圆为五万万圆，去供工人日用，此人人每星期要英政府给十五先令，多一小孩，则多给一先令，此等钱何处找来给工人？英国若在二十四小时内不给钱，则即刻有革命，因英国是工人国，此钱是向国家资本内取出的。国家资本是什么？如我为工人现已四十岁，作了几十年工，积了一千圆在银行，现在年老，每月十圆是不足用而到银内取二圆应用，英国的钱亦是此样，此即是国家资本。现在英国已有出路否？英国到了这步田地，亦知都〔道〕英国衰落的原因，但有何法以救济这一种的衰落呢？英国有何法以制殖民地工业，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英国又能否不还美债？不能，因不还美债而更往下落。英国又能否将现在的机器弃去，再办新式的？此不是现在所能做到的。又英国能否变换不处于和世界极大国家竞争？但现在英国已找得出路，是要有很好的脑筋方能想出如此妙法。前次说过英工人千四百万，若每家为三人，则为四千二百万，英国人口是四千七百万，故大部分是工人，现在英国的妙法是：将生活程度减低，即是将工人工资减小，英国要将所做货物出尽，不是将机器改造，是将工钱减低了，但英国工人生活程度，是奋斗百年得来的，且是渐渐来的，若英国果能将工人生活程度减低，能与世界各国竞争，或者能维持现状，这是妙法。此是多数人生活减低，即是将生活变移一下，此法是英国治病的法，除此以外，无别法了，且不能办了。若此法

不能实行，是没有出路了。英国外交总长张伯伦要中国得和平，等英国商业能发达，多做些生意，好改其工厂内机器变为新式工业，使工人能得工做，但此得和平否？是不知道的。时英国已在水深火热中，若中国国民革命团结起来，知道世界情势，我们要收回关税，就收回关税，要取消不平等条约，就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不还外债，皆可以做到的。现在不能团结起来，是帝国主义者的运数，但听这样好机会过去，帝国主义者站住了脚，要再得自由平等是不可能的，现在对于中国方面的情势是很好，因敌人方面正麻烦到不得了，但你们没有团结，是最可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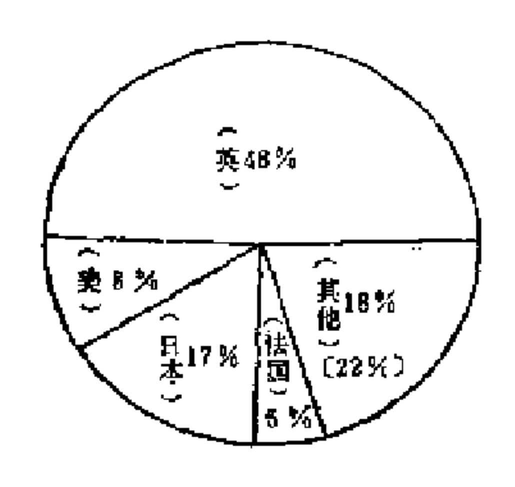
第三讲

今天和诸位讲各国国际上的情形，因为此事影响于中国利益，前次说过帝国主义最大的国是英国，若中国能起来不难将他打倒。现在英国已陷于衰落的情况，试将一千九百十三年至一千九百二十三年的事说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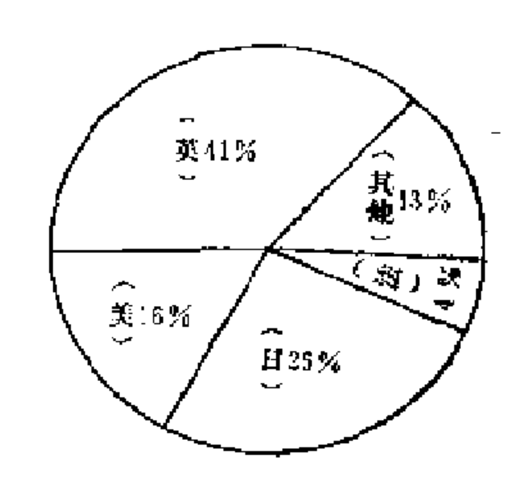
一千九百十三年在中国货的总数为九万万七千三百万两，一千九百二十三年的总数为十六万万七千六百万两，比一千九百一十三年是增加了一倍，经过的时间是十年，在一千九百一十三年的总数内，各国所占的多少呢？英国是百分之四十八；则中国的贸易百分〈之〉四十八是英国的，日本是百分之十七；美国是百分之八；法国是百分之五；其他各国为百分之十八①；其中各国的比例，日是英之三分之一，美是英之六分之一；日为美之二倍：（如下图）

① 此处计算有误。其他各国应为百分之二十二。——编者

一千九百一十三年
各国贸易比例图：



一千九百二十三年
各国贸易比例图：



一千九百二十三年：英国为百分之四十一；美国为百分之十六；日为百分之二十六；法国为百分之四；其他各国为百分之十三；由此可知英国贸易已往下落，而美国已增加一倍，日为三分之一，法亦下落，特〔唯〕美国，日本，在中国的贸易是渐渐向上（如图）。这样的图是很有研究的价值，可说他是小说，亦可云是帝国主义的传记，如此图看来英国在华贸易额是大，日本美国亦是一样，但如何能使三国联合起来？因其他各国要互相排斥，且又是利益冲突的。

再说帝国主义在中国工业所赚的东西，先说煤，工业无论如何是完〈全〉靠着燃料，可分为二期说来，第一期是煤，英国最多，故英国工业有此燃料，遂能发达，第二期是煤油，但亦以煤为基础。

（一）煤　一千九百一十三年的投资

英国二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 四九、五〇〇、〇〇〇
日本二七、五〇〇、〇〇〇元 ⎭ 元（外资）

中国五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由此观之，总资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外资是一

半，中国的煤业一半是何国销售呢？是英国，中国是有一半资，但此半资中亦是很危险，因为是由外国人借来的，出产煤的表如下：

英国二、八〇〇、〇〇〇吨
日本三、七〇〇、〇〇〇吨 } 六、五〇〇、〇〇〇吨

中国七、一〇〇、〇〇〇吨

一半是英日资本出产的煤，中国的煤一半是在英日手内，故在中国煤的情形是在英日手内。

（二）棉纱业　中国今日最重要的是棉纱业（棉纱业是以锭计算的）

英国二五〇、五一六锭
日本一、二二〇、〇〇〇锭 } 一、四七〇、五一六锭

中国二、一一一、〇〇〇锭

在中国内的纱业是三、五八一、五一六锭，在帝国主义手内者为一、四七〇、五一六锭；中国棉纱业一半是英日手内，一半以上是中国的，此表是很能查考各国情形，但英日中的纱能不能联合起来以剥削工人？因为英日工厂云他工人比在中国工厂的工人好得多，若英日的工厂给他工人的工资多，中国工厂给工资少，则中国工人助中，抑助英日？假中以现在中国民族运动；此外国工厂给中国办理，但厂内的工人云，英厂工资多，中国厂工资少，为何给中国办理，为我二人生活计，是要归英日办的。倘有如此的问题，宜如何答？这样的问题一定是要答复，如日本煤厂工资多，工作时间又少，中国的工资少，工作时间多，工人一定是要问的，且随处都可以发生，所以一定是要答的，不特为工资工作时间问题。因为英日工厂是张作霖吴佩孚等势所不及的地方，他们用钱给张作霖吴佩孚，则工会马上可以封闭，在国民革命是

不可能，因工人是产业的工人，不能若鸵鸟遇人追赶将首伏草中以己不见人为人不我见就罢了，是宜如此回答云，为民族革命起见，宜牺牲，虽工资少，工作时间多，亦宜做，因为要牺牲，这样回复是对否？还有理由否？如工人云："为何我要牺牲，资本家亦宜牺牲多少，一阶级牺牲，一阶级不牺牲这是对否"？不能如鸵鸟以目不见人为然，一定要撑开眼睛来答这个问题，要使煤及棉纱业收回归中国，宜使工人资本家双方牺牲，是否？因为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不能要求一阶级牺牲，一阶级不牺牲，于此是公道，于彼是不公道，这样的人是什么事都不晓得的，倘遇这样的人宜多加研究使其明白为好。不特煤业棉纱业为然，且及其他之一切工业，在煤的资本有一半是外国的，若革命成功宜收回为中国的，而令各阶级皆牺牲，这样牺牲是小的，如工会对资本家是要资本家牺牲的，而资本家不肯牺牲，要以钱贿赂军阀来封闭工会，在矿产方面工人工会是牺牲，工人妻子在工厂内，被资本家虐待比猪狗还不如，小孩子在工厂作工而至熟睡，厂主及司事人至便以足来踢醒，这样的事日英厂内时常有的。中国工厂内亦然，如此是没有好歹的分别，若中国工厂内待工人好，则可云中厂好，可以唤起他使去奋斗，今为一样的待遇，如何使其奋斗？香港新华工厂工人夜无衣被盖，其为外国而牺牲，若是为国民党党员是很好。但现在如何能讲到这一层？必大众牺牲方可，因中国的资本家有资本要牺牲，煤矿主亦是要牺牲一点。我们国民革命的人，尽将外国工厂取回中国有，即为国民党内的，亦应牺牲，因为大家都牺牲，有一部分聪明人或有稍识事的人，说我们一齐起来反对外国人，这是对否？为什么讲到这事？因为现时有此种情形在内，我们应当如何推翻之，不特要恃有革命军，而要恃有工人以

推翻之。

（三）中国铁路的资本是借自外国的。

中政府七、四三八启罗米达〔公里〕

外　资三七、八九五启罗米达〔公里〕

今天说了煤棉纱业铁路，下次再说外债，关税亦是在外人手内，亦在下次说。

第四讲

今天所说的是以前的结论，第一结论帝国主义于今日比前时是衰落得多，而且又是一天天衰落下去。鸦片战争以来，到现在是八十五年，在此年限内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是一天天的上升，由此以后，是向下了，如乡人放纸鸢，初是极力往上升，至一人的程序〔一定的程度〕就往下落。英帝国主义发展时对于印度是尽力的经营，印度人有三万万，皆在英国人统治之下，此时期内，非洲亦在全欧各帝国主义统治之下，中国亦在各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统治之下，高丽为殖民地，受日本势力之统治，西藏亦受英国人统治，此时期是欧战前，一千九百十四年的时期。欧战不是为民族主义而战，亦不是为什么公道的事而战，是两个帝国主义争全世界而战。这次战争亦不是为民族自决而发生，为争势力，及争得殖民地的管理权。美国人提倡为民主战争，民族自决，至凡耳赛会议而完全失败不生效力，民族自决是各民族要如何便如何做方是民族自决，但战后，印度仍不能独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亦不能取消，非洲仍是在各国统治之下。故民族自决是一句诓骗的话。这项战争是英德两帝国主义争殖民地的战争。在战争中英国虽然胜利，但是表面上的事实，而实际上是很苦楚，从此英国在全世界的威权是一天天往下落，在

他对面交战的德国是完全失败了，政治经济的权完全为美国人操纵。欧战的结果，一方面是大而且老的工业的英国是失败了，新兴的德国亦变为殖民地了。在战争中得利益的是有二国，即美国和俄国，美国是得经济上的势力，在战争中得有欧洲财富，而发展其势力至于全世界。美国今日之经济势力，即英德法亦受其支配之下，各小国是不消说了，他有全世界财富之半数，我们可以说美国是帝国主义的太上皇，是在各帝国主义以上的国家。这话不要忘记，就是说他是大帝国，美国是其他各国的支配者，在俄国一方面的利〔原文如此。——编者〕，俄国的群众，最力的是农工，在欧战初以为战争是为民族？故一千九百十六年方知战争的目的；一千九百十七年起觉明白，说俄国人不打了，故在一千九百十七年俄皇与世界各帝国主义争殖民地，而俄国的民众已把他打倒，农工群众就建设他们的政府，为世界革命之首，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在一千九百十七、十八、十九、三年中，决定世界帝国主义的道路，及革命的道路；或者照美国发展其经济的路做去，或照苏俄现在的方法做去，在三年中方决定全世界没有完全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亦没有全世界到革命方面去，所以世界全在中间，无完全在左或在右的。故现在的世界是基础弱，很动摇的，可以左右走，法国的“法郎”是一天天下落，美国的“麇耳”(原文如此。——编者）亦一天天的坏，法国的工人亦天天的坏，帝国主义亦天天的下落，革命是一天天的发展。在摇动中，帝国主义往下落，革命是向上升，什么是世界革命高涨，我们在中国亦能见革命是一天天的高涨，印度亦然，非洲亦然，我亦确信帝国主义往下落，想停止往下落，必然要有相当条件方可。我们应当知道这样的条件，但是不能明白，因为是很难明白的。要使帝国主义衰败往下落

且不停止也是要有一个条件，是印度中国非洲共同维持，即是国民革命来维持，在此有多少做打倒帝国主义的，而多少〈次〉不能成功，这是什么道理呢？中国鸦片战争是中国反帝国的运动，因为失败，所以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是格外一天天的增长，为何失败呢？因为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是满清政府，这是腐败的政府，所以对如此伟大的运动不能成功。第二是太平天国运动，这种运动在中国是很大，总发生于两广地方，有中国土地一半，但是不及于全国，这是伟大的运动，是孙先生革命的导师，但亦失败。为何失败呢？这次的失败是为英美帝国主义的摧残，而领袖亦不好，因为不知革命的策略，不知政治只知要钱故失败；虽为基督教提倡，不是为共产，但帝国主义亦要摧残他，此次运动总是很大，失败是无聊的失败。第三次是辛亥革命了，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独立，民族解放，但未做到这地步，不过是逐去清帝，换了很多皇帝来。以此看来，这次运动也是失败了，在革命后革命党有政治〔权〕在手内，可以维持国家，但有党内的人要迫将政治〔权〕交给反革命，且用权迫首领交出政权来，当交给袁世凯时，是革命党受了致命伤，象用钉子钉在脑中，钉一钉就完了。为何首领以政治〔权〕交给反革命呢？我与孙先生讨论很多，且在中国书内亦〈查〉考过，务想彻底了解此事，若有不知者现在再为研究一下。对历史上，无完全否认之可能，若闭目不看是不对了，我们能将孔庙废去，但不能将孔教取掉，因历史上有此事，不能不承认。孙先生以政权交给反革命是事实，我们不能不看，为何当时孙先生一定要将政权交给反革命呢？因为当时的军官不愿和革命合作，一个人站在战线上是无益，故不能不交出来。当日的军人以为革命已成功，首肯的承认，故亦不得不交出来，此是第一原因。但军官必

有政治方能战胜，故战胜的必是脑中有了政治方可。此是不可忘记的，因为当时有受压迫的军人对孙先生说：革命已成功可以政治权交给把袁世凯，故不得不交。此等人无勇气往前走，而孙先生一个人有勇气向前走是不足的，这个革命首领是知革命未成功，当继续的做去，但受压迫的军人以为已成功，可以安安乐乐的享受，从此时起中国革命经过一个衰落时期，象以刀断革命首领的喉，但未断独有一点气，可以在各地动一动，跳一跳。我们首领在此时期，独能领导革命，在辛亥至民国十三年，亦是革命而至于死，但未完全达到其目的，首领用生气向民众方面，且用血吹之，他是在败坏污秽的当中，但在死前二年中，很苦心的去研究，革命为何失败，他是很〈肯〉研究的一个人，又是博学的，他研究的结果，是要建设一个革命军队，故立即建设一个革命军队。他又得结果〔论〕，即无民众参加不成功，若无民众而恃先生们天天到国民党内谈三民主义，说他是老党员，万不成功，故此是他第二结论。哪个是伟大的牺牲？孙先生云是工人，此是可以见到的，在今日的广州市内有很多衣服不足的工人，故可知为工人群众能牺牲，此次打惠州是牺牲几千人，打反革命的一个堡垒要牺牲几千人，为什么要这样？是不是为三民主义而牺牲？我们知道在战场上的牺牲是农民，若为一月得有三两元而牺牲是错了，是为自己生活而牺牲。〈农〉民在革命中占有主要地位，在太平天国时亦是占主要地位。农民在此后是一天天的大起来。今年五卅惨案一回事，是中国很大的运动，现在是否停工呢？仍未停工，为何此运动亦算失败呢？即各帝国主义者犹得在北京开关税会议，此是失败，因列强在中国土地内来支配中国。此是很污秽的，中国的关税为何要他来支配，中国人要如何便如何就是了吗，为何算失败

呢？因为运动无强固的指挥者，亦未有勇气决心的为领导，有亦不过少数，像辛亥革命时要将政权交给袁世凯一样，因无强固指导，所以失败，只有广东一片地方得好结果，因为有勇气去做的缘故，所以能铲除杨希闵刘震寰陈炯明邓本殷等，收复其地。若无勇气决心的指导者，安能得如此的结果呢？现在即是外国领事亦必优待，不敢傲慢，在广东固是如此，若在全国是失败了。没有好久以前，在黄埔打沉一船及帝国主义的人民，若在天津等处如此做法，必定要赔偿人命，要几十万几百万一个，又要割什么地方给他，必定失败得很多，而在广东地方只给一千元就了结，而且帝国主义还是很喜欢的来称谢，此是因为领导的有权力，故有权力来领导，外国没有不承认的。当知北非洲的里孚人与法国支持二年之久，给帝国主义晓得这不是容易的，故不敢行以武力对待我们的一种办法。现当我们罢工的时候，香港派一代表是很有权的，内有一个是伯爵一样的地位，如何接待呢？是用他们平素看不起的工人代表去接他，为何广东能这样呢？因为工人有了组织，又有农民五十万及革命军皆在政府指导之下，故能这样，若全国能这样做，则关税会一定可以不在北京开，弄出任他要加多少才加多少的丑事。下次革命如果想不失败，必须有强固的指导，及照国民党的策略去做，则一定可以不失败，广东是一很好模范，全国如此必不失败，可以得到胜利。

学生黄道尊笔记

（原载《国际政治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单行本
1927年1月广州三民出版部印行。）

南昌群众欢迎大会上之演说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

同志们：这次我们从广东走到江西，一共走了十六天，有旱路，也有水路，在路上常常有停留的机会，可以到各乡村中城市中调查人民生活的情形。江西物产是很丰富的，然而江西人民是很穷苦的，农民非常穷苦，商民也是穷苦，工人更是穷苦，这不只是江西如此，凡是我们所能到的各省，都是如此，只有少数在通商大埠受帝国主义者保护的富翁以外，中国的人民一般都是贫苦万分的。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大多数人都是懒惰的，都不愿工作。其实错了。大多数的中国人，工作都是很勤的，全世界上都找不出这样勤俭劳苦的人民。

中国人民是这样贫苦，而同时欧美各文明先进国，则非常富裕，一般社会经济非常发展，他们有飞机火车与轮船运输便利迅速。然而中国从广东走到江西，却要十六天，一天只能走很少的路。我在路上看见许多做买卖的人，把江西的纸担到广东去，把广东的盐担到江西去，一个人能担多少斤，一天能走多少路；这就是中国现在的交通与贸易的方法，比之欧美各文明先进国工业至少落后一百年。难道真因为中国人太懒么？我已经否认过。因为中国人无知识不聪明么？我可以对各位同志说：中国人是顶聪明的。同志们，中国所以穷苦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今天不能讲，因为太复杂了。不过主要的原因，却是很显著的。近八十五年来，中国从满

清到民国，专制政府把中国的土地卖给帝国主义者，把中国国际的地位弄得非常低落。满清的专制政府和民国的贪污政府，对于帝国主义者非常奉承，把中国一点一点卖给帝国主义者，这些事情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呵！同志们，我们要记得满清的专制政府与民国的贪污政府所遗给我们国民的遗产，只是奴隶的地位，所以我们才这样贫苦。中国农民问题，差不多是中国三万万人民的问题，如今还未解决。工人问题也未解决。知识阶级多半找不到职业，除非是到帝国主义者或军阀那里找点饭吃。现在还有各省军阀所发的许多没有用的废钞票，这些都是我们得到的遗产。所以我们并没有承继一点好的遗产，只有一身的债，要我们去还的。所以诸位要知道国民党及革命政府的环境是如何困难，及其责任是如何重大，应如何的赞助国民党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与之合作。同志们，我们要努力向前去解决种种问题，要慢慢的并且又要快快的去解决。慢慢的，是因为中国问题很复杂，仔细才能找得一个正确良好的方法。快快的，是因为我们再不能忍受现在的奴隶的束缚，要赶快下决心去打破这束缚。大家要赶快下此决心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同志们，中国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了，快把过去的奴隶束缚打破，把中国独立起来，然后才能建设新的社会，改善一般人民的生活状况。各国都是这样做的。英法美以及其他各国所以能得到现时经济的发展，因为首先得到了国家的独立。求国家的独立，这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因为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使我们不独立，帝国主义霸占着中国的大门。我们要求独立，一定要把大门钥匙，从帝国主义者荷包里夺回来，拿到中国人民及其政府的手里，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关税商埠，拿到我们自己手里，这就是要废除一切

不平等条约，不然，钥匙不在手里，大门是在敌人手里，房子终不是自己的。同志们，这不是"排外"，这是"正义"，同志们，各国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这种"正义"独独不可给中国人呢？同志们，工友们，农友们，商友们，大家要知道大门钥匙不在自己的手里，中国的命运只有贫苦，工业只有落后。只有拿到钥匙，中国才能走上进步的道路，一天一天向前发展。假使我们这已做到了，就是说我们已经是房子的主人翁了，我们还要有确实的保障这房子是人民自己所有的，而不是由少数贪官污吏军阀等所占领的。唯一的保障就是人民参加政治，人民就应该极力去参加政治的活动，取冷静的态度，不管是专制政府，贪污政府，甚至于国民政府，都取冷静的态度，不管态度，这是不好的，这样是决不能从奴隶地位解放出来的。要人民起来参加政治，这就是民权主义。同志们，我们要实现民权主义，并不是政府好人民便出来表示欢迎，政府坏人民便躲在家里痛哭，而要起来帮助实现三民主义，要求确实实现民主政治。一个民权主义的政府，至少要实现三件事：第一公平的税则，第二政府要有一定的预算，第三清楚的收支报销；这样才可以说是开始实现民权主义。不过过程当中，当然有特别的情形，因此有特别的办法。广东在这次北伐，担任了五千万经费，当然不能说是公平的税利〔则〕，但是在中国这样危险的时候，生死存亡的关头，人民当然要暂时的牺牲一点才能使北伐进行，才能很快的打倒军阀，实行民权主义，实现公平的税则。不然，中国人民的痛苦要格外延长，不过这总是暂时的、危险时代的一种特别情形。农友们，工友们，商友们，学生们，兵士们，我们要知道单是要求民族独立，人民得到政权，还是不够的，还要实现民生主义。要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土地问

题在中国历史上是几千年都没解决。为什么呢？因为政府不愿意，政府是反对农民的。但是土地问题如不解决，农民一定不能富足，农民一定是穷困；农民穷困，商人跟着也要穷困，商人穷困，工人也要穷困，工人穷困，所有的人一齐要穷困。所以土地问题，是中国大多数人民的问题，要使大多数人民富足，非实现民生主义不可。我们俄国同志到中国来，只为一个目的，并没有第二个目的，我们只想帮助总理在中国实现他的三个伟大的志愿，而且同样在东方实现出来。俄国伟大的领袖列宁，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孙中山，这两个领袖愿意自动的联合起来，这是当然的事情。我们只有这一个目的，不多也不少。不过请诸位要注意，我们俄国同志要帮助的是中山先生的整个主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而不是一民主义的，也不是两民主义的。已经有许多人相信：满清推倒，什么事都完了，又有人相信：只要中国的政权交给几个有钱的人；要知道中国并没有多少有钱的，有钱人都在租界上，但是他们都想回来拿政权。我们要帮助的是三民主义国民党，是求中国独立，建设民主政治，并且要解决人民生计问题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国民党。因为人民幸福全靠经济的发展。中国现在还有三万万人还没有钱买东西，如果不能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便不是真正的国民党，便不是三民主义者。俄国同志所以愿意牺牲在战场上，完全为的是三民主义，不然，是值不得这样帮助的。同志们，不过不要误会我们不是赞成喊打倒帝国主义，或喊打倒军阀，不过我们以为还要解决土地问题。所以假使有人主张实现民族主义，我们应当当〔把〕他做我们的朋友；假使更主张同时实现民权主义，应认为他是我们的兄弟；假使还主张实现民生主义，这才真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要把他请进国民党里来。同志们，民族，

民权，民生，三个主义，看起来是三件事，但并起来，实际上只是一个武器。国民党改组以来，拿这一个武器在广东奋斗，打倒反革命派，打倒军阀，打倒英帝国主义的势力，在革命领导之下，建立一个革命基础的广东，而且把二十万敌军打散了，把一千五百万江西人民解放了，都要靠、已经靠、还要靠这个武器，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才能解决现在中国的问题，才能够实现总理在病床上所希望的所要求的遗嘱。同志们，我们对于过去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奴隶地位，不要伤心，不要痛哭，我们要用我们的武器，在国民党领导之下，与国民革命军联合起来向前进，以实现三民主义。大家要团结起来，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很感谢蒋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省党部、江西民众的努力，其结果使我能够有机会在此同诸位推心置腹的说话，我很感谢诸位欢迎的盛意。

张太雷口译　瞿景白笔记

（原载《鲍顾问演讲集》，1927年2月汉口民国日报馆印。）

英帝国主义最近对华政策报告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自万县惨案发生以来，英国的对华政策已显然的有所变更，这从广东国民政府自动实行二五附加税、香港政府对国民政府态度、政府北迁后英报的论调、陈外交部长与英公使兰浦孙的交涉和英内阁大臣对议院对华政策质问的答复，种种问题，都可以证明这种观察的不谬；但这仅是表面的事实，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中英间最近发生的种种琐屑事件，如上海英人资助丁文江借款，英人与奉张勾结之成功，天津租界引渡国民党员，日本对于奉张与英人关系之不满等等，我们便可晓得在事实上是完全不同的，英帝国主义者始终不曾改变他传统的政策。最近各方面对于英国的对华态度都很迫切的注意，希望着自由主义从英政府孕育出来，现在这个万目睽睽的婴孩已经生产了。昨早英领（事）送到外交部的对华现状宣言，后面还附着五月二十八日英政府致美政府的通电，他的用意好像是表示现在的英国对华政策自彼时即已决定；英领事并表示颇以此政策之发表过迟为遗憾，对此宣言望读者深加注意。第一注意此宣言中所表现出帝国主义的心理；第二观察其措词，其措词极佳美但是却包含着比二次革命时英帝国主义资助袁世凯及反革命派尤为毒恶的政策；第三则，考其凶恶政策的究竟，这个宣言当中极力声明，英国以前的的对华政策已到应行改变的时期，这无异于教训其他帝国主

义者应视英国之对华政策为转移，并且申说中国现状紊乱已极，北京政府已失掉代表全部中国的资格，但同时中国南部已有一能代表民众强有力的政府，中国民众正在极力运动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并要求各国改正以前的对华政策；随后又说如果中国能从此紊乱状况中（此语甚为重要）建设统一政府，则列强一定改变他们前此的对华政策，而在中国未能建设强有力的统一政府前，列强则应予中国以谅解与同情。他的意思是将中国解放运动总的过程分作两个时期，在将来中国已能建设统一政府时，则彼等不反对中国人民之改善国际地位运动，但在这个时期以前则仅能予以同情与谅解。所谓同情与谅解二名之意义等以后再来解释，现在我们先要明了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主要争论点。在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已然很明白的宣示，欲求中国之整理及统一必先取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因为国内的各种反动势力都和帝国主义有关，所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非先从国际地位问题入手不可。在本党宣传品上可以找到许多证明这种意义是正确的。而在帝国主义者则尽力申说中国欲争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必先谋国内之统一，从这里可以晓得英帝国主义这次宣言所表示的同以前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这次确是由衷之言，不像以前那样闪烁罢了。我们要晓得攻下北京建设统一政府是容易的事，即使未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也未见得做不到；但是这样的统一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统一。讲到精神上，中国数千年来一直到现在原是统一的，但是如若讲到物质上的统一，如同建设贯彻全国的铁路线，发行通行全国的货币，财政权之确实握有，实业发达之支配，及军队的统一，这种的统一才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优越权利不取消，我们即能攻入北京，这种统一不会实现，帝

国主义者深知中国现在地位并非纸面上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而是种种实际财政金融交通实业各种权利支配的问题，所以他们时常表示纸面上之不平等条约可以修改。但此次英国的宣言还够不上这样程度，他所声明的仅仅是如果中国统一则他可以承认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这和前此英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完全一样的。同时我们亦可声明我们亦将以和前此一样的政策来对付他。下等动物的保护色常因时因地而变换一英国的对华政策与之正同，我们应以这种把戏的内幕告知全国民众。我们现在来解释此次宣言中所谓的同情与谅解，具体的表现到底是什么？英国在此次宣言中责备日美各国至今不肯履行华会的对华决议，并且声明在去年关税会议中英首先赞成中国的提议，而以其他各国的反对而失败，这里所谓的华会决议和关会提议即是普通货百分之二点五，奢侈品百分之五附加税问题，英国这种大胆的攻讦其他各国，在革命利益上讲我们可以欢迎的，因为这实足以引起其他各国对英之恶感与冲突。日本在关会中以附加税收入为中国外债担保品的主张，英国是反对的，但是拿来作担保品和送与张作霖孙传芳作军费比较起来，还是此微胜于彼。后者的办法便是英国赞成实行附加税的用意所在，从经济统计上可以晓得上海海关收入占全国百分之四十，天津占百分之二十，此外再加上青岛营口等处总占全国海关收入百分之八十。中国海关年收入七千万两，若百分之二点五附加税及百分之五奢侈品附加税实行，则附加收入总在六千万元左右，此项直接取之中国人民之巨款，即将资助张作霖与孙传芳以破坏中国革命势力，这种办法殆较二次革命时资助袁世凯之二千万镑债款尤为毒恶，此即英帝国主义之所谓同情与谅解。从此次宣言中可以证明我们过去反英政策及民众反英运动意义之真确，我们应使

每一国民了解英帝国主义正以恶毒阴谋对付我们，应在全国民众之前揭穿英之假仁慈面目，暴露其毒恶之真相。英帝国主义所谓的同情与谅解，即在延长中国之国内战争，使统一更远，使人民痛苦益增。然而帝国主义越发帮助军阀，军阀越发非倒不可，已成一定的规律，这种帮助一方虽资助了军阀，同时即使之瓦解与腐化，此次英国之助张孙亦然。帝国主义颇像希腊神话中蛇身女首的妖物，此种妖物任何人一注视之即化为石头，军阀的亲近帝国主义者亦将与之同其命运。英帝国主义者的主张以附加税资助奉系军阀，同时即表示日本与奉系关系破坏，同时亦即表示英日当中的裂痕，日本的反对二五附加税是因为日本输入中国的货价廉，增税即阻碍日货销路，不比英货大都价昂，所受影响尚少，并且日本对华贸易占全国对外贸易百分之六十，附加税实行日本的对外贸易要受很大影响。这种英日日奉当中的裂痕，同时也反映到奉系内部张作霖与英国勾结的成功，一定会引起日本勾结张作霖的部下来倒戈，因为这些部下大半和日本关系很深，同时英人以附加税收入百分之四十资助孙传芳，定当引起张宗昌对孙的冲突。适才得到张作霖逮捕杨宇霆的消息，杨与日本关系为人所共知，此问题的严重殆非郭松龄事件所能比拟。英帝国主义计划，自以为可以扶助反动势力的成功，但结果仍不免与前此同其失败。在前此中央及各省常务委员联席会上曾解释占日本对外贸易百分之六十之对华贸易，对日本前途之重要，日本所恐怖中国革命的第一事即是日本经济将随中国革命成功而死亡。我们应使他们知道事实不是如此的，中国革命成功只能增进中日间的合法贸易。第二即在将来日美冲突时，中国将援助美国。此种恐怖应尽力使之打消，我们现在的政策便是使日英日奉间的冲突扩大，这是对中国革

命前途非常有益的事。

结论——（一）加紧促进对英斗争，但须避免武装冲突；（二）对民众指出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之争论点——中国统一政府的建设当在国际地位改善以后或以前，及此次宣言书的意义；（三）指出英允实行附加税意在资助张作霖孙传芳；（四）指出英人对张孙之新的“善后借款”将使军阀自行瓦解；（五）攻击张作霖之为英帝国主义走狗；（六）应对日解释中国革命成功不会消灭中日合法贸易，如日本与英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一致行动则于日本诸多不利；（七）对上海市民指出英人将以百分之四十之关税收入资助孙传芳，此举将成孙传芳张宗昌互相残杀之目标，益增加人民苦痛。根据本报告可在民众中进行一个大的运动。

张太雷口译　瞿景白笔记

（原载《鲍顾问演讲集》1927年4月汉口民国日报馆出版。）

关于“省民会议案”*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个人意见，人民参加政治一节，已在民众开会时表示。如果党不代人民寻一出路，人民为利益计，亦必自寻出路。何如吾人即挺身而出，指导人民发起省民大会，领导人民参加政治。此会开始时，年满二十岁以上之男女，虽未能全数参加，但必顾及革命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民主主义，必使社会最重要阶级，均派有代表出席会议。重要阶级中如商人为极重要者；如无商人阶级，革命必不能前进，因革命所需，全在商人身上设法。其次知识阶级，为革命之推动机，若知识阶级反对，革命地位便感困难。第三工人阶级，党的政策业已决定保护劳工。革命能否成功，即在于能否确定此四阶级于现社会所居如何最重要之地位。人民之所以参加政治者，必有人民会议而后成功。如能始终组织人民，结合力量，发起合法机关，确定政策，坚固基础，从省民会议，将来可以产出全国人民会议。对于商工农及知识阶级之政策，均可于人民会议中一一实现之。此系促进国民运动之要着，愿得一致赞同；不然，个人作最后演说为时不远矣。

……

我们现在脚踏空中，不踏实地。我们现在订了妥当的政

* 本文系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第八次会上的发言。——编者

纲，一定能使人民通过，我们的意见，即变成人民的意见。

……

现在已有组织者，对于未有组织者，应负指导之责。有此人民团体，可使我们之议决变为人民之议决，得到人民之批准。

……

真正之省民会议，再等五十年，恐尚做不到。

（原载《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临时联席委员会会议记录》油印件，1927年1月。）

汉口民众庆祝大会上之演说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

同志们！工友们！农友们！商友们！兵士们！及一切同志们！

今天我们到这里来庆祝三件很重要的事！

一，南京政府的成立！今天是中华民国十五年前南京政府成立的纪念日。

二，国民政府迁到全国中心点的武汉来了。

三，湖北省政府将要成立了。

同志们！这三件事情都是我们国民革命中的一部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求民族独立及人民幸福的三件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原故，我们今天才到此地来庆祝！同志们！我们今天必定要懂得我们从前的革命已失败了；不过这种失败给与我们很多很大的经验，我们有了以前失败的经验，我们以后就可以不蹈覆辙而得到胜利了。

为什么原故十五年以前的革命失败了呢？你们大家想过了没有？为什么我们在十五年内受军阀的摧残呢？为什么我们这样贫穷呢？现在中国有农民三万万，他们很勤苦的从早晨做到夜里，但是他们有时还是不能够得到衣食，为什么原故？为什么原故我们三百万工人始终是处在一个贫困境遇里面？工人们吃的是很坏而不够的；工人衣服是很不好的！他们的居处是很不好的！他们的小孩子没有机会受教育，为什

么我们上千上万由学校出来的学生找不得事情做？为什么原故我们的商人百分之九十九是贫困的？特别在小城镇的地方更加显明。我由广东到江西，由江西到湖北，沿路所经过的小城镇，其中的商人百分之九十九是贫穷的！你们能不能够在这个地方指出一个能容纳二十万人作工的工厂？这个地方有不有一个像世界各国的大电器厂，大机器厂，大矿砂厂？（我所说的是指中国人自己所开设的大工厂，不是外国人在租界所开设的工厂）

我们的工业为什么这样落后？我们的人民为什么这样穷？我们的银子到哪里去了？同志们！我告诉你们，我们的银子都在租界上外国银行里面。我们在市面上可以看得见的，是纸币，那末，我们的银子到哪里去了？我们的银子已经装到外国去了！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大多数的人民是贫苦的。我们无论什么东西都是处在一个贫困的地位；教育不普及！交通不便，工商业不发达，财政困难，以至于无论什么事情都是很困苦的。

同志们！这种贫穷的现状是由什么地方来的？是不是因为大多数的人民不情愿做工，是不是因为他们懒惰，是不是他们不知道怎样工作？我想这一定不是的。世界上除了欧洲热带的奴隶以外，我相信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够比得上中国人民的勤苦耐劳了！中国的商人从早晨就把门开了，等待买主来买货物，一直到深夜才关门，中国人既然如此的勤苦，为什么无论什么事情还是处在一个贫困的地位呢？

我们贫苦的最大原因，就是从前我们受了几千年帝王专制之压迫。那个时候的官吏，只知道尽忠于皇帝，以压制人民，不知道设法为人民求幸福，在这种高大压迫之下，人民无权利可言；人民所知道的是从早至晚很勤苦的工作，以供

给皇帝及皇族等的消耗，除了这以外，其他的事，人民就不知道。

到了最近数百年，满清管理中国的时候，他们不但是只压迫人民，并且还将中国的人民中国的土地卖给外国人；他们于是就同外国人联合起来压迫我们人民了。

我们知道，最初我们受帝王专制的压迫，以后我们又知道帝王与外国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压迫我们，所以造成我们现在贫困的景象。我们受了这种专制的压迫，难道就忘记了么？因此十五年以前，革命起来了，清室推翻了，中华民国于是就在十五年前的今天正式成立了。那时候我们虽然把皇帝推翻了，但是皇帝的基础我们还没有打倒，那个基础是什么？就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制度。十五年前的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这个原故！没有将皇帝基础帝国主义与封建制度打倒。

无论什么政府都有一种基础。倘若我们推翻一个政府而不将他的基础推翻，那一种旧基础就能够造成一种新的不良状况！在（十）五年前的革命虽说把皇帝打倒，但是没有把基础推翻，于是产生了军阀专政的怪现象。在这个十五年中间，人民的穷还是同从前一样，农工商学兵各界的人士所受的痛苦比较从前格外利害。十五年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为什么失败了？他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找到新基础。南京政府是建设在旧基础上面的，不是在新基础上面，新基础是什么？新基础就是我们人民。

因为从前革命的基础不是筑在农工商学兵身上的，所以那一次革命就失败了。那个时候农民不知道革命，工人亦不知道革命，很少的学生知道革命，所以那个时候的革命是没有基础的，没有基础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那个时候的革命，并没有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

那时候孙中山先生知道那次革命是无基础的。所以他常常要找一个很好的革命基础。但是，不幸他的大多数的信徒不懂得，所以他不得不将政府让与袁世凯了。

同志们！今天的革命就与从前不同了。在三年以前，广州召集了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在这个大会中，在总理的指导之下，我们就种了革命的基础。这个大会明明的告诉我们，国民革命的基础若是筑在民众身上，那么，我们国民革命就能成功。这个大会上，革命的精神，表现得十足。自从这一次大会开过之后，他的效果就很容易的表显〔现〕出来了，自自从这一次大会开过之后，陈炯明被赶走了！刘震寰杨希闵也跑了！二十万军阀的军队也被打败而离开广东了，那个时候广东就得到自由了，广东的人民也得了安乐了！在三年以前，孙中山先生在广东的时候，军阀还是盘踞在广东，广东的财政，每天只能收一万元，每月只收三十万元，军阀离开了广东以后，政府的收入就增加到每月一千万元了。

从此以后，革命的势力就渐渐延长到湖南，到湖北，最后又到了江西福建，最大的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也被革命的势力打倒了！革命的势力一天一天的发展了，一天一天的坚固了。这是什么原故？就是因为现在的国民革命是完全建筑在民众身上的。

同志们，今天我们大家到这里来庆祝国民政府迁到全国中心点的武汉。这个国民政府是建筑在人民身上的，是我们人民的政府；换句话说，这个政府就是解除人民一切痛苦的政府，也就是解除人民所受帝国主义及军阀一切的痛苦。所以我们欢迎他。我们知道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所以我们应该管理他，监督他，使他成一个真正人民的政府，以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求民众之利益。你们是政府的基础，所以你

们应该管理并监督国民政府及省政府。

你们用什么法子去管理政府呢，你们是不是以为时常到群众大会听听演讲就可以监督政府了呢？不是的，你们商人有商会，可以选举你们商人的代表；你们工人有工会，可以选举你们工人的代表！由农工商学各界所推举的代表，组织省民大会，这个大会就是人民的基础。在这个省民大会里面，我们可以议决各种税收及财政，并可以要求政府财政公开。在这个会议里面，我们应该通过种种议决案，以求人民之幸福及利益，我们还可以通过种种议决案，要求政府速即发展工业，以裕民生，并要管理及监督政府官吏，防止其妨害民众之利益。倘若我们能有这样的人民的省政府成立了，我们的革命也可以说是有成功了。倘若一个革命的政府，他不以人民为基础，那个政府就是悬在空中，很容易推翻的。我们不但是希望湖北省民大会速即成立，并且同时希望湖北〔南〕的广东的省民大会亦速即成立，使全国的各省都有了省民大会，那么，国民会议的实现也不远了。

我在四年以前，孙中山先生请我做他的顾问，我总是尽力帮助孙中山先生。现在孙中山先生死了。我还是始终如一一的尽我的力量去帮助他的党徒，同时还是忠告政府说："倘若政府不建筑在人民身上，那么，我们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

有了省民大会，我们就可以开国民大会，然后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铲除贪官污吏，以建设真正为人民求利益之三民主义的政府，你们大家对于开省民大会是不是同意呢？倘若你们要帮助这个省民大会，我们很诚实的告诉你们，我并不是放大炮说空言的，我对于你们所说的话，都是很严重很正经的，我盼望各位要下一个决心，大家聚集起来催促政府速即召集省民大会。

你们每一个人应该负一种宣传的责任，对于你们的亲戚朋友应该告诉他们以省民大会的意义及利益。他们要是不懂得，你们就解释，你们更要告诉他们省民大会就是人民政府的真正基础。各工会，各商会，各农会，大家组织起来，同时要求政府速即召集省民大会，以谋人民之利益。

有许多人反对开省民大会，他们说："我们还没有一齐组织起来，如何能够开省民大会呢？"这个话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应该把已组织起来的人民团体选举代表；我们相信现在已有的各团体确实可以代表各界的利益，工会的代表确能代表工界的利益；农民协会的代表，代表农民的利益，商会是代表商人的利益，省民大会就是由这许多各团体的代表组织成功的。所以我们大家高呼召集省民大会万岁！召集国民会议万岁！此就是孙中山先生遗嘱上面所最注重的一点，也就是我对于各位的一点贡献！凡赞成速即召集省民大会者请举手！（众举手）

张太雷口译　瞿景白笔记

（《按鲍顾问演讲集》刊印并据1927年1月6日《汉口民国日报》所载译文作过校订。）

在商民协会之讲演词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日）

请各位原谅，在未讲之前先就我自己介绍一下。有人卖货物给我们时，我们必定要知道卖货物的人是什么人？有人对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也必定要知道这人是什么样的人。中国的国父国民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在四年以前召我来中国帮他改组国民党，随后又做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顾问，到现在我留在中国已经有四年了，在这四年之内经过了种种的艰难困苦。在这些艰难困苦之经过中，我以我的经验供献给同志，我是很坦白，极真诚的供献给他们。虽然我供献的不完全都对，但我终想没有人说我不真诚不坦白。我是很愿意对商人讲话，本来有许多话，要对诸位讲的，不过今天是放假的日子不便多讲，只讲几点。以后一定还有机会对诸位详谈，因为国民政府到北京去尚有一些时日。政府在此地的时候我当然也在此地。

我们大家要知道，过去是现在的母，现在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将来是从现在产生的。我们的革命所承受过去遗留下来的是一些什么东西，是怎样的遗产；在这遗产上能否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过去遗传下来的是一些债务，一方面欠着几千万兆的外债，一方面又欠着人民很多的债，我们人民的责任，也将专忙于付债了。海关每年有丈〔七〕千万两的收入都付了债款，盐税、铁路、矿山等等也都抵付了债款，有些债

是几十年都付不清的，有些债要到民国六十一年才付得了，这些债就是过去遗留下来的遗产。再有一部分是千百万的纸票，不能兑现的纸票。现金都不在中国人才〔手〕里，都到外国人手里，汇丰银行手里去了。这一都〔部〕分纸票也是过去留下来的遗产。还有一部分是很少的，几条铁路，这些铁路经过的地方很少并且不能把中国联络起来，而且终年为军队所占。另外遗给革命的一部分遗产是三万万的农民，因为过去的压迫渐渐造成了我们现在所见的那种贫穷。此外是三千万的工人，也将是过去造成了他们的穷苦；工人的穷苦，我想诸位是不至于否认的罢！这里我们讲到商人，商人有多少财产。有一百万财产可以说很少，在坐的诸君中就没有百万财产的。有百万财产的都住到租界上去了。商民协会里面有几个是资本雄大的？我很怀疑！我常常如此说：中国的商人大多数是穷的，有十万二十万的很少，百万的更少了，中国商人多半是没有钱的。我们说到工业可以说在中国领土之内（不是在租界上）找不到一家容有二三万工人的工厂，黄石港的扬子厂，我们看见是关了门了。再有一部分遗产是一班官僚，大半是腐败的不知道为人民的利益只时〔记〕得自己的利益的，他们是满清政府和十五年来的军阀政府造成的。一部分是土匪，是很久的历史积聚而成的，他们以抢掠别人的财物生活的，是过去遗留下来等待革命解决的，并非革命造成的。一部分是军阀，到处横行的军阀，他们蓄养许多兵卒，专门剥削人民，压迫人民，到一个地方就铲尽那一地方的地皮。更有一部分遗产，这部分遗产束缚住了中国人的手足，就是不平等的条约。现在北京中央政府是已经完了。以上所举过去遗留给革命的遗产，好的还是坏的呢？我看是很坏的。

一个革命要拿这个坏的遗产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情，由这样大的债务这样破碎的情形里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当然是艰难的。既然如此的困难，那末仅仅依靠国民政府的委员，几个国民党的委员能否解决？专靠党的委员，政府的委员以及军队的将领是不能解决的，这样困难的问题，要靠诸位以及其他赞助革命的明了革命的人们团结起来才能解决的；没有诸位是解决不了的。革命的能否成功，要看诸位对于革命态度、认识及赞助力之如何。如其是能出力赞助才能使革命成功，中国兴盛起来，大家得到幸福，不然将仍旧是像现在这样穷困，要等百年之后再说了。

革命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业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是不是要现在马上对英国等开战才可做到的呢？现时我们还没有这种充分的武力对他们宣战的，他们各帝国主义者联合一起是有很大的武装势力很多的钱财的，所以现时这件事业，还不能靠打仗奏效。那末，如何能够做到呢？只有中国的人民，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兵士团结起来，就能有很大力量，强迫帝国主义者同我们坐下开谈判，重订平等的条约，不用费一兵一将，团结的力量就很够了。这并非夸大的话，可以拿最近的事实作例。在广东，国民政府还在那里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十五个月的大罢工，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赞助这一个罢工，团结在一起抵制香港，使香港屈膝跪下；国民政府下令加税百分之二点五及奢侈品加百分之五，英国政府不敢讲一句话。但是北京政府开了一两个月的关税会议，还没有得到结果正足以证明人民的力量可以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样一件小小的事情，已经表出人民团结力量是如何的伟大，如其真正全体人民都团结起来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那时四万万人民团结的力量没有那一个能够抵抗，就可以不用一兵一

舰，废除不平等条约。

废除不平等条约，海关收回，每年增加七千万两的收入，可以拿来发展工业，交通等，盐税也收回，工商业银行都可发达起来。并且可以保护税制度，如工业品中国的比外国的价钱贵的时候，就可以加征关税使外货不能与国货竞争，在需要何种物品时，则可以减轻此种物品的关税，这样就可以保护中国的工商业。另一方面，这些钱取回之后，必需使他于民众有利益，不然像现在这样给军阀贪官污吏侵吞，有什么用处？如其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之后所收回的利益，落于贪官污吏之手，那岂不是白费了我们的力量！要使我们的力量不白费，必定要使这些收入用为人民利益，使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团结起来之后，第二件事要做的就是要保证以后所得的收入，用为人民利益，这样各界人民就应该巩固地长久的，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组织人民的民主政府，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能于废约之后举其所得为人民利益的政府，现在就应该开始做这一项的工作。我们知道必定能够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取得利益的，故应先取得此项利益的保障。现在怎样建设人民的政府，就是要有一个机关！人民代表的机关，代表人民的要求的，有权力要政府实行其议决的，这就是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大会是应由现在的农工商学各团体派出代表组织的，这种会议要各省做起，每省都成立省民会议，以人民所要求的叫政府去办。一省一省的推广，及于全国那是自然能产生国民会议，成立人民的政府。

今天我所讲的就是两点，请于这两点上大家联合起来，团结起来！！这两点就是：

（一）废除不平等条约；

（二）建立人民政府。

如此才能希望建立人民的政府在过去的破烂的遗产上面，造成新的幸福的国家。

张太雷口译　瞿景白笔记

（原载《鲍顾问演讲集》1927年4月汉口民国日报馆出版。）

在湖北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之讲演词

（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

今天我讲中国工人在现在革命运动中的责任。我们首先要知道，中国工人阶级与西欧的工人阶级相比，中国的工人阶级还是非常的幼稚，非常的落后。中国的工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在租界内外国人开的工厂里做工，受外国人雇用的；一种是在中国人自己开的工厂里做工，受中国人雇用的。在租界内如上海汉口天津等处有很大的工厂容纳许多工人，在中国内地就很难找到一个近代的大工厂，容纳一万或二万工人的，大多数是很小的工场，只雇用很少数的工人，所以我说中国工人阶级尚没有强大，没有是大机器生产近代大工业时代的工人。中国的工人多数是手工业者，只有一小部分是刚刚开始的产业工人——无产阶级。中国是农业国家，我们不以租界为标准，以全国一般的情形做标准，那末，当然是手工业工人是大多数，而近代的无产阶级还是才开始的。现在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地位有几种特点，他们还是在一个过渡时期中，在从手工业工人进入大工业工人的过渡中，在这种过渡中，工人是很吃亏的。我们在后面便要讲如何使这种从手工业转入大生产工业的过程中很快的渡过去。现在的中国工人阶级可以见到尚不及印度的工人阶级，中国的工业尚不如印度工业那样发展。因为在印度仅仅只有一个帝国主义，中

国是有好多个帝国主义在这里。印度有很多铁路满布于各城市间象蛛网一样，因此他们的工业发达，工人众多了，中国的铁路是很少，并且是不相连续的，工业不发达，真正的大生产近代工业的无产阶级也就少了。在印度棉纱业，金属业及其他工业都很发达，在孟买在加尔各答等地有许多大的工厂雇用二三万工人的大工厂，棉纱业的工人有数十百万人，其他的工人也是很多的。中国的工业这样幼稚，工人非常落后，因此在工人运动中，发生许多纠纷。这可以广东为例，在广东我们可以见到很多工人的纠纷，工人自己打自己，拿了竹竿木棍互相打得头破血流的很多，政府的农工厅里有一千七百多件案子没有解决，大半是这样纠纷的案件，都是一些小工厂有三个五个工人的小铺家的工人，他们与店主，或是他们自己之间的冲突而发生这些纠纷。很少有大的工厂有几百个工人的。工会的组织与团结亦就比较困难，因为只是少数的人成一帮一帮的是非常之难团结，小手工业的工人就容易生出这些事情来，一些纠纷也是因此发生。武汉比之广东是好些，有点大工厂，包含有多量的工人，但还不能说是很好，很发达。即如大商店也是在租界上，除此再不能见到有更大的，雇用千百个人的，如上海租界上的先施公司等。在先施公司那些地方才可以有多数的群众团结起来对抗资本家，他们能有力量。在小店铺中，工人不能成为一个群众去对抗资本家。说明了为什么有如此的状况，才能够明白中国工人的责任。

中国有四万万的人口，这四万万人的职业如何分配的呢？他们做些什么事情？中国是农业的国家，大半是以耕田为生活的，四万万人之中有三万万人是种田的农民。工人的数目我们不知道一个确数，大概有五百万到六百万的样子，以六

百万工人，每家六人计算则属于工人阶级的有三千六百万人。工人农民两数合计则有三万三千六百万人。四万万人中除了工农尚剩有六千四百万人，这六千四百万人做些什么？他们中有的商人，银行家，钱庄老板，工业家，工厂主，教员，学生，这些是一类，与另外一类不同；第二种之中有军人，军人的数目很不少，有二百万到三百万的样子，第二种之中尚有一部是军阀及依靠军阀与帝国主义生活的，官僚与买办阶级也有很大的数目，这许多人仅仅是用东西，而不制造什么，是只消费，而不生产的。在一切人们之中，主要的生产者，是三万万的农民。至于三千六百万的工人与农民没有多少经济关系，农民只是种了给人家吃，自己用的还是自己做，中国的工业没有供给农民以电气衣料，用具如犁头等等。工人与农民没有经济的关系，这并不是说工人寄些银等与他的家庭，他的家里是种田的农民这种的关系，而是说的工人没有供给农民以生产品，就有也是很少的，下面我们可以见到这种关系的重要，农民供给我们米粮，我们给了他们什么？换句话说，农民能不能是工业品购买者，农村能不能成为工业的市场？农民大多数是穷的，没有能力购买工业品，他们要化了很多精神，很多的工夫自己织布做衣裳穿，因为实在没有钱买。为什么农民如此的穷，不能为发展工业的市场呢？他们贪懒！不做工不出力！而穷的吗？当在〔然〕不是为〔如〕此。中国的农民比任何国家的农民都要勤苦。但是因为被剥削太多，当然他们是要穷困了；中国的工人被剥削得很多很贫穷，如与农民相比，则农民的情形更为可怕。中国各地的情形不同，大概的平均数是不论佃农，半佃农，半自耕农至少被剥削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六十五。剥削的形式不同，或是高利贷，或是租税，或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敲诈勒索等各

种的方式——总之是剥削农民。农民种出十石粮食，要有五石或六石半被人拿去。农民被剥削了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六十五以后，他们就没有力量购置新的犁头等耕田用具，新的衣服及其他的必需品，所剩下来，适足以维持生活，甚至不足以维持生活，没有办法的时候，那就必定要借债，借一元钞要出二分到四五分的重利，甚至借一元钞要一元的利钞，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更是以借为生活，这种情形，那里来的钱使他们有能力购买工人制造出来的工业品。因为中国的农民过于贫苦不能买工业品，工业既没有市场，工业便无从发达。货物的销路是大半在占中国人口四分之三的三万万农民的身上，他们不能购买，非常穷困，商店中就冷落。工业的不发达，固然有很多原因，农民的穷困是不能不看做重大原因。农民被剥夺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五的东西，谁取去了？从农民那被拿去这些被剥夺东西是六千四（百）万人军阀、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以及其他的人，他们不耕不织，不生产的，他们以从农民处剥夺到的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六十五的东西过他们的生活。进一层讲便是工人阶级所得的，所奋斗的也是其中一部和想在此中多得一些。现在城市中用各种方式所攘夺着的，就是争分从农民那里拿来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五。现在城市中所有的工业不够维持城市中居民的生活，城市中所消费的都是由农民那里得来的，这六千四百万的人们究竟那一种人取得最多。取得最多的当然是绅士，地主军阀，官僚；一部分是学生，他们尚不生产，将来他们很有用的，目前却还是靠着别人担任维持他们的生活；剩下来最小一部分，是作为维持现有的小小的工业和商业，这是太少了，过于少了，差不多不能维持现在这样可怜的工商业。我们看海关的出口货，可以见到中国的出口货百分之九十九

或百分之一百完全是农产品，每年有一千兆两以上的数目，这是与帝国主义者买办及其银行很有关系的，足以证明帝国主义与剥削农民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农民被剥削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五的数目，一切反革命都建筑于他们的上面，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军阀的战争，就是因为抢夺剥削物，多分一些赃物，许多官僚互相争斗互相攻讦，他们的目的也在于抢一份，或是多抢一些。为什么现在的地主劣绅要组织民团，保安队等？他们是为了人民的安宁吗？决不是。他们是要以此种武力保护他们的剥削的特权。为什么一些反革命派他们要反对农民协会，因为农民协会是要将此种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五的剥削取消的，他们是要废除这种剥削的反革命派，因此反对农民协会，他们知道，如其废除了这种剥削，反革命的基础会被打倒。农民处剥削去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五是中国落为济后〔经济落后〕的基础，从满清，民国到现在还是同样的情形，就是因为同一基础永远没有更改过。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非将此落后的基础废掉不可，如其这个基础留在此地，中国国民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没有成功的希望的。如现在废除了这种剥削，农民种十亩田，便有十亩田的收入，不给别人拿去，都可以自己享用，那么他们将要如何去使用他们这增加的收入呢？第一件是买肥料，现在用的人粪都不好了，他们有了钱当然要卖〔买〕好的来，可以使生产〈增〉加更多；用了肥料可以使生产多了，食粮便价贱些，收入可以增加些，第二件买一些好的农具，新式的犁头，现在用的只能掘六寸深，买好的，合于科学的，可以掘一尺二寸或一尺五寸深，根深了，生产可以好些多些。有了钱他们就可以买布做衣服，不用自己的力气与功夫做出不好的布来穿，到城里或工厂里去买好的布来穿，可以省时省钱，拿

这些时间来尽力于耕种事业，使他们的耕种业更精善而且发达起来。他们有了钱不再愿意赤了脚，要买双鞋子着着，要将住屋修整一下，以及其他他们所必需的事物。他们也要他们的子女去读书，使他们得到一些新知识帮助他们改良农业，使生产更好起来。如其农民有钱给他的子女读书，那末现在城市中没有钱拿没有事做的教员和毕业生，都可以找到钱，找到事情做了。农民有了钱做这些事情，与城市以什么影响呢？那必定城市中须要建筑工厂制造肥料，因为肥料有销路可以做生意了，因为农民要买耕田器具，城市必定要建立田具制造厂，五金业必然发达。要运输货物，交通便利起见，铁路及其他工业也必随之兴盛。要供给农民的布，那就纺纱业、织布业必然发展。这样所需要的工业都发展起来，现在这种落后的现象可以进步到近代工业的时代。象现在这种旧制度、旧基础上，三万万农民受着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的剥削时候，中国的工人不能往前进步的。中国的工人现在似乎可以向前稍稍进步，可以加些工资，减些时间，改良一点待遇，但是极微细，极小的。更大的改善和进步现在是做不到，各位工人代表是工人的先觉，对于这一点应该放开眼界来看清楚，现在这种旧基础仍然存在，工人的生活不能希望彻底改善的，工业商业也不能发达的。我们要负责告诉工友以及其他的人民，使他们明白，来帮助农民改良农民的生活，解放农民，使农民有钱买东西，那时工商业方能发达，工人的生活方能有多的改善，工人与农民之间方能有正当的关系成立，工人供给他们以用具，农民供给我们以食料，这样的一个公平关系。我们不但要对工人讲明这点，并且还要对商人，学生，教职员，银行家，钱庄老板等说明这种关系，如中国不废除这种制度，商业是不能发达的，学生没有事情

可做，没有人读书，没有人要请你，教职员不能得到多的银，因为读书的人少教书的人多；银行也如此，因为工商不发达，金融当然不能流通……所以各种的人都需要废除这种制度，必须帮助农民解放；只有反革命势力，帝国主义，买办等反对这种制度的废弃。有许多自称革命党，革命分子，我也要问他是否赞成剥削农民的制度，他如不赞成，不是蠢人便是反革命派。如赞成保存这种农民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的剥削的，实际上就是赞成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反革命派。我们尔已只说反对这种剥削，是没有效力的，要实际上做。实际去做才是真正的革命，赞成各种群众的利益的，可以携手同为国民革命的同志的。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工业一定不能发达，商业一定不能振兴，合法的银行业不能兴盛，工人的生活没有改良，假使中国农民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五的剥削是依旧存在。所以合法的银行业者，工业家，商人，学生等等对于农民的解放，必定是一致赞成的，大家来努力废除旧制度，旧的基础，才能希望大家有向前的进步，不会象现在比别国落后一二百年的情形，特别中国工人的责任，要使农民知道工人对于他们是明了的。工人应该努力于这种工作，帮助农民解放，如其能助农民废除了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五时〔的〕剥削，则已经是为工人自身做了一件很大的工作，为中国国民革命作了一件很大的事业。

三天以前我在新年庆祝大会上说过，南京政府成立后失败的原因是在没有将旧基础打倒，革命之后，依旧是原有的基础，因此不能成功。如在南京政府时代就废除了这种旧的剥削农民制度，革命早已成功，因为不是如此，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成功。

从上面所说，中国工人之落后，中国现状之落后，他们

的原因是农民仍处于奴隶的地位，为别人作工，被别人剥削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五，所以要中国前进，中国工人阶级前进，就非废除这种剥削，历史遗留下来的剥削不行。第二点说明军阀制度。中国军阀不是现在特有的，前清时已经就有了清室的军阀，共和时代就有了共和时代的军阀，仍旧是一样。不过改变了名词罢了，因为建立于一个基础之上剥削农民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的基础上。我们看见一部分的军阀倒了，又是别一个军阀起来，因为这种基础仍旧在这里的时候，剥削的权利仍旧在这里的时候，一个倒了，当然有另一个起来竞争这份利益，在这种基础之上再产生起来。这些军阀在没处取得权位或将要得到权位之先，往往对于民众说好话，骗哄民众，等到上了台就完全取消了。所以打倒军阀，一定要铲除他的基础，不然军阀仍然是有的。希望以这一个军阀打倒另一个军阀，是一种空幻的梦想，真的要打倒军阀在解放中国的农民，废除旧有的剥削，然后军阀的制度必然会倒塌。现在的军阀的基础不仅是剥削农民，不仅是地主绅士，他们还有他们的新基础，就是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买办，他们是军阀的基础，孙传芳就是一个例，他不仅依靠江苏的地主绅士，并且与上海买办阶级也有密切关系。这新的基础——买办阶级——使他们得到新的助力，所以不仅要废除旧的制度，并且要打倒买办阶级与帝国主义。过去的失败，以前的错误，就在于不知什么是基础，只知道帝国主义不知道农民的剥削。现在应觉悟不仅打倒帝国主义，并要废除农民的剥削。这种剥削对于军阀，犹之日光对于树木，废除了此种剥削，军阀将如树木失去日光而萎死。

现在说到第三个中国落后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帝国

主义，帝国主义统治着中国，所以有工商业，工人等社会落后现象，大家都知道打倒帝国主义，但真能知道帝国主义与中国关系的很少。我们设想到了上海，在黄浦滩上可以见到一座非常高大的房屋，仅仅那座房屋就值五百万两银子，这座房屋就是汇丰银行！这个银行在去年底有百分之四十的利息给他的股东！就是你从去年一月存入一百元，到去年底你可取回一百四十元。我们如查看他的账目，可以看到每年有一千五百兆，这一个数目比中国每年全部出口货价值多一半，他们的钞票到处都香的，人人中意，不论汉口，上海，北京，香港，广东都很通行。这个银行不过是外国人在中国开设许多银行中的一个，在租界上还有很多，多有很大的红利，所有的现金差不多都积聚在他们手里，中国人手里尽是纸票，外国人手里握着我们的现金。汇丰银行他们有钱，可以拿五百万钱造屋，中国银行在汉口的现在有三十家要关门，因为外国银行不借款，这可以见到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势力，别人不给钱就得关门，中国银行是何等可怜的状态。中国所有的商业与财政都建立于空的信用上面，互相信任，没有多少现钱交易的，如到不信任时，交易就没有了。全部的商业都建筑于借贷上面，而不在实际交易上面。所有现金，银子都在外人手上，中国自己只剩有空的信用，没有信用的时候，商业也就停顿了！有件奇怪的事情，最可痛的事情，中国人自己积下来的金子银子，不拿来自己发展工商业却去放在外国银行里，被外国人拿去，到他们自己国内买公债票，发展他们的工商业。化了很多精血，一代一代积聚下来的现银，仅仅换了这纸票子，金银都到了外国人的银行库里，财政权都操之于外国人之手。在武昌经过兑换所的门口，可以见到换一张纸票要一天的功夫，很多人挤在一处，挤得热气直腾，远远

望去好象起了火一样的可怜状态。中国的人民终年终日劳动着，结果如何？代价如何？到那里去了？是不是我们都化费了，买了机器了，或是过好的生活了？没有，中国仍旧如此的穷，如此的落后，这些银钱都到外国人的银行里去了，仅仅一个汇丰银行就有一千五百兆，加上其他的，实有可观哩！如其这些银子放在中国人自己的银行里，我们将对那些老板说：你们即刻将这些钱拿来开发工业，交通事业，存放起来一定要吃亏的，因为银价渐低了，外国大半通用金币，银子将统统用到中国，银价要更低下去，如现在存放在外国银行的已亏损了二万万元，要快些用，不然要吃亏的。现在这些银子在外国银行里，他们是不肯拿出来的。因为于他们没有利益，他们自己拿去发展他们的本国的工业。要打倒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财政上的势力，必要夺回外国人二种特权，不准他接受中国的储蓄，不准他们发行钞票，如许其接受储蓄，就可以操纵，许其发行钞票，他们不依中国和其本国的条例滥发，这二者不除，中国的财政始终操于外国人手上，这里我们可以看清了什么是帝国主义，他们是怎样来压迫我们。帝国主义握住了我们的财政权，好象握住了我们咽喉一样，放纵都由他们的便，简直是握住了我们的生命机关。我们要废除不平等的条约，这种条约不过是一张纸，要最〈紧〉的还是实际上这些财政权，真是于他们有利益的。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需要用百倍的力量打倒外国人在中国财政上的势力。我问一问大家，什么是关税？为什么海关要放在自己手上？关于这个，我再讲一讲。美国工业很发达，就在于关税权，俄国的工业发达也是因此。各工业发达的国家必定先有他自己国家的关税权。海关对于一国的工业，犹如生命一样重要，好象一只船的机器，快慢都由它。中国经济生命的海关不在自

己手中。关税对于一国的工业，就如日光对于花，如没有海关权就等于花没有日光。譬如要发展五金业，可以对于外国入口的铜铁等重徽〔征〕关税，则在中国的市场中减少外国的竞争而自由发展。要发展棉纱业，可以增棉纱的入口税，中国货物就可在市场上与输来品竞争，其他重工业都照此办法。美国工业之如此发展，就是用这方法。不仅提高关税，也可用减低的办法，如外国的粮食比中国贱，可以减少或免去粮食入口税，使中国的米价低下来。帝国主义者占住了我们的海关，如不取回，中国的工业是不会发展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第二种特权就是以海关权来抑制我们生命。海关税如锁〔钥〕匙，我们须将这个锁〔钥〕匙夺回手中，帝国主义在中国约〔的〕三种特权是租界。租界可以说是反革命的巢穴，国民革命的阻碍物。所以国民革命必定要收回租界。上面所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性〔权〕，当然还有其他，重要的就是这三点，财政统治权，海关管理权和租界。

上面所讲的是中国工商业以及一切事物落后之状况及其原因。总之，第一原因一封建制度；三万万的农民，受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五的剥削，使中国工业不能发达，一切事业落后。第二原因一军阀；而军阀有两个基础：一，三万万农民的剥削；二，帝国主义者与买办阶级的协助。第三原因一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特别性质之权利：（一）财政统治权，（二）海关经济的统治，（三）用租界妨碍革命的进行。现在讲清了落后三要素，那末，如何打消这些障碍物，不是口里叫着革命所能做到的，要有实在的办法。

我对诸位工人代表说一句：仅仅只为改良生活而斗争，不为消除一般的障碍物而斗争，那末，我们改良生活的斗争，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工人生活的困苦，不能描写，不敢想描

写①，工人的生活，家室的情形，子弟不能读书，诸位自己是很能知道的，也不用我多讲。店员的生活是何等可怜！他们终日劳动着直到夜里，住的，吃的，穿的没有一样是周全的，诸位必很熟悉。工人群众和店友一旦除去了压迫，当然即时要起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是很自然很正当的事，如堤防阻着水，堤决，水当然要冲出来是同样的道理，不过从堤中决出之水不能够将所有都漂没起来，必定要照河道顺流下去。农民的剥削未解除，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没有除去，这样瘦弱的中国如冲坏了时，对于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作，农民的解放及自己都是没有好处的。工人自己的生活真正改善，在目前是讲不到，必定要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解放了农民时，才能有真的解决，到那时，才是真正解决的时候到了——大家应该明白自己的痛苦落后的原因，一致努力以求解决。要将中国落后的三种原因根本打消；我们的生活才能有根本的改善。所以我们首先要努力于废除农民的剥削，军阀的基础、帝国主义者的特权。我们固然在这个时候要加工资，减少工时，改良待遇，但是必定要知道做到什么程度。不然，做到商人跑了，银钱都拿跑，就更坏了，反而对革命不利，削弱了社会的组织。对于管理权的事，是很重要的，必定要服从领袖的话，依照工会的命令做事，不然，也会闹出店主，厂主，关门走了，是于革命没有多大利益的。对于这种管理权，尽可以妥协一些；一定要订一个条约，并没有什么用处，只要工会强固，工人肯服从自己工会的命令，有纪律，工会就有力量，不用怕店主厂主的压迫了，如其一定要订一个条约，那末，这种条约将如一面红旗在牛眼前招展，惹得牛生气，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得到利益。我们可以举一个例，有一

① 不敢想描写，似应为“不想描写”。——编者

个工会对厂主增加订了一条不准开除或无故不得开除工友条约，但是这个工会里自己有许多纠纷，自己互相争斗，那厂主必不履行条件，设法延长他们的斗争；同是一样的工会，非常之有纪律，每一个工友都加入，并不是强迫的，用宣传的工夫的，这样厂主自然依顺，此类条件订与不订都不关重要了。并且工人阶级要有统一组织，有领袖，拥护自己的领袖。

总之我们打消种种中国落后的原〔因〕素，要注意到全体的关系。全体的革命民众联合起来。在这个中间中国工人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工人所受痛苦很深，非常坚决，可以做这中间的领袖。解决中国革命的方法，我在这里回答这一问题。现在在革命高潮中看到所有群众都起来了，工人农民商人学生，我们必定有条出路。如何的出路呢？前几天我在联席会议上，我依着我的责任，供献我的意见，这个意见我以为是对的。我说仅说给人民参加政治是空的，要以真实的机会使人民参加政治。我们的革命是农工商学革命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一切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分子一定要有一个机关，决定什么是革命应该做的事，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省民会议与将开的国民会议。现在革命的民主主义分子都有了组织，工人有工会代表他的利益！再没有别的能代表。商人有商会。农民有农民协会，农民协会虽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已加入，但是足以代表农民的利益，土豪劣绅是不能代表农民利益的。脑力劳动者也有他们的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这各种民众团体的代表就可以组织省民会议。省民会议中有工农商学各种代表，或者可以加兵士的代表，这会议可以成为革命的基础。此会议可以通过一种法律，他可以要政府向他们报告财产状况，可以为各阶级谋利益，废除农民的剥削。

这个机关可以管理财政的收支，决定收什么税，收人用在什么地方。他并可决定什么是革命的，什么是反革命的。他又可决定如何去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这个会议有权建立乡、县省的政府。此会有力量决定如何维持秩序。这个会议必是一个重心，围绕这个重心是一切革命的群众进行一切革命的事业，此会不是放大炮的，决议使革命成功，他代表中国的利益，维持中国的革命运动向前进。因此，大家应该帮助成功这一个会议，现在各部分民众是分散的，没有联合的机关，不能指导政府，政府不过几个人，一定要使他有基础革命才得成功，联席会议对这个意见通过了，派出六个人组织委员会。湖北实行了，将推广之于全国，将来就可以召集国民会议。希望你们提出讨论对于这个有一个決议。

（一）请位要注意发展强大工人的组织，不仅注意生活之改善，并且要注意整个的根本问题；

（二）帮助农民斗争，废除奴隶似的剥削制度；

（三）对商学界等指出相同的利益，联合起来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告诉他们，我们为了十分的痛苦，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仍旧可以联合的，联合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废除〈对〉农民的剥削。

诸位要想一想是否省民、国民会议是革命民主主义的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办法。再在奋斗中注意到实在的工作强大自己的组织，才能取得利益，并且有保障。现在有了很多工商团体，商人尚未不参加运动的，要使他们知道工人不只为自身利益，是为中国整个的利益的，他们以更大的牺牲为中国的解放。一定要拥护与监视你们自己的领袖，使工会有纪律，团结，统一，如此才能指挥。我从事于革命二十年，在中国四年，依我的经验很诚恳的如此对诸位讲，请你们细细

的考量！我们的前面有两条路，一是失败，一是胜利！化了诸位很多时间听我的话，感谢得很！

张太雷口译　瞿景白笔记

（原载《鲍顾问演讲集》，1927年4月汉口民国日报馆出版。）

召集省民会问题报告

（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

几天以前联席会议曾通过了召集湖北省民会议的议案，并且议决中央执行委员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三机关各派二人组织委员会议定湖北省民会议组织法选举法。在国民政府治下各省如湖南，江西，福建，省民会议均将次第举行，现在则先从湖北着手。在联席会议上关于召集省民会议问题有过很长的讨论，并且有几种不同的意见，现在简单次第说明之：

第一种意见为民众方面而组织的情形是召集省民会议的先决问题。现在农民组织已普遍全省，工人也组织得很好，知识阶级如学生联合会等则很热心的参加召集省民会议的运动。商人以前对政治大半是厌恶的，现在也渐感兴趣，加入到革命运动的队伍里来了。这一班革命的民治主义分子，现在已成革命运动的基础，我们需要这种基础决不是说空话的问题，虽然就是在演说中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要民众参加政治的必要，然而只讲空话没有实际表现是不行的。此外有一点尤为重要，现在社会各阶级民众都努力为自身利益而奋斗，虽有民治主义联合战线的口号，终究无由实际上表现出来，现在虽有工农商学联合会的组织，仍是法外的，不能参加实际政治工作，所做的仅是宣传工作。欲使革命的民治主义能实际表现出来，此省民会议之召集实为必要。省民会议即为

将来国民会议之雏形，为立法机关，有一切决定权，但在现在客观状况之下，省民会议不能纯粹根据民治主义的观念，如年满二十岁的男女均有选举权的普选制，目前还是做不到的，现在的省民会议仅能建筑在革命民众的组织上，如现在已有的各种民众职业团体，这些职业团体都很能代表他本阶级的利益，如商会虽不见得每个商人都加入，但确能代表一般商人利益；工人的组织也正在代表一般工人的利益的奋斗；农民的组织现已普及多省，虽各面对农民组织有种种不同的意见，但事实还是事实，农民协会确实能代表其本职业利益的，至于精神劳动者现在亦有代表其本职业利益的各种团体，如教职员会，律师公会等。现在中国的革命问题尚讲不到完全的民治主义——所谓完全的民治主义本身已为争论之点；如美国号称最能实现民治主义的国家，但美国的选举依然完全由共和党，民主党，进步党等操纵，在中国现在只能组织起革命的民治主义分子，不能实行以年龄为标准之普选。现在民众还没有参加政拥〔权〕的机会，各阶级只是尽力谋本身的利益，长此以往，民众一定会对现状不满而日益的活动起来，将来便不免和政府发生冲突，一定会有一个反革命的事实发生。以各种职业团体为基础而组织的省民会议，如变成反革命的，我们是不要的，我们不能因民治而牺牲革命。但现在各种民众团体分子都是革命的，所组织起来的省民会议一定能代表民众利益，不会有反革命的事实发生，这个省民会议的组织一定能帮助一般民众解除苦痛，一定能解除现在政府财政困难，一定使贪官污吏见而知惧，一定能为防止革命民众脱离革命队伍的机关，一定为全部民众所协助，认为此团体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不仅将关于本身利益的问题提到本职业团体，同时也要提到这里来解决。

联席会议上对本问题有四种不同的意见，以上所说可代表第一种意见。第二种意见，以为在省民会议之前先须将各阶级民众组织起来以为准备。这两种意见除却手续上微有差别而外并没有许多不同。第三种意见则以为欲召集省民会议必须完全将民众全体组织起来，先做些训练工夫。此种纯粹民治主义现在尚做不到，所能做到的只是革命的民治主义，然而此种主张和以上的也没有很多差别，并且当然可以赞成委员会的决议。第四种主张以为召集省民会议国民会议，扶持人民主权，与以党治国主张冲突，这种主张不但和以上完全不同，并且非常严重，此种意见为本党所不承认，同时亦为革命的民主分子所反对，如果以党治国的主张与革命的民治主义相冲突，则双方必有一个是错误的，不是党的错误便是革命的民治主义民众错误。我们常对革命的民治主义者讲：我们的革命运动在过去所以失败是因为未曾建筑在革命民治主义势力上面，在讲话时这样说，但如果在革命的民治主义者要来行使职权时，我们来反对，便是不相信革命的民治主义。事实上党与革命的民治主义实为并行不悖的，从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案中，都可以看出党实欲满足民治主义之要求，故党治与革命的民治并无冲突，虽然过去发生过些问题，这些问题并非本党的全部问题，仅是党的一小部分或党员个人的问题。党与革命民众的主权并不相违悖的，而且互相维护的，能相互合作起来则对于革命工作之进展上有莫大之好影响。以前所谓党治并非否认革命的民治主义，只是没有承认革命民治主义是党的基础。本党以革命的民治主义为基础即为使其有权力以行使其党权，所以现在特别需要革命的民治主义的组织，只在表面上讲我们如何受人民欢迎，为人民拥护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省民会

议，便可以决定种种议案，这些议案虽然由党来预备，但一经省民会议通过，便成了人民公意，有违背之者即为违背人民公意，亦即为反革命。人民权力增，党的权力亦增，党与人民权力并无冲突，并实际为人民力量之领导者。如党中反对某人有错误的观念，革命的民众能助党以纠正之，使党更有力量。有些同志对现在人民力量进展很抱乐观，但对于党则颇悲观，因为党的力量落后，不能实际的领导民众，但照上面所述意见，如有省民会议，国民会议的组织，党便当然站在民众前而成为民众的领导者。

联席会议对此问题讨论后，即议决于一个月内召集省民会议。此会议便是建筑在各种革命民众组织上面，由各种职业团体派出代表组织之，并组织委员会以规定选举召集和组织的详细方法，通知各团体执行。现在报和一切宣传机关要以此问题广作宣传，并以以上各点解释各方对省民会议的怀疑或反对。

此外还有一种反对的论调，以为现在民众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不能参加政治的团体并有表决权，这与党的意见完全相反，我们要在宣传上尽力攻击的。中山先生北上主张开以职业团体为单位的国民会议预备会，是予北方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者以重大打击的政治手段，同时也就是代表民众参加政治的正当过程，在这种过程当中民众的组织和力量自然会连带着发展的，我们不能坐待群众完全组织训练起来，假使我们现在不能允许群众行使参加政治的职权，则群众与党一定发生隔膜，因之于革命运动的前途发生不利的现象，现在各报纸及宣传机关应努力宣传使同志观念确定，纠正同志中以为党与革命的民治主义权力相冲突的错误观念。此问题异常重要，从省民会议的召集到国民会议的召集，即是革

命成功，不然即必定失败。在民众的希望达到最高点时，如果我们不能实现他们的要求，他们一定以为我们只会讲话，不会实际去做。孙传芳通电之中说及我们和他们不同之点，我们可以讲给他："我们会讲革命，会写革命的文字，你连说写都不能，要用好多钱请得章太炎马素众帮忙"，但我们——真实的革命者——和他们只有这一点差别是不够的啊，我们要以省民会议做我们革命运动实际的表现。

张太雷口译　瞿景白笔记

（原载《鲍顾问演讲集》，1927年4月汉口民国日报馆出版。）

在湖北省党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之演说词

（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

同志们！今天我们花费一些时间来讲一讲党的状况与中国现状的关系。在历来中国国民革命的进行中间，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需要党的领导的，但是有许多同志对于蓬勃的群众运动非常乐观，而对于党的现状则很悲观。同志们所以有这种观念，是因为事实已经给我们看到，党不在运动的前面，而在运动的后面，党所做的事情是跟在群众的后面，而没有站到群众的前面领导群众向前进行。现在党有很大的宣传煽动的机会做一个国民革命的革命原理的宣传机关，如其能仅仅做到这一地步，本来已经是做了很大的工作了，即如唤起民众，在我们领土之内是已经做到，在敌人范围中也发生了作用，使他们的势力瓦解。不过我们要说党已经是真能够领导革命的政党，现在还说不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及最近之中央各省联席会议的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各项决议等等，这些决议都没有能够整个儿的执行，使他们实现，党也没有确切的方法来执行，没有使他实施的办法。至于各省的省党部，湖北的广东的以及其他的，都是以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意见来执行一切的事情。有时在早晨可以从报纸上见到可惊骇的事情在国民政府领土上面发生，骤睹之下，简直不能知道从何而来的，譬如

广东忽然有四条专门对付工人的决议，这种决议会使革命变卦，开一个新时期，辟一个新局面。我们自粤动身来此，经过江西省的十三个县治，十三个县的党部，尽不相同，各做各的，都是照着各自的意见去做事，很显然的可以见到党没有统一的指导各级党部。谁都不能说象现在这种各顾各的情形可以算是党有统一的指挥权，能够指挥其所属各级党部的行动的。国民党不能指挥军队与政府。整个的国民革命没有将各种不同的组织集合起来，这各种不同的组织各行其是地在各地做他们的宣传工作。

诸位是从湖北各县份来到此地，你们是各地负责任的同志，自然知道自己从北伐以来，接到多少党的训令，关于各方面的工人农民军事等等以及其他各种运动的报告。你们自己是负着什么责任，尽的什么义务，有的什么权利，是否能监督全党的行动？你们如其这样自问，你们得到的回答，必定是没有什么责任，没有尽什么义务，也没有权利，更没有能监督全党的行动。不仅是湖北，其他各省都有这种同样的情形。

这样情势的党，只可以说是一个宣传机关，而不能说是一个领导国民革命的党。或者有些同志以为党本来只是一个宣传的机关，但是我的观念不同。在改组的时候——民国十三年一月一日——是要使党成为中国国民革命领导的机关，中山先生是非常赞成这个意见的；本来如其不是为了要使党成为一个革命领导的党，又何必改组，因为在改组以前党是有在那里，主义也有在那里；在改组以前用了许多的力量与反对改组的人作了很长久的奋斗，如其目的仍只是如此，那又何必做那些无谓的奋斗。到现在三年之后依然如此，好象我们的改组是白花了力气。党是应该决定乡政府，县政府，省政府，国民政府应该如何进行。这样的议决案与原则是有

的。但是在实际政策上，政治上，是否党在指导？党是否〈知〉道收多少税？党是否知道收的钱用在什么地方？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党究竟有多少权力？我们的党有革命的理论，有革命的主义，有过去的历史，有伟大的领袖——孙中山先生，他不仅是中国的，并且是全世界的领袖，有打倒满清政府的功绩，这些在民族革命世界革命之中，都是非常光荣的，在全世界工农群众中也得到了很光荣的赞美的。这许多历史，理论，主义，功绩，使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很激烈的运动起来，使敌人畏惧。然而我们目前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党，是否实际指挥各种运动以及政府的政策。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是非常的发展，党的权力比较起来却是缩小。党一定要有真正的权力；他不仅是煽动和宣传，是要有指导与决定的权力。

诸位是负责任的同志，我是以看到的实际情形告诉诸同志。我坐下来细细地想中国革命的时候，觉得打倒孙传芳打倒张作霖是不值得一想，因为很容易，他们自身在那里瓦解，打倒他们不过象将一个妨碍手足的尸首搬掉，这是容易的；值得想的，是如何将四万万的人民革命化，即拿何种水门汀①，可以使所有的人民粘合到一处。现在的情形，连素称革命根据地的那一省，都有人怀疑这一省已经靠不住了！我们要回答的问题：现在的国民党，改组以后的国民党，在我们改组的时候所希望的是仅仅要他成为一个宣传机关的呢，还是要他成为一个革命运动领导机关？是否只要党任革命的秘书处的工作，还要他做领导的工作？是否只要党做政府的一部分，还是要他做政府的主人？是不是只要党拿千百块钱去做宣传的工作，还是要他确实去领导革命？这是我们要回答

① 即水泥。——编者

的。第二个问题——要我们回答的是：为什么党不统一不团结？如其党内不自己团结起来，对于国民革命有一致的意见，不能站在一个重要的地位，领导革命的群众，就不能做一个革命的领导者。如其我们对于现在的现状，党处在这种秘书处的地位，满意了，那末，无话可说。如其不是这样，想使党成为国民革命的领导者，那必定要想一个方法使党对于革命问题有一致的意见，树立起领导者的地位。是否能够有一致的意见？我说是能够的。我是相信党一定能够对于革命根本的问题有一个一致的意见，虽然不会有百分之一百，但定有百分之九十九是能够的，是有大多数可以一致的，至于少数反对者，自然有革命潮流会淘汰他，自然有革命的裁判会对付他。

我们的根本问题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是立一个新的基础，使政治，经济，教育……个〈个〉建设新的局面，从满清以至民国十五年来的一切，都建筑于旧的基础上面，现在要换一〈个〉新的基础。对于中国要建立一个新的基础，这一点大家是可以同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旧的基础上要消灭军阀及建设一个新的政府是不可能，而必定要有新的基础。对于这一个意见必定是一致赞成。我们党判断一个人的革命或是反革命，是在赞不赞成建设新的基础，赞成的是革命的，不赞成的是不革命的。什么人赞成这个主张？工业家，商人，本国银行家，工人，农民，学生及教职员都赞成这个主张；这些赞成的各阶级是中国社会的重要阶级。哪些人反对这个主张？地主、绅士、官僚、军阀，(这是旧时代专制制度遗留下来的，他们还在希望有专制的皇帝起来，早些恢复专制制度，这些人历史已注定了他们死的命运)，这些人是反对这一个建设新基础的主张的。地主、绅士、官僚、军阀，这些反

对的人们，历史已注定他们非消灭不可；赞成的人们历史已给与他们以新的生命和使命。我们不要误会在第一部分赞成的人们里面，是没有利益的差别的，或是以为第二部分反对的人们里面没有冲突；两方面都是有的，但是在革命一般的观点上，两方面都能全体注意到一个整个的目标。第一部分工、农、商、学、工业家、银行家等赞成建设新的基础新的国家的，后一部分地主绅士军阀等等是反对的，这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别。两部的人自己内面都有利益的不同，但在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第一部是革命的民主势力，第二部是反革命的反动势力。革命民主势力中有一致的可能，所以建立新的基础，新的国家是必然可能的。

革命的民主势力如何能打倒反革命的反动势力，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第一革命的民主势力之中要有一致，再要明白反动势力不仅仅是用武力所能消灭的，武力打败他是可能，消灭他是不可能，如其要消灭他必然要做社会经济革命；社会经济革命才能够消灭旧社会的基础。旧社会的基础，就是反革命势力的基础。是什么基础？反革命的经济基础，就是农民被剥削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中国四万万人民有三万万的农民受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的剥削，他们如种出一百担谷，要有五十担甚至六十五担被人拿去。拿去的方式，种种不同，纳税、交租、苛捐、勒索、高利贷；这是中古时代社会的基础，封建社会的基础，这是以前皇帝时代，满清政府及民国以来军阀政府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面是不能希望工商业发达，不能希望有好的财政现象；近代的社会是不能在这一个中古式基础上建设起来的。此种旧社会的基础必定要打倒。如其我们问一个工业家，问他是否希望工业发达，他一定回答赞成的，希望多开工厂。原料中国是很丰

富，所要的还有市场。市场有两种，国内的与国外的，国外的市场中国是不会得到的，只有国内的市场。国内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在三万万农民的身上，如农民不买货物，还有多少人买？现在这三万万的农民非常贫穷，他们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五被反革命势力取去，使中国的工业能有市场必定要将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五的剥削夺回交还农民，如此工商业才能发展。反革命者在农民那里剥削去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五，没有给农民一些利益。农民取回了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的剥削，他便可以到城市中来买他所需要的东西，工业商业都会因此受益，农民自己也能得到好处。取消了旧的基础才可以建立新的基础而使工业发展。至于工业家能否了解这个意思，那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你叫工业家来对他说的时候，他一定说这是共产主义，我不管。我们不要管工业家如何，我们做去，到将来他们会知道，将要对我们说："这是你们所赐与的，以前我不懂得，太蠢了！"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甲克宾党如到街上去讲，法国应该解放农民，工商业家都不会赞成。他们不去空讲，他们切实去做，解放了农民，后来法国的资产阶级就很感谢甲克宾党，他们花了很多的钱，建筑一个碑纪念甲克宾党。或有人说法国有大地主，中国只有小地主，中国与法国不尽相同的。这种辩论是没有价值的，中国农民所受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的剥削是事实，农民自己所剩有的仅仅是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对于这个能不能否认呢！不能！这种反革命的基础就应该打倒，而后可以建立新的革命的基地。我们叫一个共产党人来问，"你是不是希望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要大家能够有吃有穿的，共产主义第一是要富，每个农民有田，不用卖出一担谷要挑百十里路，要能一出门就有火车，这定要很富才能行。

共产主义在俄国都没有实现，要到电气化了才做得到。中国没有一个人主张就实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人希望发展工业，资本家也是希望发展工业，目的相同，大家都以为废除对于农民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五的剥削是必要的，不然不论是共产主义或是资本主义都不能够实现。共产主义者与资本家不管是怎样的冤家对头，在这一点上历史是要他们在一处。我所举的是革命势力中最相反的两部分，他们且必需在一处，要有一致的主张，其他更不用说了。商民助农民解放了是有利的，买货的人一定多起来；学生也不会反对，因为教育亦可能发展；工人当然赞成；所有革命的民主势力都赞成。农民是在半奴隶的状况之下，他做出来的一半生产品是为别人做的，这种半奴隶的制度要根本铲除。在这一个问题，国民党人不可退缩，要站到前面去做领导，如不去领导，两三年后群众将要自动的起来，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干了，杀人放火等等。国民党到那个时候将怎样呢？是不是咒骂他们呢？如其农民运动被军阀打了下去，中国将要象坟山墓地一样的沉默，是否我们国民党将建筑于这墓地上？国民党是要建筑于三万万农民身上的。现在国民党有决议：在乡村中建立乡村的农民政府，在城市里面建立民主的县政府，省建立革命的省政府，以及全国要建立革命的民主势力的国民政府。这许多政府他们的基础都建筑在乡村农民政府上面，他们的基础在解放了的农民，自由的农民身上。国民党内是否有一致的意见对于这一个革命问题？如其有的，那就可以去掉他的秘书处的工作，可以担任起中国国民革命领导者的责任。这次的大会应使湖北省党部成为湖北农民的保护者，湖北农民的救星，湖北省党部就可以有更广大的基础，有很大的权力，并没有那一个能够抵抗。如其湖北农民解放了，那末，湖北的

工商业一定发达，财政也必定好起来，所有湖北的重要问题，都要由湖北省党部的同意与决议，诸位不仅对于湖北负这个使命了，并应对全国负起责任，使全国都能如此执行。

第二件事国民党能否有一致意见的就是对付劳工问题。工人为改善生活而要革命，改善生活是工人所必要的。所要使工人知道的是工人的完全解放，不是现在所能做到，要在中国民族解放的问题根本解决之后，帝国主义军阀打倒之后，工人才能有根本的解决〔放〕。再现在中国的劳资两方面不是绝对的，大家有可让步与合议的地方。对于工人的要求不能完全否认，或是发怒，骂工人是流氓，说他们妨碍财政商业，实际上在中国这样落后的经济状况中工人对于财政商业不能发生多少影响。所以劳资两方面不是绝对的而是可合议的，可妥协的，对于这一点大家是可以同意的，工人的改善是必要的。

第三点应该同意的是革命不是机械的，也不是投一个片子到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接见一下可以算事的，或嘴里答应就算事的。不能是对于任何问题不是不答复反而发怒。或者有人说农会中有土匪，因此大大的怀疑农民运动，实际这是没有多大的问题，现在都是才从军阀压迫之下出来的，在热烈的运动中，又没有经验，当然难免有混入的是不能防止的。我们不可以以为拿了名片来见我们都是好的，恐怕他们之中或者真有土匪头儿在里面都说不定。武装的军队以刀去刺死敌人，他们也被敌人刺死，使孙传芳见了害怕。我们何以对于军阀这样的勇猛，对于他的基础却很有礼貌而不愿意拿刺刀去刺他们了。我们从广东到武昌的路上杀了很〈多〉军阀军队，因为他们阻碍革命；可是对于大人先生，他们是剥削农民的，在他们的身上有孙传芳的，吴佩孚的，张作霖的委

任状，或许是有一张国民党的党证，他们同样是阻碍革命的，我们却拿一个指去碰他们一碰都不敢，但是军队阻碍我就要杀，这样看起来公道与正义何在！我希望诸位对于剥削农民的用刺刀去刺死他，刺死反革命的基础，如象刺吴佩孚的军队一样，这样国民〈党〉才不至于落后，不然是要落在后面赶不上去了。所以国民党对于取消中古式的基础要坚决的实行，对于反革命势力要采取革命中对付反对派的手段，我所说第三点就是对革命要有决心，能采取果断的手段，这是应该同意的。

对于以上三点，中国的工业家、商人、工人、农民、学生都希望的，国民党对于这个要有一致的意见，然后能够领导革命的运动。还有补充的意见，党既对于这个有了一致的意见，更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最高机关，其能实行以上三件事情的。各位要细细估量这三件事，注意中央委员会能否执行此三件事，特别在革命时期内要能确实执行。总结起来就是农民的解放，工人生活的改良，解决问题必定要用强硬的手段，如此使不至于落后而能够领导革命的运动。我们要使党的中央在国民革命中占有领导的地位，这个中央为全党所拥护，为群众所拥护。因为党对于解决土地问题，铲除旧基础，对于劳工问题，对付反革命派三件事不一致，于是成了一个秘书处的样子，不是一个政党，领导革命的党，现在如再不注意〈以〉上三点和补充的一点一致起来，我不知道将怎样能完成革命。在历史上这时候是最好的机会了。这些话我到处都是如此的说，不论在广东、江西、湖北我都主张对于土地问题，农工问题，坚决的用强力处置一切，强健中央党部四点，大家都有一致的意见，这样才可以使党站到领导的地位。希望对几点有一个决议，下次全国大会上，湖北的代表应该活动，使全国都赞成这个意见，今天我的结论有

两点：

（一）打倒反革命派基础；

（二）建设新的革命的民主主义政府。

湖北省党须是一个推动力，使国民党成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真正领袖，站到革命运动的前线去。

张太雷口译　瞿景白笔记

（按《鲍罗廷演讲集》刊印并据《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0日、23日、24日连载译文作过校订。）

在汉阳兵工厂之演讲词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

中国四万万人民，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所以国民党有农工政策。同志们！国民革命是什么？什么叫做革命？革命就是人民现在没有钱，要使他们多得一些；革命就是人民没有衣穿，要得到衣服穿；革命就是人民只有最低矮房子住，没有好的屋子住，要得到好些的房子住；革命是要求使我们的子孙有书读，不再像我们没有知识；革命是要乡村与城市的交通便利些，粮食运费便宜些，城市的食粮价钱可以贱一点；革命是要政府成为人民的政府，而不是少数人抓钱偷东西的政府；革命是要有一个好的政府，能够为人民谋利益做事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的，也不是为小老婆的利益的；革命是因为商业太衰落了，要使商店里货物充足起来，人人都有钱买东西使商业发达，革命是为了要发展工业使中国有很多的大工厂，中国现在只有一个兵工厂是大的，制造枪炮子弹，革命固然需要兵工厂，但仅仅有这个没有别的是不够的，不能制造出各种货物供给工人农民以及其他社会上的人们；革命是要使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各种的人将他们劳动所得的结果，归他们自己享受。现在中国有三万万农民，工人，商人有几千万，他们从很久以前，几千年几百代，子子孙孙的做事，做得的结果到那里去了？积起来了吗？诸位身上有没有？是不是农民取去了？农民没有取去，工人也没有，大多数人

多没有钱，是那个取去了呢？是帝国主义者在他们占领的租界上一个一个的吸收去了；还有少数在帝国主义手下的买办他们很有钱，他们的妻妾有金钢钻的戒指戴着，军阀也有很多钱都放存外国银行里，中国几千百年积聚下来的钱都被帝国主义买办军阀取去了。在中国的外国银行很多，仅仅一个汇丰银行，每年就有一千五百兆的生意，去年的年利有百分之四十。仅仅一个外国银行有如此大的收入和利息；我们自己的银行呢，武汉有三十个银行因为没有本钱而要关门。这可以见得帝国主义是管辖了中国的财政，革命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的中国财政统治权。革命（一）就是要使中国人民生活状况好起来；（二）建立一个好的政府；（三）使中国独立，打倒帝国主义，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革命使中国人民生活能好起来，中国人大多数是需要革命。革命的对面是什么？革命的对面是反革命，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面对面地在接战。什么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军阀等等，他们不要人民有知识，有钱，要人民愚笨，贫穷。帝国主义也是反革命的，他要中国人永远贫穷，永远没有知识。贪官污吏是反革命的，他们在军阀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分剥人民。还有不愿意农民解放的，不肯废除农民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的剥削制度的，而要保存这种制度的，他们也是反革命派。有谁反对工农商学联合起来谋改善自身生活的亦是反革命。革命与反革命面对面的互相斗争，这种互相的斗争已经有十五年了。在十五〈年〉之中，孙中山领导了一部分，袁世凯或是另外的人领导了一部分，有些是另一种旗帜，经过了十五年不断的战争。十五年中，革命屡次失败，中国人民生活状况更坏了。为什么过去革命会失败？这是因为革命的力量没有到工人农民的群众中去，那时的革命只是在衙门里做的，没有到街上去与民

众一起做，所以失败了。现在为什么成功得如此的快，从广东肃清反革命一直下江西，湖南湖北而到武汉，不久将到浙江，这是因为跑出了衙门，离开了房门，跑到街上，跑到民众中间。当向着人民宣布革命怎样怎样，以及问“你们来不来”的时候，所有民众都高声呼喊着来参加革命，于是革命就这样快的成功了。我们若仍旧如此进行将可得到更大的胜利，打倒孙传芳，张作霖，革命将打倒一切反革命。革命将反革命打倒，可以使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生活好起来，衣服可以穿好些，住的地方好一些，食吃得饱，子孙有书读，政府成为人民的，国家独立起来。兵工厂是革命的，造一枝枪的时候，应当记住这枝枪是打反革命的，造一粒子弹时应当记住这是打反革命的，反革命打倒了，中国人民就能得到幸福。所以诸位在兵工厂做工，做子弹或枪炮都是为打倒反革命为革命的成功。诸位努力做出的枪弹打倒了反革命，完成了革命，兵工厂便成为革命的，反对反革命的，能够使中国大多数人民解放之工具。我们现在高呼：

革命的汉阳兵工厂工友万岁！

汉阳兵工厂工友与湖北工友团结万岁！

全国工农团结万岁！

工农兵大联合万岁！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张太雷口译　瞿景白笔记

（原载《鲍顾问演讲集》，1927年4月汉口民国日报馆出版。）

办理党报方法报告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

在要对于革命的报纸有所提议以前，必须对于各种革命的报纸有充分的明了。因为我不能直接读中文报，所知道的都是根据译文，当然不能十分确切，这是要请求原谅的，在我们读此地各种党报时，多感觉到对于地方消息很少注意。虽然关于全国的政治问题，以及京津沪粤的消息登载的很多，但如果我们想知道地方真实状况，则现在各种党报并不能充分供给材料给我们。所谓地方状况的，即是社会各部分，各团体生活状况，活动情形，和他们的各种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这一类的登载确是很少；即使有些登载也不过登载些各团体的决议以及一些表面的现象；对于社会各阶级的思想活动，和他们的种种切身问题，都不能深刻的代他们表现出来。“读者通信”对于这种的表现是很有效的，我们的报中这一项几乎是没有。总结起来说说现在各种党报有〔所〕表现的都是没有与民众间建设起亲密关系；所登载的反映人民生活的消息都是间断的，零碎的，并不能够将人民生活状况经常的，充分反映出来；也就是我们的报纸和一般民众的生活不发生很密切的关系。

因为消息不能反映人民生活，同时在报纸的时评中也就表现不出人民与报纸的亲密的关系。现在我们的党报都不能对于有组织社会中的要素加以注意，提出种种民众的切身问

题而代为提出解决方法。譬如我昨天到兵工厂去参观，报纸上仅仅载出某某人到兵工厂去了是不够的，即使讲加上些不完全的某人讲了些什么话也是不够的，最要紧是要能将会场中空气和情形具体的描写出来。如昨日当场有一二人讲："我们很愿意为国民政府去出力，去牺牲。但是现在每人每月工资只有八元，叫我们如何能饿着去出力，去牺牲"。我们便应当在时评中解释为什么政府只能给他们八元工资；并且应当指出政府可将不需要之靡费稍为节省，俾使工人生活稍得必要的改善——此地并不是说一定应当这样做，不过对此问题我应如此去宣传。编辑接到此项报告后，应立刻想到此工人工资情形是否真正不能维持生活，并打电话给厂长问明虚实。但如当政府委员昨天一点钟到汉阳时有许多兵士来欢迎；昨天天气很冷，这些兵士都是赤足穿着草鞋。我们应当很注意的问：他们为什么赤着足，为什么他们没有袜子穿，是政府没有钱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我们对这问题解释时不是要破坏政府的地位，而要使政府地位巩固。报纸的编辑对这些问题不会是完全没有知道而实在是没有加以注意，或者以为这些琐屑事情无关于三民主义，无关于革命大计，以为革命的问题只是些知识上的问题，和这些实际问题——如兵士赤足等——无关的。更有昨天工人说他们的要求已提出联席会议而久无回答，编辑接到此项报告应立即电讯联席会议秘书处是否如此，并问其久无回答的理由。这并不是干涉政府的行政，而是很正当的打听消息。又如现在湖北省党部全省代表大会正在开会，报纸上应以大会中意见和讨论的中心问题记载出来，做成评论，使读者一目了然。各党报上对此虽略有记载，但大会中重要意见报上并不能表现出来给民众看，这大概因为此次大会仅被视为一普通问题，故未予以特殊的地

位和注意。湖北第二次全省工人代表大会，报纸上亦未将工人中的各种问题提出报上讨论，仅仅有开会记录和文件的发表是不够的。再其次，商业在社会上占很重要的地位，报纸上应当注意商业社会的各种情形；他们有些什么困难问题和他们问题发生的原因。他们每以为现在商业的困难是因为店员改善生活运动而发生，而不知道这不过是现在使商业上发生困难的很多原因中一个最小的。我们应当在报纸上将这些真正原因告知他们。应找到商界实业界银行界和国民党中要人来谈话，从这些谈话中可以找出商业困难的真原因，拿来在报上发表，或者有人反对我的意见，那便可以通信来讨论，最后总可以得到一个真确的结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报纸的责任便是要将种种真正原因指出来，并且不是今天作一篇文章便了，要经常的时刻注意，评论，要使一般社会上的人承认了我们的意见，抛弃了他们以为"工人改善生活运动是商业困难的原因"的错误观念方才罢手。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一般人并没有真确的见解，也没有人将这些商业困难的真正原因告知他们，则日久必为这种流言所动而相信这些错观念是真实的。驻在各处的军队中人，更容易受此影响。

有许多人对农民运动多不满意，如果把相信农民运动是坏的的一般人所说的一切对于农民运动的坏话综合起来，并不见得农民运动怎样的要不得。现在谣言很多，同时便发现有反对农民运动的倾向，将来这种倾向一定和民众运动发生冲突，在党报上应当详细解释农民运动的真相，意义，必要和利益告知民众。我们要将徧〔偏〕见放开，平心来批评农民运动。我们先问我们给了些什么与农民？我们讲过很多，解除他们的痛苦，增进他们的利益……实际上所给了他们的只是组织的权利。组织起来做什么？当然不是作装饰品来商谈

政治，他们立刻要利用这个组织起来作改善自身利益的运动，这运动便不免和地主绅士冲突，有许多问题在西洋的农民一百年前早已做到，但在现在的中国，农民一提起这种要求来就不免与地主发生冲突。如同地主量租的斗斛，总是一年大起一年，如果农民起来向地主质问，便立刻会发生冲突。但是度量衡要统一，这在欧美各国已早就成为当然的事了。这种我们要问政府和省政府曾否下令规定划一的量制？没有的，政府给了农民的仅是组织权，这在农民便是改良生产权，但农民刚刚提出改良生产的要求，便立刻和旧的剥削制度冲突，县行政和乡村行政仍旧一些没有改良，但农民却已组织有力量的团体，这如何能避免冲突？如同限制重利盘剥的问题，政府曾经下过如超乎一分利息以上即为重利盘剥的明令没有？没有的；实际上许多地方农民纳的利息甚至到五分，十分以上。这并不是来批评政府，只是找些不应对农民运动加以非难的理由。政府欲避乡村中种种冲突，只有自动的使农民（从）多年的剥削制度之下解放出来。农民的种种痛苦从满清到现在一点也不曾减除，我们现在要准备解决这个问题。有人说农民一切痛苦的解除要等我们攻到北京，统一全国以后，这完全是无意识的话，革命运动不是机械的，而是一个动的过程。革命势力的发展和人民压迫的减少成正比例，农民痛苦的解除程度就是革命势力进展的程度。

现在许多同志对于建国大纲中所谓的军政时期有很大误解。他们以为在军事时期中，民众不应当有所活动，甚至于不应当讲话，所应当有的只是军事行动。谁敢说，总理规定军政时期的用〔思〕想是这样的？谁这样想，谁是错误的。记得当总理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国大纲草案时，同时他也提出大会宣言中的政纲，这政纲是他自己作主席来讨

论的，他自己来签字的。这个政纲里面讲，要中国革命成功必须农民工人来参加革命，要他们来参加革命必须先改良他们的生活。如果建国大纲中的军政时期是那样解释，何以在同一大会中又有这样政纲之规定？实则此二者完全是相辅而不相悖，仅根据对大纲的误解而非难大会宣言中的政纲是完全错误的。列宁全集已出版的有三十余册，仅仅根据其中的一页或一句话，或者亦可以硬叫列宁是反革命者，如果单单为适合个人的私意来做的时候。谁敢否认第一次大会中总理亲自作主席时讨论的决议？谁敢来否认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建国大纲，我们不能丢掉一个而断章取义的曲解其他一个，从这里可以晓得乡村中农民运动便是执行我们保护农工政策的结果。在规定此政策时已然晓得一定有现在种种现象发生，但是必须使农工生活得以改善然后才能使他们很勇敢的来参加革命。党报的责任便是要说明现在乡村中种种现象的真相，意义和原因。有一般人对于农民运动很气愤的，我们应详细替他解释消其愤懑。使他们知道这是我们政策的结果，乡村中有激烈的运动，是因我们不替他们解决，于是农民群众自己依照群众的方法与手段自动的来解决。这样当然免不了有过分的地方。这是我们自己的错误，不能责备农民的。政府自动的改善农民生活，农民就不会有过分的行动了。因为农民受着这很重的压迫，你不经常的领导他们解放则运动势必愈激烈的。如依我党政纲去解除农民的痛苦则运动自然和平。有些人以为工农运动的发生是因为有些捣乱分子的煽动，只要除去这些捣乱分子便不会有农工运动的存在，这种观念是极端错误，错误得与香港总督以及保守党的报纸《每日新闻》一样，简直是不明白中国的情形。这种是绝对无意识的。假使他们没有很迫切的切身痛苦存在，现在中国如何会有千百

万风起云涌的农工运动，这如何能说是个人煽动的结果？党报上不仅要指出这种观念的错误，只说他们不明了中国的情形是不够的，应该拿种种具体的问题提出来。如同农民的痛苦总有五十种，报纸应当从乡农民协会，县农民协会等处，披〔搜〕集这一类的事实材料，在报上来宣布，然后指明这些痛苦的来源和解决的方法。如查政府不替他们来解除，他们便要自己来解决，这样他们便不免做出些错误来。俄国某报在乡村中有六万通信员，所以他们能有很确切的从农民那里描写乡村生活的真相，我们一时自然不能希望这样大，但也要渐渐的有许多人做这项的调查。

总结起来说，报纸第一，要有丰富而且真确的具体的事意。第二，根据这些事实以真确的意见作评论。评论不要零碎的，偶然，要经常的，有系统的。

有人讲报纸是公正不偏袒的，实际上没有这样一回事。一切报纸都是偏袒的，是社会中各团体利益宣传的工具。这一点各报都是一样，只是办理得有好有坏而已。国民党的党报应该宣传革命的主义和政纲，但这绝不是如鹦鹉般教一句学一句而已，我们应当依据主义和政纲来搜集事实，并且根据这些事实来作评论。今天所报告的绝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要使我们党报不是代表个人的意思，而是代表中国现代伟大的革命斗争。我们应当使读者明了且来加入这个斗争。我们的党是各革命阶级联合的党，报纸应成为各重要社会阶级——工农商学联合的宣传工具。将他们的宣传问题充分披露出来并予以解答。这不仅是地方的党报应当如此，全国的党报也应当如此。　　　　张太雷口译　瞿景白笔记

（原载《鲍顾问演讲集》，1927年4月汉口民国日报馆出版。）

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提议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一）广东农民代表大会快开幕，可去电说明此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关于农民之决议案宣言，鼓励其奋斗精神，电文由农民部起草，提出下次会议通过。

（二）南京上海克复，应发表宣言，指出时局之重要意义，并宜组织一委员会起草。

（三）发表另一宣言，要求撤退外兵。

（四）由外交部对列国致一通牒，请求撤退外兵，近来革命空气太沉寂了，这个运动可以打破与帝国主义者妥协之倾向。

（五）汉口英租界已在外交部的指挥之下，德俄租界亦宜统归外交部管理，因为反动分子聚集在德俄租界。

末了并主张政治委员会，每星期应二次或三次写信给地方各团体，使其知道我们作些甚么事情，才能得群众之拥护，并拟继续办一政治公报。

〔(二) (三) 决议——通过，并决定起草宣言委员为陈友仁顾孟馀邓演达，并请鲍顾问参加。

(四) 决议——由外交部长起草，经过政治委员会通过发表。

(五) 决议——交国民政府及湖北省政府照办。关于继

续办政治公报一层，决议——由政治委员会发行，中央政治公报，每周一次。〕

（摘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录》，油印本，1927年。）

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

鲍罗廷：现在的情势的确是很严重，英美已准备干涉；日本的态度虽然不很清楚，但据北京来电，说是许久不造谣言的日本人，最近在北方又大造其谣，他们虽不足代表日本政府，但反对南方的这种事实，是不可否认的。现在假定英已准备干涉；美或中立，或赞助英、日；如果我们有适当的方法，可以使她不致同英美联合。所以在危险的局面时，要有一定的政策，用那个政策，可以使英日分离，可以使帝国主义者分化。我们更要注意，南京事件，乃是北方的挑拨，并不能以之为干涉的口实。在这几年来，有比南京事件更严重者，南京事件并算不了什么一回大事。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自己中间，有许多灰色态度的人，他们现在已有一只脚站在反革命方面，将来或许两只脚都站过去，因为有这些灰色态度的人，希望帝国主义者出来说话，所以英国人才有勇气向我们进攻。假使帝国主义者切实帮助反革命派，那就可使革命军消灭。在这种千钧一发的局面之下，我们应当使用各种的对付方法极力宣传，打消帝国主义者所散布的一切谣言。（一）日本民众，对于中国有两种畏惧心：一则怕革命成功之后，危害及日本

的经济；再则怕将来太平洋战争发生时，中国要加入反日的方面，所以我们现在要很公开的，诚实的对日本的民众说话，要打消他们的两种畏惧心理。我曾接着日本财政界名人正金银行的加能来电说日本人民，很愿意同中国人民，有公开的谅解。所以我对于陈部长保护日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提议，很表赞同。(二)本党及各团体，应付〔对〕于英国工党及英国人民发表宣言，声明南京事件应由英国的保守政府及北方军阀负责，若他们再不起来干涉他们的政府的这种强暴行为（炮击南京)，那我们就要施行最大的经济绝交。(三）请国际工人代表团发表宣言，请他们对世界工人及自由主义者报告中国的实在情形。(四）对于本国的工农商学兵各界发表宣言将中央政治委员会之政策明白告诉他们。(五）特别对武装同志宣言。(六)组织三人委员会，无论对内对外的宣言，每天至少要作一篇。(八）〔原稿缺第七——编者〕关于对付美国的策略，请陈部长想想，下次再提议。

……

鲍罗廷：这个问题[①]非常重大，大家都应当发表意见，共同讨论。我对于保护日侨及其他各国人民，与徐同志（指徐谦——编者）同意，对于反动分子，应有对付方法，也与徐同志同意，从前在广东，只有一省，外交还可以支配，现在反动分子自由委派重要官长，损伤党权，使帝国主义者跃跃欲试，情形和从前已大不同了。所以我们要说明：反帝国主义运动，要同反革命运动联合举行〔原文如此——编者。〕至于对日问题，与徐同志的意思不同。若将我们的政策，同反革命的政策相比较，可以看出他们是秘密磋商的，我们是公开说明的。如果我们剀切表示不愿危害日本

① 指不应否认日本人民的力量而言。——编者

人民，可使他们不再妨害我们的行动，如同他们帮助张作霖打败郭松龄一样。日本有他们传统的政策，诚然不错，但是俄国在初革命时，日本也是怕上当，但是后来慢慢的对付，居然拉拢了，中国现在的情形，同俄国当日差不多是一样，只要很公开的慢慢拉拢，花点时候去对付他们，一定可以使得他们阻碍他们的政府干涉中国的事情。至于不采用同样的政策去对付英美，我想再用不着解释。

〔后主席发言，指出"鲍顾问提议应发的宣言有五种：(一)对日本人民，(二)对英国人民，(三)对国际工人代表团，(四)对本国人民，(五)对本国军队，应由三人组织委员会起草"，"指定顾孟馀陈友仁陈公博三人起草"。决议——通过。〕

鲍罗廷：对本国人民及军队所发之宣言，要说明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阴谋，同反动派有关系。

〔后吴玉章等发言，提出"要彻底的揭发他们的阴谋同关系"。决议——通过〕

鲍罗廷：现在国际工人代表团已来了三个：一个是美国人，职工教育委员会的；一个是英国人，出名的工人；一个是法国人，议员。顶好是组织一委员会招待他们，并非招待他们的起居，乃是政治上的招待。

〔后主席发言，提出指定中央、省、市党部，国、省总工会，各出一人组织招待委员会，中央党部指定陈公博。决议——通过〕

鲍罗廷：印度的同志 ROY 也快到了，应拍电去欢迎。

〔决议——通过〕

（摘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8次会议速记录》，油印本，1927年。）

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

鲍罗廷：蒋同志现在上海，已经形成一个反动中心，这一定失败的！假使他起初就不到上海，或一到上海即退出，中央是不用打电报的，但现在是不成了。以前我见蒋同志，曾问他去不去上海呢？他说一定不去，现已竟然去了，而且他在上海并形成一个反动局面了！这种反革命行为，究竟与孙传芳何异？本来他去上海，应该要先请示中央许可的，他现在竟自由行动了！去年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行为，也是不理中央，自己乱做。现在他在上海，对外对内各种情形，都走入反革命的路去，没法子使他能革命的。假使我们不是爱惜蒋同志，就任从他在上海听他将来弄到一个失败的结果给我们看的。现在我们要他离开上海反革命的重心，免他受包围走去反革命；如他真能接受中央训令，离开上海，而是最好了，如不然，他便甘心反抗中央，那中央还靠他做革命工作吗？

（摘自《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本，1927年4月。）

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

鲍罗廷：现在有许多谣言，足以妨害财政，顶好是用政治的方法，来帮助帮助。可以对商人宣传，解释给他们听，说是不久就要打到北方，那时经济状况一定会活动的。指定一个人一星期，专门作对商人宣传或是请他们赴宴会的工作，再可以定一个时期召集扬子江流域的商人大会，本来这是早已决议的，但现在却忘在九霄云外了。这样一来，很容易得着商人群众，就是其中有妨害财政的也容易处置。……

鲍罗廷：现在快要统一中国了，须于一星期内就召集大会。

〔经讨论后，由主席提出“由总政治部、宣传部、商民部、财政部、交通部，三个总商会、三个商民协会、省市两党部组织委员会筹备对商民宣传，并召集商民大会事，有无异议？”决议——通过。〕

鲍罗廷：肇事〔指四三事件——编者〕的前两天，本会已经决定过政策，是否要遵照旧案？听陈部长〔指陈友仁——

编者〕今天所说，又似乎同没有政策一样，是否要从新规定对日政策？

……

鲍罗廷：从前各国联合起来反对国民政府的，是英国当领袖，现在是美国了。据北京的消息，美国的公使，比任何国公使的态度都还要激烈。在他设想，不但现在要反对中国，将来一定还要反对日本，换一句话说，就是欧美各国，要联合起来压迫亚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在这种状况之下，最适宜的，莫过于中日联合起来，反对英美的联合。但日本也是一个帝国主义者，要如何使得中日谅解，实在是很困难。日本人现在是徘徊歧路，一方面是同英美联合，一方面是同中国携手。他们正在那里审查考虑，不知道何所适从。也许他们想，同中国携手经济上要受损失。也许他们想，同英美联合，军事上要失败。所以我们要解释给他们听，加入英美方面，目前虽然有利，将来总是讨不着好的。加入中国方面，使他的合法经济决不得受损失，就是中国强了，也决不得同帝国主义者一样。再可更进一步对他们讲，同中国联合，不但不会危害及它的合法经济，而且可以使得它的生产格外发达。我们可以看得出，从柏林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日本，从日本到此地这一条路，有结合之可能，可以和英美对抗。所以本席的结论，是请陈部长有对日本的宣言，要根据平等的原则，磋商一切。我们要用公开的，革命的外交手段不要同南昌的那些人一样，鬼鬼祟祟的同日本人跑来跑去。

〔经主席提出对日政策可否指定几个人，除陈友仁、顾孟余、徐谦、孙科、邓演达外请鲍顾问参加。决议——通过。〕

鲍罗廷：〔对肇事日本水兵〕在他们应受审判的期间内，还是由日本自己拘禁。

〔经主席提出将他们预审之后，再送把日本领事。决议——通过。〕

鲍罗廷：精卫同志到了上海，本来是因为到汉口来路过的，但他们一定要说是专为他们而来的，我们要设法使精卫同志不被他们利用。

鲍罗廷：李石曾到上海打了三次电报……与徐谦，没有接着我们的回电，很是怀疑，不知我们对于他的态度如何，但我们一次电报也没有收到，是否应拍电去？

鲍罗廷：第三国际中央执行委员印度的ROY到了，应请他列席中央会议，并欢宴他。

鲍罗廷：山西梁上栋同志有关于山西工作方案报告，可否请他明天出席并先指定一人接洽。

〔孙科提出请顾孟余接洽，决议——照办。〕

（摘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9次会议速记录》，油印本，1927年4月。）

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并欢迎第三国际代表鲁依会上的发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

各位同志！第三国际特派鲁依同志到来中国，在此时机，实在是最相当不过了！鲁依同志对帝国主义内容以及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历史是很清楚，因鲁依同志生长于被压迫民族国度内，尤其生长于英帝国主义铁蹄之下，故对于英帝国主义之如何压迫，鲁依同志是几十年之经验的，是很清楚的。所以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组成及运用，都很清楚。这次代表第三国际，来到中国，对中国革命，一定有很大贡献的（鼓掌）。鲁依同志参加第三国际革命运动，也是自民族革命运动做起，鲁依同志是印度革命领袖，从事于印度解放运动，根据了几十年经验，是觉得不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印度革命是不会完成的，所以他参加了第三国际，我可说一句话，就是打倒帝国主义，要联合世界上势力才能成功的，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作战，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国民革命与无产阶级势力，不是孤军奋斗所得到解放，无产阶级如不与东方国民革命联合起来，帝国主义下被压迫阶级，亦不能得到解放的。鲁依同志，是代表此二种革命势力，所

以既致力于国民革命，同时又参加第三国际，来到中国，使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得到亲切关系，共同起来奋斗，打倒帝国主义。兄弟认识鲁依同志已有五年了，在这五年中，鲁依同志一面领导印度革命运动，团结起来，使发生很大力量，来打倒英帝国主义；同时鲁依同志去到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内，领导无产阶级，使与东方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故鲁依同志既为印度尽力，又能为世界无产阶级尽力，我们能得鲁依同志来到中国，对我们讲话，是很愉快与高兴！我们现在到了很严重时期了！也就是到了很危险时期了。帝国主义者已觉得其地位之危险，已觉得其末日降临，然而他们仍想出许多方法来向我们进攻，同时反革命派亦知国民革命成功，将失其本身利益，于是勾结右倾分子，转移方向，在此时期是很危险，大家是要努力，以不使其危险发生。鲁依同志代表第三国际，恰在这个中国革命危险时期来，一定有许多贡献我们，因为中国革命运动成功或失败，是关系于世界革命甚大，第三国际是用全力来帮助我们，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反动派！是鲁依此来，唯一的任务和使命（鼓掌）。

（摘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本，1927年4月。）

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

“自从东南的反动气焰高涨，增加了帝国主义者向我们进攻的力量；而因为反动派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更使我们不容易向他们进攻。但革命的工作是不进则退，不能在中途停止的。为应付这种恶劣的环境，只有暂时采取战略上退却的办法。我们都晓得革命党在根本上是不能有什么退让，现在所谓退却，只是战略上的退却，同根本理论并不发生妨害，或者更可以促成革命的进步。帝国主义者或因我们改变策略而停止进攻，或因我们改变策略而更加猖狂，我们须采取各种应付的方法，使他们无所藉口。他们凭武力而施压迫的唯一理由，就是说在国民政府之下，外国的侨民不能继续经商。而我们自己的民众，也常常误解了打倒了帝国主义的意思，以为打倒了一家洋行，或打倒了一家商店，就是整个的帝国主义授命之时；这种误解，不但于打倒整个的帝国主义的运动没有利益，更可以说多少还有点妨碍。如果退却的策略，可以纠正湖南、湖北一部分民众的误解，是应该作的；如果退却的策略，可以使帝国主义的国家的人民在国民政府之下安全营业，也是应该作的。所以现在所谓的退却，就是要使外侨在国民政府所管辖的各地有不受限制的去经商的权利。这个办法，不但于国民党及革命军的前途有莫大的利益，就

是于工人自身也有相当的好处。我们看看：自从汉口中外交通断绝以来，失业工人的数目逐月增加，建筑工人失业的有四万，砖瓦制造工人失业的有两万，只这两项已六万之多！而因为来往的船只一天比一天少，码头工人失业的也是很多。据外交部接外国商人的报告，说他们运货来时，常被劫掠，都是失业工人所作的事。工人失业者既是这样多，铜元的价格又飞涨不已，所以工人的生活，实是困苦万状。同时，又有许多流氓、地痞、反动分子乘机扰乱，处处都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所以在交通未恢复以前，武汉的市面很难有安全的秩序。这个退却的政策，一方面是要减少我们失业工人的数目，苏解失业工人的困苦；一方面要使帝国主义者无所藉口，他们的人民不至于赞成他们的政府对于我们的武装干涉。根据种种的理由，所以本席用书面提出了五项办法。至于集中现金的政策实行以后，工人因纸币跌价所受的痛苦，可由财政部拨三万元的铜元与总工会，使他们按照原来的市价兑换。商人所受的困难，就是上海、汉口间的汇兑问题，但可以在上海找一两家银行（按：指定为上海之苏俄远东银行——编者），同中央银行发生关系，由中央银行汇一笔款项存在上海，专为开发汇兑。总括起来说：我们现在已为反动份子所矣，一时没有力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能不向后退却，使他们没有一点藉口。所提议的是（否）有当，请大会公决。"

……

本席认为裁判所由工人自己组织效用要大些。这不是法律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

（鲍罗廷提出五项办法）

"㈠政府与工会人员合组一委员会，其目的在执行工人

中之革命纪律，同时由工会组织裁判所，审判并处罚违犯革命纪律的工人；㈡由政府与外国银行商店协商，使他们在湘、鄂、赣、皖南、豫南、西至于万县等处，都可以公开的贸易，并由政府与工会代表组织委员会，执行政府与外国银行商店所定之协商。此委员会有调用纠察队与武装势力之权；㈢除得第二条所规定之委员会同意外，外国银行商店中工人不得自由罢工；㈣政府应可能力量，迅速规定铜元及一切必需品之最高价格；㈤立刻设立失业局与失业者饭堂。除这五条之外，还提议财政部要拨三万元之铜元与总工会，使一般工友可以按钞票停兑以前之兑价换取铜元，但每人一次所换之铜元，应有一个限制。”

（摘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4次会议记录》，油印本，1927年。）

怎样解决土地问题*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土地问题的解决，可分两方面，(一)国民政府内的，(二)非国民政府内的。在非国民政府内的暂时不能定很详细的办法，在国民政府之下的，最重要为实行农村自治的建立，必有强健的农村自治组织，才可以执行解决土地的办法，不至发生毛病。目前的困难，在避免因土地问题所发生的不好影响。现在对土地解决的办法限度虽低，亦必发生困难，因农村政权不在农民手中，因此最先要建立农民的政权，使农民政权受党的指挥，故目前首先要实现以前所议决的地方自治，马上要农政部赶快成立，规定农村自治条例。解决土地问题，须要根本的解决是不错的，但怎样的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恐不易有具体的方案。应设专门的机关研究这个方案，应该先在国民政府之下，成立专门机关，农政部须根据科学方法，研究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用党部名义，提出省民会议，议决后，成为单行的法令，在各省施行。湖南省民会议，在五月底便开会了，现尚有一个月的时间，农政部应有一种具体的方案，提出省民会议通过后，湖南的土地问题才算有了解决办法了，湖北的问题亦是一样。湖南的同志，或者不大满意，以为时间久了，不能久候了。这是当然的，我的答复是在这一月之中，把湖南农村自治完全建立起来，预备解

* 此文系鲍罗廷在武汉土地委员会第五次大会上的发言。——编者

决土地问题。这就是说湖南的同志，在一月中间，应积极成立农村自治机关，到省民会议，通过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后，即可实行。湖南现在的情形是老的组织已经破坏，新的尚未成立，在此情形当中，要解决土地问题，必定有困难的。在新旧政治过渡中，解决土地问题是极困难的。故湖南的同志，应该赶快成立新的政治机关，否则不能解决土地问题的。目前需要一个乡村自治机关，能够维持地方的秩序，办理乡村的教育，代政府征收租税，那一处有此机关成立，那一处即可实行政府所颁布的种种法令。我以为现在要（一）望农政部赶快成立；（二）求农政部对中央议决之农村自治组织，赶快去组织；（三）希望农政部协同湖南省党部，规定解决土地方案，提出省民会议，湖北亦一样；（四）调查各省土地分配情形。解决土地问题应有详细的办法，广东的同志应受党的训令，根据这个提案的内容，向农民宣传。其它各省亦同样的办法。反动各省应从下层造起，去推翻反动的势力，但在国民政府之下，不能如此造法，应一方面组织下层的民众，一方面由政府协同农民讨论解决的办法，因此国民政府下与非国民政府下的办法，是有些不同的。

（原载《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土地专号，
1927年6月。）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六日）

汉阳县党部违背了处分逆产条例是一个事实，应将他们所作的行为一概取消。由中央令公安局发还所封的财产，将所捕的两个人交司法部处置。至于他们违法的行为，应予以警告或解散。在本席个人的主张，要将汉阳县党部解散。因为革命最注重的是纪律，汉阳县党部近在咫尺，竟敢违背中央保护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则离中央较远的地方，更要不服从中央的命令。这种解散党部的举动，因为少数同志不明了合法的手续，不能执行中央的政策，乃是革命时期中常有的事，并非开除他们的党籍。

……

商民部预备了几种宣传文字，请交代审查，如果同我们的政策没有冲突，就可发表。

……

民众团体可随时提出要求，但汉阳县党部应明了中央的态度，不然如何还配领导民众。

（摘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油印本，1927年5月。）

第二部分

关于鲍罗廷的评论和回忆

陈独秀谈鲍罗廷

（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九年）

〔I〕

……我们党中的“左”稚病——我们同志中“左”稚的现象约有数种：……

……

（4）否认左派存在。这种完全否认左派的思想，特别粤区的同志最厉害。他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至于左派呢，亦没有这回事。”还有鲍同志以为，真能解决农民问题，只有解〈决〉土地问题。因此他说：“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才是真正左派，现在国民党中无左派。”这是一种新奇的逻辑！否认左派的结果，我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与右派合作，一是退出国民党而领导群众和国民党冲突。这两条出路都要不得，我们的出路只有留下国民党中联合左派和右派争斗。鲍同志这种错误见解的原因：一是所定左派的标准太高；二是忽略了中国目前争斗的问题。中国目前的争斗是要继续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和反军阀土〔地〕主劣绅土豪的民主运动。在国民党中谁完全赞成这两个运动的就是左派，否则便是右派。因为国民党的左派必须是民主主义者，若只赞成反对帝国主义而不赞成反对军阀、地主、土豪劣绅的人，便是封建主义者，当然是右派，这种右派分子，在国民党重要人

物中还非常之多。解决土地问题，当然是对地主土豪最后的打击。可是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在宣传上自然可以由目前争斗的这些问题，引申到根本的土地问题。若是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做争斗口号，便是停止争斗。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党左派标准，自然是没有左派。减租减息等目前的争斗，在农民群众中，比解决土地问题更是迫切的要求，赞助这些要求的国民党左派之已经存在，比希望有一个赞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左派出现，更合于事实。因为想象未来更左的一派而否认现在的左派，便等于专候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白菜豆腐维持生活看做不必要。

……

（摘自陈独秀《1926年12月中央特别会议上的报告》。载《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一九二二——一九二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

〔Ⅱ〕

……他（指鲍罗廷——编者）的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

在此时期前后，中共所染机会主义还不很深，所以还能够领导二七铁路大罢工（一九二三年）和“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都未受国民党政策的牵制，并且还严厉的批评国民党的妥协政策。“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一抬头，便惊醒了资产阶级，戴季陶的反共小册子便应运而出了。是年十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我在政治决议案委员会提

议；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势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致严厉的反对我的提议，说这是暗示中共党员群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

次年（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变，正是执行了戴季陶的主张，在大捕共产党，围缴省港罢工委员会，苏俄视察团（内多联共中央委员）及苏俄顾问的卫队枪械后，国民党中央决议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分子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员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册缴存国民党，我们都一一接受了；同时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琛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这一时期是最严重的时期，具体的说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的时期，是无产阶级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资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甘心作它的附属品之时期（国际代表公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党到了这一时期，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极左派，而开始堕入机会主义的深渊了。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其势必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

策，获得群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说："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与退出英俄职工委员会，已经是两个错误，现在又发生第三个错误，中共主张退出国民党"。一面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

……

我于四月初到汉口，第一次会见汪精卫，即听到他一些有反动倾向的言论，和上海谈话时大两样。我告之鲍罗廷，他也说是如此，并说汪精卫一到武汉，即受了徐谦、顾孟余、陈公博、谭延闿等的包围，渐渐和他疏远了。蒋介石李济琛相继屠杀工农后，国民党日益看轻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汪精卫及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的反动态度与政策日益发展，我在本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和我们所争的，表面上好象是这样或那样的各个小问题，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会议上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报告。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乃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同时我和秋白谈论此事，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

……

（摘自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蔡和森谈鲍罗廷

（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一年）

〔Ⅰ〕

……

一 机会主义下的中央政治局

……

不久湖南许克祥的马日事变证实（但中央特派员李维汉同志及湖南省委始终无报告来），老鲍异常焦急，急欲与平山及国民党中央所决定的查办代表团（老鲍、平山、彭泽湘、陈公博及唐生智代表二人）赴湘，一面查办许克祥的叛变，一面查办农运的过火。此事是老鲍决定的，鲁易是反对的。结果老鲍偕此查办团行至岳州，许克祥来一逮捕与就地枪决之电，六人皆逃回武汉！老鲍这种主张当然是很错误的：（1）查办农运过火是原则上的错误；（2）不想用武力去对付反革命，而想用合法手段查办反革命，根本是笑话；（3）“单刀赴会”的故事演不成，结果更丧失了所谓国民政府及老鲍的威信，反革命愈益张目。鲁易反对是对的，可是鲁易也只知消极的反对，并提不出积极的办法。

在有一场政治局会议上，鲁易与老鲍各自发表长篇的演说。老鲍的大意是：（1）现在国民党的左派还是好的，他们

没有甚么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2）我们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合作是中心的问题，假若现在我们与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完全的失败，我们将甚么也没有；（3）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便是指与他的现在的中央合作。国民党的中央现在还是好的，离开他的中央，或推翻他的中央，这不是决裂便是政变。现在党内有此危险的倾向，应攻击此倾向（暗指鲁易）；（4）农民运动只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等，便是我们的胜利，便是土地革命；（5）C·P·中央及一切工农会现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最近所公布之一切取缔民众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

鲁易的大意是：(1)现在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已经不是左派而是土劣、地主、军阀的代表，我们应号召左派群众起来推翻他们；（2）推翻国民党现在的中央，并不是根本决裂与政变；（3）我们现在应一直到工农民主独裁制（未多说理由）；（4）C·P·中央应发宣言，反对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近日所公布之一切反对的法令，在这些法令中不仅反工农运动，并且保护封建制度。

鲁易之后，和森发表的大意是：“我们听了老鲍和鲁易的演说之后，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和政治路线。在老鲍的演说中，有些动听的办法是可宝贵的，但试拿以国际决议案相比较，则完全与其原则相违背：如国际决议教我们实行土地革命，而老鲍则教我们只要做到减租减息便是顶好的土地革命！又如把一切罪过通归于工农运动过火，而认现在代表土劣、地主、军阀的国民党中央一点不好的倾向也没有，反教我们去拥护他们咒骂民众运动，取消民众运动的法令；这样，还有

甚么原则？至于鲁易同志所说的一切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宝贵的，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每次开会都象上课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这是不够的。代表土劣的国民党中央已经不是左派，我们应当推翻他，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我们对左派群众的工作还是一点没有准备。现在要一声呼喊与国民党中央决裂，事实上不是政变也要发生政变的。至于鲁易忽然提出工农民主独裁制，也与国际决议不相合，是否国际有所改变，应请说明。以我看来，老鲍是有办法而无原则，鲁易是有原则而无办法……。”

秋白同志接着说道："和森同志的批评是很可笑的；在他看来，仿佛鲁易与老鲍之间，一个懂得'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原则，一个不懂得'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原则似的。其实老鲍与鲁易在根本原则上并无不同，只是对于国民政府内资产阶级的成分是否完全排除的估量上有点不同。在鲁易及莫斯科的同志们以为中国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业已成功，国民政府内已经完全没有资产阶级的成分，所以认土地革命可以尽量实行。老鲍则认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还未成功，因国民政府内还保留许多资产阶级成分，所以土地革命不能彻底实行。我（秋白自谓）也觉五次大会决议关于这一点没有指明，太把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说完全了一点，仿佛此联盟完全成功了，没有资产阶级成分在内了，这是一个缺点。"

在有一场政治局会议，独秀同志在报告中报道："我昨日与老鲍谈话，老鲍指出湖南农运不是我们的领导，而是地痞与哥老会的领导。这样怎得不糟！"这个新发明在不接近群众的中央政治局看来，真是动听。由此农运的"地痞论"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国是；每一个农民运动的通告除了抄写一些国民

党咒骂农运训令之外，一定在组织方面要禁止地痞做农协委员，一切农协委员皆应由在业农民、未离开土地的农民来担任。这个也成为天经地义了！

……

第二期北伐有一点好处，便是将唐生智在两湖的主力军调出三分之二于河南。假若我们有先见之明，乘此时机准备两湖暴动，用自己的势力来巩固两湖根据地，来实行土地革命，来改组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老鲍根本无巩固革命根据地和实行土地革命之志愿，不必责备他。鲁易徒有此志愿而完全不知利用北伐出发后之形势，消极方面只知反对北伐，积极方面只知要取广东。老鲍无异抛弃两湖想西北，鲁易无异抛弃两湖想广东！广东与西北虽不同，其忽视两湖是一样。

……

二　政治局的后一阶段

政治局的后一期，完全表现是一种指导破产的阶段，老鲍于武汉军撤回之后，又极力拉拢唐生智经营东征，以为唐生智野心勃勃，未得东南之时还不致与我们决裂，他再三申言“我的箱内还有草（指苏联对武汉政府之借款），他（指唐）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致跑掉。”由此引起政治局对于撤回武汉的唐生智之最后的幻想；以为夏、许之变，唐不是主谋，相信他回湖南或者有几分诚意解除许克祥亦未可知。

……

过去一度拟议之发动群众去攻击国民党中央的反动，这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呢？说来也可笑，便是只在“欢迎铁军凯旋”的停工之下，湖北总工会违反修改罢工案的精神，发了

一些反抗国民党政府纵容许克祥的宣言，和打倒许克祥及朱培德的标语。这些激烈一点的表示是总工会负责同志刘少奇等经过中央秘书厅的同意做出来的。可是这又做错了，得罪了汪精卫。汪精卫见着总工会的宣言，知道这一日实际是罢工反抗他们的；他一见老鲍和独秀流泪切齿的说："吴稚晖曾警告我，'你日后上共产党的当时，记得吴某的话。'我是一个文弱书生，其实他们（即指总工会）何必联络武人来倒我！"所以到七月一日中央在武昌开扩大会议时，独秀的政治报告中犹指此次罢工的"激烈"表示，是开罪国民党左派的主要原因。老鲍尤其深恶痛恨这一日的罢工表示。

前此一度拟议提出"进攻的政纲"与国民党公开谈判的事怎样进行呢？说来更可笑；不仅没有进攻的政纲，即鲁易所拟之最低限度的政纲，也难通过。老鲍坚决的主张在此政纲中：（1）不要提土地革命；（2）不要提武装工农及工人纠察队；（3）此政纲专为适于东征之用，应特别提出一些有利于"工商业者"资产阶级的条文；（4）把过去一切取缔店员，取缔工人，取缔农民，取缔童子团及取缔一切民众运动的条文都综合上去。

此时不提土地革命的理论是："现在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冯玉祥一齐叛变，左派与我们的关系千钧一发，还同他谈什么土地革命，谈更无益。现在只有东征才能跳出此危机。故一切较高的政纲都待打到南京后再说。"从前北伐是唯一出路，现在东征是唯一出路；从前主张打到北京后再实行土地革命，现在主张打到南京后再提其他问题。前后照应，一气相承，这是西北学说的精神！

此时的实际情况是：（1）国民党中央公开的袒护许克祥与朱培德，说许是代表全社会反对农民运动过火的，说朱驱

逐C·P·及左派的办法完全是对的；（2）冯玉祥仿行朱培德办法，驱逐C·P·及政治工作人员出境；（3）朱、冯之举皆先得汪、谭、孙科、徐谦、顾孟余等之主使与同意；（4）汪精卫等对各处被逐来鄂之左派分子表示，C·P·问题待七月十五日之中央会议正式解决；（5）汪精卫孙科极力勾结唐生智经营东南，欲完全取消三大政策和一切民众运动，以博东南资产阶级之同情；（6）唐生智部下将领以何键为领袖，公开宣言不分共不能东征，不愿意为C·P·东征；国民政府升许克祥为师长，马日事变之湘省政府主席张翼鹏为参谋长，中央军委直接发电拉拢夏斗寅；唐生智回武汉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完全成为唐生智的机关，汪精卫是他的"新欢"小老婆。

在此情况之下，我们只有两条出路：或准备暴动，提出一进攻的政纲与所谓左派公开谈判，谈判不遂，即公开宣布左派叛逆革命的罪恶，将其政府与中央推翻而改组之。或是完全投降，赞成修改或抛弃三大政策，停止工农运动也可以，分共也可以，只要你在南京未打下以前，不驱逐或屠杀C·P·，在此条件之下，还可合作东征，还可给草与国民政府及唐生智吃。

前一出路，在鲁易初提出进攻及罢工示威时，有此倾向，但不到三日即被打消。在此情况之下，自然只有由鲍罗廷同志领导我们走后一条路。所以此时显然不需要一个进攻的政纲，只需要一个投降的政纲，即不提土地革命，不提工农武装；而只加重取缔工农运动之过火，把武汉政府一切赤色的标志皆涂黑，由此去博得东南"工商业者"之同情，我们暂时受此委屈与他们合作东征，待东征成功度过现在的难关，然后再与他们谈别的事情。老鲍的意见完全是这样的。所以此时他所亟亟经营的只是拉住汪精卫、唐生智来吃他的

草，交换条件只是要他们答应在东征时期暂不实行分共，此案暂时保留到打倒蒋介石后再说，希望他们在各将领间去疏通疏通。可是唐生智直接间接的答复是怎样呢？"对呵！我也是如此想，分共案最好保留到南京打下后再讨论。无奈这些纠纠武夫不听我的话，只听何键的话。所以最好还是C·P·顾全大局，自动的解决这个难题！C·P·须知现在也非常危险，我也拿不住我的部下！"这是甚么意思呢？这是要C·P·自动的退出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免得武人动手，因为"我也拿不住我的部下"。这个意思开始还是暗示，后来汪精卫、唐生智公开的明说，汪精卫把谭平山请去，要他与苏兆征同志立即上辞呈退出国民政府；唐生智则提出优待的办法，送谭部长、苏部长出洋考察。老鲍对于后一办法表示可以采纳！

于是最后的买卖是很明白的：老鲍与C·P·所要的是在东征时期还不要实行分共；汪精卫与唐生智所要的是在东征时间还要吃草，还要请苏俄的借款快些汇来。"请你保留分共案到南京取下后再谈呵！""请你电催苏联借款迅速全数汇来呵！"这是最后的交易。

老奸巨滑的左派政客与新军阀还要讨些便宜，是很显明的。在我们"东征时间不要实行分共"的语气中，也要看出"实行"是不愿意的，但"议决"分共或许是可接受的，横竖这是个实际问题，他们的决议不过是句空话，他们那有势力来管理党部和民众团体，在东征时间，他们尤其无此力量，而且他们互相间的冲突还多呢；即使他们现在决议分共，待打到南京，情形变换，难道不能再作道理？这种空气从老鲍起，在政治局中是可感觉的。假使后来国际训令不来，也许引领我们这样去投降，即一切草料给他们吃，让他们议决分共，待打到南京后情形变易再作道理。

鲁易在他所拟的最低限度的国民革命政纲中，仍然提出土地革命、工农武装、惩罚反革命及讨伐广东。这些都是他与老鲍不同的。至于对左派关系及综合过去所决定之限制工农店员要求等具体条件，都没有不同的意见。鲁易自从上次受一打击后，再也不提进攻和准备决裂了。他此时的精神，似乎趋向于经常的合法的政治路线：（1）想极力拉住汪精卫为左派中心；（2）想扩大左派武力，以邓演达、张发奎为中心；(3)想在白纸黑字上维持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的原则；（4）湖南反革命问题要求国民政府惩办；（5）对于东征未表示反对，但仍提出南取广东。事后追论，鲁易始终不失为一个书生，原则是在纸上维持着，实际问题一个也未见到。此时的实际问题是"决裂"，是"暴动"，是以群众的势力没收土地，武装工农，是以群众的势力推翻假左派而建立群众真正的左派和政府；维持原则的政纲之作用不过在用以公开谈判，揭破假左派首领汪精卫等之假面目和藉以与之做正式决裂的口实与号召罢了。此等政纲只有是坚决的准备与汪精卫等决裂才有作用。鲁易既始终要拉住汪为中心，又始终要提出汪所不能接受的政纲，这是老鲍始终有力制胜鲁易之点。鲁易的主张始终是矛盾的，老鲍却是始终一贯的，因为他的主张始终是顺从汪等的心理与需要的。始终要拉住汪是老鲍与鲁易相同的；但鲁易始终愿做汪等的头，老鲍始终愿做汪等的尾。结果鲁易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老鲍是"既善顺随，又会揣摩"。

现在再叙述些别的事情：

鲁易所拟扩大左派武力的计划实行了么？没有实行。此计划原本不始于鲁易，在前一期的常务会秘书厅即有此决定，但未实行。邓演达随从第二期北伐出发后，中央军事委员会

之权落于谭延闿、程潜、孙科之手，他们大大缩减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之经费并拟遣散教导团或归并于各军，这完全是向邓演达进攻的。我们曾几度计议打破此阴谋，故在郑州将下时派国焘同志前去河南，与邓商议此事，并谋左派之新团结。然邓演达自讨论土地问题时受谭、唐、程、孙等大众之排斥，不得不离开武汉，随军出发，故他异常消极，且受托洛茨基派俄顾问的影响，倾向有第三党之说，即取消C·P·与国民党左派合并组织第三党。其实也是空话，他只是消极悲观。现在鲁易是想扩大张发奎的势力，此事老鲍坚决反对，因此C·P·中央军部负责同志及中央政治局多数亦坚决的反对，以为这个意思一露出，唐生智等马上就要和我们翻脸，何键马上即会暴动政变。但是鲁易终不死心，竟把此意完全告知汪精卫。

……

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既然如此混乱，鲍罗廷主义之一贯的领导愈益促进了混乱动摇和犹疑。有一日老鲍出席于政治局会议，发表他关于中国C·P·之目前任务的主张，大意是说：“中国C·P·目前的任务不要以为只有土地革命是革命的工作，例如现在中国有这样广大的失业群众，假若能把这些失业群众组织起来也便是一件顶革命的工作。又如小资产阶级看不见他们自己的痛苦是由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经济封锁，我们能领导工农向他们让步，工农让步之后，他们的痛苦，依然如故，彼时他们便能觉悟到自己的痛苦是由帝国主义及经济封锁来的。我们能使小资产阶级不怨恨工农也便是一件顶革命的工作。总之现在中国C·P·应从各方面多做些有效的事情，令人看着佩服……”，这些教训只有使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乱和动摇。这些教训在现在看来完全是一种回避土地革

命的改良主义。

老鲍在另一政治局会议发表他对于土地革命的意见：他公然说明“土地革命不即是没收土地”。照他的解释，土地革命的意义和内容是：（1）减租减息；（2）乡村自治；（3）保护佃农；（4）武装自卫；（5）办农运讲习所，从新养成不幼稚不过火的农运人材。当时独秀说：“老鲍这种办法好是好，但是修改了国际土地革命的意义。”秋白说：“这不是修改国际土地革命意义，按照中国目前的状况确实只能如此做。”照老鲍的意思看来，武汉国民政府已算是质土地革命的了，因为上列五项事情几乎皆已办到，而且在未出发北伐前的广东国民政府即已办到了。老鲍一直到底灌输这种改良主义于政治局，怎得不使我们迷离失所，此时大约国际有电报来调鲁易回去，鲁易已不管事了，老鲍每次都能出席于政治局的会议。

鲁易亦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便是中了“汪毒”。他还想拉住这个唐生智的小老婆（汪精卫）来做左派的“中心”，来扩大左派的武力，他竟把国际来电和盘托出告知汪精卫！国际来电的要点：（1）农民自动的没收土地；（2）武装C.P.五万人；（3）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4）组织革命法庭，严惩一切反革命。这个电报怎能告知这个逆迹昭著的叛徒?!汪精卫知道这个电报之后，谢谢鲁易，跑向唐生智及其部下将领大大的鼓动起来，说第三国际及C.P.即要解决国民党及其一切军队，实行共产革命。在这个严重的错误之下，中央政治局全体反对鲁易，大约老鲍也有电致国际，所以国际调他回去。

假左派叛逆的计划是已确定了的，所犹疑的只是用甚么口实来“分共”，公然抛弃三大政策么？这个太傻。为民众运动的过火么？更揭破了自己的假面具。这对于虚伪的叛徒确

是一个难题，使他们不得不犹豫。汪精卫曾拟行一苦肉计，于七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前赴九江，名为与朱培德会商东征，实际让何键发难开刀，自己避免分共和破坏三大政策之恶名。现在好了，谢谢鲁易先生，为他们解决这个难题，使他们于苦肉计外寻得一更好东西，便是所谓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消灭国民党的阴谋。

现在严重的情形到了最后一阶段：（1）冯玉祥来电驱鲍，分共；（2）何键露布讨共檄文，并发讨共通电于全国；（3）叶琪、周烂（唐部下）名为回湘查办许克祥，实际举办十路清乡，积极向农民进攻；（4）唐生智回乡之日公开反共，将马日事变责任完全推于C·P·身上，公开枪决我们二同志；（5）何键等公开要求C·P·分子立即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要求解散一切工农会、纠察队、童子团及妇女团体；（6）何键之三十五军移驻汉口，其势汹汹，企图开刀。这是六月底的情形。

…… ……

翌日仍回汉口开会于鲍宅，是日才知道这两日中因解散纠察队和中央秘书厅未迅速发迁移通告问题，同志间精神大形混乱，有几位同志激烈反对中央移于武昌，理由是："我们是领导左派的，左派首领尚在汉口支持革命的局面而向前进行，而我们反离开他们藏到武昌去，成甚么话……"。独秀也以为必须仍回汉口，才便与汪等接头，于是又决定中央机关仍回汉口。同时正式决定七月一日开中央扩大会议。

翌日又开会于鲍宅，老鲍出席做了一个很长的演说。大意是：（1）现在国际方面有一种空气，认我们中国党有改良主义，其实此改良主义并不存在，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鲁易十倍以上的革命；（2）中国现状在客观上是很有利于我们的，

在客观上无产阶级本有取得领导权之可能，例如蒋介石一直到现在并未真正取得群众的领导权，他不过是侥幸成功，机械的用炮火把我们的势力打落下去，可是我们主观的力量没有成熟，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农民（是地痞领导的），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工人，我们不能组织广大的失业军，所以我们不能取得领导权；（3）斯大林主张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对的，可是斯大林他所接受于季诺维夫（国际第七次扩大会前的委员长，反对派首领）的遗产太坏了。以前季诺维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大约指魏琴斯克），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于实行。老鲍做这演说时是很精神的。

独秀接着说："以前季诺维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驼背毛子与少年国际代表则提出一反对老鲍演说的决议。指明第三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方针前后是一致的。从前季诺维夫的政策是经过俄国C·P·中央批准的，不是季诺维夫个人决定的。老鲍巧得很，反指他们是帮助季诺维夫说话，是帮助反对派。

老鲍上面这个演说全是文饰自己的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也是他的起身炮，留下一个中国反对派的理论基础；国际方针前后是两截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国际负了责任。也就是说中国党没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国际以前的政策才是改良主义机会主义。老鲍不说布哈林领导的第三国际"不懂中国情形"，不说斯大林领导的俄国党中央"政策太左"，而把一切罪过归移于季诺维夫，实际便是把中国机会主义的责任归于第三国际，而自己表面反似站在维护斯大林的立场说话。

"我们主观力量没成熟"这句话在西北学说的字典上来

解释工农运动过火，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工农，一言包括，便是我们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太不成熟。若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典来解释，便是我们指导机关社会民主党化，迷信民族资产阶级，回避土地革命，以致不能取得领导权，一言包括，便是三月二十日以来的机会主义太成熟了。

最后的破产到了：七月一日武昌的中央扩大会是五次大会后机会主义的总结。但这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秋白主持的决议和说明中，不过是两月以来（五次大会后）动摇、犹疑，回避土地革命，向所谓左派让步政策之总结罢了。

三　五人政治局至“八七”会议

不知道是七月初几（和森于七月二日大发旧病，三日由国焘通知说常委决定和森送入医院养病，愈后即去九江有事），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不日秋白、立三赴九江，老鲍亦赴九江。常委又大掉换两湖工作同志，以为大反动到来，一切过去知名之人皆不应留在原地工作，如向忠发、项德隆等同志决定去俄，毛泽东等则决定派赴四川等。因此许多活动分子认为是“散伙政策”。同时常委决定，中央机关立迁九江而转上海，亦更增加同志之惶惑。

大约国际责斥机会主义调回老鲍及改组中央之训令已来了许久，老鲍秘不发表，中央移武昌时，驼背毛子所携致国际电稿内有“……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指导权。……”之语，我们莫明其妙。此后老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及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

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为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原先我们莫明其妙。

此处老鲍又犯了最后的严重的政治错误：（1）假若老鲍早将国际训令发表，何至七月一日武昌中央扩大会犹在那里贯彻那回避土地革命向所谓左派让步的破产政策；(2)假使老鲍在中央扩大会议时将国际训令发表，我们能于七月一日决定一与假左派决裂的方针；彼时唐生智、汪精卫与我们决裂的阴谋尚未成熟，势力还未完全集中；我们在鄂豫交界的张兆丰同志（属方振武）之一师二旅劲军还未被解决；张发奎（此时与唐甚冲突）、贺龙、叶挺及军事政治学校之军力皆集中武汉，工农民众冤屈愤慨，正是积久待发；假若此时决定与假左派决裂，便是决定我们在两湖以至江西之暴动，何致待至八月一号才在南昌发作呢？（3）老鲍临行犹给一种“逃跑主义”，“散伙主义”于五人政治局，以为“大反动临头了，中国的一九〇五年到了”，以至使此临时政治局开始即全无斗志，怀疑国际训令。所以老鲍不发表国际来电，敷衍国际之罪小，而延误我们的新方针之接受和新政策之执行其罪大！及至七月十三日的前几日，老鲍才提出国际来电以C·P·中央名义发表一批评式的退出国民政府的宣言（国际来电是要我们示威的退出），此宣言之末尾还有“希望”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的幻想。然此宣言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当时王荷波同志说：“我们工人看了此宣言，虽然未扬眉，但觉吐了一口气——晦气。”

（摘自《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载《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II〕

……

一九二五年的革命高潮，推动中国党开始由知识分子的小团体变为工人群众的党。党在这一高潮中起了相当的组织的和领导的作用。这一高潮首先就是证明中国无产阶级之领导的能力与作用，打破陈独秀马林以至鲍罗廷等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势力之不相信和轻视。陈独秀在相当的短时期中，似乎多少变动了对于革命动力的机会主义观点。可是一到五卅末期——张学良出兵镇压上海工人，郭松龄事变及吴佩孚攻取河南之后，又使陈独秀对于工人阶级势力发生悲观，对于时局发生不正确的估量。他同魏金斯基立刻修改以前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政策，由此以至武汉时期就实行陈独秀主义之机会主义的实际政策。

第一、改变只要左派国民党的方针（坚决打击右派，削弱中派和强大在中共领导之下的左派），号召国民党右派合作，并送右派首领回广东，这是三月事变的主观原因之一。

第二、对三月事变完全采取无原则的退让政策，并实行乡村联合战线的机会主义策略，阻滞广东的土地革命。

第三、北伐开始后，即将独立的工人运动隶属于蒋介石所要挟的民族利益之下，实行阻止和削弱罢工运动的方针；同时扩大乡村联合战线的口号，去阻滞湖南高涨的土地革命。

第四、在上海工人三次暴动中实行“帮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工人阶级只要政治自由”的孟什维克策略。

第五，对于已经开始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代表蒋介石采取卑鄙的屈伏〔服〕退让政策。

第六、北伐出发，鲍罗廷同陈独秀完全把广东交于李济

际，盛行“以甲制乙以乙制甲”的小政客式的上层政策。

上面这些机会主义的实际策略，就规定了一九二七年四月间上海和广东之大失败。

现在再看武汉时期陈独秀主义之实际政策。这一时期，陈独秀主义与鲍罗廷主义混合起来，有名的西北学说的理论与实际成为陈独秀主义之变形发展。他的主要内容是：(一)回避帝国主义离开东南工业中心，接出冯玉祥同到西北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二)停止土地革命，等打到北京后再说；(三)取消所谓工农运动的过火；(四)向小资产阶级让步；(五)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权，共产党在政治上完全处于隶属地位；(六)完全向汪精卫，唐生智投降，自动的承认退出国民党和其政府，以换得共同打到南京去（详见我的«党的机会主义史»）。

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之断送于陈独秀主义及其变形的西北学说之手，难道还不显明？

……

陈独秀把自己装做是革命势力“保全者”，极力咒骂八七以来共产国际与中共新的政策如何牺牲了干部、如何丧失了革命势力，那么我们首先看他在武汉政变时用什么政策“保全”革命势力；他同鲍罗廷规定投降的政策来“保全”革命势力——自动退出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把一切革命领导权政权工农组织交给国民党左派，用“适合工商业利益的政纲”同汪唐共同打到南京去。上帝呵！假若此时没有共产国际坚决的出来打碎你们这一“保全”革命势力的投降政策，还有今日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党吗？还能取得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之唯一的领导地位么？你们自命为革命势力的“保全”者和反对盲动主义的英雄，实际你们只是可耻的投降者，顽固的叛徒。再看你们七月会议的大纲十一月的大纲(一九二七年)

以至中东事变后的大纲，难道你们革命势力的"保全"者之假面具还不显明么？

……

对陈独秀主义的性质阶级基础以及其前途之不正确的了解就要弄弱对于他们的斗争。比如鲍罗廷在讨论陈独秀主义时（在莫斯科中国科学研究院）开口便说："陈独秀主义与西欧的孟什维克主义有区别么？我以为在业已走到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欧洲孟什维克主义，与中国的孟什维克是一样的——这是不正确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承认在中国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而资产阶级已站在政权上，孟什维克已在中国起社会法西斯蒂主义的作用。不能断定中国孟什维克主义走到欧洲社会法西斯主义，因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是必不可免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所以说不上中国有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所以陈独秀与他的派别即中国少数派完全不要妄想他们与其欧洲兄弟——即帝国主义国家孟什维克起同样的作用，换过说，中国孟什维克没有任何前途"。

又有一个同志用书面这样的写着："假如我们现在再提出一个问题：陈独秀主义代表什么东西，他的社会基础怎样？那么我们明白看出一种回答，以为陈独秀代表将来的中国社会民主党——这是不正确的。社会民主党有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有工人贵族做基础，而且只有在财政资本和剩余赢利发达的地方才有地位。以为陈独秀和他的派别会成为中国社会民主党那就会错误。因为要做出这样的结论就须要设想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开始第二个资本主义时代。照我的意见他的社会基础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与中国资产阶级，一部分买办

资产阶级有关系的自由职业者学生等，另方面没有脱离半封建地主的关系。”

上面的见解可以说是补充鲍罗廷的。他们做出陈独秀主义与欧洲孟什维克主义的区别，在陈独秀主义不会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主要理由是中国不是财政资本的国家，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工人贵族等等。这种不正确的区别和否认，不仅是建立在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机械的对照上面，而且建立在对于中国阶级关系之不正确的了解上面。所以对陈独秀主义的性质作用及其阶级基础就发生不正确的估量。

……

以为指出陈独秀主义必然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就是设想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这样机械的可笑论证，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鲍罗廷主义近年以来显然趋向于完全否认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他把民族资产阶级通看为买办资产阶级。鲍罗廷主义对于中国的阶级关系又复活了彭述之主义的“新”解释。

鲍罗廷主义否认陈独秀主义之必然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这对于中国党与陈独秀主义的斗争是很有害的。鲍罗廷主义是陈独秀主义的兄弟。这一否认的意义就是辩护陈独秀主义。

……

最后不能不说到陈独秀主义一个重要的伴侣——鲍罗廷主义。武汉时期鲍罗廷主义与陈独秀主义混合为一个东西，此处不用赘说。现在所说的，只是一九二七年后，鲍罗廷关于中国问题最近的见解和态度。

在讨论陈独秀主义时（在中国科学研究院），鲍罗廷宣言

他在中国革命中的错误，在于他与陈独秀之间发生了重大不同的政见，而他没有把这不同的政见引到公开斗争；他宣言当时有广东路线与上海路线的对抗；他的结论是：假若他的路线与陈独秀的路线引起公开斗争，那就不会有武汉时期那样的失败。

不是一九二七年以后生长的人，大约不会相信鲍罗廷的话是真实的罢！然而不然，竟有同志公开出席替他辩护。可见鲍罗廷主义在我们党的队伍中直到现在不是没有保留重大的影响和残余。这一残余保留在党内终于有复活陈独秀主义的危险。所以在反陈独秀主义的斗争中决不能把鲍罗廷主义除外。

鲍罗廷在中国革命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假若说陈独秀是中国的蒲兰德尔，那末，鲍罗廷就是中国的拉狄克。所以他对于我们党内同志的影响不是不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看他对于中国阶级关系的新见解：

“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相互关系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当时垄断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经纪地位的，是以皇帝为首的高等官僚贵族……。第二个时期，……即你们所知道的买办阶级……。最后第三个，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时期，这一个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已在排挤第二时期的中间人，排挤买办阶级而开始与帝国主义发生各种相互关系”。

“……资产阶级企图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外是企图在中国创造一种条件，在这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更能密切与帝国主义联系。不仅在各大商埠条约上给他与帝国主义联系的可能，而且在全中国。换说一句即为帝国主义肃清在中国道路上一切的障碍，实现买办性质于新形式中，在新环境中，于极广大的范围中。”这在鲍罗廷主义的信徒看来，要算是极革命的极

响亮的高调了。看他的下文说些什么呢：

“讲到这一点还必须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完全是另外一个程序的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他要把中国工业化的大道上的障碍物扫除，准备同国内的封建势力以及与封建势力勾结的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资产阶级。”

“当我们说到民族资产阶级还极弱时，我们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指企图垄断中国与帝国主义间之经纪地位的资产阶级，而是有点工业资产阶级倾向的民族资产阶级，那末我们就应当说这种资产阶级现在还不能引导中国到工业发展的道路上去，因为这种资产阶级现在还极弱。”

原来鲍罗廷主义把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同化之后，还保留一“不企图垄断中国与帝国主义间之经纪地位，准备同国内封建势力及与封建势力勾结的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极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还极弱，还不晓得把中国引到工业发展的道路上去。而其将来怎样呢？这点他虽没有明说，但读者不难从他的观点做出结论，就是从鲍罗廷主义的中国阶级关系的观点非走到复活“民族资产阶级还有革命作用”的机会主义不止。

鲍罗廷接着上文就来估量无产阶级：

“这种资产阶级在中国现在是极弱的。由此就可明了中国无产阶级也充分的弱，数量太少，他的年龄，总共不过几岁。他的基本群众不在中国内地，而在租界，完全与中国隔离的香港一类的地方。在香港、上海、天津和汉口你们有工业无产阶级基本群众，而在中国其他各地，工业无产阶级在真正的字义上是很少的。”

鲍罗廷新的“租界无产阶级论”的论证仍然回复到自己

老的西北主义的结论，就是远居上海、香港等租界之中国无产阶级很难领导中国的农民，中国革命很难凭靠大城市的领导。所以在反动统治下，职工运动的工作没有什么前途，唯一重要的是农民游击战争。中国全体共产党都要加入游击战争，如欧洲共产党全体参加工会工作一样。鲍罗廷主义的根本精神，自始至终，如陈独秀主义一样，怀疑与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鲍罗廷主义不仅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有领导农民，领导革命的能力，而且根本不相信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有用自己的力量完成中国革命之可能。他说："中国无产阶级的缺点，在数量上，年龄幼稚上及其他方面，这些缺点之百倍的补偿，就在不能把中国革命，中国无产阶级从其他世界分开。假若拿中国无产阶级从印度无产阶级，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特别苏联的无产阶级分离起来，那末，自然不待说对于指导基本联盟的农民他要遭受莫大的困难。假若中国无产阶级是分离的，那末就很可怀疑到他是否能成就摆在他前面的伟大任务，即关于指导农民与封建残余斗争，与帝国主义斗争等等。但假若拿他与印度无产阶级，各国无产阶级，特别苏联无产阶级共同来看，那末中国无产阶级之必不可免的历史的缺点就百倍的补偿起来了。从这些的观点看来，中国无产阶级较强于中国资产阶级。"

这是多么漂亮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呵！托洛茨基不相信俄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有用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之可能，鲍罗廷却比较更进一步不相信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有用自己的力量成就中国革命之可能。

中国革命之社会主义转变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之必须依靠先进国无产阶级的帮助，尤其苏联的帮助，这是毫无问题的，中国革命之需要国际无产阶级帮助也是毫无问题的。可是照

鲍罗廷的观点，就完全是不对的。从列宁主义的观点，中国革命不仅有自己的充分的力量，而且他能促进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东方各殖民地革命；中国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强有力的理由，不仅在于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的观点上，而尤其在中国内部阶级势力之对比上。鲍罗廷主义完全与列宁主义相反，从他自己的阶级关系的分析，他断定中国无产阶级比中国资产阶级更弱些，只有在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观点上中国无产阶级较强于资产阶级。所以他把中国革命的命运完全建立在国际无产阶级的依赖之上。

鲍罗廷主义的信徒以为鲍罗廷同陈独秀“根本不同”的地方就在鲍极看重农民势力，着重游击战争；纵然他在武汉时期与陈独秀共同阻止了土地革命，而现在他却与陈独秀“根本”相反，他“异常”看重土地革命。现在来看他对于农民问题的政见：

“现在说到农民方面。与农民的关系的问题，必须指出下列的根本要点：一、是不是真的在中国乡村中已发生这样的阶级变迁，其结果已使富农分化，而这富农已同着资产阶级组成南京的政权，所以需要与富农斗争。我不否认中国乡村有富裕的农民之存在。但是应当说明富农是什么，其意义就不能如我们（指苏联——森注）所了解的一样，不能搬运革命以后的我们所有的富农观念到在革命以前的中国所有富农的观念上去。这个不是一样的富农。说到中国农村，那就必然须要一个全体农民的共同民主的战线去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军阀制度，反对一切封建基础的上层建筑，反对帝国主义等等（以下大大地引证列宁——森注）。土地革命在中国只有凭靠在中国农村的统一战线上才有可能。”

此外关于国际状况，他做了以下的肯定：“无论怎样还没

有牢不可破的论证，证明在最近的将来，在太平洋上美与英日就发生武装冲突。美在中国将采取最谨慎的政策。"

上面一切的话都是从鲍罗廷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之"中国革命的前途"有名的大报告中引出来的。这是新的变态中的机会主义的大系统，是西北主义之继续发展：在中国革命的一切的根本问题上——阶级关系无产阶级领导权对农民的策略及革命前途等——是与共产国际和列宁主义的路线不能并存的。假若拿了现在的鲍罗廷主义与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九年以及一九二三年的一切机会主义去对照，便可看出中国革命中孟什维克路线之一贯的线索。这一路线的中心点，是在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和对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统一战线之孟什维克的了解：从隶属无产阶级于资产阶级（武汉时期以前），做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的尾巴（武汉时期），以至联合富农。假若陈独秀在一九二九年用托洛茨基观点来攻击中共中央之业已改正的联合富农的错误，那末鲍罗廷在同年就企图恢复以前乡村联合战线的机会主义策略与谭平山的"民族阶级"和统一战线的理论内外相应。由此不难推想：假若中国共产党真正执行反富农路线到底时，陈独秀主义便会同鲍罗廷主义一样暴露其代表富农的真面目。

（摘自《论陈独秀主义》，1931年9月10日，
见《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瞿秋白谈鲍罗廷

（一九二八年）

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革命，是必须得着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力量，甚至于短期间听他们的领导，听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蒋介石那时曾说，听鲍罗廷的话，就等于听总理的话）。

……

冯玉祥政变时，孙中山在鲍罗廷及中国共产党的"压迫"之下，才发表北上宣言及国民会议主张。当时他还要搬出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建国大纲（革命三期学说为中心的建国大纲）。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建国大纲并未通过的，也是因为鲍罗廷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压迫"。北上时他又要提出来！真是教不会的笨孩子！他的脑筋之中，象一般上等社会一样，是无论如何想不通的，在国会破产之后，明明看着上等人尚如此不够程度，那时无知无识的"四万万昏君似的阿斗"如何可以立刻使他们行使民权，选举国民会议？必得要无产阶级教给他。

……

时势是日益严重起来，蒋介石叛变后，共产党的政策虽然在第五次大会有许多决议，实际上最高政策是在另一条路上进行，是在第五次大会的背后进行。何况第五次大会决议的本身，只是蒋介石叛变之前的性质。将他们和国际第八次执委会决议相比，是有许多不同的。

最高政策谁在执行？一是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他是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及政府里的党团之实际领导者；一是国际代表罗易；一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独秀、和森、

维汉、秋白、国焘、平山、兆征、立三、恩来……)。三个领导之中，鲍罗廷是有一定的路线——退却的路线和缓土地革命，鲁易亦是有一定的路线——务必同着小资产阶级进攻；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实际上是没有一定的路线，因为他已经不能指挥群众，又因为他动摇于鲍鲁之间，又因为他内部有许多模糊的不同的倾向，而不能一致，但是实际上是倾向更右于鲍罗廷的占优势。

……

总之，当时对于蒋介石叛变后武汉之新形势问题，党内没有一致的意见。当时的意见有：

(甲) 鲍罗廷的——(一) 对帝国主义用应付政策，(二)"对小资产阶级"(所谓工商业者) 让步，(三) 对地主豪绅也让步，(四) 驱使"将军"去北伐——联冯以倒蒋；以此政策领导左派领袖反对武汉南京之右派反动势力。

(乙) 罗易的—— (一)对帝国主义亦用应付政策，(二)"对中产阶级"(所谓工商业者) 相当的让步，(三) 对地主豪绅阶级不让步，仅对小地主革命军人让些步，(四) 对"将军"则主张改组其军队，故不可北伐；以此种政策领导左派去进攻"深入革命"。

(丙) 中央的—— (一) 对帝国主义赞成用应付政策，(二)"对小资产阶级"(所谓工商业者) 完完全全让步，(三) 对地主豪绅也完全让步，认为土地革命尚须经相当宣传时期，不能立刻实现，对"革命军人"则联甲倒乙——结果还是北伐最好；最好是让左派去领导，自己让开些，使革命不至"超过时代"。

……

事实上，鲍罗廷与中央两种倾向的混合进行，便形成总

的革命势力溃败的形势。当时事实上的政策是，（一）为战胜蒋介石叛变后的困难，必须让步；（二）土地革命停止进行——甚至自己承认农运“幼稚”“过火”，命令新闻记者党团在武汉民国日报作文批评农运，农政部出布告，中央宣传部出宣传大纲，纠正自由行动的没收土地等的过火，赞成解散黄冈农民协会……（三）工人店员运动则制止过火，禁止汉阳工人没收工厂之行动，第四次劳动大会只以“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口号为中心口号……（四）决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党部及报馆须听国民党命令，不得有独立主张，须服从国民党之指导，……赞成解散“过左倾”的（共产党员主持的）国民党下级党部（如黄冈县党部）；（五）共产党员退出省政府（湖北），主张各地地方政权须尊重国民政府之最高权；（六）讨论到是否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其实在此之前，已经赞成国民党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查办，已经绝对与发动群众以改造国民党指导机关的意思相反，所以退出国民党便成后来自然的结论；（七）应该自动退出国民政府，使左派容易对付些，谭部长请病假，要限制工农会及其纠察队童子团等之行使政权；（八）对帝国主义则在武汉应用应付政策，在沪粤应挑起民族斗争以掩护阶级斗争；（九）北伐或东征以移转武人之视线，使不专注意于阶级斗争之剧烈——对蒋介石则希望东征或南伐去推翻他，至广东铁路工人与各县如海陆丰农民之暴动，则无丝毫领导，反而对上海决定工人加入工统会；（十）对小资产阶级，则事事听从之，象他们听资产阶级一样，以“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合阵线”，这和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全体会议，是完完全全相反的。

……

共产党中央却亦因张发奎的动摇而为最后的动摇。退出

国民政府是不成问题了。但是如何退出，是否同时退出国民党，如何与张发奎继续合作，还成问题。这时候，真正不能说有中央了。独秀的倾向与鲍罗廷的倾向，一直维持合作至今也不能不露裂痕了，邓演达是左派中所剩最后的一个，孙夫人也反对分共。鲍罗廷这时的主张：不退出国民党，领导这一部分左派〈分〉裂出国民党，反对汪精卫——这是他在十一条政纲后几天（七月某日）新变更的态度。他在十一条政纲之中，关于退出国民政府是反对独秀的主张的，是反对避嫌式退出国民政府的。独秀的主张是：是否索性退出国民党，"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而退出国民政府，并非反对汪精卫的示威的退出国民政府。谭平山呢，他这时早已请假，并登启事对国民党及豪绅地主抱歉，说"不能纳农运于正轨"，理应引咎辞职。独秀也反对他自由行动。总之，中国共产党中央已经实际瓦解了。"为减少政局纠纷起见，共产党亦可以允退出国民党，只要国民党此后还能继续革命并且给共产党及工农以自由"这一犹豫不决的思想与谈判，便是五次大会之政治局最后向国民党与世界告别的政见，便是中央重新从武昌迁回汉口的几天之内最后"奋斗"。鲍罗廷是反对这一意见的。十一条政纲是集机会主义之大纲，亦是机会主义之顶点，过此一往，机会主义自身已崩溃而粉碎，中央政治局也是不能不散伙了。

于是七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全体共产党员退出国民政府的宣言发出了。那时政治局已经最后决定缩小，付于其职权于推定之五人的临时政治局（国焘、维汉、立三、恩来、太雷）。

（摘自《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报告》，1928年6月1日，铅印单行本）。

李立三谈鲍罗廷

（一九三〇年）

……这在中国更是明显，中国革命更要与农民联合，可是党在第四次大会以前是没有农运的决定的，四次大会的决定还是经过广东党严重的斗争，因为广东党那时已有农民斗争，鲍罗廷已和孙中山谈土地问题，宣布农民协会组织大纲。不过，虽然有了农运的决定，但未提出土地问题。

……

争论中最表现明显的是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广东党很坚决的把许多右派驱逐，老鲍并开始准备反蒋，广东党的路线决定二次代表大会要有共党多数当选，在政治上、组织上占领导地位，这一路线很明显是正确的，……

……

当蒋介石的哀的美顿书要答复了，鲍罗廷提出他坚决的意见，认为原则上不退出，但必须以退出相威吓，当时国焘秋白是赞成这一意见，可是中央派去的彭述之是始终说要研究，每次会议总是没有结论，直到最后，由许多干部负责签字来提出这一意见。

……

五月十五日以后国民党变成蒋介石一人专政，以后就北伐。在北伐过程中广东党的总路线是要准备推翻蒋介石，积极准备我们的力量来反对资产阶级，鲍罗廷当时的计划确是向

着这一方向走。不过因为这不仅是广东问题而且是全国问题，所以在鲍罗廷起程以前要周恩来同志到上海和中央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拥护蒋介石还是打倒蒋介石。这一问题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意见是要打倒蒋介石。这一问题到中央讨论很久，而结论则是北伐，也不是拥护蒋介石，也不是打倒蒋介石。这是什么策略，这不是政党的策略。

……

陈独秀为开扩大会在一月也到了武汉，他和我们第一次谈话就说工人运动过火，他的理论是现在这样闹，把小资产阶级都吓跑了，不能这样干，但是武汉在鲍罗廷总路线之下，所以反对他的意见，这的确是正确的路线，……

……

不久，国民党政府南迁，准备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当时鲍罗廷还是坚决执行他的路线，积极准备打倒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这样布置，蒋介石到了武汉一看觉得没有办法，所以他马上回长沙去攻江西。江西打下后，蒋介石更加孤立，这个时候，第三次全体会议开幕，提出提高党权的口号，反对蒋介石军事专政，提出了土地问题，号召工农加入国民党，三次全会的决议的确是更左倾的。蒋介石从南昌到武汉，看到革命空气非常浓厚，革命力量非常强固，就和鲍罗廷来一个冲突，跑回南昌去了。此时武汉就更加坚决反蒋，同时蒋介石在南昌大发制裁共产党的论调。这一言论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报纸的欢迎，都用大号字登载。当时党一定要坚决执行反蒋，但是中央写了二封信给国民党，说蒋介石的言论要制裁我们，这是不是贵党的意见，还是蒋介石个人的意见。这还比较强硬的，但接下去就说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决定并没有违反，始终愿意合作的话。这里一方面还把蒋介石算在

国民党内，不号召国民党反对他，将他除外，采取一个坚决的指导态度，同时完全是一个示弱。

……

我要说到五次大会前后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对东征和北伐的争论，这是五次大会以前的事，北伐到了上海，马上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叛变，继续在“四一五”广东叛变，所以当时革命力量只有武汉。当时张作霖积极从河南进攻，所以就发生北伐和东征的问题，鲍罗廷同志就发挥他的主张，要北伐到西北去建立革命基础；……

……

如果党在五次大会后坚决执行国际上述的路线，则武汉不一定会失败，可是五次大会后整个中央都走到机会主义方面，鲍罗廷已经机会主义化，罗易也是处处动摇，因此党对于每个实际问题的处置，处处和国际指示相违反，所以造成武汉的失败。……

……

长沙事变后，谭平山鲍罗廷亲自出征，准备以政府手腕来解决，可是到了岳州就被挡驾折回，……

……

中央讨论马日事变时，罗易比较坚决。主张一定要发动一个武汉的示威，发动广大群众来反抗马日事变。但是老鲍和陈独秀坚决反对，以为这一示威是对国民党。当时一般观念是非常糊涂，主张示威是要的，但也有危险，所以决定把欢迎北伐凯旋和反对马日事变同时举行一个群众会。这不仅是机会主义，并且是非常滑稽，因为反抗马日事变就是要反对这般将军们。

……对于武汉工人运动的政策，也有一些不是如国际所

指示，完全尽了镇压斗争的作用。首先由老鲍发明革命纪律由总工会颁布。其次是童子团的缴械。童子团在武汉的确非常活动，陈独秀就大发脾气召集CY会议，大骂一顿要缴童子团武装。可怜得很，所谓武装只是一根木棒，结果是缴了械。……

……

这个时候鲍罗廷还提出一个原则，要党和国民党"共同决定，共同行动"，完全消灭党的独立性，所以两党联席会议变成国民党隶属共产党的机关。对于群众斗争，主张共同领导，断送领导权。……五次大会前党内还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五次大会以后是看不出两条路线，罗易比较坚决，但也是动摇并且太书生，对于实际问题一些不能解决，而老鲍是个实际家，什么都有办法，因此中央整个跟着老鲍跑。这些情形国际是很难知道，不过国际在第八次扩大会上已经公开批评中国党的机会主义，并且派了代表来挽救，不过相隔太远没有办法。

……

同时国际来了一个电报，这个电报是代表国际主要的路线，有五条，要坚决肃清反革命派，以国民党左派和群众领袖来组织特别法庭，要武装工农至少五万等，中央接到这一电报讨论时觉得不能执行，老鲍说没有办法。这个电报不能向国民党公开的，但罗易以为这是一个原则不是不能执行，只要汪精卫说服过来就有办法，因此，他把这个电报给汪精卫去看，于是汪精卫马上提出分家。

当时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有不少电报来，可是党没有看到，都到了老鲍袋里去了，并且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同志走

并，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崴办党报，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就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

……

在五次大会以后党内完全没有反机会主义的声音。……国际代表经过两三次催促，并声言如不召集会议他便直接召集全国代表会议。后派人来江西征求对国际的意见，我与恩来在江西这时还是动摇，秋白同志在庐山与鲍罗廷计划南昌暴动，我们与秋白讨论，秋白同志指出我们应认识武汉失败是机会主义失败，固然要维持组织上中央威信，但政治路线是非常重要。

（摘自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据铅印本。）

毛泽东谈鲍罗廷

（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五年）

〔Ⅰ〕

又是一个晚上，毛泽东继续他的叙述：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中央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

我（按：斯诺）问毛泽东，在他看来，对于一九二七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

他认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毛泽东解释说，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的立场，他在一九二六年是赞成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一九二七年又竭力反对，对于自己的摇摆没有提出任

何合乎逻辑的根据。"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泽东说："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据毛泽东说，他"能说，而且说得太多了，却不提出任何实现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客观地来说，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

（摘自斯诺：《西行漫记》，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132、134、138—139页。）

〔Ⅱ〕

孙中山这个人我见过，在座的同志看见过他的还有。他是一九二五年去世的。当他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的时候，我见到了他，那时他已将近六十岁。当时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座的林老也是参加的一个。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是国民党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一九二四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他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俄国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败。……

（摘自《"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载《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周恩来谈鲍罗廷

（一九四三年）

……

这时正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我从汕头回广州，和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苏联派到广东的国民党和政府的顾问鲍罗廷商量。当时，我们本来确定的政策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我们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我们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在军队方面，当时的实际情况，蒋介石的第一军只有三个师，第一师是何应钦，第二师王懋功接近当时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除第一军以外都不是蒋介石的。因此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把我们的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下撤出，另外与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我带着这个意见回汕头去，并等待中央回电到后，立即正式向蒋介石提出。当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实现上述计划是完全有保证的。等了很久，中央来电不同意。……

这次大会后，在实际行动上也是孤立了左派。大会完了，鲍罗廷回国去了，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到冯玉祥那里去了，执委中的党员大部分都走了，以至汪精卫问我们还帮不帮助他。……

（摘自《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1943年），载《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上卷118—120页。）

吴玉章谈鲍罗廷

（一九六一年）

汉口租界收回以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的诱惑日益加紧了。一九二七年一月九日，蒋介石从南昌到武汉，他这次武汉之行的目的仍然是想把国民政府迁到南昌去。那时武汉的群众运动，非常高涨，工会、农会、学生会、童子团、商会等组织都已建立。国民政府召开了一次有三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他，会上蒋介石竟恬不知耻地丑表功，说自己如何如何的用兵如神，劳苦功高。群众当场起来质问他：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为什么无理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被问得张口结舌，面红耳赤。接着苏联顾问鲍罗廷讲话，大意是说要依靠人民群众，反对个人独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蒋介石受了群众正义的质讯，恼羞成怒，却把怨毒之气全都转移到鲍罗廷身上。他回到南昌以后，立即给徐谦（党政联席会议主席）打来了一个电报，硬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徐谦接到这个电报，吓的不得了，打电报到宜昌，要我快回去商量。这样我就星夜从宜昌赶回了武汉。

我回到武汉，开了一次会。会议上多数人反对撤换鲍罗廷，只有徐谦主张顺从蒋介石的要求，说："照顾蒋介石的面子，把鲍罗廷换一换罢！"我说："这不是面子问题，鲍罗廷是否要换，应由大多数中央委员来决定，蒋介石一句话怎能算

数！究竟是蒋介石服从中央呢，还是中央服从蒋介石？再说鲍罗廷的话根本没有错误，凭什么理由要撤换他？这不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后来会议决定不理蒋介石的这一无理要求。

（摘自《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1961年），见《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40—141页。）

《鲍顾问演讲集》编者序言

张　太　雷

鲍罗廷同志是一位俄国的老革命党，在革命运动中有二十多年的经验；他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亦已有四年的积极活动。四年前他到中国来是因为中山先生请他来帮助改组中国国民党的。他对于国民党的改组是有极大的供献。是后他帮助了中山先生指导党务及政治；中山先生的北上，造成了中国全国广大的民众运动，是他竭力主张与筹画〔划〕的。中山先生曾对他的信徒讲：凡是关于政治的，应当听鲍同志的指导。中山先生的信任他，可想而见了。自中山先生逝世后，他以党与国民政府顾问的资格帮助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统一广东及进行北伐。他不仅是做党与政府顾问对于内政及外交有极大的供献，他并且与民众运动有亲密的关系，给民众运动以好的指导。这种指导特别是广东与湖北的民众感觉得到。

鲍同志，他是最欢喜与民众说话的。他在广州的时候常常到群众会议去演讲。他说的话对于民众运动及一般革命运动，都是极有关系的。可惜，没有记录或记录得不好，没能把他那些演说全部搜集起来，印成本子，以供同志们的读阅。现在出版的这本小册子不过是鲍同志很多演说中的渺小的一部分，专限于抵武汉后一两月内的演说。虽然，只有几篇演说，但是对于中国国民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有很好的指示，对于工农商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责任亦有充分的说明。中国国民革命是一个农民革命（土地革命）；中国国民革命一定要铲除了

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的基础——农民所受的残酷的剥削，方能真正成功——这是鲍同志很早就发表的意见。（在民国十五年初对黄埔军官学校第三期学生曾经有过一次演讲，在北伐前，当黄埔第四期学生毕业的时候，一连讲过三次，部〔都〕是关于这土地问题）到现在很多革命的同志认识了这个问题，这实在给与了中国国民革命以清楚的途径，及给与了中国农民运动以极大的推动力。这本小册子中的几篇演说对于这土地问题有详细的说明。所以鲍同志这本演说集的出版应该对于革命同志们有所裨益。

鲍同志这几篇演说是由我口译的，并且由瞿景白同志笔记下来的，在付印之前并未经过鲍同志的审定，所以如有错误之处是应该我负责的。

（原载《鲍顾问演讲集》，1927年4月汉口民国日报馆出版。）

回忆鲍罗廷

包惠僧

（一九二三年）二月间鲍罗廷初来北京准备到广东参加国民党与共产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活动，他在苏俄大使馆约集北京区的负责同志讨论两党的联合战线问题，参加这次会的人除李大钊同志及我而外还有范鸿劼、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等，对于两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根本观点和及方式方法问题，起了激烈的争论，北京区的多数同志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它们只有领袖，没有群众，只有高级干部没有中下层干部，严格说不象一个政党，尤其是孙中山的高级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些堕落腐化的政客，很难在它们身上找出革命的因素。我们同他们建立联合战线，既失掉了我们的阶级立场又违害了我们党的纯洁性，这就是国共没有建立联合战线以前一般共产党人的见解。鲍罗廷的意见就完全相反，他说就中国革命客观形势的需要，国民党与共产党应该无条件的统一起来，他根据国际形势与中国历史的现阶段的情况讲了一大套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法，最后归结到共产党人应该无条件地加入国民党，要我们在两党的联合的必要性与方式方法上多加研究再向中央提出意见。他整讲了两个多钟点。最后李大钊同志说：我同意鲍罗廷同志所提出的共产党的阶级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性，今天革命事业中的客观形势，是需要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种革命任务不是国民党尤

其是现在那样的国民党所担当得了，必须要加上新的血液，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如果有共产党来担当这个使命，恐怕为时尚早，因此建立两党的联合战线就成为必要和适时了。但是国民党的缺点很多，而无组织、无纪律、无群众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有把握把国民党大大地改组一下，确定它的政策方针，还是可以有为的；如果不这样，仅就国民党的现状来谈国共两党的合作，那就恐怕合不拢？联不成？只要国民党有改造的可能，孙中山有改造国民党的决心，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才有可能，关于建立两党联合战线的方式方法问题，那倒是程序问题，或者可以说是形式问题，而不是什么主要的问题，那倒比较容易商量。他的意见鲍罗廷很重视，他一面说，鲍罗廷一面记，后来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三大政策，受李大钊同志这一主张的影响很大，那一天的会议从晚八时起至午夜一时才散，我们步行出东交民巷由东长安街过西长安街我们到西单分手，他（指李大钊——编者）始终精神饱满毫无倦容。

（摘自包惠僧《回忆李大钊同志》，载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包惠僧回忆录》。）

鲍罗廷等在广东*

郑秀山　邓演存　尹时中　欧树融　陈锦松

一九二三年，列宁、斯大林应孙中山先生的请求，派遣以鲍罗廷、加仑为领导的顾问人员（初到广东时原称驻广东代表团，后以鲍罗廷均被聘为顾问，习惯上多称为苏顾问或苏顾问团），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工作，很好地体现了列宁、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无私援助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也表现了孙中山对贯彻“以俄为师”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坚决态度。我们在这段期间，曾在不同岗位上和苏联顾问一起工作过（郑秀山任苏联顾问鲍罗廷办公处翻译，陈锦松任军委会参谋团主任罗加觉夫秘书，邓演存任炮兵监，尹时中任步兵监科长，欧树融任海军局局长西米洛夫秘书等职务）。就所见所闻，集成此篇。

一、孙中山与列宁的联系及鲍罗廷来华

一九二三年春，滇、桂、粤军响应孙中山先生号召，东下讨陈，攻克广州，孙中山先生回粤重组革命政府，当时因滇桂军各怀异志，形势复杂，困难重重，中国共产党为支持革命政府，动员了大批党员及革命青年，南下工作。为协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现三大政策，动员工人农民参加革命，开展一系列的工作，至同年约八月，由鲍罗廷率领的

* 本篇原题为：《略记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政策及苏联顾问在广东的工作》，写于1965年7月，这里是该文有关鲍罗廷在广东活动部分的摘录。——编者

苏联代表团，带着列宁、斯大林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到达广州，同行的有高和罗夫将军等人。（据马湘所说，孙、鲍曾在飞鹅峰发炮，时在九月，故鲍八月来华可信）①陪同鲍罗廷等来广州的，则有周恩来、李章达等人。

鲍罗廷等到达广州，正是孙中山先生带领粤、桂、滇军在惠州前线、讨伐陈炯明残部的时候，鲍等到后不久，即随孙中山到前线视察，并交换意见，曾在惠州飞鹅岭炮兵阵地，与孙中山先生交互引发大炮，轰击惠州敌军；并在白沙堆视察鱼雷局长谢铁良、航空局长杨仙逸等装置鱼雷，准备爆炸惠州城墙的情况，后因处理不慎，鱼雷爆炸，谢、杨等被炸牺牲，孙中山与鲍罗廷仅离去片刻。此外鲍罗廷并随孙中山到虎门等地视察。

同年十月，孙中山先生根据廖仲恺与共产党人长期会商、拟定的国民党改组计划并听取了鲍罗廷所转达的列宁、斯大林的意见，乃于十月十九日正式任命李大钊、廖仲恺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并于十月二十五日成立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聘鲍罗廷为顾问，宣布开始国民党改组工作。共产党人林伯渠（执委会副总务长）谭平山（执委之一），参与了实际的改组业务。这样孙中山先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的愿望，遂在中国共产党人及列宁斯大林派来的使者的热烈直接支持帮助，及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拥护下，付诸实行，亦为鲍罗廷等在粤工作的正式开始。

……

二、苏联顾问团的一般情况和物质援助

苏联顾问人员在广东先后有多少人，内部组织如何，具

① 当系阳历10月。——编者注

体工作计划怎样？要全部了解是困难的。据鲍罗廷翻译郑秀山回忆，他们在广东工作大约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鲍罗廷来华到孙中山逝世前后，是他们在孙中山先生的充分信任下，用顾问身份参与孙中山的建党建军工作；第二个时期是从国民政府成立到“中山舰事件”之前。这时，他们在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的充分支持下，既以顾问身份参加工作并担任了革命政府中的某些实际职务，这是他们工作人员最多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逐步篡夺了革命政府军政大权，苏顾问退出了政府实际工作职务，部分人员回国，留下的仅以顾问身份，提供意见。

苏联顾问以鲍罗廷、加仑为最高负责人，鲍主政治，加主军事，故鲍罗廷、加仑又分别有政治总顾问和军事总顾问之称，其余各级顾问及工作人员二、三百人之中，均以苏联人为主，但也有不少欧洲国籍的人，大部分都会讲英语，在粤所聘中国翻译、秘书、新闻、事务等工作人员，也以懂英语的为主。

苏顾问人员的办公地点主要有两处，一在大东路（三十一号），是鲍罗廷的办公处和住处，也是他们的政治工作中心。楼上为鲍罗廷的办公室，基本工作人员是他的夫人（名字已忘记）、秘书（名字已忘记，据说是他的侄女），与中国籍翻译二人，他的夫人是他的主要助手，经常代他处理各种日常事务，秘书则管理各种文件，翻译员除负责日常翻译业务外，并按鲍的指示，经常到有关机关、团体取阅文件、资料，取阅范围很广，包括国民党中央，省、市党部，大元帅府及国民政府成立后的文官处，外交部，财政部，财政厅，全国总工会，省市工代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等机构。经常注意各帝国主义外交动向，工农运动情况，政府财政情况等方面，有

一个时期，还特别注意北方红枪会和工农运动情况。所有这些资料，都由孙中山先生特别通传各单位，给予借阅方便。这就很好地说明了孙中山先生对苏顾问的充分信任。当时张太雷同志为翻译人员之一，主要负责对中国共产党及工农团体的联系；廖仲恺介绍的翻译员郑秀山，则负责对政府各机关的联系。常到鲍罗廷办公室谈商问题的，政府方面有廖仲恺，孙科、宋子文、邓演达（后期）等，工农领导有邓中夏、苏兆征、彭湃、刘尔崧、罗绮园等，其余，国民党的主要军政人员、省港罢工委员会的负责人员，冯玉祥驻广州代表，红枪会的负责人等，也常去交谈。日本、朝鲜、越南、马来亚等地的革命工作者，也不时有人到访。所有到访的人，只要带有顾问团发给的证章或来访材料，（证章是一颗红星），都可直进直出，而许多经常来访的人，多能用英语与鲍直接谈话，无须译员译。

鲍罗廷办公室的楼下，是苏联塔斯通讯社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约四、五十人，主持者为一个丹麦人，其余为中国籍的年青人，这是塔斯社在东南亚以至整个远东地区的工作中心，每天能发塔斯社的电讯外，并采访和编发东南亚地区新闻，其电讯、邮件的收发，各方人员的往来，都是很频繁的。据说每月电讯、邮件及宣传品的费用，数达十万元港币之多（有人说，鲍罗廷在广州还负有第三国际在远东的宣传、联络任务，因无具体资料，未便确断）。

顾问人员的另一办公地点在东山的恤孤院路附近。加仑在这里办公，是苏联顾问的军事工作中心，派在各部队或军事机构工作的顾问或工作人员，常到这里开会或汇报工作，故出入的多是军事工作人员。

列宁、斯大林从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革命的责任与义务

为出发，对中国革命的援助是无私的。当时苏联革命成功未久，国内困难重重，但列宁斯大林除了派遣顾问人员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革命力量以外，还给予一定的物质援助。关于这种援助到底有多少数量，要详细记述是有困难的。据我们所知，在军械方面，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在黄埔或附近地区起卸的先后有五批（第一次东征前两批，第二次东征前一批，北伐前两批），第一批由苏联舰艇直接运到黄埔军校码头，第二批运到虎门附近，船上表面运载木材，下面尽是枪械，后用大驳船四、五十艘，来往搬运四、五天才运完，数量比第一批多，但以北伐开始前运来的两批，数量最多。此外，第一军驻汕头时，苏联亦曾将一批山炮、枪械，直接运给第一军。苏联所运来的武器，有日造步枪、日造山炮（一说是日俄战争时的战利品，一说是十月革命后缴获日本干涉军的武器）；也有俄造步枪、机枪、山炮，其中俄造的双轮重机枪，最受各方欢迎。斯大林并曾决定给中国以飞机援助（数量似为十多架）后只运来数架，由苏联飞行员驾驶，参加北伐（为什么没有按原定援助计划到齐？原因未明，一说是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苏联改变了态度）。北洋政府曾因苏联给广州革命政府以军火援助，对苏联提出过所谓“抗议”。

对于财政上的援助，因为没有具体材料，无法详细记述。但显著的是，当时派来中国的苏联顾问人员，包括在中国雇用的翻译、秘书、事务工作人员在内，都是由苏联支付工薪的（在广东时一律以港币支付，西米诺夫等高级顾问人员，月支港币约七百元，翻译、秘书等月支港币约一百五十至二百元）。西米诺夫任海军局局长时，政府偶然未能如期发薪，顾问团还垫发过干部的薪金。此外，黄埔的建校建军，斯大林

曾直接给过财政上的支援；“中央银行”的建立、革命政府的财政规划等，至少都得过苏联实践经验的指导和支持。廖仲恺、宋子文与鲍罗廷往来关系的密切，广东财政厅特别设有苏联顾问部可以说明这点。

鲍罗廷、加仑应各方面的请求，先后作过很多报告、讲话。鲍罗廷的讲话有一个特点，凡事深入浅出，并用提问方式进行。一次他对农民讲习所第一期学生讲话，首先向大家发问：孙中山先生过去领导的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等大家经过讨论，作出“失败了”的结论时，他又再问：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火车头，而且是健全的火车头，对吗？但既然是健全的火车头，为什么有时会出轨，有时会摔倒呢（意指失败）？对于这些问题，当大家作出各种各样的回答而且无法解释清楚的时候，他就强调说：这问题一定要回答，不回答不行。跟着就逐件提问：是煤炭不好吗？是机器不好呢？是螺丝钉不好吗？最后才作出结论说，都不是。而是支持孙中山这个火车头行进的两条铁轨中有一条不健全。他说，支持孙中山这个革命火车头的两条铁轨，有一条是华侨、留学生、知识分子（意指当时一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这一条铁轨还可以。但另一条却是旧式的军阀部队，未经改造的民军、土匪，这一条铁轨不健全，实际上不是铁轨，而是腐朽的木头。所以就时会出轨，时会翻车，现在实行三大政策，组织工农人民参加革命就是要用工农人民这条新的钢轨去掉换这条旧轨，使革命火车头能够安稳前进，保证革命的胜利。最后，才归结到讲话的主题，号召大家到农村去，为组织农民参加革命而努力奋斗，又如他一次对工会的基层干部讲话时，就用提问方式开始，先问大家什么是同志？什么是工贼？怎样区分同志和工贼？最后才作出结论，

要大家怎样团结同志和反对工贼。

加仑的讲话主要在军事方面，经常讲的是红军建军历史，建军经验，战斗历史，战斗经验，红军战例等等。讲话也能深入浅出，用丰富的事例去说明问题。

三、孙中山北上前后的苏顾问工作

孙中山先生是自始至终抱着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的向往心情，充分信任的态度，来对待苏顾问人员的工作的。所以鲍罗廷到广州后不久，就被聘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的顾问，协助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进行。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人士，经过长时期的协商和草拟，已制定了国民党改组的全部方案，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具体内容。鲍罗廷根据这个方案及列宁、斯大林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指示，用英语整理成一个新的国民党党章、党纲草案（一说是经过讨论，由陈友仁用英语记录整理而成的，后孙中山在一次讲话中，公开说是鲍罗廷起草的，惟整个改组方案则是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与廖仲恺共同拟定的，内容已包括了后来公布的党章党纲基本原则），经孙中山先生亲自审定，并由廖仲恺译成中文，交付临时中央执委会讨论。由于这个草案，要把旧国民党改变为包括工农人民及各个革命阶级参加的革命联盟，并以反帝反封建作为党的革命任务，它马上受到了国民党右派邓泽如、张继、谢持、邹鲁、林直勉、冯自由等公开反对，并把中国共产党及鲍罗廷作为攻击目标。但孙中山采取开除出党的坚决态度，给这些右派分子以严厉的打击，用以表示他对中国共产党及鲍罗廷的充分信任与支持，表示他对贯彻三大政策坚定不移的信心与决心，从而为鲍罗廷建立了工作威信。以后，就凭着共产党员、左派人士及鲍罗廷等的

共同努力，国民党终于完成了改组工作，并于一九二四年一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了三大政策，发表了著名的大会宣言，共产党人毛泽东、李大钊等参加了大会并担任了领导工作。林伯渠、谭平山（后来的）分任农民部长、组织部长；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何香凝分任工人部长、妇女部长；仍聘鲍罗廷为中央执委会顾问。从此，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改组后，遂在共产党人及鲍罗廷等苏联顾问帮助下，开展了新的一页。

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先生根据与共产党及苏联代表历次会谈的商定，委派廖仲恺等筹办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叶剑英、聂荣臻等参加了筹备工作。苏联顾问鲍罗廷（初期的首席顾问）加仑（后来的首席顾问）等，根据列宁、斯大林的建军经验，曾为黄埔建校建军工作制定了蓝图。这个学校的特点之一，曾参照苏联红军制度，实行党代表制，一切命令法规，必须党代表副署始生效，把党和政治领导提高到首要位置上来。孙中山委派左派、左派骨干廖仲恺为党代表，发表蒋介石为校长，蒋介石就由于不满这个制度（因党代表制妨碍他实现个人专权，及利用军校树立个人武力的阴险目的），曾一度回奉化原籍。故整个军校筹备工作，实际是由苏顾问设计，共产党人叶剑英等加以完成的。这个学校的另一特点，是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相结合，以政治教育为主，三民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社会主义运动、中国及世界政治问题、苏联研究、帝国主义、群众运动，都是必修课程。特别重要的是，全部政治课程，基本都是由共产党员周恩来（政治部主任）、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熊雄、高语罕、于树德等主讲的，因而黄埔军校教育时间虽短，但不少学生都在共产党人的教育下，成为较自觉的反帝反封建

革命战士。而苏联顾问卡拉绰夫（政治顾问）、白列贝列夫（步兵顾问）、贝斯查斯特诺夫（炮兵顾问）、瓦林及雅阔夫列夫（工兵顾问）等，则发挥了列宁斯大林的军事思想，针对着黄埔军校军事教育时间较短的特点（每期仅七个月至一年多），从新编订典、范、令及四大教程，亲自对军事教官也进行示范教育，使学生能在较短期间掌握实战技术。因此黄埔军校能够在短时期内培养出一批有政治觉悟的军事干部，是与共产党员及苏顾问的努力分不开的。黄埔军校就这样的从一九二四年五月至一九二六年六月北伐开始之前，先后办了四期，培养了约五千名的军事干部。后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著名的黄埔教导团而至党军第一旅、第一师、第一军（即后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支军队，同样参照红军制度，从军到师从团到连，都设有以共产党员为主干的党代表，部队中都有苏联顾问参加工作。在第一、二次东征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后来蒋介石强迫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把这支军队篡夺为个人军事独裁的武力基础）。

此外，苏顾问团还根据孙中山先生的邀请，派出李微为大元帅府航空局的顾问，西米诺夫为海军局顾问，沙非为铁甲车队顾问，率领有关各该方面的教官和技术人员，参与了空军、海军、装甲车队的教育和整顿工作。

在一九二四年镇压"商团事件"过程中，以胡汉民、伍朝枢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纠合驻广州的右派军队，一再要挟孙中山对商团军及其背后主子——帝国主义妥协让步。共产党则大力发动群众，主张武装工农，镇压商团，鲍罗廷坚决支持这个意见，建议孙中山先生马上建立工团军和农团军，他说：既然很多人害怕商团，那么就让工农人民的武装去解决商团吧！孙中山和廖仲恺接受这个意见，决定把苏联

援助革命政府的第一批军械八千多枝（枪），全部发给工农人民。孙中山并指定廖仲恺、李章达等组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排除一切右派势力，全力贯彻三大政策。鲍罗廷直接参加了这个工作。但由于蒋介石另具阴谋，全广州只组成了三百名象征性的工团军，也没有把武器发给工人农民（他要把武器留作培养个人武力之用）。革命委员会也弄得有始无终。后来，商团军公开枪杀双十节游行群众，准备发动暴动，孙中山在共产党领导的工农人民支持下，接受苏顾问的意见，终于派军队解决了商团军。

……

一九二四年冬，孙中山北上与段祺瑞政府共商国事，鲍罗廷以顾问身份随行。至一九二五年春，孙中山病逝北京时，鲍罗廷随从在侧，并据孙中山口授，鲍罗廷笔记（一说是陈友仁笔记），写成著名的《致苏联遗书》。以后，按孙中山临终指示，鲍罗廷返回广州，继续为孙中山未竟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四、国民政府成立后苏顾问的工作

在政治工作上，以鲍罗廷为首的苏顾问人员，这个时期一方面对国民政府的组织与建立，尽了提供意见的责任；一方面并对当时蓬勃开展的工农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给予积极支持。当时，由彭湃、毛泽东主持的农运讲习所培养出来的农运干部（大多是共产党员）已在各县发动农民，组织农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由共产党和左派人士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已打破流氓工会的封建桎梏，组织了大批进步工会，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斗争（如镇压商团，平定滇桂军叛乱等）；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在刘少奇领导的全国总工会及邓中

夏、苏兆征等共产党员发动下，一开始就以震动世界的姿态，给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把香港变成死埠。但国民党右派乘孙中山逝世机会，和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在农村则和地主恶霸狼狈为奸，支持各地民团（地主武装）对农协和农民自卫军发动武装进攻；在广州，则联合广东省总工会、机器工会等流氓工贼，用挑拨、恫吓甚至武装袭击方法进行打击和破坏；对外则勾结帝国主义千方百计阻挠省港罢工的举行，用武装走私甚至袭击工人纠察队的手段，破坏罢工工人对香港的封锁。在这种情况下，除共产党领导工农人民坚决给予回击以外，鲍罗廷还充分运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通过汪精卫抽调各军部队（每军一个团），调动直属军委会的装甲车队，在花县、四会、广宁等地，协助农民自卫队对地主武装进行镇压；在各个会议上，在电话中，鲍罗廷还一再要求吴铁城（时任公安局长）及各军将领，不要干涉、破坏广州工人和省港罢工工人的活动，甚至谴责他们纵容部属，袭击罢工工人纠察队的罪恶行为。因此，鲍罗廷也曾受到伍朝枢（据说他曾接受英帝国主义三十万元港币收买，一再要求鲍罗廷出面阻止省港工人罢工，为鲍拒绝）、邹鲁、孙科、马超俊等右派势力的攻击，说他越权揽事。但由于共产党人左派人士及广大人民的支持，右派的攻击和毁谤都不得逞。最后，国民党政治会议在左派人士倡议下，还对邹鲁给予警告处分。反动工会的工贼陈森（广东省总工会）、李得轩（机器总工会）等，更扬言要殴打鲍罗廷，当时左派势力强大，右派的阴谋恫吓，毫无用处。

…… ……

在北伐军攻下武汉三镇，国民政府迁至汉口之后，鲍罗廷留在汉口工作，加仑一度随蒋介石至南京指挥作战，至一

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背叛革命，苏顾问乃纷纷离去蒋系部队，集中汉口。至同年七月，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背叛革命，宣布解除苏顾问鲍罗廷合约，七月十四日，全体苏顾问人员乃离华返国。

（广东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廷

鲍罗廷妇

一九二三年春，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应孙中山的邀请来到广州。同年秋季前，我携带两个儿子也来到中国南方。

鲍罗廷对我们讲，孙中山热情地迎接他，长时间地询问列宁的情况，不仅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而且以医生的口吻关注伊里奇的健康。他称列宁为中国最好的朋友，再三衷心感激我党和苏维埃国家，因我国迅速而真诚地回答了他吁请援助的要求，派出了加伦、巴甫洛夫、切列潘诺夫、格尔曼等军官和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党的工作人员前去革命的中国工作。

到广州以后不久，我就认识了孙中山和他的夫人——容貌秀美的宋庆龄，我们并且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孙中山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善良的面庞、睿智的双目、全神贯注、强烈的事业心——这一切都表露了他非凡的人格。

孙中山和鲍罗廷都精通英语，所以他们共事伊始就可以不用翻译。这一点（当然，革命观点的一致性就更不必多说了）极有利于他们的直接交往和友好接触。孙中山有一次竟就此开了一个玩笑，他对鲍罗廷说，殖民主义者使中国蒙受巨大灾难，可是他们的语言倒成了向中国同志传授革命经验挺不错的工具。

孙中山经常一连几个小时地同鲍罗廷谈话，详细询问俄国革命发展中某些阶段的情况、俄共（布）的历史、一九〇五

年革命失败的原因、凯歌高奏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的情况等。他对列宁生活的细节也很感兴趣，例如列宁侨居国外时怎样工作（鲍罗廷曾于一九〇四年与列宁一起侨居瑞士)、怎样培养革命者、如何研究多种学科和学习外语，如何出版和编辑《火星报》等许多情况。

鲍罗廷对我说，当孙中山问及列宁的各种情况时，他的眼睛流露出一种特殊的温煦的光采，他的问题和反诘中也令人感到，他十分钦佩符拉季米尔·伊里奇这位革命家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领袖。

孙中山把对于列宁尊崇的态度也广施于奉派前来援助中国革命的一切苏联人。凡曾会晤过孙中山的我国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对此都有体验。孙总是设法使我国顾问明白,中国同志并不把他们当成外国人、海外来客，而是把他们当成亲兄弟，因此在最艰苦的时刻，他们热情地前来帮助兄弟的中国人民。我国顾问高度评价这种亲切的态度，并对孙中山报之以尊崇和爱戴。

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对我们家人和各苏联顾问也很友好、真诚。她积极参与丈夫的政治工作。我们同她谈话也不用翻译，因她的英文极好。宋庆龄对我讲述了关于中国妇女的许多有趣的情况，介绍我认识了社会各阶层的一大批妇女代表，后来我不止一次地遇到过她们。

鲍罗廷始终感到孙中山很敬重他，认真倾听他的建议。他们成了亲朋好友，这种友谊有助于他们共同的革命工作。一九二三年九月，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政治顾问①。

① 孙中山所发委任状上对鲍罗廷的称呼是“国民党组织教练员”。——译者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①，孙中山在广州各区分部和国民党组织者的会上，曾概括说明鲍罗廷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作用如下：“因为要学习他（按：指俄国共产党）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位同志牺牲自己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鲍罗廷总是把孙中山对他个人、他的工作能力和经验的种种赞扬归功于他所代表的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他感到自己是培育他的亲爱的党的一名战士。

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友谊与共同工作一直持续到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者生命的最后时刻。当孙中山因胃癌和肝癌病卧北京，生命垂危之际，宋庆龄和鲍罗廷一直守护在他的病榻之旁，孙把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交给了鲍罗廷。

孙中山在这件遗书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孙逸仙。北京。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②。

伟大的革命家、民主主义者、爱国者孙中山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美好的祖国、伟大的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直至临终都在怀念他。

鲍罗廷之子据母亲口述记录整理

译自《孙文》，196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86——288页。）

李玉贞译

---

① 孙中山是在1923年12月1日于广州国民党区分部的会上讲这番话的。见《孙中山丛书》第三册，第70页。——译者

② 孙中山原稿为英文，中译据《孙中山选集》1981年10月人民出版社版，第995—996页。——译者

鲍罗廷在武汉*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从外交部穿过街道有一幢石块砌成的大楼，其下层为《国民论坛》社占用；上层则是米哈依尔·鲍罗廷的一套房间，他作为俄国顾问在国民政府任职，已为时四年。两位年轻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威廉和雷纳·普罗梅，经办《国民论坛》和兄弟组织《国民新闻》社①，他们的任务是代表国民党人用英语进行宣传。与其他任何个人比较，他们更多地向美国发出电讯，使美国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据以制止对华武装干涉。他们从北京到广州，并从那里到汉口，目睹国民党的兴衰，甘苦共尝，进行了四年的工作。他们两人都不是共产主义者，然而与国民党左派一起，甚至在汉口失败以后也如此。左派本身已停止活动，他们依然保持这一左派通讯社继续存在。在为中国革命服务之后，雷纳·普罗梅往莫斯科并在那里逝世②，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堪与另一美国人约翰·里德为俄国革命工作相媲美。

米哈依尔·鲍罗廷，四年前受孙中山邀请担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顾问，在《国民论坛》社的楼上居住和工作。通向他的那套房间的旁门经常停放着前来请教他的政府官员的

---

* 题目为编者所加。——编者

① 《国民论坛》和《国民新闻》社的英文原名为"The People's Tribune"和"Nationalist News Agency"——译者

② 雷纳·普罗梅于1927年11月21日病逝。——译者

汽车，少则一、二辆，多则五、六辆。在他的各种房间内，日日夜夜随时都有国民党或共产党的会议在进行。

在汉口用英语讲话的外国人士中，鲍罗廷的力量几乎是超人的，但是与其说他被当成天使，不如说他被当成了魔鬼。“你真的已经见到他了吗？他像什么？”他们叽叽喳喳的说。当他们知道我已见他多次并且还想再见他时，他们简直不知道是否要用异常的注意或异常的怀疑来看待我。他们把他看作是每一个新的命令或文件的唯一作者，不论是陈友仁给外国政府的照会，还是孙中山夫人离开武汉的原因的声明都是如此。他进行的每次活动成为人们热烈评论的主题。甚至假若他偶尔正常地在晚上入睡，而他的办公室里通常点到清晨三时的那盏灯熄灭了，午夜后路过这所房子的人们看见房子是黑暗的，于是鲍罗廷“昨晚乘私人飞机逃走”——自然意味着武汉陷落只是数小时内的事，这一消息将传遍整个汉口。用英语讲话的外国人士们完全不惯于在政府中指望中国人会有任何管理才干，并为“强有力的人”的传闻引入歧途（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正是在此传闻下经常这样看待“落后国家”政府的），他们除了从鲍罗廷身上，无法看到任何政府力量的表现。就武汉政府的实际成员来说，他们直到现在都不是错误的。所有这些成员常常去鲍罗廷处，不仅因为鲍罗廷通过多次革命得到的长期经验给他们以忠告，而且更因为鲍罗廷有革命意志的力量，这种力量正是他们多数人所缺乏的。在他们全体中，当他们在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军人的力量之间发生动摇并采取了调和态度时，唯独鲍罗廷能够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并为它说明理由。他的理由是如此完整、正确并以如此丰富的经验为依据；长时间内，这些理由甚至吸引了那些本身利益是反对工农运动的成员。

鲍罗廷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在于他对中国经济力量和社会集团经常的、明智的研究，并用许多以往革命的见解加以说明。在中国，我听过别的方面消息灵通的自由主义人士评论共产主义目标，如按鲍罗廷解释是"使中国陷入混乱状态，以求共产主义的可能出现。"我从未从哪个共产主义者肯定也未从鲍罗廷那里听过这一说法。他认为中国已处于混乱之中，为中世纪酋长余孽之间的内战所分裂，他们全部都在掠夺群众，并在削弱国家抵抗外国干涉的力量。他认为，目睹这种混乱延续，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愿望，因为混乱给予他们继续掠夺的借口，并增强他们在战略港口进行演习的控制。他自己常常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哪些社会集团有勇气、有组织力量、有纪律性足以组织一个稳定的政府和创造一个现代的国家？"他认为这些特征存在于迅速组织起来的中国工农之中，因此革命的策略是组织和教育这些成员，使他们最后取得政权和组成一个政府。在此时，他的看法和一般正统的共产主义者的看法是：中国当前的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换言之，是一个从中国扫除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残余的革命；但是这一革命只能通过受工人领导并包括无地农民夺取土地的土地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所作的决议写道："只有广大劳苦大众积极参加斗争，才能创造一种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分割和粉碎封建关系的残余。"

外国记者们来到长江上游在"红色汉口"呆一个星期，总是首先要求会见鲍罗廷，并且常常得到了接待。他们来此期望知道有人所谓残忍的极端分子是怎样的；他们中大多数人带着如此赞赏的心情离开，以致他们的报纸几乎难以发表他们的报道。俄国顾问凭借他那种在中国官员中属于罕见的

明确陈述，凭借他对改造中国的力量的豁达见识，凭借他在他们中间清晰地选择一条道路，而使新闻记者们感动。他还以无所畏惧、忠于革命的许多个人品质和似乎很快理解并设法接近访问者心灵的直觉，使来访者感动。

我在汉口几周的大多数时间里，鲍罗廷多少有些病，这是在中国热带地区呆了四年中所患的旧的发热病[①]；他并为一只残臂所苦。他常在热病袭击的间歇中，从床上爬起参加会议和接待来访者，只是有时病情沉重时他才被迫卧床。有一次他对我说："你曾否想过，当我们在俄国进行十月革命时，我们作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吗？中国革命比俄国革命要大许多倍。它是地球上整个人类的四分之一。它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它将延续长久。在革命胜利之前被杀者将不是鲍罗廷一人。"

在另一场合，中国共产党书记陈独秀与我们同在这房间内，我已觉察到，从及时看到实际情况而言，对于俄国革命，我去晚了，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我来的又早了点。鲍罗廷笑着说："斯特朗女士的时间是不凑巧的，她来俄国太晚，而现在她来中国又非常的早。"这时我不十分理解他的话。因为，与世界其它地方和所有除了国民党委员会的人一样，我仍然认为武汉是革命的，而不知道右倾已经在武汉贯彻得多么远了。

后来，当我知道封建军阀与要求民众管理的现代军队之间有些斗争已开始时，我提醒鲍罗廷，如果政权稳固，军队则必须让步。他笑了。

"你曾见过蟒蛇面前的兔子，"他说："兔子发抖着，知道将要被吃掉，简直吓呆了的情景吗？武汉军队面前的政府

① 鲍罗廷患疟疾。——编者

宣员，凝视着军队并且发抖，正是如此。”……所以，他对与之一起工作并且组成武汉政府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气，很少幻想。然而他是他们的不动摇和坚持革命目标到底的主要来源。人们怀疑仅仅他患病这一事实，在多大程度上缩短了武汉的革命时期，人们还设想如果他能出席郑州会议与冯玉祥会晤，他就不能得到一个更长的喘息时间去组织工农，然而可以暂时改变与冯玉祥联盟的形式，直至有足够的时间夺取北京。对于组成国民党运动的各种冲突势力，进行长期的调停，不是他和别人的力量所及，也并非他的愿望。因为他毕竟还是忠于工农革命，而对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仅是临时的。

（译自《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1927年中国中部的革命》1928年纽约英文版，第37页至40页。）

（张寄志译，杨云若校）

鲍 罗 廷

子 云*

有一个"怪物"在广州停留着，引起了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的呼号咆哮，成为他们发泄毒恨与愤怒的目标，并且这些毒恨和愤怒与日俱增，每当中国的革命运动进一步时，他们的攻击就要集矢于这"怪物"一身，其热烈几乎到了发狂的程度。这"怪物"是什么，无疑的，这是醒狮派所称的，"俄寇"鲍罗廷。

鲍罗廷何以得罪了这些高贵的先生们，成了他们仇视的中心呢？显然的因为（一）他不应该是俄国人，（二）他不应来中国管中国革命的闲事，使革命得到很大进步。在往昔英国诗人拜仑为希腊的独立而战死，其侠义肝胆落得留芳青史，他们是肯称赞的。在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时，有些日本人志愿帮助孙先生革命，以至牺牲生命，这也不算要紧。惟有俄国人是天生的没有帮助中国革命的资格，因为他们不应该推翻了他们本国的专制政治，树立起劳动政府，感召了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俄人来帮助中国革命，若无侵略的攫取利权的野心，便是腐蚀了中国青年的良心，比帝国主义还要利害。换言之，我们宁愿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也不愿见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横行。便是陶履恭所说的，宁愿中国亡给英美统治，也不愿见中国赤化共产。

* 子云，即刘仁静。——编者

醒狮派如此盲目的排斥俄人，我们只有叹惜他们的愚蠢可怜，他们如初出世的小儿学牙，高喊外抗强权，却不知强权是什么东西，不知强权就是帝国主义，更不知帝国主义的利害高低，（要联合全世界的被压迫的人民打倒他）。这些无知的孩子们，更加上一点遗传下来的顽固脑筋，背诵一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书，便活活的耽误了他们一生，不自觉的卖给军阀与帝国主义做单打共产党与苏俄的镖手。他们是永远不懂得世界上会有以平等待我的民族的。俄国对中国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在他们看来，正不知包藏着什么祸心，还要提防着他呢。所以对一个献身帮助中国国民革命的鲍罗廷，自然是咬牙切齿的痛恨。他们这种痛恨，决不是感情的或偶然，这是因为革命的势力已笼罩住全国，胜利如在目前。因为过去工农阶级参加革命，所以国民革命的胜利，也是工农阶级的胜利，这逼迫有产阶级落后，反动，希望依靠着帝国主义与军阀以苟延残喘。他们虽然没有到公开的与敌人勾结时期，但现在却不得不多寻隙攻击革命的势力，拿十分之八的精力对付革命派（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以拍资产阶级的马屁，以十分之二的精力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以勾引一般青年的信仰。醒狮便是代表这般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怕工农阶级领导的国民革命，比怕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压迫还要利害。工农的势力进一步，他们便要跳脚冒火一次。醒狮张牙舞爪，向共产党苏俄及鲍罗廷猛扑，原来是怪他们唤醒了中国革命运动。

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对鲍罗廷与共产党，也出于一部分代表资产阶级官僚政客的人们，看见中国工农阶级的革命势力日趋强盛，他们自私自利的行动，不免受打击与限制，他们的懒惰与保守，看见革命分子的努力，不免有点惭愧，所以

与老的右派结合，攻击共产派，而更进一步的“开除”汪精卫和“取消”鲍罗廷的顾问。他们正在那里高嚷国民党中兴，自〈称〉真正孙文主义的信徒，兴致勃勃的组织党部，实在他们已得到国家主义者的精神帮助了，而且在下层党员群众中，竟有些与醒狮联合，此种倾向如不挽回，他们还要更受醒狮派的影响。

然而鲍罗廷在中国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引起他们的如此的仇恨呢？

据我们所知道的，鲍罗廷是俄国共产党中的老党员，他在来中国之前，曾在英国扶助革命运动，以致被捕入狱，数月乃释。以后被第三国际派到中国，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到了中国之后，因为孙中山先生的信任，国民党才实际产生改组的运动。他的能力是可敬的，所以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全国大会时，告同志要以鲍罗廷为师，学得革命的经验与组织；并于北上时，曾有手谕谓“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样”(见蒋介石在汕头演说)。以中山先生，中国革命的老领袖，尚如此尊重鲍罗廷，可见右派之主张撤消鲍罗廷的顾问，显然是离开了孙先生的指导。我们亦可举一二实例，以证明鲍之有先见之明，确能指导，裨益于中国的革命运动。第一、当去年北京政变之后，对于孙先生北上，在国民党内引起很大的争论，而当时力赞其北行的，鲍罗廷之力居多。第二、孙先生的北上宣言中所主张之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也可说有些是他的意见的贡献，至于武力与民众结合，及使武力变为民众之武力，这个理论，我们可说有好些革命同志在当时是不懂的，在今日则完全为事实所证明，此主张也是鲍罗廷的贡献。第三、在廖案发生后，

鲍罗廷主张肃清反革命党徒，最为坚决，因为廖案是年来党内姑息养奸的结果。他们是隐藏在反共产的旗帜之后，以遂其反国民革命之阴谋的。果然，广州国民政府雷厉风行，解散了反动军队，扑灭了反革命的势力以后，广州的根基稳固，无内顾之忧，遂得有余力统一广东，及过问全国的政治了（这是得罪右派的一大原因）。我们看鲍罗廷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功绩，他辅翼中山先生，第一、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第二、提出国民会议及预备会的口号，阐明武力与人民关系之理论，成为今日民众普遍的呼声，第三、坚决主张肃清反革命的势力，奠广州于磐石之固。我们略略介绍鲍罗廷是如此，至于他在广州，赞襄汪精卫和蒋介石，指挥中国及广州的革命运动，随时贡献很多有价值的意见，此地毋庸细说。读者诸君看了这点叙述，是认鲍罗廷为中国革命的朋友，还是认他为中国革命的敌人呢？鲍罗廷不过是一个黄头发，绿眼珠的人罢了，我们果应当存一种封建时代的省界和国界的观念，去盲目的排斥我们的好朋友么？

（原载《中国青年》第108期，1926年1月2日。）

张国焘关于鲍罗廷的回忆*

同时（一九二五年秋——编者）广东区委会来的报告中，描述广东的情况，也和鲍罗廷一样，称汪蒋合作之局面为"革命的专政"。这个报告也说到右派的力量仍是很大的。戴季陶那本题名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在黄埔与一般国民党人士中，流行甚广，影响亦大，势将酿成新右派。广东省委否定国民党内有广大中派存在之说，要求中共只与国民党左派团结，共同推进革命向左发展。

鲍罗廷和广东区委会的这些观点，首先引起了陈独秀先生的强烈反应。他认为在广东的同志们忽视了整个反共阵线的力量；他们偏处广州一隅，企图以一部份革命军人、省港十几万罢工工人、和二十几万有组织的农民来对抗整个帝国主义、北方军阀和一般反共势力，显然是犯了低估敌人实力的错误。

……

我原约定与鲍罗廷在几天后商谈双方歧见问题。鲍罗廷似也已得到莫斯科方面的复电，可以表示意见了。因而由他主动约集我和广东区委会主要负责人陈延年等举行会议。

鲍罗廷首先发言，他对广东局面表示乐观。指出在对外

* 张国焘在他所写的《我的回忆》一书中曾有大量篇幅谈到鲍罗廷在中国的情况。这里节录少量有参考价值的段落。由于该书是作者为自己的反动历史辩护的，所选部分，歪曲史实之处一定会有，有待于鉴别、研究和批判。——编者

关系方面，由于罢工委员会组织的严密，香港方面一切破坏的阴谋都没有成功。他预料香港当局不久将与广州当局谈判解决罢工问题，有恢复双方正常关系的可能。至于其他各国，如美、日等国的商船，早已直接开到广州，进行经常贸易；而且日本方面开始与国民政府商谈海南岛田独镇铁矿开采问题，国民政府并准备给予开采权。根据这些情况，他指出列强现在不得不承认国民政府业已稳固这一事实。

关于广东内部的状况，他认为基本上已经统一，不会再有叛乱发生；汪蒋合作的局面也不会因外间的挑拨，而产生破裂。广西军人对国民政府的关系正在改善之中，可望成为国民政府属下的另一省区。广东四周并没有甚么军事力量，足以危害广东的安全。现在政府税收月有增加，并可望大量增溢。他认为在这个稳定的基础上，民政的整理、各军训练等主要工作，都可望顺利进行。

根据这种乐观的看法，他认为国民党左派与中共仍应向右派势力进攻，以期广东局面获得进一步的巩固；此时决不应退让，因为退让政策会助长右派的气焰。他指斥中共中央"团结左派、联络中派、打击右派"的政策，是死板的公式。国民党左派本身是相当脆弱的，需要和中共合拢一块，才能形成一个雄厚的力量。他也承认摇摆不定的中派占多数，但反对以向右派让步的方式，去联络中派。他主张强迫中派追随左派，要他们无条件的拥护国民政府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他讥讽中共中央与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所成立的协议是要不得的安抚政策。

他还进而号召广州的中共同志，反抗上级的决定。他说不应当无疑问的遵守中共中央的决定。广东区委会负责人根据他们对广东情况的真实了解，是可以对这种决定，提出修

改的意见的。

……

四月二十九日（一九二六年——编者）鲍罗廷回到广州（大约稍后于胡汉民的到达）。他在黄埔下船，首先与蒋氏晤谈。我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在他的办事处候驾。我和他又重新聚首。他以不安的神情，叹息着他离开此地不过三月，局面竟变得这样糟糕，真非他始料所及。

他告诉我，刚才蒋介石将军曾向他转述胡汉民的话，要蒋不再信任鲍罗廷，并将鲍扣留起来。他说完这些话，向我摇摇头耸耸肩。接着表示他固然不相信他真会被扣留，但他却觉得他的好朋友蒋介石将军居然藉胡的话，向他来一次下马威，这使他不无今非昔比之感。

鲍罗廷又向我指出，广州局面能否恢复旧观，他实在没有把握；只有做到那里算那里。不过这次莫斯科倒很尊重他的意见，赋予了他更大的权力，简直就是要他全权相机处理一切。

他还根据莫斯科的意旨，要求我转知中共中央和一般同志们，要象莫斯科一样的充分信任他。特别在这个时期，步骤是一点也乱不得的。我自然也将我所知道的情况，扼要的告诉了他。

鲍罗廷来到以后，迅即成为政治接触的枢纽；我的工作情况也为之一变。我摆脱了大部份的对外政治活动，转而注意指导广东区委的经常工作以及即将举行的工农两大会议的进行。

……

当时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廷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即一向居间的谭延闿似也没有参预其事。

……

大约是五月二日，鲍罗廷约我再度会谈。

……

在我们那次会谈中，鲍罗廷曾分析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的原因。他表示蒋介石将军不过是一个中派，孙中山先生本人也只是一个中派；都同样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即使孙先生健在，也要采取某种步骤来限制中共的活动。他这种说法我觉得是有疑问的。我问他是否认为三月二十日事变，是绝对无可避免的？又是否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合作这一政策，必然要碰壁？他似乎无法自圆其说，因而改口说："孙中山先生在世，如果要限制中共的活动，大概不会采取三月二十日那种方式。"

鲍罗廷转而向我直接表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俄国人会不会被逼离开广州，他引证香港方面的宣传，如"广州当局要驱逐当地所有俄国人"、"实行分共"等等传闻。胡汉民也确正式提议过要将他扣留起来。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帝国主义者和右派人物，正处心积虑要将中、苏和国共之间的关系加以破坏。

鲍罗廷根据当时情况，认为如果我们的处境，并不象帝国主义者和右派分子所希望的那样恶劣，就应该设法弥补，即使是权宜之计，也算是我们的胜利。他坦白表示，莫斯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支持中国国民革命，并已与国民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如果因三月二十日的事变而有所损害，莫斯科对内对外，都将无法交代。因此，莫斯科一直是在设法冲淡这一事变的严重性，期望我们能设法挽救。

……

到了五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左右，鲍罗廷找着我和谭平

山，要我们立即去访问蒋介石和张静江。他说明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明天就要开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外间谣言甚多，主要是传说中共要发动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决议。蒋介石对这些传说甚表关切。鲍罗廷希望我们向蒋张表示，对次日的会议内容并不知情，所以也说不上赞成或反对；并表隙中共始终维护国共合作，亦决不会作公开反对之举，如果翌日广州市内发现有反对该次会议的传单标语或其他行动，完全与中共无关。

……

鲍罗廷认为中央不必重视此一党务整理方案，除了其中规定中共党员任国民党高级党部委员者，不得超过全数的三分之一，以及不得任中央部长等是中共所受的实际损失外；其他如交出名单和审查中共对党员的训令等，只是国民党的片面决定，中共中央可以在将来的联席会议中，提出异议。

……

蒋氏在准备北伐中，开始就与共产主义者发生了矛盾。重返广州任军事顾问的加仑将军，主张北伐有较长的准备时间。他根据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认为立即北伐，打到武汉或可操胜算；但要一气打到北京，似乎力有未逮。因此应有一准备时间，从各方面来充实自己的力量，在战略上是合算的。加仑将军的客观分析任何人也无法加以反驳。但蒋氏所注重的是北伐时机不可失，坚持从速挥师北上。

鲍罗廷对于蒋氏在此阶段中的所作所为，也有许多不满。他那时已不再是甚么“导师”，而只是“顾问”了。他比较清闲，也有点苦闷。他曾向我说到，他除同意加仑的军事见解外，认为在政略上蒋氏也多欠考虑。他主张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将当时被困潼关以内冯玉祥的力量接应出

来，掩有西北和西南广大的领土，以便再与沿海一带帝国主义的势力相周旋，他不赞成蒋氏向长江下游东南各省发展的想法，认为会过早的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鲍罗廷的这种观念，是他后来在武汉时期所提出的“西北主义”的张本。这似是利用了土耳其革命改都安格拉的经验，也含有为苏俄利益着想的成份。

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抑或向沿海东南各省同时发展，是鲍罗廷与蒋氏间的主要冲突。当时蒋氏似已秘密委托他在广州和上海的朋友们，设法与英、日等列强接触，鲍罗廷对此已微有所闻，但蒋氏讳莫如深。蒋氏不重视鲍罗廷所谓避免过早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的意见，似也露出了他的外交政策将有转向的迹象。这在鲍罗廷看来，如果修改了或取销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那简直就不是国民革命了。中共在广州的同志，认为北伐不仅是军事行动，还应该是革命政纲的实现。他们认为巩固广东根据地和实行北伐应同时并重；仅株守广东，固非所宜；但因北伐而损及广东的巩固，也属不智。中共这些见解，国民党部分左派人士也有同感。

……

武汉的反蒋运动，是鲍罗廷到武汉以后才开始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鲍罗廷不满蒋氏在三月二十日以后的种种安排，但他大体上对蒋还表示容忍让步，以弥补国共之间几濒破裂的关系。但一到十月间，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之时，反蒋的锋芒开始显露出来，这似乎得到鲍罗廷的支持。等到鲍罗廷到达武汉以后，认为反蒋时机业已成熟，不再隐藏他的反蒋决心了。这一反蒋运动，自然是以各方反蒋的倾向为基础而决定的，由限制和削减蒋氏权力开始，进到武汉政府与蒋氏正式对立。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左右，鲍罗廷偕同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以国民党中央暨国民政府代表团的名义，到达了武汉，筹备迁都事宜。国府主席谭延闿等则正率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全体人员随后迁来武汉。

当我到汉口旧德租界一所精致的洋房，去访问鲍罗廷时，他正在客厅接见宾客，我便在他的办公室内先与随同他一道来的张太雷同志晤谈。张太雷首先向我说："鲍罗廷真有几手，一席话便把唐生智收服了。"他接着说明，鲍罗廷在下船后，即偕同欢迎他们的唐生智，同车驰至唐的总指挥部。他们开始谈话，由他从旁任翻译。鲍罗廷劈头便向唐生智说："谁能忠实履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就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唐生智听了这话，似乎喜出望外，将身体扭动了几下，欣然回答道："我愿意这样做。"鲍罗廷接着说了一些如何忠实履行孙中山先生主张的话，不着痕迹的将他已不信任蒋，转而将信任唐的意向表示出来。唐生智因而向鲍罗廷恳切表示："一切愿听指挥。"

……

鲍罗廷和我讨论一般政策问题，是在十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组成以后。联席会议为何要急于组成，职权为何，已否得到蒋的同意等等，鲍罗廷事先都未和我提过。等到联席会议举行后，鲍罗廷才向我表示：在广州时，他曾说过北伐打到北京，国共便要分家；现在看来，分家之事已经大为提早了。我问他为甚么有这种看法，他说是凭他的嗅觉，而他的嗅觉是特别灵敏的。

他向我指出下列各点：一、蒋氏占领了江西之后，正锐意经营东南，以夺取南京、上海为目标；这种东进方针，将

与苏俄日渐疏远，而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浙江一带的买办资产阶级，寻求妥协。蒋的这些活动，是经由黄郛钮永建等人从中拉线的。二、蒋氏一直要建立他个人的军事独裁，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完全置于掌握之中，反对汪精卫回国复职；这些已引起国民党大多数中委的反对，这次和他同来的国民党中委，一致不赞成蒋的这种野心，因而成立了一个联席会议，俾中枢大权不致为蒋个人所操纵。三、蒋氏如果取得了南京上海，很可能就要发动一个反共运动，以取悦于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

……

三中全会结束后的一两天，林祖涵告诉我，国民政府已有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秘密命令，交给程潜执行。他向我说明连日少数要人集议的结果，决定责成二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不使蒋氏在南京另建中心的阴谋得逞。如蒋氏违抗，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便可根据国民政府的密令，将蒋氏逮捕起来。

林祖涵还说到这个重要措施，似是鲍罗廷所授意，为各主要人物所一致同意的。他因为是程潜军的党代表，才知道了这个机密。他认为程潜即将出发前线，对反蒋颇具诚意，表面上虽然满口答应要完成这个重大任务，但暗中也流露出身当其冲、踌躇为难的神情；所以将来能否执行这个密令，还是有问题的。我虽事先未与闻其事，但对于即将偕同程潜驰赴军旅、肩负重责的林祖涵同志，仍予以鼓励。并立即用机密方法，通知上海中共中央，请就近予程潜以协助。

……

四面楚歌中的武汉，亟图予蒋氏以实力打击以求取出路。鲍罗廷在那几天(指一九二七年四月——编者)的态度似近于疯狂，他曾向我表示，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都要先肃

清内部，现在我们内部已产生了第二个陈炯明，怎样谈到北伐？目前，应乘蒋介石立足未稳，迅速东征，除去这个心腹之患，武汉才能立足得住。鲍罗廷这种议论，至少在表面上得着了武汉要人们的热烈支持；这些支持似也鼓励了鲍罗廷的勇气。

加仑将军在这个问题上却抱有不同的见解。

……

几天之后，鲍罗廷的主意显然已经转向。他在一次中共中央（当时中央委员多数已来武汉）的会议上曾表示，现在奉张的军队正沿京汉路向信阳南下，如果此时东征，武汉有受奉张侵袭的危险。因此，武汉的军队应先配合冯玉祥部，消灭河南方面的奉军，再定第二步办法。

……

五月初（指一九二七年——编者），鲍罗廷重新提到他的西北计划，但显然已有退却的意味。他说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太大了，西北却是帝国主义势力所不及的地方。那里不会有象武汉这样的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又接近苏俄和外蒙，便于获得援助，因而西北是最好的革命根据地。他当时所提出的西北计划，其着眼点显系移到了陕甘一带，与在广东时所说到的沿京汉路北进，掩有西北西南的大西北主义是有分别的。这自然也有寄希望于冯玉祥之意。……

……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开始举行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未改善中共内部的混乱状况。……

……

我们之中不少的人觉得要彻底检讨过去，才能开展未来的生机；但一触及具体问题，又觉难于下手。陈独秀先生的

地位是动摇了，但谁能在这个紧急关头继承其事，又大成问题，尤其是想到继任人选所能够组织新中央的阵容以及他们将能够做出一些甚么事情，则更难逆料。而且大敌当前，我们自身检讨又可能降低自信，反而增加困难。再说检讨过去，也会涉及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是否正确的问题。当时共产国际领导的威信是在低降之中，我自己和其他一些同志就觉得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是错误的，一切不应单独诿过于陈独秀先生。更多的人则不满意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譬如当时的瞿秋白就觉得鲁易的空谈误事，其危害是有过于陈独秀先生的。不多过问中共内部事务的鲍罗廷，则以不应动摇现有领导为理由，主张少检讨一些过去，多策划一些未来，瞿秋白原拟对陈独秀先生发动检讨攻势，在鲍罗廷这种意见影响之下，也暂时止步了。

……

大会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和土地问题等决议，并发表宣言。这些是鲁易、威金斯基、沃林（当时在武汉的一位苏俄籍的土地问题专家)、陈独秀、瞿秋白等人花了许多时间的作品。在政治问题上，大会强调无产阶级应领导武汉这个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左派政权，对抗资产阶级的代表人蒋介石的叛变。但中共事实上所做的是随着那些国民党左派政客（所谓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的动摇态度而摇摆不定。在土地问题上，大会决议，没收大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但中共事实上所做的，却是纠正工农运动过火。这些与大会不符的做法，却出自鲍罗廷的意旨，而他那时是最能影响中共中央行动的一个人。

……

正当中共遭受到严重的打击陷于被围攻的时候，共产国际的一份有名的电令，于六月一日到达武汉了。……

……

……鲍罗廷和威金斯基都曾确切表示，这个指示一时无法执行。鲁易也在这个会议上表示了难于实现的看法，因此，会议一致决议，回电莫斯科，告以无法立即付诸实施。

……

不料正在这个紧急关头，鲁易的一个不可理解的行动，使时局更形恶化。他事先没有与任何人商议，将共产国际的机密电报，交给汪精卫看；并依汪的要求，送给他一个副本。莫斯科这个电报似是没有明了马日事变已使中共处于四面受敌的地位，以为鲍罗廷等还能左右时局，所以电令鲁易和鲍罗廷指导中共奋起反击，以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不用说，这个电报是不能向外公开的。鲁易本人并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电报，明知已复电暂不执行，竟反而将这个电报交汪阅看，使人殊难理解其用意所在。

……

自此事件后，鲁易和威金斯基等人立即在武汉消失了。大概是莫斯科急电他们迅速离开武汉，一切交由鲍罗廷应付。可是鲍罗廷也显得垂头丧气，声言要到庐山去休养；并告诉我们莫斯科另派代表来指导中共工作。

（摘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年12月出版。）

陈公博关于鲍罗廷的回忆

赣汉对立的空气一天紧张过一天，在江西方面张静江先生依然倔强不让，而在汉口方面则孙哲生和徐秀龙俨然揭起反蒋的大旗，……蒋先生终于一天到了武汉，那里自然也照例开了一个欢迎大会，但大会场中少不免有许多蒋先生所不满意的口号和标语出现。末后蒋先生和鲍罗廷办过一次直接交涉，任翻译之责的是宋子文，他们争论了许久，鲍罗廷最后对蒋先生说：

"你想众人都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件故事吧，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各大臣说话。有一天他对着各大臣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各大臣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找狗去。'"

……蒋先生听了这段故事，遂决意要驱逐鲍罗廷。他回至江西，在路中上了牯岭，提出驱鲍问题，当时张静江自然赞成，……

（摘自陈公博：《苦笑录（1925—1936年）》，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1年4月。）

第三部分

鲍罗廷在中国活动纪要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年）

（一） 来中国以前的经历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Михаил Маркович Бородин），曾用名格鲁申贝格（Грузенберг）。

一八八四年七月九日　生于沙俄前威帖布斯克省。在拉脱维亚度过了童年时代，并在那里上学。

一九〇〇年　参加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简称“崩得”），从事推翻沙皇的活动。

一九〇三年　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布尔什维克，在里加活动，在党内用化名基里尔（Кирилл）。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　作为里加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的代表出席在芬兰塔墨尔福斯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

一九〇六年四月　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不久被捕。释放后，党派他到英国宣传俄国革命，在旅英俄侨中活动。

一九〇七年春　到美国波士顿，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在夜校开展革命活动，和朋友们创办刊物《美国工人》。

一九〇八年　去芝加哥，为俄侨组织了一所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政治学校，同时参加了美国社会党，并担任“帮助俄国政治犯协会”财务主任职务。①

① 关于鲍罗廷在美国活动的记述，参见1953年9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有关鲍罗廷逝世、追述他的生平的文章。

一九一八年七月　回苏俄，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不久，鲍罗廷受列宁委托把列宁所写的《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送到美国去。此信开头写道："有一个参加过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后来在你们国家住过多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向我建议，由他带一封信给你们。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①这个布尔什维克即是指鲍罗廷。这封信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在纽约社会党人国际主义者出版的杂志上摘要发表，在美国其它期刊上转载过多次。

一九一九年三月，鲍罗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由共产国际派到美洲，化名布兰特温（Brantwein）到了纽约，但很快被警方发现，无法在美国住下去，同年初夏，又到墨西哥，在这里，他遇到了罗易，并引导罗易推动墨西哥社会党转变为共产党。十二月，鲍罗廷作为苏俄代表参加了在西班牙举行的马德里万国邮政协会会议。

一九二〇年二月，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然后经柏林回莫斯科，继续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并把列宁的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译为英文。随后，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一年一月，任共产国际驻柏林特使。七月十四日，应列宁之约，写了关于美国工农联盟第三党（或称非党派党）的报告材料，深受列宁赞扬。②八月至十二月，参加共产国际会议。

一九二二年二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时任英国委员会委员；三月，再次参加共产国际会议。会后，他化名乔治·布朗（George Brown）被派往英国。八

① 《列宁选集》，1971年中文版第三卷，586页。
② 列宁曾为此写过两信（1921年7月13日，7月16日），中译文见《列宁文稿》第九卷，167、224页。

月，在格拉斯哥被捕，判苦役半年，期满后，回国。

一九二三年　加拉罕出使中国，建议鲍罗廷到中国担任孙中山的首席顾问，得到同意。

（二）在中国的活动纪要

一九二三年

八月　鲍罗廷到哈尔滨。后即到沈阳，多次会见张作霖，商讨中东铁路悬案问题。

九月　鲍罗廷到达北京，向中共党员了解中国情况，询问对国共合作的看法。

九月二十三日　加拉罕为鲍罗廷写介绍信往见孙中山。

九月末　鲍罗廷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和其他中共党员。后即乘小船南下去广州。

十月六日　鲍罗廷到达广州，住亚洲旅馆，后即移住东山。

十月九日　孙中山举行欢迎鲍罗廷的招待会。孙中山发言指出，鲍罗廷来自一个短期内结束内战而立于强国之林的国家，苏俄不愧为中国革命的模范。鲍罗廷应约介绍苏俄革命经验。他强调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以及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①

十月九日、十一日　鲍罗廷与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党员瞿秋白、谭平山、阮啸仙等人谈话，研究改组国民党计划。②

十月十五日　在广州市立公园举行国民党员盛大集会。孙中山、鲍罗廷都出席了大会。鲍罗廷演说号召群众团结在国民党周围。

①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文版，34—35页。

② 叶尔马舍夫：《孙中山》，莫斯科，俄文版，261—262页。

十月十五日至十六日　鲍罗廷分别参加广州国民党员、外交部以及廖仲恺个人举行的欢迎会。鲍罗廷在讲话中阐明建设一个组织良好、团结的、矢志民族解放的党的重要性。

十月十八日　觉悟社记者访问鲍罗廷，询问对中国社会、政治的看法。鲍罗廷指出："将来引导国民运动以至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①

十月二十一日　鲍罗廷陪同孙中山、宋庆龄等赴虎门要塞巡视，次日返回广州。

十月二十五日　孙中山聘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

同日　鲍罗廷在孙中山召开的五十多个著名国民党员集会上就国民党改组和章程草案作了报告，指出全世界压迫和被压迫民族进行着长期斗争，而力量的联合成为生死存亡的问题。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了进行坚决斗争团结人民群众。要在中国完成类似的任务，国民党应当进行改组，通过人民明白易懂的纲领并以各种通俗易懂的方法向广大人民群众介绍这个纲领。只有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党才能达到统一和独立的目标。

十一月七日　鲍罗廷在广东工联等团体举行俄国革命六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号召中国人民为独立自由而努力奋斗。

十一月十二日　因获悉陈炯明军队占领石龙，政府军向广州退却，孙中山召开军事会议。鲍罗廷在会上强调有目的的军事行动的重要性，然后通过决议动员全体国民党员保卫城市；与此同时，中央执行委员还应立即乘汽车分赴各地区。

① 鲍罗廷：〈文明国开化退步国〉，原载《商报》1923年10月19日电讯。转引自《向导》第45期，1923年11月19日。

鲍罗廷的军事计划，深得孙中山的赞扬。鲍罗廷并指出，前线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因国民党在农民中间工作薄弱，因而农民对事件的态度是消极的，有时甚至帮助敌人。孙中山亦表示同意。

十一月十三日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召开所有地区（12个）的委员会。廖仲恺任会议主席，他扼要讲述了当时的形势，然后请鲍罗廷讲话。鲍罗廷考虑到前线的危急形势，在征得孙中山的完全同意后，坦率提出重要的建议——即颁布给农民分配土地、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以及使小资产阶级得到好处的法令。廖仲恺把鲍罗廷的发言逐句译为英文。鲍罗廷的主张在群众中特别是党团员中受到热烈的欢迎。①

十一月二十五日　孙中山在大本营发表演说，指出国民党改组的用意，强调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②

十一月二十六日　鲍罗廷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这次会上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③授权廖仲恺进行筹备工作。

十一月二十九日　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林直勉等十一人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国民党改组，并大肆污蔑共产党。孙中山阅后在书信上作了批示：国民党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

---

① 见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文版，第40—43页。

② 《中国国民党周刊》第2期。

③ 根据1923年12月18日廖仲恺给蒋介石的电报，廖之任政治部主任，系鲍罗廷推荐的。见《蒋介石日记》，1965年版第219页。

为汉文，……切不可疑神疑鬼。”“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常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耳”。①

十二月三十日　鲍罗廷在上海收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于十一月二十八日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如何解释中国革命发展新阶段的三民主义，作了阐述：民族主义应当意味着“国民党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民权主义，应当是“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民生主义应当解释为外国商行、企业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但不能解释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应该提出土地归劳动者所有的口号。决议关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解释，实际上成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基本原则。

十二月末　鲍罗廷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国民党上海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提出了国民党改组的纲领草案。参加讨论的有廖仲恺、瞿秋白、汪精卫、胡汉民等。草案由瞿秋白译为中文，又将修改重编稿译成俄文，交鲍罗廷研究。②

一九二四年

一月初　中共中央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次联席会议在上海举行。鲍罗廷、瞿秋白和陈独秀都出席了会议，讨论改组国民党问题。鲍罗廷叙述了自己作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的

① 邓泽如编：《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上海正中书局1948年版，301—308页。

② 鲍罗廷自述。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东方》1969年俄文版，第309页。

工作情况，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使民族革命运动真正地依靠人民群众。国民党的改组正在朝着这个方面进行。……这项工作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拟定的、得到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赞同的、经过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讨论的计划进行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按照共产国际关于支持民族革命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建立起来的。"①

一月上旬　鲍罗廷自上海回广州。

一月十八日　在广州召开的共产党员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鲍罗廷谈到在民族革命现阶段国民党的作用和任务。他说："我们努力使国民党真正成为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切实地发展它，赋予它斗争的意义和口号，促进它达到最后的目的。国民党作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代表，应该掌握政权，为此必须使国民党成为战斗的党。"②

一月二十三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

一月二十五日　鲍罗廷获悉革命导师列宁于二十一日逝世后，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悼念列宁的讲话。他指出："列宁现已死，而列宁主义仍在，所以列宁死了之后，关于东方，关于被压迫民族，国民党之责任，须加重一点，国民党领袖，责任亦加重一点，列宁虽死，列宁主义万岁！"③

二月十六日　孙中山致函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契切林，

① 见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文版，第56页。

② 卡图诺娃：《共产国际与国民党改组的一些问题》，见《共产国际与东方》，1969年俄文版，第308—309页。

③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26日。

"对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为我们做出贡献的鲍罗廷同志表示深深感谢。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他的中国之行显然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①

三月八日　鲍罗廷应加拉罕电约，由广州启程前往北京。②

四月十六日　应孙中山要求，鲍罗廷和加拉罕电莫斯科提出给广州派五十名军事工作人员，其领导者须是有战斗经验的人。③

五月三十一日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暂定管理中东铁路协定》正式签字。鲍罗廷到沈阳参加了这次中俄谈判。

六月十五日　鲍罗廷从上海乘船启程前往广州。

六月十六日　在苏联和中共帮助下，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正式成立，这天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发表演说，强调接受俄国的革命教训，学习苏联的榜样，建设革命的军队。稍后，共产党人周恩来担任该校政治部主任。恽代英等任教官。鲍罗廷于二十二日回到广州。

六月二十五日　鲍罗廷在广州东山以国民党训练员身份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进行了谈话，驳斥了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右派言论。

十月十日　革命委员会成立，孙中山任会长。孙中山强调"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十三日，任鲍罗廷为委员会顾问，规定"遇本会长缺席时得有表决权"。④

十月十四日　鲍罗廷在革命委员会提出联合各种力量镇

---

① 《著名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俄文本，28页。

② 据《申报》1924年3月11日第四版载香港10日发出的电讯报道，鲍罗廷"前天赴北京。"

③ 同注①第31页。

④ 任命状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压商团叛乱的计划，粤军一、二师分别由李济琛、张名达统率，许崇智统率全部粤军，范石生统率滇军，所有军队在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下进行活动。

十一月一日　革命委员会开会，由孙中山主持，鲍罗廷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发表北上宣言。

十一月十三日　鲍罗廷随孙中山乘永丰舰离粤北上。孙中山途经上海取道日本转赴天津。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抵北京。

一九二五年

一月　孙中山令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政治委员会由广州移至北京，以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于右任、陈友仁、李大钊、邵元冲为委员，鲍罗廷继续为顾问。二十六日，孙中山病势加重，入协和医院施行手术。确诊为肝癌。政治委员会是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预立遗嘱问题。

一月至二月　鲍罗廷到张家口访问冯玉祥。冯玉祥同意国民党宣传人员进入国民军并宣传新三民主义。

三月十二日　孙中山于上午九时三十分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孙中山要求鲍罗廷向莫斯科转达他的遗言和给苏联的信。①

四月二十一日　鲍罗廷再次访问冯玉祥。②

春　张太雷在广州东校场一所二层楼下，负责为鲍罗廷组成了一个翻译室，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傅大庆、杨明斋、李仲武、卜士奇、黄平等人，当时在中国的胡志明（公开用名

---

① 据贾丕才《苏中关系》，俄文版第144页。书中引述鲍1925年3月14日在苏联使馆的报告。

② 参见《中华年鉴》（China Year Book），1925年，第922页。

李瑞，或阮爱国）后来也参加了。

五月十七日　鲍罗廷刚由北京经河北、河南回到广州，便参加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全体职员联席会，并作了报告。他勉励说："打仗要为人民利益而战，不要为个人私利而战"，"中国国民党可说是完全为国为民的政党，大家要极力拥护它"。①

六月　鲍罗廷两次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作了报告。讲到"俄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有志救国的军队之地位"等题目。他提出目前有三件要事：(一)研究军事学问，使训练和组织都可得到好处；(二)我们要告诉军士和人民，使人人懂得要从军阀和帝国主义压迫下求解放；(三)我们要仔细研究怎样才能与人民结合。

七月一日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为主席。国民政府聘任鲍罗廷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高等顾问。

同日　鲍罗廷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军事会议。出席此会者尚有加仑(Галин，又名Блюхер)、罗加乔夫(Рогачёв)、尼洛夫(Нилов)、切列潘诺夫(Черепанов)、斯捷潘诺夫(Степанов，又名Зильберт)、列密(Реми，又名Угер)等八人。决议委派斯捷潘诺夫、切列潘诺夫、玛采利克(Мацейлик)分别为蒋介石师部、黄埔军校、朱培德军部、湘军、陈铭枢师部顾问。

八月二十日　廖仲恺被凶徒狙击逝世。据鲍罗廷提议，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联合会议议决组织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任委员，负责处理此案。

九月六日　鲍罗廷在湘军讲武堂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追悼廖仲恺党代表大会上演讲。他说，有三条铁链束缚

① 《鲍罗廷报告时局和讲演：吾人之责任》，载《中国军人》第6号，1925年8月17日出版。

孙先生的主义使它不能实现，即穿制服的土匪，抢夺的政客，糊涂的党员。孙先生就是因为这三条铁链受气而死，廖先生也因此被杀。他提出要破坏这种铁链，要研究国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孙中山的主义。①

九月　鲍罗廷向中共中央说明，为稳定广东政局，胡汉民必须离开广州，决定以国民党代表名义派他去莫斯科列席共产国际执委会议。

十月七日　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十六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建立莫斯科中山大学。他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中山大学学习，并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选拔委员会。鲍罗廷担任这个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会建立后，迅即在广州、上海、北京选拔学生。

十月十四日　鲍罗廷在国民党政治特别训练班作了“国际情形”的报告。

十一月七日　广州各界庆祝苏俄革命八周年纪念大会在广东大学操场举行，与会者四十多团体计五六万人；会后又由俄代表欢宴各界代表。鲍罗廷在两次集会上先后作了长篇演说，论述革命势力的联合与革命成功等问题。

十二月一日　鲍罗廷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讲到中国国民运动屡次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强大的革命军和人民的团结。“诸位出去是要担任改造中国的人物”，希望“第一军队要有纪律，一为军事的纪律，是要团结摧毁敌人的，敌人来摧毁，决不退让；一为政治的纪律，我们是要为人民利益奋斗而牺牲的”。②

---

① 演说词见《先锋》半月刊，第1期，1925年11月印。

② 见《鲍罗廷训词》（1925年12月1日），载《先锋》半月刊第3期，1925年12月印。

十二月　鲍罗廷在中共广州地委召开的支部书记、干事、组长及重要工作同志参加的会议上讲述反基督教运动的政策等问题。①

一九二六年

一月一日至十九日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鲍罗廷在一日和十九日举行的欢宴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时，均发表了演说。在十九日的宴会上，他着重指出："一个革命的党，非有严密的纪律和有纪律的军队不可，——但是要有纪律的军队，就非有党的指挥和训练不可！……希望今后的国民党能以纪律来支配工作，并引导其成功"。②

一月二十一日　在广州的广东大学操场举行李卜克内西、列宁纪念会。到会有二万人以上。设三个讲台，主席为中共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学联的代表。高语罕、张国焘、恽代英等报告李卜克内西、列宁、卢森堡的历史。鲍罗廷作了演说。③

二月四日　鲍罗廷以"奉召回国述职"为由，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请假一月，离开广州。

二月十四日　鲍罗廷到达北京，向来华视察广东和冯玉祥部队中苏联顾问情况的苏俄观察团团长布勃诺夫提供关于广东革命根据地情况的报告。他写道："随着许崇智的出走、梁鸿楷被解除武装、胡汉民被派往莫斯科，在广州似乎形成了一个统一而又牢固的政权……可以认为，在六名军长中有四名是可靠的(即指一军蒋介石、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

① 据《中共广州地方书记报宣传部十二月份工作报告》1926年1月1日。
② 见《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6年。
③ 《管祝迪（广州地委的代号）关于李列纪念情况报告》，1926年2月8日。

军〔六军〕程潜）……我们同他们未必会发生误会……有了这些指挥官就可以作很多工作”。报告还对解决土地问题与革命前途作了分析，他主张只有那些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唯有经过土地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的人才可算是国民党左派。①

三月二十日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

四月五日至七日　鲍罗廷至库伦（乌兰巴托）逗留三天。三次往访正拟赴苏访问的冯玉祥，谈及改组后国民党与冯玉祥之国民军合作事宜。②

四月二十九日　鲍罗廷回到广州。

五月初　鲍罗廷与蒋介石多次商谈国共合作问题，蒋介石提出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种种要求，鲍罗廷为维护国共合作，采暂时让步政策。

五月十五日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

五月　鲍罗廷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广东全省农民大会上作了世界革命运动状况的报告。

六月初　鲍罗廷给广州全体顾问团作的专门报告中谈及统一战线中力量划分，认为国民党由五派别组成：一、原先的国民党人、西山会议派，他们继续认为自己是党的成员；二、与买办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右派；三、以蒋介石的军人集团为首的中派分子；四、国民党左翼的代表人物即仇恨帝国主义的小

① 见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文版，第317—318页。

② 见《冯玉祥日记》第二编，1926年4月5—7日所记，其中写道，“鲍罗廷、于右任来，详谈国民党国民军合作事”（5日），“余同尼大使送鲍顾问诸位至西郊，诸君直往莫斯科”（7日）。后鲍罗廷等未到莫斯科，而经乌兰乌德、海参崴，南下回广州。见切列潘诺夫，同上书，第350—356页的记载。

资产阶级分子；五、中国共产党。①

七月九日　国民革命军开始由广东出师北伐，分三路进军：一路入闽，一路入赣，一路入湘，入湘是主攻方向。十月十日攻下武昌。北伐期间，鲍罗廷在广州。

八月三日　鲍罗廷在黄埔军校讲军事政治问题。②

九月三日　鲍罗廷对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毕业生作了《革命的基础问题》的报告。他说："我们要革命成功，必先要革命的基础稳固。不然，我们的革命是空谈的了，过去通通的错误都在这一点，都是没有解决这个基础问题"。革命的基础问题，就是农工问题。

十月一日　鲍罗廷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作了《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报告。③

十月十日　鲍罗廷在辛亥革命十五周年纪念日向前线归来的纠察队员讲话："现在的情形，我们广东好象右翼，江西福建为中路，天津满洲为左翼。我们右翼与帝国主义奋斗十五个月了，现等到中路与左翼预备好了，再行进攻。现在将中路左翼的反动军阀肃清，使人民得到团结，工农得到发展，那时中左路可以一齐向帝国主义进攻"。④

十一月十二日　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迁武汉。

十一月十六日　鲍罗廷偕国民政府代理外长陈友仁、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等离粤经江西北上。

---

① 见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文版，第393页。

② 见《黄埔军校1926年大事》，载《黄埔日刊》（新年增刊之二），1927年1月4日第3—5版。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③ 《黄浦潮》周刊，1926年10月10日出版。

④ 见《工人之路》第461期，1926年10月11日。

十二月一日　鲍罗廷在南昌群众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中国农民贫困的原因和实现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的重要性。

十二月十日　到达武汉。

十二月十三日　在鲍罗廷建议下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会议设武昌，后迁汉口。委员除鲍罗廷及外交、司法、交通、财政四部部长外，尚有宋庆龄、邓演达、吴玉章、唐生智、董用威(必武)，于树德等，以徐谦为主席。①

十二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鲍罗廷的联席会议。十二月十三日，陈独秀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批评鲍罗廷所认为的应以是否赞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识别国民党左派的标准的看法是"一种新奇的逻辑"。陈独秀认为只要赞成减租减息的就是国民党左派。②

十二月二十二日　鲍罗廷在武汉临时联席会上提出反英办法及行动。

十二月二十七日　鲍罗廷在联席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就广东国民党拟定限制工人的处理办法提出反对意见；呼吁保障人民言论结社罢工等自由。③

十二月二十八日　在武昌作《英帝国主义最近对华政策》的报告。

十二月三十一日　鲍罗廷在联席会议第八次会议上提出

① 见1926年12月22日徐谦在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见该次会议记录油印本，1926年。

② 见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年12月13日）。

③ 《国民党、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第六次会议记录》，油印本，1927年。

"省民会议案"，指出此会开会时"必须顾及革命的民主主义"，"必须使社会最重要阶级均派有代表出席会议。重要阶级中如商人为极重要者……其次知识阶级为革命之推动机……第三工人阶级……对于商工农及知识阶级之政策，均可于人民会议中一一实现之。"他又说此省民会议，是全省的立法机关，先从湖北省作起。①

一九二七年

一月一日　鲍罗廷在汉口民众庆祝大会上演说，庆祝十五年前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纪念日、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以及湖北省政府将要成立三件大事。他强调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把基础建立在农工商学兵身上。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是政府的基础，所以人民应管理并监督国民政府及省政府。②

一月二日　鲍罗廷在商民协会演说，强调大家团结起来，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建立人民政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希望在过去破烂的遗产上造成幸福的国家。③

一月三日　英帝国主义水兵用刺刀驱逐在英租界附近集会的群众，当场刺死一人，伤数十人，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鲍罗廷在联席会上提出"政府必当采取适当方式保护人民，在二十四小时内，当可决定办法，防止以后再有此等之事发生，及为人民报仇雪耻"。④

同日　鲍罗廷在临时联席会议第九次会议上提议以临时

---

① 《国民党、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第八次会议记录》，油印本，1927年。
② 见1927年1月6日《汉口民国日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北迁纪念增刊》。
③ 《鲍顾问演讲集》，1927年3月汉口长江书店印。
④ 《国民党、国民政府联席会议第九次会议记录》，油印本，1927年。

联席会议名义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经徐谦附议通过。

一月四日　在湖北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作了演说。谈到中国落后三要素：封建制度、军阀、帝国主义。而打消这些障碍物，要有实际办法，即一，注意发展强大的工人组织，不仅注意生活之改善而且要注意整个的根本问题；二、帮助农民斗争，废除奴隶似的剥削制度；三、对商学界等指出相同利益，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废除对农民的剥削，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在谈及中国工人特点时强调"非常幼稚""非常落后"这一方面。

一月五日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鲍罗廷于这天作了讲演。他谈到党的情况与中国现状的关系，指出目前党的情况只可说是一宣传机关，而不能是一领导国民革命的党。党一定要有真正的权力，它不仅要煽动和宣传，还要有指导与决定的能力。他主张对土地问题、农工问题，坚决的用强力处置一切，强健中央党部，才可以使党站在领导的地位。①

一月九日　蒋介石从南昌到武昌，观察形势，三十多万群众开会"欢迎"他。鲍罗廷在会上讲话强调反对个人独裁，要依靠人民群众，提高党权。蒋介石很生气，会后即回南昌，并电国民党中央说鲍罗廷侮辱了他，要求撤换鲍罗廷。②

一月十日　汉阳兵工厂工人集会。鲍罗廷作演说指出，"兵工厂是革命的，造一支枪的时候，应当记住这支枪是打反革命的，造一粒子弹时应当记住这是打反革命的，反革命

① 报告全文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0日，1月23日，1月24日。
② 据《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140页。

打倒了，中国人民就能得到幸福”。①

一月十一日　鲍罗廷作了关于办报方法的报告，主张报纸要有丰富真确而具体的事实，还要根据这些事实以正确的意见作评论。评论不要零碎的、偶然的，而要经常的、系统的。②

一月三十一日　董用威（必武）代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向临时联席会议要求，谓“该会第三次会议议决，嗣后关于广大民众所认为罪大恶极请求枪决之土豪劣绅，政府应准予执行。”鲍罗廷认为民众打死土豪劣绅虽是不法行为，应告诉是不许可的，但不许只是消极的，应更有积极的，应由党及政府受理人民之要求，则更为积极。③

二月至三月　维经斯基自上海来到武汉，与鲍罗廷商谈对蒋介石的政策，鲍罗廷这时主张联唐（生智）反蒋，维经斯基则希望革命阵营不要分化太快，曾去南昌寻求同蒋介石妥协，事无结果又经武汉返回上海。与此同时，蒋介石已在与帝国主义勾结。

三月初　共产国际发出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强调“必须坚持武装工农、把各地农民委员会变成拥有自卫武装的实际权力机关等方针”，“共产党不应当掩饰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的和反动的政策，必须动员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周围的群众去揭穿国民党右派”，“中国革命正经历着危急的时期，只有在展开群众运动的坚决方针下，革命才可能获得进一步的胜利”。④

三月十日至十七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鲍罗廷出席了会议。会议确立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

①② 见《鲍顾问演讲录》。

③ 《联席会议记录》，油印本，1927年。

④ 《斯大林全集》第10卷19—20页。

会和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改选了常务委员、各部部长、政治委员、军事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实际上剥夺了蒋介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三月二十三日　鲍罗廷在武汉国民党政治会议提出“关于上海外交问题”，并通过决议如下：“一、由外交部长发表对外宣言；上海战事终了，要求撤退驻上海外兵；二、由党部指导民众作扩大宣传，要求撤退驻上海外兵。用谈判方法，磋商收回上海公共租界。”①

三月二十八日　鲍罗廷在政治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提议，南京、上海克服，应发宣言，指出时局之重要意义，“要求撤退外兵”。②

四月二日　鲍罗廷参加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指出蒋介石在上海“已经形成一个反动中心。”他还是力图劝说蒋介石离开反革命道路，“假使我们不是爱惜蒋同志，就任从他在上海听他将来弄到一个失败的结果给我们看的。现在我们要他离开上海反革命重心，免他受包围走去反革命。”③

四月八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汉口举行扩大会议，谭平山主持会议，吴玉章、林祖涵等二十六人出席，鲍罗廷与罗易列席。鲍罗廷向与会者介绍了罗易的革命经历和来华使命。

四月十二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四月十五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蒋介石反

---

①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纪录》油印本，1927年。

②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纪录》，油印本，1972年。

③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日，油印本，1927年。

共事件的声明》。

四月十九日　南京国民政府发表所谓通缉鲍罗廷、陈独秀等一百九十七名共产党首要分子令。此后很多地区大肆迫害共产党人。

四月二十日　由于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包围，武汉与外地联系被截断，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在此情况下，鲍罗廷在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提出"战略退却"的口号。他说："自从东南的反动气焰高涨，增加了帝国主义者向我们进攻的力量。而因为反动派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更使我们不容易向他们进攻。但革命的工作是不进则退，不能中途停止的。为应付这种恶劣的环境，只有暂时采取战略上退却的办法。我们都晓得革命党在根本上是不能有什么退让，现在所谓退却，只是战略上的退却，同根本理论并不发生妨害。"他提出五条办法："(一)政府与工会人员合组一委员会，其目的在执行工人之革命纪律，同时由工会组织裁判所，审判并处罚违犯革命纪律的工人；(二)由政府与外国银行商店协商，使他们在湘、鄂、赣、皖南、豫南，西至于（四川）万县等处，都可以公开的贸易，并由(武汉)政府与工会代表组织委员会，执行(武汉)政府与外国银行商店所定之协商，此委员会有调用纠察队与武装力量之权；(三)除得第二条规定之委员会同意外，外国银行商店中工人不得自由罢工；(四)(武汉)政府应尽可能的力量，迅速规定铜元及一切必需品之最高价格；(五)立刻设立失业局与失业者饭堂。"①

四月二十二日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发表《为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宣言》。

---

①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速记录》，油印本，1927年。

四月二十六日　鲍罗廷在武汉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对土地问题意见。指出："最重要的为实行农村自治的建立，必须有强健的农村自治的建立，必须有强健的农村自治组织，才可以执行解决土地的办法，不致发生毛病。""对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已入了反动势力之下的省份，应派同志秘密活动，使农民起来，推倒反动势力。"①

四月　鲍罗廷在武昌农民协会作了题为《湖北的农民运动》的报告。②

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上旬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举行。国际代表罗易、维经斯基及鲍罗廷都出席了会议。罗易在会上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要巩固革命基地，深入土地革命；批评了鲍罗廷和陈独秀要把根据地移到西北去的理论。但罗易对如何实现领导权，如何有步骤地开展土地革命等问题，没有提出具体实现方法。

五月二十五日　马日事变后第四日，鲍罗廷偕武汉国民党中央之特派员陈公博、谭平山等五人赴湘查办许克祥，行至岳阳，许克祥密电岳阳驻军将特派员"就地拿获枪决"。查办团闻讯即返回武汉。

五月十八日至三十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五月二十四日斯大林在全会第十次会议上发表《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演说，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会议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出紧急指示，指出：立即实行土地革命，改造国民党现在的机构并增加新领袖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武装五万工农动员两万共产党员组成可靠的革命军队，组织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

① 《武汉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油印本，1927年。

② 载《中国问题汇刊》（俄文），1927年第9期。

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①此电报发给鲍罗廷和罗易。

六月一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政治会议通过解除聘任鲍罗廷为顾问的合同。十七日，陈友仁正式通知鲍罗廷，武汉国民党中央已解除他的职务。

六月五日　罗易向汪精卫出示共产国际来电，并给他一个副本，使汪精卫叛变革命有了借口。

六月十九日　冯玉祥到徐州见蒋介石，经三天密谈，决定反共、反苏、宁汉合作。冯玉祥电武汉国民党领袖，谓经决定令已解职之鲍罗廷回国。

七月上旬　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改组，组成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参加的政治局兼常委。十三日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

七月十三日　鲍罗廷和瞿秋白去江西庐山，研究对策。

七月十四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刻不容缓地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但仍留在国民党内不退出国民党。

七月十五日　汪精卫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

七月二十七日　鲍罗廷等苏联顾问与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起程在洛阳稍加停留后经蒙古回莫斯科。②

（三）回国以后

鲍罗廷离开中国以后，仍然关心中国问题，多次发表有

①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0卷，31—32页。

② 与鲍罗廷同行的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1928年写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民》(《China's Millions》)一书曾详细记述了这段经历，鲍罗廷一行于8月9日至西安，19日至平凉，20日至固原，24日至宁夏（今银川），9月18日到达乌兰巴托。

关中国革命的演说、文章，参加过陈独秀问题的讨论。1927年9月途经乌兰巴托时，作了《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报告。①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作了一次报告，说"三·二〇事件""在任何程度上都不可能妨碍工农运动的发展；"整理党务案通过的那次会上中国共产党"作的让步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中国共产党不作出让步，那就意味着同国民党合作的终止，革命力量就会局限在一个省里。"②为右倾立场辩护。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作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报告说他在中国革命中的错误，在于他与陈独秀之间发生了重大不同政见，而他没有把这不同政见引到公开斗争；他说当时有广东路线与上海路线的对抗；假如他的路线和陈独秀路线引起公开斗争，就不会有武汉时期那样的失败。③

鲍罗廷回莫斯科后，历任劳动人民委员、塔斯社代理负责人并在外文出版社工作。一度曾任《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编辑主任，与斯特朗在一起工作。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二月初，与斯特朗同时被捕。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死于远东靠近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劳动营中。后来苏联为他恢复了名誉。①

张注洪　杨云若编写

① 蒙古《乌兰巴托新闻》，1927年9月28日。

②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文版，第392页。

③ 《中国问题汇刊》俄文版，1929年第3期，210页。又见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

④ 参见切列潘诺夫1964年6月30日在苏联《莫斯科真理报》所发表的《革命的列宁主义者》一文中的记述。

附　录

未收入本书的鲍罗廷其他著述及有关资料简目

I、未收入本书的鲍罗廷其他著述

《任何东西没有遗忘，任何事情没有开始》

Ничего Не Забыли, Ничему Не Началось

《赤色职工国际》俄文版第6期，1921年10月22日。

《英国煤矿工人罢工及其教训》The Strike of English Miners and Its Lessons

《共产国际》英文版第18期，1921年10月。

《加地夫（Cardiff，英国威尔斯东南）会议》

The Cardiff Congress

《共产国际》英文版第19期，1921年12月。

《劳工研究部汇刊（书评）》Bulletin of the Labour Research Department

《共产国际》英文版第19期，1921年12月。

《互相庇护》Рука Руку Моет

《共产国际》俄文版第20期，1922年3月。

《伟大的叛逆的历史》История Великой Измены

苏俄彼得堡国家出版社，俄文版，1922年

《湖北省的农民运动》（在武昌召开的农民代表大会上的演说）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Провинции Хубей

《中国问题》第9期，1927年，4—44页。

《封锁在嘲弄》（记者凯彻姆访问时鲍罗廷的谈话）．

Die Blockade Verspottet. Der Sonderberichterstatter des Daily Express, C. J. Ketchum, hatte in Hankau am 4. Mai 1927 ein Interview mit Borodin

《国际新闻通讯》（Inprekorr.）第49期，1927年5月10日。

《鲍罗廷同志报告：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

Prichiny Porazheniia Ki-



taiskoi Revolutsili

《乌兰巴托新闻》(Izvestiia Ulan-Batorkhoto) 第73号，1927年9月28日。

《〈广东农民运动，中国土地问题资料〉(沃林、约克合著)一书序言》。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Kwangtung, Materials on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China, Under the editorship and a Preface by M. Borodin, Canton

1927年4月广州出版

《中国革命的前途》(1929年5月20日在莫斯科的报告)

(蔡和森的《论陈独秀主义》一文曾引述此文，但是否发表和发表何处，不详)

《鲍罗廷自述》

М.М.Бородин

《俄国革命运动活动家》第5卷第1—2部分，莫斯科，1931年。

2、其它有关资料

Ф.С.鲍罗廷娜：《在中国反动派的刑讯室里(我的回忆)》 Застенках Китайских Старапов (Мой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苏联国家出版社，1928年版

Ф.С.鲍罗廷娜：《中国的妇女》 Женщина В Китае

苏联国家出版社，1928年版

Н.鲍罗廷：《M.M.鲍罗廷其人》 Кто Был Михаил Бородин

《祖国》(Отечество) 1971年第8期。

A.L.斯特朗：《千千万万中国人民》 China's Millions 纽约，1928年版。

L.霍罗布尼奇：《鲍罗廷与中国革命1923—1925》 Michael Borodi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3—1925。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79年版

D.N.雅各布：《鲍罗廷：斯大林派驻中国的代表》 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

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